

毛泽东的读书人生

孙宝义 刘春增 邹桂兰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ISBN 978-7-5098-2403-0
9 787509 824030 >
定价：48.00元

毛泽东的读书人生

孙宝义　刘春增　邹桂兰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的读书人生/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098-2403-0

Ⅰ.①毛… Ⅱ.①孙… ②刘… ③邹… Ⅲ.①毛泽东(1893～1976)—读书方法 Ⅳ.①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420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兵
复　　审:黄　艳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400 千字
印　　张:27.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403-0
定　　价:48.00 元

目录

CONTENTS

一、师生相承篇

二、读书涉猎篇

三、苦读钻研篇

四、读书工具篇

五、批注新意篇

六、创新思维篇

七、实践求真篇

八、壮志未了篇

一、师生相承篇

外婆家的“小小陪读郎”/天资聪颖的私塾生/乡野异士育奇才/府学秀才教“国学”/就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杨昌济先生的高才生/“特立独行”的先生/“敬老尊贤”/“一师是个好学校”/“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

外婆家的“小小陪读郎”

在唐家坨外婆家，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颇有文才，他在家里办了一个蒙馆。这是一种旧式的学堂，是专门给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一般只有一位老师，招收一二十名七八岁乃至十岁左右的孩子入学。

那时，蒙馆里教的，不用说四书、五经，就是最初的启蒙书，如《三字经》等也都是古文，言简意深，七八岁的儿童是懂不了的，所以，老师上课只教学生识字、读书、背书，布置的作业是“描红”写字。

当时，毛泽东只有几岁，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每天，当表哥们去上学后，他就常常独自一人跑到门前的小溪里玩水，到屋后的田里去捉蚱蜢。外婆怕心爱的小外孙出什么意外，便让文正莹的三子，比毛泽东大三岁的文南松，把毛泽东带到文正莹的学堂里去玩耍。可是，谁也没料到，这个稚童竟能安然地坐下来听八舅讲课，跟着学生们一起念书。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他居然也能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背下来。看到毛泽东读书这样有天赋，文正莹心里特别高兴，充满爱意地称外甥为“小小陪读郎”。

文正莹自幼饱读诗书，精通史籍，深知历代的“神童”，都是从小就开始接受教育的，更懂得早期的智力培养对整个人生的重大影响。因此，他有意对聪慧的外甥进行精心培养。就这样，毛泽东这个“小小陪读郎”，在唐家坨私塾度过了正式延师入学前的那段时光，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拿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学前教育。

这期间，文正莹除了在课堂教毛泽东读书识字外，还抽空给外甥教读一些适合幼儿趣味的古诗，像曹植的《七步诗》，骆宾王的《咏鹅》，李白的《静夜思》和李绅的《悯农》等脍炙人口的诗歌名篇，都是他最初教会毛泽东背诵的。后来，文正莹见毛泽东接受能力特别强，就把他在学堂里给学生们讲授

的文章也教给小外甥。

数十年后，当年每天带毛泽东上学的文南松，对从师家父门下的这段启迪童蒙生活，仍记忆犹新。老先生曾对后辈回忆说，那时父亲对毛泽东的期望值很高，望子成龙之心也太切，有时甚至忘了表弟还是个小孩，常常教一些超出幼儿年龄范围的东西。如教毛泽东和他读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千字文》和《六言杂字》，还讲授过曾经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夸着读书人光荣”的《神童诗》。据文南松讲，他的父亲很欣赏这部诗作，诗的作者汪洙为宋代神童，九岁善诗，官至观文殿大学士。在这首诗中，汪洙全部用的是五言绝句，篇幅短小而诗味浓郁，音韵和谐而对仗工整，宣扬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正统思想，故而被父亲列为私塾学童习作诗词的教材之一，不仅在课堂里要求学生认真加以研习，还在闲暇时间把它教给“陪读郎”毛泽东。

文南松记得，当时他和表弟毛泽东都还小，不懂诗中的含义，只朦朦胧胧地记得父亲文正莹说过，这是宣讲读书好处的书，就跟着他囫囵吞枣地背诵，由于该诗朗朗上口，易于记忆，竟学会了不少。这首诗中的不少句子，如“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和“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到老都铭记于心，很难忘掉。

文正莹虽然是一个没有求得任何功名的“布衣”，却有着远大的抱负。他常自叹命运不济，此生壮志未酬，故而把满腔的热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常教导子侄外甥们从小要树雄心，立大志，学得真才实学，将来建功立业。

文正莹对天资聪颖的小外甥所抱的希望尤大，在教毛泽东读书学字的同时，还经常给他讲述古今中外英雄的故事，像“韩信智胜楚霸王”、“梁红玉击鼓退金兵”、“岳飞大破金兀术”、“林则徐虎门烧鸦片”等名篇，不知讲了多少遍。因此，韩信、梁红玉、岳飞、林则徐等英雄豪杰的高大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田里。

文正莹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对当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投降卖国的行径十分不满，常在课堂向学生讲述国家遭受外侮的事，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报国之志。文正莹还教导小外甥毛泽东要好好读书，将来如能考取功名，一定要做个好官，像历代民族英雄那样扬我国威，振兴家邦。

文正莹是一位为人正直，注重节操的乡中儒士，他虽知识不薄，资财不菲，但平素最看不惯那些仗势欺压穷苦百姓的人。有一年，当地一个为富不仁的财东要送自己的儿子到文正莹处读书，被他以面试不合格为由，加以拒绝。当时，年幼的毛泽东对八舅的这一举动大惑不解：为什么唐家坨好多佃户的伢子都可免费到学馆里读书，却把这个家大业大的富家子弟拒之门外呢？文正莹事后告诉外甥，这个人先前也通些文墨，后来利用知识挣了不少钱，回过头来又去专门欺侮四乡八村里那些没文化、没钱财的种田人，赚他们的昧心钱。他由此告诫毛泽东：文化知识是帮助人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的，如若不然，有文化的人变坏则比没文化的坏人更坏。

为了教育毛泽东等子侄们学着“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他曾手抄《家范箴言》一卷，以课学生。《家范箴言》主要内容为文氏家戒和家训，“家戒”有六条，即“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论，四戒攘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家训”共有十则，内容颇为细密，其形式和作用与今天的乡规民约有些相似，故照录如下：

一、培植心田。一生吃着不尽，只是半点心田。摸摸此处实无愆，到处有人称羡。不看欺瞒等辈，将来堕海沉渊，吃斋念佛也徒然，心好便膺帝眷。

二、品行端正。从来人有三品，持身端正为良，弄文法有何长，但见天良尽丧。居心无少邪曲，行事没些乖张。光明俊伟子孙昌，莫作蛇神伎俩。

三、孝养父母。终身报答不尽，惟尔父母之恩。亲意欣欣子色温，便见一家孝顺。乌雏尚知报本，人子应念逮存。

四、友爱兄弟。兄弟分形连气，天生羽翼是他。只因娶妇便参差，弄出许多古怪。酒饭交结异姓，无端骨肉喧哗。莫为些小竟分家，百忍千秋佳话。

五、和睦乡邻。风俗何以近古？总在和族睦邻。三家五户要相亲，缓急大家帮衬。是非与他拆散，结好不啻朱陈。莫恃豪富莫欺贫，有事常相问讯。

六、教训子孙。子孙何为贤知，父兄教训有方。朴归陇亩秀归痒，不

许闲游放荡。雕琢方成美器，姑息未为慈祥。教子须如窦十郎，舐犊养成无状。

七、矜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儿雏母苦最堪怜，况复加之贫贱。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余膳。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

八、婚姻随宜。儿女前生之债，也宜随分还他。一时逞兴骛繁华，曾见繁华品谢。韩侯方歌百两，齐姜始咏六珈。大家从俭莫从奢，彼此永称姻娅。

九、奋志芸窗。坐我明窗讲习，几曾挥汗荷锄。驱蚊呵练志无休，诵读不分夜昼。任他三伏数九，我只索典披图。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右。

十、勤劳本业。天下有本有末，还须务本为高。百般做作尽糠糟，纵有便宜休讨。有田且勤尔业，一艺亦足自豪。栉风沐雨莫乱劳，安用许多技巧。

据文正莹之子文运昌回忆，父亲结合课堂教学，始是教弟弟文南松和毛泽东等学童诵读《家范箴言》，继而要求他们熟记，并引以为为人处世的行动准则。文老先生认为：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在一定意义上，《家范箴言》规范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文氏后嗣们的思想、伦理、道德、行为及人生追求等。特别是悟性极高的毛泽东，自打幼年时期熟读了八舅文正莹编撰的《家范箴言》起，一个人应当“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做一个像八舅一样的好人”等朦胧的思想意识，便已经开始在他的大脑中萌生。

自然，最令毛泽东难忘的，还是在八舅身边度过的那段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童年时光。从两岁多寄养唐家坨起，“根基不稳”的毛泽东，便得到了外婆外公和舅父舅母的格外看待。特别是文正莹，更是对妹妹文七妹的这个“命根子”视若掌上明珠，疼爱有加。在每天的学习之余，他都要让儿女们带着毛泽东到秀美的山冲里去尽情玩耍；闲暇的时候，他还常常带着毛泽东登上唐家坨对面的龙头山，春采蘑菇，夏摘甜苞，秋打毛栗，然后舅甥二人坐在山顶的大青石上，一边品味着野果，一边远眺着山南麓的韶山冲；有时，在皓月当空的夜晚，舅甥二人在家门前的打谷场上铺一领竹凉席，惬意地躺在上

面，一边数天上的星星，一边听文正莹讲述奇妙的天文地理和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动人故事……农家田园生活的浪漫气息和四世同堂大家庭的无穷乐趣，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以致每每父母从韶山来到唐家坨探望外公外婆，他总是避而不见，生怕把自己带回去。

恰在此时，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来到唐家坨，文正莹对毛贻昌说道："石三虽然年幼，尚未入馆就读，但每日到我的学堂里玩耍，也学得了不少的诗文。不过，老是这样也非长久之事，他已到延师的年龄，你这次就把石三带回去吧!"

眼看就要离开生活了五六年的外婆家，就要离开对自己视若亲生的八舅文正莹，毛泽东不由难过得哭了起来。

文正莹也舍不得这个聪明可爱的外甥走。几年来，他经常与毛泽东食同桌、寝同床，手把手地教他读书写字，可谓倾注了比自家孩子还要多的父辈之爱、蒙师之情。眼下外甥这一走，便再也不能天天见面了。但他明白，要使外甥成大器，自应让他早些上学堂读书。于是，文正莹一边替毛泽东揩干眼泪，一边含着眼泪劝外甥跟父亲一道回去。

下午，毛泽东就要上路了。临行前，父亲带着他向外公外婆、七舅八舅和舅妈及表兄弟们辞行。八舅文正莹牵着毛泽东的手嘱咐道：回去后要用心读书，要多识字。他还把自己那本心爱的《康熙字典》送给了外甥，告诉外甥只有多认字，才能读好多的书，懂好多的道理。

就这样，毛泽东告别了唐家坨，离开了文正莹，回到韶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幼学童蒙生活。但是，文正莹的这份珍贵的童年馈赠，毛泽东一辈子都未曾忘却。1951年，他在北京同文正莹之子、表兄文运昌会见时，还饶有兴味地谈起童年时在唐家坨当"小小陪读郎"的趣事，称道文正莹"他才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哩!"

天资聪颖的私塾生

1902年春，毛泽东刚满八岁，开始在韶山南岸读私塾。启蒙老师是邹春培。

毛泽东也是从读《三字经》开始，继而点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据毛泽东的弟媳王淑兰（毛泽民原配）回忆：邹春培对我母亲说：三伢子有些特别，他读书从不读出声来，我给他点书，他就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邹先生就说，你特来读书，不点书何理要得？他就讲，你不要点，我都背得。原来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认得、懂得，因为他开始学会翻《康熙字典》。还有填红蒙字，他就不填，要自己放手写。他写的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还要好些。于是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省先生”。他在家里，除了劳动，就是看书。热天，晚上蚊子多，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凳上放一盏灯，头伸到帐子外面看书；冷天，就干脆不放帐子，困在床上看。

毛泽东小时候很调皮，但很诚实。他的族兄毛宇居回忆说，他在南岸读书时，一次，他和一些小朋友同到一个农民菜园里去摘黄瓜吃。主人发现了，别的小孩一个个跑了，他却不走，忙给主人赔不是。主人倒很赞赏他，说他是个“好诚实的孩子”。还有一次，邹春培的母亲晒盐姜，小朋友好玩，喜欢拿点吃。她就把盐姜放到屋上晒，然后把梯子搬走，并生气地说，看你们哪个还能吃到。毛泽东轻声地笑着说，我们不吃多的啰。他叫同学们拿来一根长线和一根竹竿，自己捉来一只螳螂，把它系到线上，又把线扎在竹竿上，手举着竹竿一攘，螳螂被抛到姜盘里，再轻轻地一拉，螳螂锯齿般的脚即将片片盐姜带了下来。春培的母亲怀疑从哪里来的“天兵天将”，吃了她的盐姜。

毛泽东从小酷爱游泳。有一次，邹先生因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当书读熟后，毛泽东和几个同学到校前池塘戏水。先生回校后，见此情景，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用楠竹板打手心。他出的是“濯足”，毛泽东

不假思索，对以“修身”。先生不禁连连点头。

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到韶山关公桥私塾。塾师是毛咏生。1905年春至1906年夏，他在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读书。塾师是周少希。

据当年同学贺福祥回忆，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不仅能背，还能默写出来。在学习时从不到别人桌上去看，不东逛西走。放了学，在回家的路上，有的同学喜欢抢头，他却一步一步地慢慢地走着，显得文质彬彬，十多岁就有大人风度。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致力于书法。初习欧阳询字，后习钱南园体。这为他后来兼采各家笔法，打下了基础。

1906年秋，转学韶山井湾里私塾，塾师是毛宇居。因离家较远，就读寄宿。据同学刘授洪、郭梓材回忆，毛泽东读书时，“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作，他作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常帮别人作”。他对人很有礼貌，但对无聊捣蛋的人，则力主制伏。他常对人说：“逢恶就莫怕，逢善就莫欺。”

毛宇居回忆：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他最喜欢看的是《精忠传》、《水浒传》、《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后来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毛泽东自己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毛泽东是尊师的。对他的私塾老师邹春培等都很怀念。1959年他回到韶山时，曾用自己的稿费备餐，邀请毛宇居等老人在一起吃饭。席间，他举杯一一敬酒。当敬到毛宇居时，毛宇居立即起立，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即对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除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外，还坚持自学，经常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据王淑兰回

忆，凡是在韶山冲能够借到的书，他都借来读了，连和尚的经书也读。他不仅刻苦攻读，博览群书，而且善于思考。他在读中国旧小说时，发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为什么这些书里的主人公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没有种田的农民？为什么种田的农民当不了书中的主人公？他带着这个问题，询问了很多人，有同学有老师，有少者也有长辈，大家都回答不出来，觉得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纳闷了两年，后来他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颂扬的全部是文官、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让农民替他们耕种。种田的农民终年劳累，吃不饱，穿不暖，哪有条件和机会读书识字？就是识了几个字的农民，又哪能写书立说？所以写书的一定不是农民。他自己解答了这个问题，并从中得到启示和力量，立志发愤读书。他常对小朋友们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1909年秋至1910年夏，在停学两三年后，他说服了父亲，复学于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塾师是毛岱钟和毛麓钟。前者毕业于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远近；后者是韶山唯一秀才，又曾在云南蔡锷部下供过职，见多识广。这期间，毛泽东在其门下读了《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新书。

对这六年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六年私塾为毛泽东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文功底。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毛主席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乡野异士育奇才

1906年秋，12岁的毛泽东，遵照父亲的意愿来到离韶山约5里地的井湾里私塾。这里的塾师郭伯勋，祖上和毛泽东家是世交，他的家兄又同毛泽东的父亲有八拜之交，因而很乐意毛泽东前来就读；加之，蒙馆里的另一位塾师毛宇居，是毛泽东本家的堂兄，也一直希望叔父毛贻昌把堂弟送到他这里，以便就近加强教育与管束。这样，尽管井湾里离上屋场远了些，毛贻昌还是把儿子送到这所私塾来了。

井湾里私塾的塾师郭伯勋先生，是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他颀长身材，白净面皮，眼睛闪着壮年人特有的睿智之光。他的额头很大，光洁无皱，颇有些智者风度。

据说，这位郭先生读过10多年"长学"，不仅饱读儒家经典，而且对文字古奥、义理隐微的易学，也很有造诣。他运用《周易》相术学，对天文、地理、历法、术数、养生等，进行了20年的苦苦钻研，开始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对世人多视《周易》为"筮书"深感不公，认为易理集人类智慧之大成，堪称真正的"天书"。但他同时赞同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魏禧在《左传经世叙》中所言："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若不适用"与未尝读书同"。读《周易》、钻易理也一样，为的是"通世务，达世变"。他不赞成将易学划分为相术、易理两大学派的传统观点，坚信自古真正精通易学的人，必定能够遥观天象，知宇宙生灭；俯瞰地理，察人事兴亡。正所谓：自古深于《易》者，无不洞天达人！九九归一，《易》中卦爻辞皆由相生，有其相即有其术，有此相数才有此易理；阴阳八卦，时空合一，其变化无可穷尽。万物之象，万物变通之理，皆在《易》中……

郭伯勋谈《易》的这些深奥玄妙的宏论自然不会轻易向人去说，就是说了也许没有多少人懂。不过，为了学以致用，有时也按书中阐述的道理，给亲

友乡邻卜个卦、算个命或看看相什么的，竟往往也有几分灵验。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郭伯勋在韶山一带远近闻名，他被人看作是乡野异士，有人甚至称他为“郭半仙”。

对于毛泽东，郭伯勋并不陌生。要知道，毛泽东早以绝顶聪明和淘气顽皮，而使韶山妇孺皆知；郭伯勋也听同行邹春培亲口讲过毛泽东与他属对的事。这些曾勾起过他的好奇心：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少年呢？他倒想亲眼见一见。

开学的第一天，当郭伯勋站在讲台上给新学生讲课并以他特有的眼光与毛泽东相对时，却实实在在诧异不已！他暗自称奇：这个学生好特别！

名字特别！论姓氏，“毛”字即为反手梳头。泽东—润之，泽沛苍生，东来紫气，是为人主之福命，或可曰一条蛟龙，润泽东海之水，而后一飞冲天。

相貌特别，面若妇人，下巴上一颗又黑又粗的乾坤痣。上完课后，郭伯勋急忙把毛泽东叫到他房里特地让他背一段《百家姓》，认真听他的发音。——声音也特别！毛泽东读书的声音娓娓动听，像一副女人腔调，悠扬之中含激越，温厚之中藏刚劲。

郭伯勋不禁重新打量起毛泽东的相貌和体态，这下他看得更真切了：毛泽东生就一双不算太大却长而美丽的眼睛，宽阔光洁的前额下面有两只淡淡的眉毛，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腻，一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在背后飘逸。……在这一刻，郭伯勋记起了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状貌如妇人好女，如妇人好女……”郭伯勋嗫嚅着，“对，毛泽东正是生就了留侯这样的一副相貌！”半晌，郭伯勋用颤抖的手把毛泽东拉到跟前，他凝视着毛泽东说：“润之，好生用功读书吧。观你的相貌，听你的声音，你会有大造化的！”

从此以后，郭伯勋对毛泽东另眼相待，悉心指导，疼爱有加，倾注了比普通学生多出许多的心血。

毛泽东家住上屋场，离井湾里较远，每天往返要走十多里山路。为了他的安全和学习着想，郭伯勋分文不取让毛泽东寄宿在自己家里，并安排亲侄

儿郭梓材形影不离地陪伴着毛泽东，他们白天一起上学，空余时间在一块玩耍，晚上在一个床上困觉，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郭伯勋除了在生活上尽心照顾毛泽东外，更注意他的学习。他找来历代科考中必读的诗书词赋，要求毛泽东刻苦攻读。毛泽东果真聪明，记忆力特别强，读书过目不忘，作“破题文章”总是交头卷,还时常帮助别的同学做。但是，毛泽东的志向终不在科举，因此他常有悖老师的苦心孤诣。

那时，《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左传》之类的经书，已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了，他开始偷偷地读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里将小说视为杂书、邪书，不准学生读，可是毛泽东却不理这些清规戒律，他被小说中那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生动形象的人物性格刻画和精湛的文学表现手法，深深地吸引住了，必欲一读为快。为了防止让老师发现挨“剋”，他便把经书竖起来作掩护，用这种办法来挡住老师的视线，一头扎进小说之中，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

他的这种雕虫小技，常常被郭伯勋识破。有时搞点突然袭击,将看小说入迷的他点起来，要他背诵一段《论语》，他竟也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

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起这段读书生活时，曾经饶有兴味地这样说过：“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虽然，毛泽东有违师命，不读经书而偷看“杂书”、“邪书”，多少让郭伯勋感到不太满意，但他在罚背课文时表现出的惊人记忆力和对古文的纯熟，却令郭伯勋暗自称奇，高兴不已。

郭伯勋思忖：毛泽东不仅生就一副极好的面相，而且绝顶聪明，很有读书的资质，这是成大器者的天赋。不过，他读书的自觉性尚嫌不足，须晓之以理，方可造成良才。

据郭梓材回忆，那时候，他们兄弟俩和毛泽东一起，常常在晚饭后来到二叔的书房，就二叔那一盏桐油灯温课。郭伯勋往往利用这个时间，向他们讲述读书成才的道理，教育他们戒骄戒躁，树立远大抱负，刻苦自觉地读书，立志成才。

郭伯勋有针对性地对毛泽东说：读书光凭天分、凭一个聪明的脑袋，行不行呢？前清翰林大学士彭端淑在《为学一首示子侄》中曾讲过："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摒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由此可知，读书是件不容易的事，仅靠资质聪慧是不够的。那么，它靠的是什么呢？是志气。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正所谓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志之士，纵不能日新，犹当月进，不能月进，犹当岁益。所以，郭先生勉励学生铭记古训，从小立定远大志向，认真读书。

为了给毛泽东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郭伯勋还特地讲了那个"状貌若妇人好女"的留侯张良青年时代虚心求学的故事：

张良出身韩国豪门旺族，其祖父、父亲都当过相国。他虽然生就一副妇人样的相貌，却有着不凡的志向和超人的胆识。秦始皇灭了六国后，张良变卖家产，背井离乡，到外面去结识英雄好汉，决心替韩国报仇。后来，他交上了一位大力士朋友，准备趁秦始皇到各地巡视时谋刺他。公元前218年春天，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当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来到博浪沙这个地方时，潜伏在这里的张良，指挥大力士把一个重约60斤的大铁锥砸向秦始皇的座车，但砸得不准，只把一辆副车砸碎了。行刺失败后，张良隐姓埋名，逃到下邳。失败的教训使他清醒，他感到光凭匹夫之勇是报不了仇的，必须学一套过硬本领才行。于是，他潜心钻研起兵法来。

可是，学习兵法没有名师传授是不成的。这时，发生了一桩事，使他求得了名师。一次，张良外出散步，走到一座桥上，遇着一位身穿土黄色大褂的老

者坐在桥头上。他见张良过来后，有意无意把脚往后一缩，将一只鞋子掉到桥下去了。张良正要继续往前走，没想到老者却责怪是他把鞋弄丢的，很不客气地要他去把鞋子捡上来。张良很生气，但转念一想人家毕竟是个老人，便耐着性子下河把鞋捡了上来。谁知那老者连接也不接，只把脚一伸，要张良给他穿上。张良想，既然已把鞋子捡上来了，索性好人做到底，就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帮老人把鞋穿上。这时，老人才站了起来，边微笑边对张良说："小伙子，还不错呀！是个可塑之才。你如果想学点什么，过五天再到桥上见我吧。"张良听他的口气，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赶紧跪拜应承。第五天，张良天一亮就前去赴约，他来到桥头一看，那老者已先到了。老人生气地对张良说："你跟老人家约会，就该早来一些，怎能让我等你呢？"张良只好认错。那老人说："今天你回去吧，再过五天再来。"又过了五天，张良鸡鸣即起，没想到老人还是先到了，他瞪了张良一眼说："过五天再来吧。"第三次，张良吸取前两回的教训，到了第四天半夜，就赶到桥上，静静地等到天亮。一会儿，老者来了，他对张良露出慈祥的笑容说："这样才对了！"说罢，从衣袖里掏出一部书来交给张良，说："年轻人，拿回去好好地读吧，将来说不定可以为国家出点力呢。"然后，他头也不回就走了。张良借着晨光，将书翻开一看，原来是一部周朝初年太公吕望编的《兵法》。

就这样，张良用自己虚心和谦逊的求学态度，得到了名师的真传。从此，他刻苦钻研兵法，后来终于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

听了郭伯勋这些深入浅出、具体生动的道理以后，毛泽东深受教育和启发。打这以后，他的学习态度比以往端正了许多，读书的自觉性也大大增强了，文章学问更有了长足的进步。

打从真正了解了毛泽东起，郭伯勋对自己的断言更加深信不疑。同时，他对毛泽东的教育也更尽心尽意，特别是在对毛泽东自身的原始美德进行深层开掘的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郭伯勋先生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看错人，一直相信毛泽东能成大气候。据传，1949年10月1日，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年逾古稀的郭

伯勋在广播里听到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时，他惊喜地对家人说："听，毛泽东的声音！像不像女人的声音？我早就说过，男人生一副女人相，一种女人声音，就会主大贵，做皇帝，没错吧？！"

毛泽东对郭伯勋这位老先生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知遇之恩，总是念念不忘的。他深知，正是老师出自于一片爱才之心，对他从难从严的要求，使他掌握了不少有用的知识，并应用到后来的革命斗争生涯之中。因此，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怀着感激的心情，通过各种途径，关心询问恩师和家人的情况。早在1952年11月的中旬，毛泽东少时的老师李漱清和同窗好友邹普勋，到北京看望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打听起郭伯勋一家的事情来。他关切地问他们："井湾里郭梓阁在不在？我在井湾里读书时，他姐对我很好，给我梳过辫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往日学生生活的难忘和对同窗好友及其家人的挂念。郭梓材回忆说，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先后给他家及他本人寄来书信13封，还汇款近2000元，以资助他和家人治病及改善生活。

郭伯勋对于毛泽东一生立身、做人、建功立业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他对毛泽东"虎气"的形成、藐视一切的大无畏精神的培养，就如同对毛泽东进行知识灌输一样，起着开发童蒙的作用。"天命"，中国几千年儒家学说的内核，代表着少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末代封建王朝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无论是王公贵族、文人雅士，还是山野草民、下里巴人，无不膺服于"天命"。正所谓"自古兴亡不由人"。试想，一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在乡间有着很高资望的老先生，以近乎于迷信的神秘色彩，引经据典地去宣称一个年方十几岁的稚童有"帝王之相"，并深信他"日后定会大有作为"，这无异给对方编织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梦，使之产生多么的自豪感和多么强的自信心！同时，它又在世世代代听天由命的山民中，产生多么巨大的震撼力！而且，郭伯勋的断言，又在毛泽东以后的学生生活中不断得到和鸣——在东山小学堂，颇具文才的谭咏春老师看了他的相貌、读了他的文章，不也是断言他有"建国之大用"吗？在北京，名士章士钊第一次在杨昌济的家里看到毛泽东，不是也在他堂堂相貌面前驻足，而后深赞他是"伟器"、"异才"吗？可以想象得到，当毛泽东吟诵着孟子的话："如欲治国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一股

陡起的稀世豪勇、人杰气概，将是怎样使他豪气顿生！催他跃马奋进！

有人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立意要成为伟人。”毛泽东是不是从少年时代起，就立意要成为伟人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基于“舍我其谁”而产生的自信心，是他成功的基石。这种自信心使他本能地认为，他的意志能压倒一切，凡是他希望获得的东西，必定会归他所有。于是乎，在幼年时期，他成为韶山的“孩子王”；在一师求学期间，又被推举为“学生王”；直至大革命失败后，又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当了红色的“山大王”。而这些，则是凡夫俗子们可望而不可即的。

命运似乎也被他那铮铮的“王者之气”慑服。他一生征战，却从未受过一点伤，他十磨九难，却于九死而入一生。秋收起义之初，他落入敌手，竟然轻易逃脱，虎口余生；进攻长沙退到三湾，子弹打穿了他的帽子，裤脚还钻了两个洞，连根毫毛也没有伤着他；胡宗南的大军逼进延安，他率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蘑菇”，子弹从他耳边穿过，打死了警卫战士，他却安然无恙；1948年5月，敌机轰炸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他的住地中了几颗炸弹，连开水瓶和鸡蛋都被弹片崩了个稀烂，他却幸免于难……如果在这些险境中，死神不是向他退让的话，那么历史将要重新书写，可是死神总是退让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恰恰为“宿命论”的传说，找到了一些难以叫人猜测的“谜”。

府学秀才教“国学”

东茅塘私塾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私塾，塾师毛麓钟派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农历十月二十四。祖居韶山冲茅塘屋场。祖父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系嫡堂兄弟，是以诗书而振家声的著名士绅，在满清曾任过几县的县丞，既有文才，又善于词令诉讼，乡间遇有重大纠纷无不请其到场得以调解。父亲毛鼎臣有五个儿子，毛福深居

长，毛麓钟排行老二，还有寿生、喜生、全生。毛麓钟就是生长在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他从小在祖父的严格教育和影响下，生活节俭朴素，学习勤奋刻苦，终于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应考经柯学使甄拔补入郡庠”。科举时代称府学为“郡庠”，也就是说毛麓钟是长沙府学秀才，据毛宇居撰《毛麓钟公传》载：“毛麓钟对于各经史无不揣摩纯熟，诗赋尤极典丽，每试辄冠其首。”据传，他的诗赋，有人抄去背熟，然后去赶考，往往深受考官赞赏，考生多被录取。青年时代的毛麓钟，为了干一番大事业，视国家为家园，四处漂流，“初应江南提督沈茂胜之聘，以其文才襄办军务；继走武陵，为参军何梅岭之书记”。甲午战争后，因不满清朝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愤然辞职回乡，不问政事，闭门隐居，并自诩“韶山小隐人”。

毛麓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是五服内堂兄弟，家庭关系十分密切。毛泽东的父母，对毛麓钟这位有府学秀才功名的族兄，素来十分敬重。毛泽东初发蒙时，偶有调皮捣蛋，学习不肯用功，他们就常拿这位堂伯作榜样，来教训儿子，指望他能像堂伯那样专心攻读，将来学有所成，由于受父母的影响，毛泽东自幼便格外敬畏毛麓钟。每逢年关，在官衙做幕僚、谋士的毛麓钟回乡，父亲总是带着他去拜见这位堂伯，小泽东总是躲在爹爹的身后，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这个穿将校军服，颇有威严的长辈。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最初的目标就是学堂伯的样子，长大以后做一个文武兼备而又受人敬重的人。

毛麓钟辞去军职，回到桑梓之地兴办学堂后，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开办新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用坚船利炮来富国强兵，表现出一股强烈的爱国思想。毛麓钟办学本不为衣食之虞，而是图培养人才，报效国家，因此所取的学生大多是品学兼优的人才。

毛麓钟的家坐落在韶峰脚下。这里树木葱茂，楠竹青翠，在一片绿荫的掩映下，有一栋不小的瓦房，环境清幽。

毛麓钟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他恪守塾师授徒的原则，认为“少则工夫有余，精神足用，自然训诲周详，课程无缺；多则师之精力既疲，而工夫亦有所不及，一切皆苟且简率矣。故生徒以少为贵也。”所以他只收了十来个学生，以精为旨。

正月一过，学生们陆续来到经馆，毛麓钟给他们上了别开生面的第一课：“人为何而活着?”

毛麓钟直接切入主题，像是自问又像是问学生：“我常常思忖：人，为什么活着呢?”先生提出的问题，学生们意想不到一时都没明白过来。

毛麓钟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到底要做些什么？”“人，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人生观上的大题目！同学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才好，只好面面相觑。毛麓钟没等学生们回答，接着讲：“我总在想，一个人来到世界上走一遭绝不能做行尸走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吃穿二字？就是为了成家立业？为了妻儿老小?”他顿了顿继续说：“是呀，‘人在世上走，为了身和口’，许多人都这么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可是，吾辈莘莘学子也能像如此生活着吗？我已年近五旬，多年戎马征战，四处漂泊，一不求高官厚禄，二不为荣华富贵，生平最大的嗜好是置书、读书。这些年来，我每天襄办军务，总要读书至更深人静。这些书本，引起了我许多的感慨！你们看，史书上、小说里，那些忠臣义士、英雄豪杰，都是十分了不起的风流人物！他们或公正廉明，解民倒悬；或血洒疆场，为国立功；或立一家之言，成百世圣哲。因此，他们名垂青史，辉同日月，为后世的人们所钦佩，所纪念，并且一代又一代地流传着他们的英雄事迹，生命力极强，成为永垂不朽的人物。你们都是家乡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是韶山的骄子，当你们在书本中和历代英雄豪杰、圣人先哲会晤时，你们的对话将是什么呢?”

毛麓钟激动了，他向在座的学生们扫了一眼，讲堂里鸦雀无声，学生们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只见他面色绯红，胸脯起伏，拿起粉笔“刷刷”地在黑板上写下：“旷观宇宙，竖画天地，前因后果，无一可恃；而可恃者惟在我横画山川。古往今来，一无可恋；而可恋者，惟在目前。目前之事惟何？即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激，惟有迎头赶上，才能自树立于世界之林。”

毛麓钟接着又讲道：“如今，国家多难，外贼逞凶，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时，黎民百姓沦陷水深火热之中，像尔等七尺男儿，一介书生，正在有为之年，理当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岂能株守家园，无所作为？古人云：‘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依为师所见，雄飞的翅膀就是知识，知识犹如农民的土

地，渔夫的网罟，骑手的骏马，勇士的刀剑。望你们趁大有作为的年纪，认认真真读书，扎扎实实求知识，练出一身真本事来!”

毛麓钟教导说：“志向，乃人之灵魂。人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学，就没有目标，没有动力，好比盲人骑瞎马。志向与理想即主义。人无高尚之主义，即无生活之意义；事无高尚之主义，即无存在之价值；团体无高尚之主义，即无发展之能力。至于勤奋刻苦，则是读书求知的根本。今朝大学问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采撷宋词三首中的各一句，用来形容读书做学问的三种境界，窃以为极是生动贴切，恰到好处。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选择三首词的三句话集在一起，选得很巧，集得很妙，给三句古词注入了新的生命，道出了读书的真谛。古往今来，‘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为了读书求知，谁开始没经历‘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艰苦探索，最后才能到达‘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佳境呢？这种求得真知灼见的愉悦，豁然开朗的欢乐，不亲身经历由淡到苦,由苦到甜的全过程，是无法真正体会到的。”

毛麓钟认为，学习还要不耻相师、不耻下问：“韩愈的《师说》大家读过吗？韩吏部说得好：‘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拿平常的话说就是，生在我前面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比我早，我就向他学习；生在我后面的人，他懂得的道理要是比我早，我也要向他学习。我要学习的是道理，哪管他是生在我前或是生在我后呢？所以不论尊卑贵贱，不论年长年幼，谁懂得道理，谁就是我学习的老师。韩愈的见解相当精辟，大凡是有学问的人都不以拜师求学为耻。你们都在蒙馆读了《论语》，可否记得书中记载着这样的一件事：孔子刚刚做了鲁国小吏的时候，到太庙去助祭。进了太庙，他每件事都向别人请教。祭祀的礼节他在书本上不是没学过，但是因为没有实际演习过，他还是样样都要问个明白。旁边有人看到他这样，就讥笑说：入

了太庙每事问，谁说他是知礼的呢？孔子听了说：每事问才正是知礼呢！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求知要诚心诚意，不耻下问，如果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度量，是学不到真正的知识的。试想昂首向天，除了几片浮云之外还能看到什么呢？”

这堂课毛麓钟从早饭后一直讲到正午。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开学第一课给他们的启示太大了。不少道理是他们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这一课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务虚”的，但它足以使学生们认识了自己的先生，大家深为能选择到这样一位思想、学识、品格都在上乘的先生而感到荣幸，一股对明师的崇敬之情在他们稚嫩的心田里涌动着。

此时，毛泽东已到了懂事的年龄，老师提出的“人，为什么要活着”的问题，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他曾长期思考过但未得到结论。今天堂伯父终于把答案给了自己。人，并非仅仅是为自己而活着，也不是为他人活着，是为国家民族和黎民百姓这个“大我”而活着。毛泽东思考,既然此身并非一己之私，那么就应该将它奉献给公众，去奋斗，去创造，像历代英雄豪杰那样去追求人生的最高价值。他在心里暗自发誓:为了在此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为了像毛麓钟所言，使祖国不再因国力羸弱而受到列强欺侮，中华民族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之林”，从今往后一定要树立远大志向，勤奋刻苦学习，掌握过硬本领，以图日后效力于国家，服务于民众。这次讲课给毛泽东留下了终生不忘的记忆，1959年当他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时，曾深情地回忆说：“那时我能读书，可能是不好好读，后来在家种了两年田，到了东茅塘麓钟二伯父手下读书，才晓得用功了。我二伯不愧是韶山的秀才，教书育人很有办法哩!”

毛麓钟自从给学生们讲了第一课后，逐渐发现在众弟子中，毛泽东禀性最聪明，记忆力最强，诗文也做得最好，因此自然格外关注这位学生，他以特定的眼光认定：自己的这个学生加侄儿极有发展前途，将来在自己所教的学生中，最有出息的当非他莫属，就是毛氏家族中兴的希望，恐怕也要寄托在他身上。从这个时候开始，毛麓钟就抱定了一个心愿：精心培育毛泽东，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去浇灌这棵幼苗，使他长成参天大树。

毛麓钟经常向毛泽东讲述古人立志成才，以图报效国家民族的大道理，

还以他特有的思维方式，把“大道理”与“小道理”结合起来，不时地向毛泽东讲述毛氏家族的兴衰史。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阅读着由毛麓钟保存的那部本房的《毛氏家谱》，从这部编修于乾隆二年的族谱中，他了解了毛氏的渊源。

知道了毛氏家族的历史后，毛泽东才明白老师为什么让自己看那昏黄的族谱：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民族和国家。只有全家团结和睦，家庭才能兴旺；只有全体族人的齐心协力，家族才能昌隆，像毛姓这样华夏最古老的氏族才能经千百年而不绝；只有全民族人民的共同奋斗，国家才能够繁荣富强！

毛麓钟花费心血最多的，还是毛泽东的学习和进步。他除了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外，还十分注意指点他在课外如何读书，悉心引导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古籍。

《史记》是毛麓钟先生给毛泽东点读的第一本史学著作。毛麓钟告诉他：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只有两人，一是与他时代较近的班固，史称“马班”，一是跟他时代较远的司马光，史称“两司马”。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班固的《汉书》，是史学界呈鼎立之势的三部大书，故而有读史必读《史记》之说。受老师的熏陶，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读《史记》。这本书使他对中国历朝历代之事有所了解，并从中懂得一些兴衰与得失的道理。与此同时他还按老师要求，阅读《纲鉴类纂》和《日知录》等书。《纲鉴类纂》是明人王世贞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俗历史课本，《日知录》则是顾炎武精著之书。毛麓钟点读这些书，大大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精神食粮，使他收益颇丰，对他正在形成的世界观有了质的变化。

毛麓钟酷爱历代著名诗词辞赋，尤其喜爱宋词元曲，往往一时兴起，以手击节，低头吟咏，不能自已。他的这一爱好自然而然地感染了学生们。毛麓钟见毛泽东对诗词辞赋也有极大的兴趣，便专心教他朗读、背诵，习诗作赋。

毛麓钟让毛泽东认真地背诵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

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仔细体味其中的意境和缭绕的余音。

毛麓钟又点读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他认为它反映了古人珍视友情的主题，很适合青少年学习和模仿。他要毛泽东学习这首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毛麓钟又将白居易的《长恨歌》抄录给毛泽东：“……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由于毛麓钟的严格训练，毛泽东对诗词辞赋的兴趣越来越浓，他不仅能熟读几百首古诗，即使是冷僻的诗句也能稔熟于心，倒背如流。从南宋“将军诗人”辛弃疾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到陈亮的“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再到庾信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都能即兴吟唱，信口诵读毫无差错。他的这种熟读古诗的兴味和超常的记忆力至老不衰，恐怕与这时的基础分不开。

毛麓钟不但精心给毛泽东点读诗书，而且还教给他怎样去读书求学。老先生是见过世面，有一定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大搞读死书和满堂灌那一

套教育方法，而主张让学生们独立思考，清静无为。平时他经常带领学生们走出课堂，来到私塾后面的龙头山上游览踏青，让学生们领略大自然的美妙奇观，省悟人生的真谛。在那块被儿时毛泽东叩拜为“干娘”的观音岩下，毛麓钟把自己在外谋职的曲折经历和所见所闻尽情告诉毛泽东，并向他和同学们介绍祖国的大好河山，教导他们热爱名山大川，在美丽的大自然中陶冶性情，养成高尚的情操，广博的胸襟。

为了启发学生把课堂学习与社会联结起来，也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毛麓钟结合课堂教学，常向学生讲述古人读千卷书、行万里路，探寻世上万事万物奥秘的事例，灌输学以致用，“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适用”，若不适用“与未尝读书同”的道理。他在给毛泽东点读《史记》和《日知录》时，就曾讲过司马迁和顾炎武的治学精神，认为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提倡实地考察研究，遇事穷源探本，其治学态度堪称一代文人之楷模。毛麓钟对太史公司马迁尤其推崇，要毛泽东多读《史记》，说是“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一以发为文章，故气势奔放，雄视百世”。受老师的影响，毛泽东“迷”上了《史记》和其他典籍，司马迁的文章及其行谊，都使他深为折服、感佩。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这大概是毛泽东当时读书的心得吧。

在东茅塘私塾，由于毛泽东学习刻苦认真，又聪明过人，且有超常的理解力，课堂授课已不能满足他的知识需求量，毛麓钟先生只好经常给他“开小灶”单独授课。

单独授课讲什么内容呢？一般的诗书，课堂上已讲过许多篇章，毛泽东在课余时间也自学了不少，毛麓钟不愿再在这方面花费很多工夫，像天下的为人师者都有自己的“绝活”一样，他也想把人世间最深奥的道理讲述给毛泽东，把书海中的精华采撷下来传授给高足。

这期间，毛麓钟根据自己对毛泽东的期望值，辅导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等书，并进行了耐心的讲解。

这两本书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治乱兴衰之书”，是仕人必读之书。毛麓

钟以此授之，足见其良苦用心。毛泽东这一时期所受的教育，不啻是“中国治乱兴衰之学”的启蒙教育。

毛先生多年从军，没有积攒多少家资，却置下为数可观的书籍，其中有不少还是书中珍品。不过嗜书如命的他从不轻易拿出这些书示人。可是有一天，毛麓钟却破例把毛泽东带进了他的书房。

跨进老师宽敞的书房，看着四周依墙而立的书橱，毛泽东惊异地赞叹道：“唉呀，二伯，你这里书可真多呀!”

“嗯！”毛麓钟点了点头说：“石三，坐吧！上次你读了《纲鉴类纂》有什么心得呀?”

“二伯，读了这本书，我以为对中国历朝之事有了些了解，也懂得了些兴衰与得失的道理。只是觉得简要了些，更深的知识不知道。”

“嗯，是的！这是一本根据《通鉴纲目》编写的通俗历史读本，自然写得肤浅了些。今天我准备让你再看一本书。”说着他从一个书橱里抽出一本线装书，递给他的学生。

毛泽东看了看书名，欣喜地问：“《资治通鉴》？”

“是的，这是一部很有名的史书。凡二九四卷，另有《目录》、《考异》各三十卷，所记千余年史事，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之故为中心。你拿去好好读一读，或许有所裨益。看完后我还想同你探讨一番呢。”

“好的，二伯！”毛泽东高兴地从先生手中接过这本书，恭恭敬敬地向毛麓钟鞠了一躬，告辞了。

三个多月以后，毛泽东把《资治通鉴》通读完毕，当把书送还给毛麓钟时，他感到自己多有受益。他心中暗想如果再同老师谈起历史，自己不至于一无所知了。

这以后不久，毛麓钟又教毛泽东阅读了堪称“成功宝典”的《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是盛唐开创者李世民逝去几十年之后，一个叫吴兢的唐朝史官，以生动真实简洁明了的文风，运用对话夹轶事的形式，追记了这位皇帝

的非凡政绩与生平经验，以及他与他的聪明多谋的大臣们讨论的种种问题，所进行的多番争议与论辩，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治理国家、控制权力、调度人事、平衡利害、驾驭臣僚、考察人心、防备腐败、消除隐患等的“统治谋略大全”，并将其命名为《贞观政要》，遂使该书成为“中国兴衰治靡之学”的第一经典。自其问世以来，未有哪一个后世中国皇帝敢不用心拜读。作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之集成，该书亦系“朝野上下必备”，“人世为人必读”的教材。历代从官僚阶层到草野人士，该书的哲理、教义、格言、名句，俱被反复研讨广泛援用。

毛泽东很快就完全被这本书所吸引。他发觉《贞观政要》十分奇特，它极为朴素平白，却又丰富博大，作为一部忠实的历史文献，它不加修饰地辑录了唐太宗的所说、所为、所想、所感，以及所犯的错误。同样也不带忌讳地记述了一代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等人对唐太宗的规劝，批评甚至指责，以及唐太宗与众大臣之间坦率的讨论与争执。而作为一部政论性的历史读物，它又一反历史传记中通用的编年式的烦琐写法，而对唐太宗的治国经验与思想进行分门别类，共立40个篇目，多以故事、轶闻等实例为引子，生动有趣，概括集中，清晰明了地进行记叙与评介。这40个篇目，涉及了权力、体制、政策、人事、品德、欲望、名分、淫乐、竞争、奖惩、灾祥等内容，十分广泛。其间涉及的众多唐代名流，俱是富有个性，处处形象鲜明，时时妙语横生，每每机智过人。其取譬之机警，举例之巧妙，诘问之尖锐，立论之精辟，尤其令人叹为观止。

这部书的确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诸如“明君与昏君之别”、“草创与守成孰难”、“居安思危”、“反对‘一言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国犹如栽树”、“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知心者智，自知者明”、“防微杜渐”等，都能熟记于心，恒久运用。大唐皇帝和文臣武将“治国平天下”的韬晦、谋略、策略，成了他以后处理党内斗争，对待“反对派”的一个“法宝”。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封建文化的沉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社会管理学。

就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名士荇，字运昌，亦作润昌、咏昌，排行十六，是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次子，毛泽东称他为“十六哥”。

文运昌早年毕业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任过小学老师和中学庶务。他比毛泽东长九岁，生平赋性刚直，自幼与毛泽东交往亲密，情同手足。1910年，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父亲毛贻昌决定送他到湘潭一家与自己有往来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毛泽东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外婆家那边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便不顾父亲的反对，要求到那里去读书。

此时，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正在那所学堂上学。文运昌向他介绍了这个学堂的情况及其“新法教育”的改革，说那里不那么注重经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比较“激进”的，并极力赞成他到该校读书。这样，更坚定了毛泽东去那里读书的决心。他与母亲商定，邀了舅父文玉瑞、文玉钦，还有表兄王季范、塾师毛麓钟等人，劝毛贻昌送儿子读书，最后终于得到父亲的同意。于是，毛泽东便随文运昌到了那所学堂。文运昌替他办好了入校注册手续，并作了他的入学担保人。表嫂刘氏还将毛泽东从韶山带去读书的青色蚊帐换成白色蚊帐。

这所学堂，便是毛泽东离开风气闭塞的韶山冲以后，走进的第一个新式学堂——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当时，它是远近闻名的一所学校。1905年前称“东山精舍”、“东山书院”，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地方，学费和膳费都有相当可观的津贴。可是毛泽东既不是湘乡人，又没有特殊的“背景”，因此，有人不同意录取他。然而他在入学试题中，做了一首《言志》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抒发

了自己求学以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校长李元圃阅后，大感惊异，兴奋地说：“今天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极有意义的生活时说：“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招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了140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16岁。”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能写一手好古文。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国文老师阅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当时，流传到该校的新书报很少，毛泽东经常向文运昌借书。文运昌说：“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还是要先打条子后拿书啊!”因而毛泽东借书有借条，还书有便条。毛泽东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或用手小心地压平，或用屁股坐平，然后“完璧归赵”。这时，文运昌也多方为他寻找书报，向毛泽东推荐，以满足他的求知欲。在文运昌推荐的书中，令毛泽东爱不释手的有两种，一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二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毛泽东说：“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1915年寒假，毛泽东回家过春节，来到外祖母家，向八舅父、八舅母拜年，顺便向文运昌归还了《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并留下了一张还书便条：

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即1915年2月24日）

又“国文教科”两本，信一封。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了半年书，这年期考，成绩优异。校长李元

圃和国文老师贺岚纲应聘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推荐毛泽东去那里读书。此事受到父亲的阻挠，毛泽东又请八舅父、表兄文运昌及老师们，劝说父亲让他去长沙读书。父亲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临行前，毛泽东抄了一首诗，包上一张相片，夹在一本书内，交给文运昌，请他转交给父亲。诗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抄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青年政治家西乡隆盛，又略作改动，以示他求学的愿望和志在四方的决心。新中国成立后，文运昌把这首珍藏了40余年的诗，连同一本毛泽东亲笔签名的书和一张照片，一起上交了人民政府，成为研究毛泽东早期生平的宝贵资料。

文运昌既是毛泽东的表兄，又是他启蒙时代的先生，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生中有过多次接触和书信往来。新中国成立后，文运昌被选为湘乡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又担任了湖南省文史馆馆员。他经常通过书信向毛泽东反映乡间情况，并先后多次进京与毛泽东会晤。毛泽东对这一位表兄十分尊重和关心。开国大典之后，他就向由家乡进京来的堂兄弟毛泽连详细询问外婆家人，尤其是文运昌的情况，并请毛泽连捎去信件和礼物，转达对外婆家人的问候之意。1950年4月19日，他又给文运昌写信：

运昌仁兄如晤：

接到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予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

顺颂

安吉

毛泽东

信发出后，毛泽东仍不放心，担心文运昌收不到，1950年5月7日他在致表兄文涧泉的信中询问道："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接到否？"1950年5月12日在致表兄文南松的信中又一次询问道："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事后，直到文运昌给他复信，才算放下心来。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为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

爱的外婆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婆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作为一位伟人，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他生长的社会环境所影响。他从小就常在外婆家生活，在那里，他有过欢乐的童年，外婆家的成员对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后来，他能走出韶山冲，走出湖南，走向全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婆家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像文运昌，对他更有深远的影响。

杨昌济先生的高才生

杨昌济，字华生，又名怀中，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板仓杨家，可谓是书香门第。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但没有做过官，一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父亲杨书祥，字书椎；母亲向氏，平江县石洞人，其父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乃诗书世家。向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勒伯丁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在此期间，杨昌济与后来成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相识了，并建立起亲密的师生情谊。以后，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情谊日渐加深。杨先生不仅以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毛泽东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杨昌济归国之初，应聘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这时，结束了定王台半年自学生活的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后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

到一师任修身教师，毛泽东也转入合并后的一师继续学习。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千百计，但却对毛泽东尤其欣赏。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他对毛泽东的出身、经历，专门作过一段详尽的记载：

>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杨昌济写下这样一篇日记实非偶然，他的确十分器重毛泽东。在两年多的教学活动中，杨昌济以他的慧眼，通过对毛泽东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发现这个性格潜沉冷静、行为洒脱不羁的湘中青年，却原来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毛泽东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顽强的意志，非凡的胆识，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等等，都令他刮目相看。身为一个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老师，杨昌济尤其赞赏毛泽东那独特的为学之道——他在不断的摸索和借鉴中，选定自己的学习目的是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之真谛；他认识到学问在于勤学积累，因此严格要求自己刻苦攻读，持之以恒，成为一个“苦读生”；他拜师访友，求学问道，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求教，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他不动笔墨不看书，自觉养成独立思索的精神，在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博与专的相互关系上，均已形成自己独到的看法；更为可贵的是，他不读死书，而是不断地面向实践，立志读通社会这本“无字之书”……

杨昌济知道，在第一师范还有许多老师和学生对“资质俊秀”的毛泽东甚为器重和钦佩。虽然毛泽东偏重社会科学，不愿意学数学，但数学教师王立庵仍十分喜欢他，常利用节假日让他到家中补课，阅读家里的藏书，还为他提供食宿。国文老师袁仲谦也很赏识他的文学才华，对他精心培养。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彭道良曾由衷地说，“我与二十八画生同班同学，颇知其为人品学

兼优，且具独立特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今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毛奇，且语意双关。”同学陈赞周亦曾称赞道：“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仰视之概……”

透过毛泽东个性中显示出来的许多极富特色的品质，杨昌济认定毛泽东是个特殊的学生，如多加点化，定会前途无量。故鼓励毛泽东以梁启超等湖南的杰出人物为榜样，努力学习，将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此后不久，在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教室的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以此抒发他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激越情怀。

毛泽东后来给已赴京任职的原一师历史教师黎锦熙的信中曾写道：“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先生“弘通广大，最为佩服”。

在当时一师的教师当中，论口才，杨昌济并不很好，但他既博学多才，又注重实际，所以授课仍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加之他与一师的一些资深教师，如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易培基等人过从甚密，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吸引了一批“尖子”学生聚集在他身边。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听讲非常用心，并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杨昌济家中请教。

尤其是毛泽东，把到“板仓杨寓”聆教看作是比课堂听讲还要重要的一种学习机会。在这里，他或请教治学做人方法，或求解疑难问题，或纵谈天下大事，只要所学，必多裨益。

杨昌济深感这些好学上进的学生十分可爱，很乐意和他们交往。他从毛泽东、蔡和森这批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年身上，看到了人才脱颖而出的希望，感到无限慰藉，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他除了在课堂讲授“修身”、“教育学”两门课程外，还动手自编了《论语类钞》等教学参考书，还翻译了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将这些书籍和讲义送给前来求教的学生，供大家学习和传抄。如毛泽东就曾手抄《西洋伦理学史》七大本，十余万字。

为了使学生不囿于课堂知识，把学生从“小课堂”引入“大社会”，杨昌济在浏阳正街李氏芋园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成员有黎锦熙、方维夏、

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从1914年冬天到1915年秋，每逢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杨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来读书的心得拿来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边一个人的日记看看。

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等人没有回家，就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和王立庵二先生辅导哲学和数学。通过杨先生悉心而又系统的指导，毛泽东很快"接触到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从他那里"受到融合中西方思想为一体的教育"。

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也有一段有关毛泽东不辞辛劳到他家拜访请教父亲的回忆：1916年暑假，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120华里，来到我们家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板仓。毛泽东在板仓期间，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新订的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

在一师时，给毛泽东以教诲和影响的老师很多，如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王立庵、方维夏、王季范等。但是，对他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紧密的，当首推杨昌济。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是文化知识的，又是思想人格的。对于毛泽东来说，杨先生诚如他后来赞叹的那样，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他的道德楷模。

对于毛泽东而言，他从杨昌济那里最大的获益，莫过于理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

杨昌济常对毛泽东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是人生的高境界，要臻此完美地步，就必须"立志"，必须经受住意志的磨炼。他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时，对学生这样讲道："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因此，他要求学生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服务于社会，不要谋官，不要混世，不要光为个人打算，真正做一个公正、有道德、有益

于社会的人。他认为，为人一定要有理想，要研究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强调个人应该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但绝不能牺牲自己信仰的主义。他说：“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杨昌济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他在听课笔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表明开始懂得“高尚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已经做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奋勇献身的精神准备。他在1917年8月给老师黎锦熙的书信中，进一步抒发了他确立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本大源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宏图大志：“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从此直至终年，毛泽东一生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奋斗——他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影响，他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然而当他把这些人物、思想和主义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这个伟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之后，如有发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便毅然摒弃，继续探求新的真理。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支撑他在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探索道路之后，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杨昌济极为注重个人的人格修养和修身，并将仁、义、礼、智、信、恕、诚、忠、敬、静等作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准则。他认为，待人以诚，律己以严，是修身之本。他在日记中将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观；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无简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

轻发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意。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以此为基点，在生活作风上，他主张严谨刻苦；在言行方面，他坚持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等；在生活磨炼方面，他做事勤勉，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珍惜时间，废止朝食，冷水沐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应酬等。这些在学生们中间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争相效仿。

据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当时有的同学喜欢在寝室里谈论个人和家庭生活琐事，有的同学喜欢谈论男女之间的事，还有的同学在言谈中羡慕升官发财的人。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和同学订下“君子协定”，相约做到“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有一次毛泽东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原来约定是要讨论社会问题的，不料这个朋友却侈谈生活琐事，并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佣人叫来，为买一点肉的小事仔细吩咐了半天。毛泽东对这件事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以后便不同这个人往来了。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危急是如此严重，青年肩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求学求知的需要又是如此迫切，哪有闲情逸致谈论那些呢？他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一师学生罗学瓒在一首诗中，描述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的这种高尚情趣：“开怀天下事，不谈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存。光芒垂万丈，何长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妖孽根。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

“格物致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读书人奉行的一条出仕入世之道，杨昌济自然也跳不出这个儒家政治文化的框架。所不同的是，他不把修身本身当目的，也不为步入仕途而修身，目的在于实践于社会。这种实践于社会的“力行”，表现在躬行实践的杨昌济身上，便是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潮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江山孰主持”的济世感叹。不惜远涉重洋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倡导“改革思想，提倡真理”，“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并为此而奔走呼号。当他的政治抱负在腐朽社会制度下难以施展时，他最后选择的人生

之路则是以修身为本，以教育为天职，通过培育长天之才，达到治国的目的。杨昌济的这种榜样，对毛泽东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成为伟人的毛泽东，就像他的老师一样，力求知行统一，言行一致，躬行实践。

在治学上，杨昌济注重于博与精两个方面，可以用“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个字来加以概括。毛泽东读书之博之勤，以及专心研究问题的执着精神，在读书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都是向杨先生师法的。杨昌济虽然出洋留学近十载，但他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强调学习外国要结合中国的民情国情。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虽然倡导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借鉴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又要求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杨昌济超越时空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中西学关系问题的真知灼见，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不仅接受了老师的这些思想观点，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学习精神上，杨昌济鼓励学生树立刻苦勤勉的学风，作日积月累的知识储蓄，做到久积成学，以久制胜。他自己率先在这方面给学生做出了样板。在一师执教时，尽管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勤奋读书、写作。即使是学生来家请教学问，待解答完各种难题送走学生之后，他仍要挑灯夜战，读写一阵子方才罢休。就是靠这股钻劲和挤劲，他编写出版了《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和《儿童侦探》等著述。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和《西洋伦理学史讲义》。

向老师学习，毛泽东也成为刻苦治学的范例。他在一师读书的几年中，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在一本不很厚的《伦理学原理》的书上，他写了1.2万多字的评语。在他最喜欢读的《韩昌黎全集》中，圈点、考订、批评和称赞，朱墨纷呈，琳琅满目。因此，他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苦读生”。

此外，杨昌济还非常重视自学。他当时同时兼任三四所学校的课程，教学任务十分繁忙，但仍抓紧时间刻苦自学，并能坚持不懈，他天天写日记或读书笔记，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出了表率。以老师为榜样，毛泽东订立了严格的自修计划，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用自习时间阅读

的……杨昌济在教学当中，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他认为，一个好学生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知识，还要有强健的体魄，这样才能在将来担负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能担当重任。因而，他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加强体格和意志锤炼的教育，要求学生“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刻苦顽强地坚持体育锻炼，不断增强体质。

杨昌济不但是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而且是一位体育活动的实践者。他长期以来坚持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方法，并收到健身养生的功效。他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积极指导实行，以此推进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杨昌济关于“三育并举”、“身心并完”的教育思想以及大力提倡体育活动的做法，很对毛泽东的心路，因之深受他的欢迎和赞同。

毛泽东在12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人变得十分瘦弱。后来辍学在家，从事两年多的体力劳动，身体反倒日见强壮起来。这种亲身体验使他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身体全在于锻炼。以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和知识的日渐丰富，熟读文书的他，看到历代名贤都很看重身体的锻炼和意志的磨砺。孔子重视体育，“射于矍相之圃”；孟子奉行皮肤哲学；李刚提倡“主文而兼武”；颜习斋推崇“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力行“以动养生”，年迈而漫游天下。而颜回、贾谊、王勃、卢照邻诸人，虽有才华，却都短了命，皆因身体不健之故。出于对前贤的效法，他对身体锻炼也日益重视。进入一师后，由于良师的熏陶，已开始确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毛泽东，受强烈使命感的驱动，对体育的作用看得更清楚，在认识上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感到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一旦身体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不把身体锻炼结实，就不配谈救国救民。所以，他认为体育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平均发达，不仅要强筋骨，还要强意志；不仅在于养生，还在于卫国。为了能够实现生平的抱负和志向，将来承担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重任，一定要像杨昌济要求的那样，努力学习、刻苦锻炼，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具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壮体魄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师法杨昌济，毛泽东成为一名体育活动的爱好者和全校最顽强的锻炼者。毛泽东参加的锻炼项目很多，根据他的回忆，主要有远足，爬山，冷水浴及雨浴、日光浴、风浴，露宿，游泳，六段操运动，等等。

经过数年的锻炼，毛泽东感到自己受益匪浅——他正朝着“身心并完”的方向发展。但是，正在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的毛泽东，精神上并不觉得轻松和心安理得，他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另一种现状：整个教育制度存在着德智体三育脱节、“偏于智而略于体”的弊病和“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的谬误，学校教育把体育当作“杂科之末”，极不重视体育锻炼。

于是，他产生了从事体育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念头，以阐明自己通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老师杨昌济，得到他的赞成。杨昌济还和他一起专门讨论了文章的体裁、结构和选材等技巧方面的问题，指导他拓宽思路，放开手脚，结合所学过的修身、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和历史掌故，写好这篇文章。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花了几天时间，写就了一篇长达7000余字、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经杨昌济加工润色后，推荐给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于1917年4月1日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

《体育之研究》是一篇十分出色的文章，它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的历史价值不独是学术上的，还在于思想观念上的。

然而，值得提请人们注意的是，当年作为青年学生的毛泽东上述这一切思想框架的构造和产生，是绝非偶然的。在他的身后，有一位比较高的导师——杨昌济先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1913年在四师与杨昌济相识至1920年先生谢世，毛泽东承蒙老师长达八年的教诲之恩，良师的谆谆教导如春风化雨，催他成才；再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经过28年风风雨雨的磨炼，他终如老师所愿，长成了一株拄天大木——成为中华民族这泱泱大国的主席和数万万中国人民拥戴推崇的伟大领袖！

前人栽树后人歇荫。成功越是巨大，好念旧情的毛泽东越是忘不了杨昌济老师的再造之恩。怀念之情夹杂着些许忧愁和感伤，常常啃噬着他那颗永

不安逸的心——杨先生走了，开慧也走了，他们未能等到同毛泽东一起分享这成功的喜悦，胜利的滋味……每逢思虑到此，杨先生那清瘦的面容，伏案辛劳的情景，便一一浮现在毛泽东眼前。他想，老师毕生事教，为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可他积劳成疾，不到50岁就与世长辞了！他就像春蚕一样，取天地万物之精华，经几番生死之蜕变，最后从腹中吐出那晶莹剔透的银丝，来造福于人，而自己却劳累困顿而死……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品格，多么可贵的奉献精神！

毛泽东由杨昌济先生联想到他的其他许多老师——邹春培、毛宇居、谭咏春、贺岚岗、符定一、袁仲谦、王立庵，还有徐特立、黎锦熙、王季范等，再通过这些老师联想到全中国千千万万的教育工作者，他觉得这些人也和杨昌济先生一样，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可贵的奉献精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解放前后一直是在从事冷冷清清的教育工作，一直是在为教书育人“吃粉笔灰”，这些人今天的生活怎么样了？是否都健康地生活着？看来有必要制定一些政策，要保护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工作条件，照顾好他们的家属子女，让他们全心全意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毛泽东的思绪从国事上又回到家事上来。他想杨昌济先生不愧为一代杰出教育家，他的家属既是毛泽东的至亲，也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于私于公他都责无旁贷，当尽心尽意、尽心尽孝地关心照顾他们。

为了保证向振熙老太太安度幸福晚年，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她的生活，并供给足够的生活费用。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毛泽东就用自己的稿费按月给老人寄生活费，哪怕工作再忙，也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有时检查发现秘书忘寄了，他便叮嘱要补寄。就这样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

1962年11月15日，惊悉老岳母逝世，毛泽东心情十分哀痛。他亲自起草电文，让秘书火速给杨开智致电，表示哀悼。唁电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毛泽东对岳母杨老太太的一片孝心，寄托了他对夫人杨开慧的满腔炽

情，也体现了他对老师杨昌济无比崇敬和不尽的思念之情！

“特立独行”的先生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按徐氏辈分又名徐立华，1877年2月1日出生于长沙县五美山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现名是后来才改的。

在第一师范，徐特立是位与众不同的老师。

徐特立不仅品德和学识堪称一流，还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套良好的学习方法。而后者，对于求知若渴的毛泽东，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

当时一师学生课外自学已成风气，但在读书中存在着贪多图快、不求甚解的毛病，因而读得多，忘得快，效果欠佳。针对这种情况，徐特立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读书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的经验，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之法”。

毛泽东十分钦佩徐特立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他知道，徐先生少年时代只读过六年私塾，后来除在宁乡速成师范读了四个月书，到日本进行过短期考察之外，没有进过别的学校。他渊博的学问都是自学得到的。

一天课后，徐特立正坐在教师休息室看书。毛泽东走了进来，他问道：“徐先生，您读书的经验，可谈一些出来，让我们仿效吗?”徐特立亲切地回答说：“润之，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通，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读书，虽然进度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很重视徐先生的读书经验，也是实践徐先生教学主张最有成效的人。

《讲堂录》是现今保存的毛泽东学生时代唯一的一个学习笔记本，珍藏

在“湖南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讲堂录》是一个9行直格笔记本，共94页。它所记内容的庞杂，我们从中似乎可以窥见毛泽东当年经济并不宽裕，因而不能分门别类地用几个本子记各自不同的学习科目。但就在这个不太起眼的听课和读书笔记里，它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却是相当广泛的。从这些笔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学思结合的读书特色。

经过徐特立几年的熏陶，及至一师学习后期，毛泽东已把“不动笔墨不看书”当作读书的习惯定式，坚持不辍。他听课写有“讲堂录”，课后读书有读书笔记和批注，阅报写读报摘记或札记。同时，还有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以及摘录精要的摘录本。例如，杨昌济先生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成书，毛泽东就把译稿借来，一字不漏地全部抄了下来，然后进行阅读。此外，毛泽东还坚持每天写日记。

这样，经过数年的辛勤积累，毛泽东所写的各类笔记本有几网篮之多。他很珍爱这些笔记，毕业时携带回老家韶山收藏。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抄他的家，将这些本子和书籍全部搬到房前焚毁了。毛泽东的塾师毛宇居，从火堆中抢出两本书籍和一个笔记本，这本笔记本就是现存的《讲堂录》。

从一师时期起，毛泽东养成的手中无笔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后来他几十年坚持不废。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保存的他阅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这些琳琅满目的，由毛泽东亲笔批注的书籍及批注的文字，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它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不动笔墨不看书”，徐特立传授的这条读书秘诀，曾使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受益匪浅。

正当毛泽东在徐特立、杨昌济等良师的引导下，像蜜蜂一样在知识的花丛里尽情地采撷花蜜的时候，国内政治局势日益恶化了。

一师是当时政府认定的“动乱窝子”，自然也是湖南教育界开展反帝倒袁运动的中心。因之，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等率先响应，立即放下书本，走出课堂，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之中。

5月9日，《湖南公报》发出袁世凯正式承认“二十一条”的号外：“北京

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48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消息传来一师，师生群情激愤。与邪恶势力毫不妥协的徐特立此时奋不顾身，勇赴国难。通过新闻媒介得知消息后，立即同杨昌济、方维夏等先生商议，决定编写一本书，彻底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企图复辟帝制的丑恶嘴脸，通过他们几天通宵达旦的努力，一本题为《民耻篇》的小册子与广大师生见面了，师生们进行反袁斗争有了武器。稍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加剧，指使他的亲信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筹安会”，大演“劝进”丑剧。湖南也出现了这股复辟逆流，禁止各报刊登载反对帝制的文章，压制各种反袁言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对这股逆流进行反击，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学生，共同主编了一本反袁小册子，汇集了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的反袁言论，定名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的主张》，到处散发。毛泽东更是义愤填膺，他在学校进步教师徐特立等人编印的揭露袁世凯卖国行径的补充教材《民耻篇》上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了他要勇敢地站出来，和进步的青年学子一道，肩负起为国报仇雪耻历史重任的决心。

这期间，最叫人荡气回肠、最令毛泽东难忘的，是徐特立拔刀断指、誓死反袁的壮举。一天，在长沙修业学校兼课的徐特立，应邀向该校师生作时事报告。会上，他慷慨陈词，历数袁世凯对外执行屈膝投降政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在湖南枪杀所谓“党案”牵连者数千人，为其复辟帝制清扫道路的滔天罪行……越讲越激昂，越讲越悲愤，声色俱厉，热泪如注。突然，他纵身从讲台上跳下来，跑进厨房，取来一把菜刀，当即砍断左手小拇指，以示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愤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顿时，血流如注。徐特立即以指蘸血，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交给即将赴京请愿的湖南立宪派人士罗峙云（又名罗杰）等人，然后就晕倒了。事后，湖南省内外的一些报纸纷纷报道这一新闻，有人还作了一副对联予以赞扬：“罗峙云仗义执言，效申包胥之哭；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霁云之风。”南霁云系唐朝将领，以忠贞报国、视死如归而名垂青史，人们以徐特立比南霁云，借以称颂他的爱国义举。从此，徐特立的美名蜚声湖南，传遍全国。

1916年6月，袁世凯在护法运动的压力下，众叛亲离，只当了83天皇帝，就

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随后，北洋军阀汤芗铭也兵败离湘。包括一师师生在内的湖南人民的反帝倒袁斗争，宣告胜利结束。

后来，毛泽东回忆起他和老师徐特立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中的情形时，说："我们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反袁斗争胜利后，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了。自此，他和老师徐特立为了各自的事业分别了。不期这一别竟是六年，直到大革命时期才在长沙相聚。

1925年的春天，毛泽东因病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回到湖南，一边养病，一边从事农民运动。这次回归故里，毛泽东在长沙拜会了阔别多年的老师徐特立，师生进行了促膝长谈。

在叙谈了别后的情况后，徐特立向学生袒露了自己的苦闷心情。毛泽东听后对老师说："社会制度不好，恶势力当道，是没有人管教育的。你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说不定会被人用去干坏事，为虎作伥。可见在现时教育救国的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动员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彻底砸碎旧的社会，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创造一个劳苦大众的天下，教育才有希望，才有出路。"他还以中共负责干部的身份告诉老师："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造就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而眼下正全力做这样的事，到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发展全民教育之时。"接着，毛泽东向徐特立谈了自己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看法和主张，也吐露了此次返乡将全力推动湘省农运的计划，最后恳请老师出山参加和支持湖南农民运动……

同徐特立会见以后，毛泽东即以自己的故乡韶山和湘潭为中心，点燃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这次会见及与毛泽东的谈话，对徐特立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他思想观点转变的起点，也是他整个人生转折的开始。

1930年，徐特立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国内。

到上海向中央报到述职后，徐特立即奉命赴苏区。他化装成商人，假道香港、潮汕、大浦，穿过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封锁线。于当年12月30日安全到达赣南根据地。就在这天，中央苏区广大军民正在欢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活捉敌人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伟大胜利。而统一部署指挥这次震惊全国的战役的，就是他当年的学生毛泽东，以及在南昌起义结识的战友

朱德。

在宁都小布赤坎，有一幢两层楼的民房，这便是红一军团的总部。在这里，徐特立见到毛泽东、朱德，见到了同是老教育家的董必武……新朋故旧喜相逢，说不出的亲切和激动。从此，他就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左权等住在这幢简朴的民房里，共同开创开天辟地的伟业。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毛泽东就请徐特立去担任教育俘虏的工作。徐特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深入被俘官兵之中，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便帮助认清个人和家庭受苦的根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为穷人翻身而打仗的革命道理，使这些俘虏兵受到深刻教育，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使红军队伍不断扩大。

长征胜利结束以后，徐特立和全体红军将士一样，有着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喜和庆幸。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感到由衷的叹服。联想到韩愈所讲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感到应该好好地向自己过去的学生毛泽东学习，更加自觉地接受他的领导。

这期间，当人们提起他曾是毛泽东的先生时，他总是真心诚意地说："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只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是我的终身之师——是他带我这个老朽走上了革命道路。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言语之中，充满着对毛泽东的爱护尊重之情。

毛泽东对徐特立也是十分信赖和敬重的。到达陕北以后，因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牺牲，毛泽东亲自提议徐特立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又任命他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之职，给这位老教育家创造了一个为边区教育事业大展宏图的机会。

1937年2月1日，是徐特立60岁的生日。1月30日，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举行60寿辰庆祝大会的前一天，正忙于制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毛泽东，怀着对师

长的尊敬心情，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给徐特立，为他祝寿。信中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采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则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60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毛泽东的这封信，高度地概括了徐特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热情地赞扬了他作为一代师表所具备的崇高品格，充分表达了一位学生对老师的崇敬之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是年3月，徐特立参加了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随党中央迁住北京西郊香山，接着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进入中南海，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1950年起，他还担任过一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的名誉主席。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尽管政务十分繁忙，仍忘不了他与徐特立之间的师生情谊。一次，毛泽东特地派人来到徐特立的住地，邀请他到中南海家中吃饭。席上，还专备了几样家乡风味的菜肴招待老师——一碗湘笋，一盘青椒，这是两人都爱吃的。毛泽东抱歉地说：“徐老，请你来，没有好菜吃。”徐

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

上桌前,徐特立谦和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毛泽东马上说:“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上坐。”硬是让徐老坐了上席。

叙谈之间,毛泽东请徐特立谈谈他对治国方针大计的看法。徐老思考片刻后说:国家初建,要防止某些同志以为革命大功告成而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还要力戒贪图舒适,追求享乐、腐败堕落的思想和作风。他还把不久前在吴玉章70大寿时写的一首诗中的几句念给毛泽东听:“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称是,击节叫好。

话别时,毛泽东见徐特立穿着还像过去那样俭朴,又联想到徐老当年为革命牺牲的两个儿子,就将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呢子大衣脱下来,送给徐特立,以表人子之心。

“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师表。他曾教导毛泽东立志、立德,他还使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中国人,知道了读书、识字、明理,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从毛泽东和徐特立的深厚情意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感情,堪为师生的楷模。

“敬老尊贤”

师承关系,是成才必不可少的条件。毛泽东与他的几位老师有深厚的感情。

1906年,毛泽东到离家七八里的井湾里私塾读书。这是一个阔人家开的“经馆”,条件比较好,毛宇居在这里当塾师,给学生们讲授《春秋》、《春秋左传》等经书。在私塾里,学生应叫老师为“先生”,可毛泽东按辈分叫毛宇

居为“大哥”。这使毛宇居非常生气，还动手打了他。

1952年下学期，毛宇居到北京，将韶山小学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请他题写校名。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韶山学校”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毛宇居问他：“怎么不写韶山小学呢？”毛泽东笑着说：“学校不是还要发展吗？可以办小学，也可以办中学，将来还可以办大学哩！”毛宇居听了，深深敬佩毛泽东的深思熟虑，连连称赞：“好！好!”

1958年8月，毛宇居再次赴京，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湘潭大学的创办情况，并请他题写校名。毛泽东说：“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候读书的那个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都未写。假如我给你们写了，那他们就会有意见啦!”毛宇居说：“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湘乡东山学校的那张由我替你送去，两县人民不就都满意了吗！”毛泽东笑了。

1959年6月26日下午，毛泽东到韶源一带视察，同毛宇居老人亲切地手拉着手，不时询问稻田管理措施、产量。晚上，毛泽东请毛宇居和韶山的老地下党员、赤卫队员、革命烈士家属及主要亲友来到他的住所座谈、共进晚餐。毛泽东举杯首先给毛宇居敬酒，毛宇居急忙端杯起身，对毛泽东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即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袁吉六先生，是湖南宝靖的一位进士，在第一师范教书多年，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练就了一手好文章，他后来回忆说：“我能写古文，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

符定一先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后来文史馆成立，他任第一任馆长。当时，在符先生看来，文史馆员不过文、老、贫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对此则补上一句曰：“还要才、德、望。”意即还要有才干、有道德、有威望。这对符老是一种安慰，也足证毛泽东始终尊敬老师。符老至诚拥护共产党，还以一人之力，著出一部36卷的大书《联绵字典》。

此外，还有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等道德高尚、学术渊博、思想开明的老师，都曾对毛泽东有过较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知识渊博举世闻名，但他仍重视向有专长的人学习。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离别32年的故

园——韶山，深有所感地写了《七律•到韶山》，原稿中首句是“别梦依稀哭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完稿后，他虚心请教身边工作人员梅白，梅白建议将其中的“哭”字改为“咒”字。虽是一字之变，但整篇诗的诗意较前深刻，气势亦更宏大，毛泽东连连称赞道：“改得好，改得好!”马上定稿为“别梦依稀咒逝川”。为此，毛泽东称梅白为“半字之师”。从这里可见，毛泽东虚心求学、坦诚待人的博大胸怀和尊师重学的高尚品德。

“一师是个好学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坐落在长沙城南门外妙高峰下。它面临湖南最大的河流湘江，与岳麓山隔江相望，东面紧靠京广铁路，东南丘陵参差环列，北边楼房鳞次栉比。那里风景优美，黉舍壮观，滔滔湘江，百舸争流，铁路线上，车来车往，使整个校园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学校学术研究之风高涨，教育内容不断创新，学校有丰富的藏书和阅报室，更重要的还有一批道德高尚、思想开明，诲人不倦的教师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对走出闭塞的韶山小村，迈向广大社会的毛泽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这个学校里，毛泽东获得了不少知识，发展了他的某些特长。他的文学功底很好，因此许多国文老师都喜欢他。有一位国文老师还主动借给他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使他大大受益。后来，毛泽东做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虽然仅有600字，却受到了国文教员柳潜（字钧湄，湖南湘阴人，前清秀才）的赞誉：“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给该文记了100分，并在文题上方写了“传观”二字，除通篇多处串圈外，还作了7条眉批和文末总评，共计150字。批语认为，文章“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又盛赞文章“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

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自觉地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他充分利用有利的学习环境，刻苦学习，探索为学之道，专心打好学问的基础；密切联系社会实际，探求人生的价值与救国的根本道路；积极从事社会实践，开展广泛的社会活动；组织同学反对旧的教学制度，驱逐校长张干，领导学生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率领同学智缴北洋军阀一混成旅部分败兵的枪支，主办学友会和工人夜校，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新民学会；刻苦顽强地进行各种形式的体格锻炼，磨炼坚忍不拔的斗争意志。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在一师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道：“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与当年的老同学谈话时，又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毛泽东非常怀念在一师的那段岁月，1925年，当他回想起自己在一师那丰富多彩的学生时代时，曾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沁园春·长沙》一词。

这首词上半阕着重写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一开始，作者便把自己置于秋水长天的广阔背景之中。同时也把读者带进了一个高远的深秋境界里。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作者不仅看到了眼前岳麓山中由绿变红的乌桕、水杉、槭树、獬树、黄连木……那一重重山，一层层树，让自然之神彩笔一抹，晕染得一片嫣红，比2月怒放的春花还要艳丽，比6月飘舞的彩霞更加瑰奇。近观：“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秋水澄澈，秋江碧波，脚下的湘江，在秋天更加清澈晶莹，如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水晶。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渡，静中有动，生气勃勃。仰视：“鹰击长空”。万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奋振健羽，自由飞翔。俯瞰：“鱼翔浅底”。因透明而清浅见底的江里，鱼群摆动鳍尾，任意遨游。作者以短短4句诗，描绘出一幅立体的寥廓万里、绚丽多彩的江南秋景，宛如当代著名的岭南画派大家关山月浓墨重彩的彩墨山水图。不愧为“驱山走海置眼前”、“咫尺应须论万里”的大手笔。

这首词的下半阕着重抒情。通过回忆“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联想到当年作者与同学朋友，在橘子洲头散步、游泳，畅论天下大事的情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峥嵘岁月里，作者和同学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立志救国的知识青年，正值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情怀奔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面对“万山红遍”的美景，他们既赞叹锦绣河山的壮美，又悲愤大好河山的沉沦。于是，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抨击黑暗，宣扬真理，鄙视当时的“万户侯”——军阀如粪土。“携来百侣曾游”到“粪土当年万户侯”，直抒胸臆，尽情倾吐，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气势磅礴，痛快淋漓。一直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形象地表达了一代革命青年的凌云壮志。这首词对了解当年毛泽东在一师学习的峥嵘岁月有很大帮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特地为一师题写了校名，并写了“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题词。

“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

毛泽东与李大钊神交已久。

他最初知道李大钊的名字，是在1916年的9月。那时，李大钊刚从日本留学回国，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

当时，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是《新青年》在湖南最早的读者和支持者，他鼓励一师学生阅读这本杂志，还自己掏钱买了一些分送给他最喜欢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受到教益和得到启发。

毛泽东记得，他第一次从杨昌济那里看到的那期杂志上，登载有李大钊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青春》。文章指出，“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文章号召青年“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造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

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毛泽东对上述宏论极为赞赏，精神为之振奋。他说：“是的，要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

于是，毛泽东成了《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之一。

毛泽东不仅爱读《新青年》，还积极给它投稿。1917年春，毛泽东在登过岳麓山之后，激情勃发，写下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寄给了《新青年》编辑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介绍了他自己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体育锻炼方法，提出了把“武勇”作为体育之“主旨”的见解，文中不少惊人之语，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新青年》编辑李大钊慧眼识珠，很快将此文发表在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3卷2号上。

对于景仰已久的《新青年》编辑——李大钊，毛泽东早就希望能到北京一趟，登门拜访和结识，聆听教诲，并亲睹他那令人倾倒的风采。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就这样，在北大图书馆所在地——红楼东南角的一间办公室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极富意味的是，正是由于毛泽东和李大钊这两位巨人在这里相识、握手、工作，使得当年的北大旧址“红楼”，在数十年后被国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辟有纪念性的陈列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先生曾在《咏红楼》一诗中写道：“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力量看方生，勋勤垂后代。寿与人民齐，春风永不改。”

图书馆的助理员，是一个暂时安插性的职务，每月工资八块钱。毛泽东的工作室紧靠着李大钊的办公室。房子的中间是长方的会议桌和许多凳子，他自己就坐在窗下的一张三屉桌前办公。他的具体工作，是登记来馆看报纸的人们的姓名。这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被人瞧不起的职位，但是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纸，他从中吸取了许多新鲜的有益的知识；同时，也给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从那些来阅读书报的人当中，他知道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他对这些著名学者怀有

浓厚的兴趣，试图与他们就政治和文化问题开展交谈，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无暇去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话。即使在大学的其他场所，毛泽东也只有在缄口不言时才能去听。在一次旁听教授讲课时，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得知他只是一位没有注册的学生时，竟拒绝回答他的提问。从这些冷遇中他感觉到：即使是高等学府，也是专制的世袭领地。它就像一座耸入云端的金字塔，名流学者高高在上，“下等人”是无法和他们平起平坐的。这也触发了他决心打破旧的传统习惯、变革社会的强烈意念。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遇上了知音，这就是李大钊。虽然，李大钊也是很有名气的教授，但毛泽东蓬勃的工作热情、认真踏实的办事态度，首先就博得了他的好感。尤其是毛泽东那远大的抱负、横溢的才华、敏捷的思维和锋芒毕露的锐气，更深得他的赏识。平时工作之余，或在他前来阅览室检查工作、翻阅书刊杂志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李大钊以极大的关注，倾听毛泽东讲述他对社会、人生和学术问题的见解，回答对方提出的一个个疑难问题，有时谈话长达四五个小时，而每次交谈总是十分投机，都有新的论题和新的收获。

李大钊感觉到：毛泽东的学识才具、革命气质和思想方向，所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已经具备了干大事业的良好素质——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一个进步的团体，共同追求真理，共同从事战斗，已经体现出“领袖”的风姿。

毛泽东表现出来的不凡的抱负、理想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扬，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和毛泽东在一起，李大钊更为深切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仿佛展望到20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西侧的中央公园举办演讲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陶孟和等社会名流出席了这次大会。当李大钊身穿棉布长袍、裹着灰色毛线长围巾，气宇轩昂地登上讲台时，台下数千听众发出阵阵掌声。会上，他作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不久，又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李大钊这几篇具有崭新观点的战斗檄

文，不仅标志着他本人已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从此，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京大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蓬勃开展。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收集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包括许多英文、法文、德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许多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到这里来寻求真理，他们或者孜孜钻研、刻苦阅读，或者共同研究、交流探讨，或者径直向李大钊质疑、请教。

由于在图书馆的工作关系，更由于李大钊对他的倚重，毛泽东获得了直接向李大钊请教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条件。这期间，他不仅专程到中央公园聆听过李大钊那激动人心的讲演，还及时阅读了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文章，透过那惊世骇俗的时代强音，他仿佛看到了中国希望的曙光。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为了让毛泽东进一步吸收先进思想，学习新的知识，经受全面锻炼，以增长社会活动的能力与才干，李大钊引导毛泽东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和广泛的社会活动。经李大钊准许，毛泽东抽出一定工作时间，经常在北大旁听他感兴趣的文化课，如哲学、伦理学、文学、新闻学等。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多种学术组织。1918年冬，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1919年1月28日，参加了蔡元培、李大钊、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2月19日，又出席了新闻学研究会改造大会；3月10日，在理科第16班教室聆听了李大钊对哲学和新闻学两个研究会会员所作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还因李大钊的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邓中夏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在参加这些学会的过程中，毛泽东认识了许多名人学士，像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还在这时结识了北大的许多进步学生，像邓中夏等人，并成为他们的亲密朋友。参加这些学术团体和结识这样多的朋友，使毛泽东开阔了眼界，吸收了大量新鲜、有益的知识。与此同时，经李大钊引荐，毛泽东还拜访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

如：他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蔡元培、胡适、陶孟和作讲演或解答问题；他单独造访了胡适，征询了胡适对是否出洋一事的意见，并试图争取他对湖南学生运动的支持；还多次拜会蔡元培、李石岑，接洽、商讨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还前往陈独秀的寓所，聆听了这位北大文学院长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他还经常到原一师的老师杨昌济、黎锦熙家中，同他们畅谈世界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中的中国地位问题，还有办报的事情……通过拜访这些名流学者，他广泛地了解各种思想及学说，满足了自己强烈的求知欲望，使知识迅速地增长起来。

在北京，毛泽东虽然只待了六七个月的时间，但他有两个大的收获，对他后来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奠定了他事业成功的基础。一是结识了他认为是第一楷模的李大钊先生，并通过李大钊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交结了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朋友，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有了长足的进步；二是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线条知识，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其间最让他震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看到新的曙光，感到古老的中国会有新的出路。正如他后来对自己这个时期思想历程所叙述的："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20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曾回忆谈到李大钊向他推荐"三本书"的情况："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

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友人陶毅的信中说："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后来，他果真在长沙发起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认为

“俄国学术精神不可不研究”。这时的毛泽东，已感到赴俄学习要比赴法学习迫切得多了。他和李大钊都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到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以改造和拯救腐败无能的中国。

192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工作、学习了不到半年，即将离京赴沪。临行前，李大钊对毛泽东说，你不妨再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上海。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独到的见解。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后，遵照李大钊的嘱咐，多次会晤陈独秀，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通过陈独秀的进一步影响，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路上，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岁月流逝，毛泽东对李大钊的怀念之情却丝毫未减。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土窑洞里，曾多次饱含感情向埃德加•斯诺谈起了李大钊。当回忆起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时，他说：“我到京后不得不立即找工作，我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这时已成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一份工作，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后来被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给了我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月薪八元钱。”他又说：“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将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无限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二、读书涉猎篇

毛泽东的读书人生

一生喜读范仲淹作品／读“无字的书”／读新闻／一生攻读马列主义／读哲学书／最喜李白诗／读军事书／读报纸杂志／读《聊斋志异》／读《永昌演义》／读《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读楹联／读间接得来的“书”／读杜甫的诗／读逻辑学论著／读“小人书”／读《一种清醒的作法》／向科学家学习／读放翁诗词如遇知己／读《增广贤文》／读宗教类书／读《黄琼传》、《李固传》／读《触訾说赵太后》／读《南史·梁武帝纪》／读人民来信／读鲁迅著作／读笑话书／看国产电影／看京剧、听京剧／读刘禹锡的诗／晚年听曲秘闻／读《枯树赋》

一生喜读范仲淹作品

1906年，毛泽东13岁，从师毛宇居，读《左传》、《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成书于清康熙年间，所收文章，上自东周，下迄明末，共220篇，几乎都是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品，称得上是一部古文精品选本。其中有北宋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和《岳阳楼记》两篇文章。毛泽东很喜爱《岳阳楼记》，读得烂熟，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志趣，对他很有影响，启迪着他开始去关注社会、人生，有了一种朦胧的社会责任意识。

1913年10月至12月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所做的课堂笔记中，几次写到了范仲淹。如11月23日《修身》课堂记录：

>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所谓“办事之人”，是指建立功业，“为万世开太平”之人；所谓“传教之人”，是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经圣继学”之人。“孔孟朱陆”，指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韩范”，指韩琦、范仲淹。“曾左”，指曾国藩、左宗棠。笔记中肯定范仲淹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范仲淹是一位道德学问、事功俱全的人。

《修身》课，为杨昌济先生所讲授。杨先生可算是湖南现代的一位大儒，学贯中西，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受杨昌济影响最大。他崇敬杨先生，是杨先生深为器重的高足，终成为杨先生的乘龙快婿。毛泽东所记下的，当然是杨先生对范仲淹的看法，但这看法无疑是为毛泽东所接受和赞同的。

再如11月29日课堂记录：

> 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宋稍一振兴，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其至也，朱程礼义之士兴，

天下风俗，骎骎比隆东汉焉。

充分肯定了范仲淹的历史功绩，也即肯定了范仲淹的崇高的历史地位。

同日的课堂笔记中，还这样写道：

> 范文正世家子，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悦。初不自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极而泣。励志苦学，3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取，管宁之亚也。公盖苏州人。子尧夫，仁侠似之，尝遇故旧于途，见窘于资，指赠以麦云。

简介了范仲淹的身世、品行、籍贯，还赞许他的次子范尧夫继承他的“仁侠”之风，急人之难。

杨昌济如此推崇范仲淹，对毛泽东是确有影响的。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说自己打算“以三年为期”，“略通国学大要”，再“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但自己“家薄必不能任”，打算“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以勉强支持。“颜子之箪瓢”兹不赘述；“范公之画粥”说的是范仲淹刻苦读书的事。据宋代释文莹《湘山野录》记载，范仲淹少时家贫，在僧寺里读书，经常煮粥一小锅，待凝结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外加一点咸菜，即为一天的食物。《宋史·范仲淹传》也记述：“……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于此，可见范仲淹对毛泽东影响的一斑。

1918年春三四月间，毛泽东和蔡和森一道，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20天，进行社会调查。

途中，他们登了岳阳楼，纵览洞庭的湖光山色，读《岳阳楼记》，欣赏镌刻在木板上《岳阳楼记》的书法艺术，为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而赞叹。

1927年年初，毛泽东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历时32天，返回武汉时途经岳阳，又去登了岳阳楼。

1937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在自己的住所同刚到延安不久的左谟野谈话。当左谟野说自己是岳阳人时，他便以赞扬的口吻说：“啊，岳阳是个好地方。我在大革命的时候去武汉，经过岳阳，我去游览了洞庭湖滨的岳阳楼。你们岳阳有名，同岳阳楼很有关系。因为范仲淹写过一篇传颂千古的《岳阳楼

记》。”说着便问左谟野背诵过《岳阳楼记》没有，左说：“小时候读过，现在还记得一些。”

毛泽东又问：“岳阳楼上的几块木刻的《岳阳楼记》现在还在吗？”

左谟野回答：“还在。”

毛泽东特别赞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说：“‘先忧后乐’的思想，较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他从《岳阳楼记》谈到延安钟鼓楼上的书有“范韩旧治”四字的横匾。他说：“延安也是范仲淹的旧游之地。‘范韩’就是范仲淹、韩琦。为了防御西夏入侵，他们曾经镇守延安。西夏人称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当时有一个民谣：‘军中有一范，敌人闻之惊破胆。’许多人都知道范仲淹是一个文人，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个镇守边疆的主帅。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这个评说，与他《讲堂录》中所记范仲淹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的评说是一样的精神。左谟野说：“我爱读范仲淹写的词，特别是那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毛泽东说：“那就是他在陕北戍边的时候写的，他是一个边塞词人。”他由此谈到词的流派，并引用了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柳永、辛弃疾、陆游等人的作品，予以评说，这表明他对范仲淹的作品不仅读得多，而且很熟悉，且对范仲淹有相当的研究。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用钢笔信手书写了范仲淹的两首词：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意，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毛泽东写着写着，诗人的兴致勃兴，乘兴运笔，写下了一大篇词话：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这篇词话，内容很丰富，谈了词的流派，范词的审美特征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谈了他自己诗词欣赏的审美个性、阅读诗词的一般心理特点等，对于研究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及毛泽东诗词创作与鉴赏的审美个性，都是极有价值的。这一大篇词话，是因“哼范词”引发的，将范仲淹的《苏幕遮》和《渔家傲》两首词的审美特征高度概括为“既苍凉又优美”，可谓恰切。用“中间派”一词概称范词在词的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也是恰当的，科学的。我国的词肇兴于唐末，勃兴乃至成熟于宋，其间确有个由婉约向豪放发展的过程，而范词正好处于这个过程中的承前启后的一环上，在审美风范上，有所谓“儿女情长”的优美一面，也有近乎“铜琶铁板”的苍凉一面，而正是后一面，开苏、辛词豪放派的先河。

毛泽东是很爱范仲淹作品的，不仅有他的文章如《岳阳楼记》，有他的词如《苏幕遮》、《渔家傲》，还有他的诗。1959年8月19日，庐山会议结束，毛泽东下山了。他的专列行驶在浙赣线上，直至金华东站。在专列上召集金华地委及金华、兰溪、永康三县的主要负责人开座谈会，了解生产、生活情况。他说：“要讲实效，不可浮夸，不可搞形式主义。”他勉励那几位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很重要呀。”他谈到永康县方岩山的胡公庙，说胡公名则，北宋的一位清官，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实事，人民就建庙纪念他。说着就念诵了

范仲淹赞颂胡则的一首诗：

千年风采逢明主，一寸襟灵慕昔贤。
待看朝廷兴礼让，天衢何敢斗先鞭。

这首诗在范仲淹的诗作中并没有代表性，更不是什么名作，毛泽东却记得，由此可见他对范仲淹的作品阅读得广泛和喜爱之深。

读“无字的书”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读书的又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读书结合游历。他不但重视书本知识，而且重视社会实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但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的书，而且要读无字的书。

他在《讲堂录》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衣。”“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指出，改革家王安石托古改制，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傲睨汉唐”，可谓是一个精深的学者，但他的变法为什么最终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毛泽东认为，王安石“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尤其当他认识到当时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犹鸿沟之分东西”，更决心走向社会这所永久的大学校，了解社会，读懂社会。

后来，毛泽东在一份《民报》上看到关于两个学生徒步旅游全国，一直到达西康（今四川西部地区）的报道后，很受启发。他说：“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1917年7月中旬，毛泽东邀同学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暑假的同学萧蔚然一起游学。他们从长沙小西门渡湘江，徒步经长沙白若铺，到宁

乡县城。在同班学友王熙家聚居两宵。走访了劝学所、玉潭高小，游历了香山寺，给劝学所所长喻士龙送了一副对联。还到了宋家潭，找农民宋冬生等了解了生产、生活情况，走访了一位姓张的老先生，并共同讨论了经书。上了回龙山，给白云寺的和尚送了对联。到了云山书院旧址云山学校。在黄材镇了解了当时农村小市镇的贸易情况，替一些店铺书写了招牌。后经横山湾抵杓子冲何叔衡家。在何家住了几晚，看了猪栏、牛栏、菜园和稻田，座谈何家的经济收支与生活及家庭历史情况，走访了何叔衡的堂兄弟和附近的农民。他每天清晨早起，在野外做“六段操”，看书，追记笔记。

离别何家后，经沙田到巷子口，在一个姓王的老头家里交谈许久。老头问，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么子？毛泽东说，我们都很穷，又想旅行，没有路费，只好“游学”。老头说，游学并不坏，游学的往往是些正直、老实人，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我曾在衙门里当过门房，亲眼看到，谁想打赢官司，谁就得送钱送礼，谁送得多，谁就可以赢，这就叫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人的话引起了他的联想——深感世道不平。一路上他与同行的二萧热烈地讨论着社会上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有了深刻的体会。

三人行至宁乡沩山密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和理论。在这一带，还了解到张三元举起义旗造反的历史故事。

他们离开宁乡抵达安化县的司徒铺，到了雷鸣洞萧蔚然家。此后，毛泽东、萧子升二人继续“游学”，来到伏口罗驭雄同学家。当时毛泽东穿浅蓝色单长衫，手拿雨伞，背上背着一个略现蓝印花的灰白色包袱。在罗家吃中午饭后，上横坡仓去久泽坪，给当地秀才吴幼安送了一副对联。又经清塘铺、太平段去梅城，在路上，曾露宿河提。毛泽东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并指着身边的一棵老树说，这就是衣柜，顺手将包袱、衣服挂于树枝。睡前，萧子升要去河底洗脚，毛泽东笑着说：你还要保持那绅士的习惯啦！你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哩！

第二天，他俩在途中一家小店吃饭时，听老板娘诉说了她家的苦难遭

遇，并知道了附近有一座刘邦庙。二人对刘邦的评价问题进行了讨论。两人边走边说，不觉到达安化县城——梅城。毛泽东在梅城，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学背后（现安化一中后面）一些贫苦农家走访，到安化县劝学所拜会了安化饱学先生、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夏时年64岁，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学识渊博，经、史都好，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夏先生喜吟诗作对，性格高傲，一向不理游学先生。毛泽东求见，两次被拒。他并不灰心，复而第三次登门。夏只得开门相见，并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见后，即书属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看后大吃一惊，觉得对句胜过原句，还带有火辣味，连声赞好，并留餐宿，昼夜长谈，还赠给毛泽东八元银洋。

毛泽东这次在梅城，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又叫铜钟滴水），并在北宝塔第七层塔壁上，用墨笔题词：“伊水拖篮，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还给县城的“鼎升泰”、“谦益吉”、“云集祥”等商店送了对联。

离开梅岭，经仙溪、山口、长塘、马迹塘、桃花江，到达益阳县城。游览了市容，走访了一些学校和人士，其中包括当时的县长张冈夙（原一师教员）。在此三天后去沅江。

当到沅江县城时，正值涨水，街道被淹，行走不便，于是两人乘船返长沙。8月16日，回到长沙楚怡学校。放下包袱，打开一看，还有两块多钱的剩余。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两人还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这次游学，毛泽东到过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步行近千里，历时达月余，写下了许多笔记，师生们传阅了他的“游学”笔记后，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后来，毛泽东还回忆说：“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萧子升却“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

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80多块”。

1917年寒假，毛泽东到浏阳文家市铁炉冲一带，在学友陈绍休家住了几天。他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并针对当地没有栽树的习惯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果树，后人吃果实”，劝大家植树，为子孙造福，而且自己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这次，他还到了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

1918年夏初，他还同蔡和森赴洞庭湖滨部分地区游历。

这些“游学”活动，使他更加了解了民间，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对进一步了解“国情”很有益。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是读“无字之书”，也是在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新闻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当时北大学术自由，思想活跃，各种学术团体不下十六七种。北大新闻研究会当时在国内是一种创举，每周举行两次活动，参加者三四十人。《京报》总编辑邵飘萍担任讲师，主讲办报的业务经验。《晨报》主笔徐宝璜等讲授新闻理论。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也曾讲课或出席。毛泽东多年来与报纸就有特殊的感情，加上当时杨昌济先生打算介绍他到北京某报馆工作，因此，他以很大热情和兴趣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

邵飘萍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当时才三十四五岁，就已经创办过《汉民日报》、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曾因揭露袁世凯篡权窃国而被捕入狱。毛泽东对邵飘萍很钦佩，课后经常向他请教有关新闻学方面的知识，得到邵飘萍很多帮助。

1918年冬和1919年春，毛泽东还曾两次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了解工人的状况，宣传革命思想，从事采访实践。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偕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开北京到上海，才中断新闻学课程的旁听。

正因为毛泽东对新闻学有浓厚的兴趣，新闻又和报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有时他把读报看得比读书更重要，更紧迫。1951年，有几次身边工作人员没有把当天收到的报纸及时送阅，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我是要看新闻，不是要看旧闻。"为了获取新闻，毛泽东在阅读国内报刊的同时天天阅读专门刊登外国电讯的《参考消息》，有重要新闻随时批给其他中央同志和有关同志传阅。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间，为研究国际问题他专门摘录的外国电讯稿保存至今，按16个国家分类，成为一批珍贵的手稿。

全国解放后，为了扩大新闻的范围，毛泽东阅读的报纸杂志数量更多了，不只是哲学和社会科学，还有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至讲琴棋书画之类的报刊文章，都在他喜爱或涉猎之列。他每年订阅的报刊，包括出版社赠送的，都在百种以上。1956年，他开始考虑适当摆脱一些政务，用更多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后，从1958年起，又增订了全国各主要高等院校出版的综合性的学报或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报。

毛泽东通过各种新闻媒介来了解天下大事和各种各样的知识，每天必读的报纸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海《解放日报》、《天津日报》等。经常看的杂志主要有：《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新建设》、《文史哲》、《经济研究》、《红旗》、《学术月报》、《文艺报》、《诗刊》、《文物》、《科学画报》、《大众科学》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现代佛学》等，有时还翻阅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某些刊物。对《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哲学》专栏尤感兴趣。而对《人民日报》在一段时间内比较缺少理论文章和学术文章提出过意见。1964年，他说过："《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又说："《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人民日报》最近组织一些学术讨论，这样做好。"后来《人民日报》加强了理论方面的内容，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说："现在，《人民日报》有看

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毛泽东把报刊作为新闻渠道，了解国内情况和学术理论动态，也通过报刊了解国际情况和国际知识。一天几万字的《参考资料》是他每日必看的重要刊物。他除了看重要新闻，对刊登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也饶有兴味。他说，这些回忆录里写了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很值得看看。1960年斯特朗在回忆她1946年同毛泽东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毛泽东对于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和观察国际动向的敏锐性，同他认真地、一天也不间断地阅读和研究大量国际问题的资料和新闻是分不开的。

一生攻读马列主义

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马、恩、列、斯的著作。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读了很多，有的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地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读。

1920年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两三本书，知道人类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他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泽东在1926年已经直接或间接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被国民党政府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马列著作十分困难。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

军事、政治、科学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根据彭德怀和吴黎平的回忆，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

长征路上，毛泽东患病的时候还躺在担架上读马列的书。1964年3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曾亲眼目睹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她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也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画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的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毛泽东对刘英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泽东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为了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毛泽东开始读列宁的著作，特别是他在革命时期的著作。“他说理，他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曾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在列宁的著作中，《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等，又是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这两本书还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画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

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是在大革命时读到，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

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容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现为吴旗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并集中精力攻读。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当时毛泽东阅读、圈画并作了批注的马列著作，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和《马、恩、列、斯论艺术》。

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阅的马列著作有两本，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毛泽东亲笔写上“毛泽东1946”，在扉页上注明：“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读”。翻开书，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画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画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画得最粗，圈圈画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词组的旁边画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1948年4月，解放战争正在乘胜前进，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塞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　1948年4月21日”。中宣部于当年6月1日转发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

关政治经济学论文13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小册子，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评论。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评论，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对该书中斯大林概括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五条，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在斯大林批评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地方，毛泽东写道：“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在斯大林讲到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地方，毛泽东写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这些批注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想立即进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就发愁，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商品生产？他就没有区别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在性质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充分发展和利用商品生产。为了团结几亿农民，为了换取农民的产品，就要跟他们做买卖，商品生产不是缩小，而是要发展。废除商品，对农民的产品实行统一调拨，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一个国家。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怕资本主义。毛泽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都在钻研马列主义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著，坚持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他的藏书中，马列主义著作占了相当一大部分。

读哲学书

毛泽东从早年求学时代起，就对哲学存有浓厚的兴趣，他批读过大量中外哲学书籍。

《伦理学原理》一书为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主要代表作，是《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1909年由蔡元培译成中文。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把它作为本科毕业班的修身课教材。在这本十几万字的著作上，毛泽东用毛笔小楷写了一万多字的批语和提示。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笔、黑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抒发自己对道德、人生、历史、宇宙的看法。凡原著中与他的观点相吻合之处或颇能发人深思处，他就密加圈点，批上："切论"、"此语甚精"、"此言与吾大合"、"振聋发聩之言"、"诚哉，诚哉"、"洞悉人性之语"、"吾极主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真理在此"等字样。对于原著中有怀疑或否定的地方，便批上"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予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美"等字样。许多处还联系我国历史和五四前夕的政局和思想动态，加以分析对比。如当原著中论及专制政体与暴君时，他便在旁边注上"如袁政府"；当论及康德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哲学时，便注上"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语。类似的还有"此情诚有之，7年长沙兵溃时，有此现象也"，"中华民国正处于此地位"，"吾人平昔即有此情"，等等。这些批语，处处充盈着青年毛泽东的独立探索的精神，洋溢着追求真理的热情和改造社会的激情。

1931年苏联出版《辩证唯物论教程》，两位主要作者西洛可夫和爱森堡，是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列宁格勒分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这本书的全部六位作者都是批判德波林的积极分子，时称"少壮派哲学家"。1932年9月，中国学者李达及其学生雷仲坚通过日译本转译成中文，由上海笔耕堂出版。

李达在“译者例言”中称，这本书是苏联“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苏联哲学教科书，在中国颇有影响。

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读到这部书后，于8月14日致易礼容的信中说：“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李鹤鸣即李达。毛泽东对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批注了4遍。第一、第二遍是用黑铅笔批注的，第三遍是用红蓝铅笔批注的，第四遍是用毛笔批注的。在这本书的末页背面上端用毛笔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1936.11”；第二行是“1937.4.4”。这本书近600页，27万字。第一次铅笔批画，每页都有，最后一次用毛笔字的批注文字较多，说明他经过多次研读，已产生了很多想法。全书批注文字1.2万字，绝大部分是最后一次批读之后写的。毛泽东从四个方面批读：一是评论性批注；二是提要性批注；三是结合中国实际批注；四是理论发挥性批注。毛泽东围绕认识论和辩证法，做了深入的研究，在论述辩证法三大法则这一章里，批注文字就有9000多字。据统计，关于质量互变规律批注有1600多字，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批注有1500多字，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批注则有6000多字。

1936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苏联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有34万多字。毛泽东在全书491页中，留下批划符号的有186页，将近全书的五分之二，写有2600多字的批注。对对立统一规律和认识论做了许多批注，有些话与以后写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只是批注中的有些观点在“两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

1937年5月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出版。李达立即将书寄给毛泽东，请其指正。毛泽东对李达寄赠的《社会学大纲》十分赞赏，在延安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看看。”并称赞这部著作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批读这本书花了1个多月，每天少则读1页，多则达47页。全书854页，44万字，平均每天读25页多，近1.3万字。毛泽东至少批读了两遍。第一遍画的是细铅，第二遍画的是粗铅，粗铅的批画有一部分是压在细

铅的上面，也有用粗铅去描不清楚的细铅的。在第一篇“唯物辩证法”内，385页有一半批画过。全书有批画的达640页，33万字，占全书的四分之三。批注文字约3400字，其中近3000字是讲哲学的起源和古希腊哲学史的。

1939年5月，艾思奇的《哲学选辑》出版，荟萃了延安出版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有37万字。毛泽东至少批读了3遍。第一遍是用黑铅批画的，第二遍是用毛笔批注的。全书500多页，几乎逐页都有黑铅批画的符号。批注集中在“绪论”第二节“哲学是党性的科学”和第一章第一节“哲学中的两条路线”，第二节“机械唯物论”以及第三节“主观唯心论、马赫主义和直观主义”中。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批注文字约有3200字。

此外，毛泽东还批读了艾思奇等著《思想方法论》，河上肇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博古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李达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部分）。毛泽东读这几本书写的批注文字约为2.3万字，再加上3000字的摘录和近1000字的日记，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属于毛泽东的文字总共约为2.7万字。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看，5年批读了9本书，达200多万字，可谓“发愤读书”了。

最喜李白诗

毛泽东喜欢的中国古代词诗有一大串，但似乎没有一个能超过他对李白诗歌的喜欢。换句话说，李白也许是他最喜爱的中国诗人了。在毛泽东身边陪他读书的北京大学女教师芦荻就曾说过：“毛主席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尤其喜欢李白的诗。”

1936年，丁玲初到延安时常与毛泽东聊天。她当时就觉得毛泽东比较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并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向她谈论李白、李商隐、韩愈等。

1942年4月13日上午，毛泽东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曾邀请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等人到他杨家岭所住的窑洞来交换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在谈话中，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喜欢李白还是杜甫呢？"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有了自己的书房。李白的诗仍是他喜欢读的作品之一。他读李白诗，主要是通过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和蘅塘退士孙洙的《唐诗三百首》等选本来进行的。据曾在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过的张贻玖说："仅他批画过的《唐诗别裁集》就有六部，《唐诗三百首》五部。"在这些唐诗选本的李白诗中，毛泽东常常用笔圈画或批点。如他在《将进酒》一诗的开头批道："好诗"。又在此诗的标题前画了一个大圈，标题后连画了三个小圈。在《蜀道难》的开头批道："此篇有些意思。"并画了一个大圈。此外，毛泽东对李白的《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上三彬》、《鹦鹉洲》、《鸣皋歌送岑征君》、《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子夜吴歌》等诗也很喜欢，或多次在标题前后画圈，或在一些句旁画线，表明他读过已不止一遍了。

毛泽东不仅喜欢阅读李白的诗，还喜欢谈论李白的诗。他在1957年邀见臧克家等人来谈诗时，曾谈起李白的诗。后来臧克家在《伟大的教导深沉的怀念》一文中回忆道："毛主席也有个人特别喜爱的古代诗人。在谈话当中，对唐代两个大诗人——李白、杜甫，比较起来，毛主席更欣赏李白。"

1958年3月，成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于3月29日乘江峡轮往武汉方向行驶。在航行中，毛泽东问女驾驶员小石："三峡有个白帝城吧？"

小石说："有的。"

毛泽东立刻朗声吟起了李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959年仲夏，毛泽东在庐山开会时，为庐山的壮丽风光所动，不禁想起了李白的诗句，便欣然命笔，抄写了李白的四句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写完以后，注明道："李

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四句。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

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得知儿媳刘松林生了一场病，便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还引用了李白上面的诗句来鼓励她。

60年代初，毛泽东来上海视察工作。一天特地把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专家刘大杰请到自己的寓所，一起谈论中国古典文学，其中也谈到李白的诗。

1965年7月21日，他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说：“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

1973年7月3日，毛泽东在与别人谈话时说：“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

他停顿了一下，又提高声音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尽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据芦荻回忆，毛泽东晚年有一次曾对她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在闲暇或练习书法的时候，毛泽东常常用毛笔抄写李白的诗，据目前查阅所知，抄录过《梁甫吟》、《将进酒》、《赠汪伦》、《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送储邕之武昌》、《登金陵凤凰台》、《下江陵》、《忆秦娥》、《越中怀古》、《夜泊牛渚怀古》、《黄鹤楼闻笛》，共15首。毛泽东手抄的唐代诗人的诗词

很多，但以李白的数量为最多。

直到晚年，由于视力减退，他为了读李白《梁甫吟》这首诗，还特意叫人把这首诗用一寸大小的楷体毛笔字抄录在16开的毛边纸上，共有7页之多。在右上角，他还特意用铅笔画着圈记，表明他已读过两遍。

由此，人们很自然地要问：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喜欢李白的诗呢？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李白诗中那种汪洋恣肆、热情奔放、豪迈雄壮、不受任何拘束、极富幻想和浪漫气息的风格特色吸引了毛泽东。他曾经说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此外，李白诗中那种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感受人生、为人生所苦恼，同时又能摆脱苦恼、超然置之的大度精神，也时时吸引着他。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所固有的艺术欣赏趣味和爱好，而毛泽东作为个人的艺术取向和爱好，正在这些地方。这也正是毛泽东喜爱李白诗的主要原因。

读军事书

毛泽东既重视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提高和运用，又重视发愤读书，从更高水平的古今中外的军事著述和其他著述中吸取营养。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过细而有心得”地阅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着重研究了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以后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中，他还多次研读《孙子兵法》和《管子》等书，从中吸收古代的作战思想及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有的古代兵书，至晚年自己还放在身边，认真研读或以备查阅。同时，他还注意从古代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中吸收有关军事思想的营养。他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汲取了许多用来说明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的典型事例，如林冲棒打

洪教头、三打祝家庄、如来佛降服孙悟空等。

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着重于军事问题的学习与研究。在一段时间内，他把读书的重点放在了军事书籍上。1939年1月17日他在写给历史学家何干之的信中说："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你又在想做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毛泽东读军事书，不仅注意吸收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注意研究学习外国的军事理论。抗日战争期间，他精心研读了19世纪普鲁士著名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据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时的读书笔记中记载，他从1938年3月18日开始阅读《战争论》。当他拿到这本书的第一天，就如饥似渴地读了书的序言、目录和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的第一章，一下子就读了55页。他不但自己读，还组织和倡导其他同志一起读，在延安凤凰山自己的住处组织了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当时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肖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同志。莫文骅回忆：毛泽东组织的这个研究会每周开一次会。每次从晚七八点钟开始，到深夜11点多钟结束。先由何思敬教授发自己翻译的讲义，一章一章地介绍，然后大家进行讨论，最后由毛泽东讲述自己的意见。研究会学了《战争论》的前一部分。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讲了集中兵力问题和战略划分等问题。"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术界掀起了翻译和评价克氏《战争论》的高潮。1939年7月，八路军《军政杂志》第7期刊载焦敏之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俄文版序言》，第12期和次年第1、2两期连载了何思敬的《列宁与克劳塞维茨》；该杂志社1939年10月出版杨作材译《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1940年11月出版夏光伟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附录》。这个时期，《群众周刊》3卷22期，4卷9、15期连载傅大庆译'战争的重要原则'、'胜利的顶点'、'战争政治的工具'等章节。1941年8月，八路军军政杂志社重印了瞿寿译《战争论》的全译本。"当时，正处于毛泽东军事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主观和客观形势

的需要，迫使他深入研究和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并将学习和研究的成果及时用来指导战争的实践。

毛泽东读军事书，能通过对军事理论的研读和对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产生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系统地提出了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创造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战术，形成了他独特的军事思想，对于指导取得全国最后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读报纸杂志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读报纸杂志的习惯。他曾经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主办的《民主报》、《民报》的热心读者,后来更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这些报刊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新青年》，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为什么十分重视报纸杂志呢？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嗜读报刊是为了增进知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紧张的战争岁月，以更加迫切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报纸，是直接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正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刊物比较容易搜集到，毛泽东订阅的报刊多起来了。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40年代初期，他订阅的报刊，至少有三四十种。延安《解放日报》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的。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一直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不仅亲自为它撰写社论，还直接计划安排组稿工作。他读到报上的好文章、好新闻，立即通知各报转载，广为传播，有时读到一篇好作品，可以兴奋地一口气读到天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世界战争的全局在胸，要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阅读国内报刊的同时，还天天阅读专门刊登外国电讯的《参考消息》（后改名《今日新闻》），有重要新闻随时批给其他中央同志和有关同志传阅。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毛泽东的一批珍贵的手稿，是他在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间，为研究国际问题而专门摘录的外国电讯稿，按16个国家分类。

毛泽东对报刊上有争论的问题尤为关注。有时为了研究一个问题，还召集有关专家和人员共聚一堂，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交谈和讨论。

从1955年起，我国学术界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1956年达到高潮，这个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浓厚兴趣。

从1958年以后我国哲学界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的讨论。凡属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毛泽东几乎都要看的。1958年6月24日他曾邀集一些同志谈论发表在1956年第2期《哲学研究》的《对“矛盾的统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该文对苏联《简明哲学辞典》关于同一性的解释提出不同意见。1960年11月12日，毛泽东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讨论的综合介绍，当即要工作人员把文中提到的分别刊登在《新建设》、《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上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全部找给他。

对苏联哲学界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文章，毛泽东也很注意。1958年2月1日，他要看这方面的文章，工作人员搜集了一批送给他。当时苏联有一位哲学家写信给毛泽东，并寄来他的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重视。

同阅读书籍一样，毛泽东阅读报刊也常常写一些批注，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还批给别人看。例如，1959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里发表了《如何评价〈文赋〉》一文。作者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进步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观点。毛泽东将此文批给一些同志看，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毛泽东还注意根据报刊文章中的合理意见，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1958年全国掀起了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运动。对于应不应该消灭麻雀，科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赞成，认为利大于弊；有的不赞成，认为弊大于利；有的认为利弊相当。在刊物上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各抒己见。毛泽东知道了这个情况，要工作人员把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搜集起来送给他。送去文章时，工作人员还整理了一个简单材料附上。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些材料。1960年3月16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接着，3月24日他在天津会议上重申了这个改变，说：这两年麻雀遭殃，现在我提议给麻雀恢复“党籍”。科学界的意见对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在学术上，毛泽东比较注意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自由讨论，认为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即使有人对毛泽东的著作提出不同的观点，他也同样认为应当允许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1956年，来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意见。有同志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此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立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1965年，高二适写了一篇与郭沫若争鸣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7月18日，毛泽东为这篇文章的发表问题写信给郭沫若，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几天之后，高二适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毛泽东读报刊杂志是在不断地追求新闻，延安时期他就说过：“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他认为读报刊杂志是生活和工作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是自己获取智慧的源泉。

读《聊斋志异》

1939年5月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到“鲁艺”看萧三，和他谈起文学问题。毛泽东说，《聊斋志异》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又说：“《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约何其芳等谈古典文学，当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他举出《席方平》，说那篇就可以作为史料。

毛泽东还讲了《聊斋志异》的优点，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毛泽东还举出一篇题目叫作《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

他对何其芳讲了那个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涨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毛泽东讲完了这个故事，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说，毛泽东同他谈不怕鬼的故事，有两个故事给

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一个是《狂生夜坐》的故事，一个是《席方平》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出自《聊斋志异》。

《狂生夜坐》大意是说，太原耿氏，原来的住宅广阔，有一半旷废，常常闹鬼，耿家很害怕，迁居别处。耿氏的侄子耿去病是个狂生，他不怕鬼，只身前往废宅。夜晚凭书桌读书，有个鬼披头散发，面如黑漆、瞪着眼睛来吓唬狂生，以为书生会被吓倒。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笑着研墨，用手指涂墨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鬼的舌头那么长就是了，他们两个就这样瞪着眼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顶久了没意思，惭愧地走掉了。毛主席说，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跑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给征服了。

《席方平》的故事，更激动人心，发人深省。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为人憨直，得罪了邻里姓羊的富翁。姓羊的早死了几年。席廉得病，生命垂危时对人说，是羊某贿赂阴司官吏来拷打我。最后席廉浑身红肿，惨叫着死去。席方平悲痛欲绝，如傻如痴，他说："我要到阴间为父申冤。"

席方平觉得自己出了家门进一城市，来到牢狱门口，远远看见他父亲望着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大骂狱吏，遂写好状子，向城隍告状。城隍也受了羊某的贿赂，硬说席的控告无根据。席气愤不过，他的灵魂走了百余里，又告到郡司。由于郡司也受贿赂，席挨了一顿打，仍交由城隍办理此案。席回到城隍辖区，尝尽了械梏之苦，而不能申冤。城隍怕他再告状，派人押他回阳间的家。鬼差押席到家门口就走了，席又溜回阴司告到冥王那里。冥王也偏袒城隍和郡司，不容席诉说，就下令打他20大板。席大喊："谁叫我无钱，应当挨打！"冥王更怒，教鬼卒把席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冥王问他还敢再告吗？席说，大冤未申，寸心不死，一定要告。冥王又怒，叫两个鬼卒把席的身子锯成两半，席痛不可忍，硬是一声不吭，鬼卒说，真是条硬汉子！掌锯的小鬼同情他是孝子，不忍锯到他的心，锯子曲折而下，结果加倍疼痛。不一会儿，身子被劈为两半。鬼卒把席的身子合起来去见冥王，冥王问席还告吗？席怕再遭毒刑，便谎说，不告了。冥王立即叫鬼差把他送回阳间。

席想阴间的黑暗比阳间还厉害，可叹无路能告到玉皇大帝那里。听说二郎神是玉帝的贵戚，聪明正直。于是席又回到阴间去找二郎神。这时冥王又派了两个鬼差把席抓住去见冥王，冥王软硬兼施，叫他不要再告，并强行把他投胎为婴儿，席愤怒哭啼不吃奶，活了三天便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碰上玉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冥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阳寿三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

毛泽东讲《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说，老实的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冤案终能昭雪。他还说，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从中汲取了不怕鬼的精神。毛泽东对林克说：“遇到尖锐的问题时，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不能怕丢失选票，而保持两边不得罪的中立态度。结果反要丧失选票，失去人民信任的。”毛泽东对林克又说，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劳改、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班房和杀头。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费德林拜访过毛泽东，毛泽东把自己对《聊斋志异》的看法告诉了费德林。后来费德林在《聊斋》的俄译本前面作了序言，把毛泽东的这番意思也写进去了。

读《永昌演义》

毛泽东对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十分关注，一直很注意对他的经验和教训的研究。1944年4月，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的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

4月29日，毛泽东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永昌演义》是一部历史章回小说，它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英雄事迹为内容。“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的年号。作者李健侯，出身书香门第，1944年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李健侯是米脂人，米脂也是李自成的故乡。李健侯很崇敬李自成，从正杂各史和地方志等60多种古籍中搜集史料，从民间搜集传闻，饱含激情地于1926年着手写作《永昌演义》。初稿写成后，又进行了六次修改。《永昌演义》共有40回，34万字。这部书情节曲折，故事生动，虽是小说，却有史料价值。

李鼎铭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开明士绅，也是米脂人，1944年前后，他把《永昌演义》修改稿推荐给毛泽东评阅。毛泽东读过这部书后，于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上述一信。这封信告诉我们，毛泽东不仅读过《永昌演义》这部书，“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足以说明他对这部书的重视。

毛泽东的信由李鼎铭转达给李健侯后，不久，李健侯十分兴奋地应邀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奖励给他200元边币。全国解放后，由毛泽东建议，安排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同时修改《永昌演义》。李健侯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着手修改他用毕生心血写作的这部历史演义小说书稿。遗憾的是，此书尚未修改完，作者却于1950年不幸逝世。

读《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

1944年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新作《田保霖》。这是她参加陕甘宁边区的合作会议期间写的一篇作品。文章是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一个模范人物。同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欧阳山的文章《活在新社会里》。

毛泽东读了《田保霜》和《活在新社会里》，心里特别满意。立即提笔给二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丁玲、欧阳山二位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

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丁玲自己倒纳闷起来：“这篇文章我一点也不觉得好，一点也不满意，可是却得到了最大的鼓舞。”因此，她心里“觉得非常惶恐”。当天傍晚，丁玲和欧阳山按时赴约，毛泽东还请二人一起吃了晚饭。“我一口气读完《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席间，毛泽东对丁玲说。

后来，毛泽东在高干会议上，在合作社会议上都提到《田保霖》和丁玲。

陈赓曾十分高兴地告诉丁玲："毛主席在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霜》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要反映他们的生活，这个重要主张，和哲学通俗化，"大众哲学"的主张一样，是毛泽东心灵深处群众意识的外化。

此前丁玲并非不曾写过以工农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早在《左联》时期，她写的中篇小说《水》以及《奔》、《田家冲》、《母亲》等作品，都描写了工人农民或农村的生活。这些作品也努力反映了工人农民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他们的阶级意识的觉醒，表现了他们在黑暗社会中的挣扎和抗争。但是，在那些作品中，他们毕竟只是一群受苦受难者，充其量有些抗争精神。而《田保霖》写的人物，是边区合作社生产者中的模范，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的先进人物。田保霖原是一个接受过教会宣传的买卖人，后来转变成为边区劳动英雄。"他踏上新的道路，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靖边而工作"。田保霖主动办起的合作社及其发展，体现了边区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田保霖这个作为新社会的建设者的农民形象，不仅不同于《冰》、《奔》、《田家冲》里面的工人农民，而且有别于《新的信念》中陈老太婆、《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那种肉体和精神都带着创伤的农民。革命意识的觉醒需要忆苦，对旧社会的鞭挞依赖揭露。但建设者的精神风貌则要靠示范、培养。新社会新生活的普及与推广更是靠歌颂。这大概就是暴露文学（诉苦文学）、革命（战斗）文学、建设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

"写工农兵"，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出现的新概念。它的精义并不止于题材上"写工农兵"的生活，更主要的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丁玲写出《田保霜》这样的作品，算是得了真谛。毛泽东夸《田保霖》写得很好，说它是丁玲"写工农兵"的开始，大概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肯定的。这里产生了一种正面的反馈效应——它有强化原有行为的作用。

丁玲自己很清楚，从艺术的角度上讲，《田保霖》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其成功与其说是在艺术技巧上，倒不如说是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效益方面。因此，她把《田保霖》看作"只是一点点萌芽"。对毛泽东的夸奖，丁玲心

领神会。从那以后，按她自己的说法，“我已经有意识的在写这种短文时来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

在写《田保霖》前后，丁玲写出了一组反映边区新生活的作品，如《三日杂记》、《袁广发》、《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后来都以《陕北风形》为名结集出版。丁玲把这本很薄的小书全视为是自己“走向新的开端”。

1936年，毛泽东写了一首《临江仙》词：

>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从中可见毛泽东对丁玲的评价。丁玲不愧为一名文艺界的精英，文艺大军中的巾帼。她牢牢抓住了最富有生命力的“萌芽”，把它作为新的生长点，有意识地培养和练习这种“新写作作风”、新风格。经过刻苦努力，便结出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样的丰硕成果。这里，当然不能忽视毛泽东对丁玲的影响和鼓励。

读楹联

毛泽东历来重视祖国文化遗产，对历代名联有着特殊的喜爱。特别是解放后，他常乘巡视各地工作之便，抑或从政之余，怀着浓厚的兴趣，浏览名胜古迹，鉴赏楹联匾额、历代碑刻。

1952年10月，毛泽东借视察开封之暇，游览了北城古迹铁塔和龙亭。薄暮时分，毛泽东迈着矫健的步履登上龙亭。龙亭东侧石门两侧镌刻着康有为的题联：

> 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
> 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廓犹是，人民已非。

毛泽东长时间地凝视着这副对联，非常高兴地叮嘱秘书抄录下来。

1958年3月，毛泽东游览了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对后人凭吊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得十分仔细，盛赞杜诗是“政治诗”。他对大廨前那副清人顾复初的名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毛泽东左手轻托下颚，微弯的右臂背在身后，神态从容安详。他用轻微的声音诵读上联，脱口说道：“是集杜句。”然后走到西头看完下联，脸上露出了开心的微笑。赞赏地同周围同行者说：“好！”紧接着，毛泽东来到武侯祠。先到碑亭详察了石碑，随后观看了二门和刘备殿的楹联。他对陪同的负责同志说：“你们走在前面，你们年轻，应该多看些。武侯祠内楹联随处可见，以诸葛亮殿前清末赵藩所题最负盛名。”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此联系赵藩游武侯祠时借诸葛亮治蜀针砭时弊。此联独特新奇，不落窠臼，提出了“攻心”、“审势”两个颇有见解的问题，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毛泽东非常认真地看了此联，反复吟诵。直到晚年，他还提议让四川负责同志好好研读此联，以及新都宝光寺何元普一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对联虽藏禅机，然不乏朴素的辩证法。

毛泽东晚年，虽日理万机，然而对各地文物管理和保护工作时有垂询。他曾亲自向云南负责同志问及清人孙髯翁那副脍炙人口、遐迩闻名的大观楼长联保存得怎么样，还随即背了一段：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

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凡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帆清霜。

这副长联，上写滇池风物，下写云南历史，气魄雄伟，文辞富丽。康乾年间曾被称为“海内第一长联”、“古今第一长联”。毛泽东很喜欢这副长联，不时地还背诵一番，以寄托思古之幽情。

1960年3月上旬，毛泽东视察南方，在专列上接见了湖南省地市委书记。当他知道陈洪新是郴州地委书记时，便饶有兴味地问道：“郴州有个‘三绝碑’，你看过吗？”陈洪新不好意思地回答：“没看过。”毛泽东示意大家坐下，便娓娓叙说开了：公元1096年冬，北宋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著名词学家秦观，因“元佑党人”的牵连，遭章惇排斥和打击，被削职流放到郴州。他远离亲朋，穷愁潦倒，忧愤满腹，便写下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毛泽东深吸了一口烟，接着朗朗有声地背诵起来：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毛泽东一字不漏地背完这首词后，继续讲道：这首词将一个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中，受排斥打击的知识分子不得志的心境描述得淋漓尽致。苏东坡很喜爱这首词，因为他们同病相怜。四年后，秦观病死，苏东坡为怀念朋友，将此词抄在自己的扇子上，并附上跋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后来，书法家米芾以其沉着俊逸的书法将秦词苏跋写下来。宋朝以“淮海词，东坡跋，米芾笔”之造诣精深而谓之“三绝”。后人将其刻于崖壁，称“三绝碑”。毛泽东亲切地望着陈洪新，语重心长地说：“过去郴州是瘴疫之地，文人骚客多贬谪于此。现在郴州不同了吧？”陈洪新激动地回答：“现在很好，我很安心；我们一定把郴州建设好。”事后，陈洪新立即带领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落实了修复和保护“三绝碑”的措施，使“三绝碑”重放光彩。

1972年1月，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看到了张伯驹先生用鸟羽体书写的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
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
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泽东怅然有失的脸上露出了赞赏的神色，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可见，毛泽东随时随地都很关注楹联，这一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瑰宝。

读间接得来的"书"

毛泽东非常重视对社会情况的调查、了解，他认为，了解社会情况，研究社会情况，是党的政策的出发点。他一方面通过阅读报纸、刊物掌握信息；只要有机会，他还要直接接触群众，听取群众反映。后来，他发动身边的工作人员搞社会调查，了解到不少社会情况。于是，他明确规定警卫中队的三项任务：一要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做群众工作，要学会调查研究。

毛泽东把警卫战士召集起来，就如何认识调查研究，怎样做好调查研究，作了说明。末了，他号召每一名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写一份调查材料，向他报告家乡的真实情况。

为了更全面的调查和了解情况，毛泽东要求负责他安全的警卫一中队的成员，从全国各个专区选送，不要重复。他对身边的卫士说："你们以后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从此以后，每个休假回来的警卫战士，都写调查报告。有些文化程度低

的同志，错别字连篇，文理也不怎么通顺，毛泽东仍然看得很仔细，并提起笔来，一一纠正其错处。战士王文礼的调查报告，一连写了六次才算完成。毛泽东一边看一边给他纠正错字，耐心地讲解应该注意的一些字的用法。战士高碧岑的报告材料，毛泽东看后说："写得很好。你写的这位合作社的干部，病得那么重还要带领群众搞生产，使我也受到鼓舞和教育。你代我写信问候他，问问他的病好了没有。下次回家你再去看看他。"说罢，毛泽东把这份报告稍加修改，并写了几句赞语："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广东战士曾文探亲归来，写了一份家乡人民依靠合作社集体力量战胜百年未遇的大旱灾的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很激动，在报告上写下了"合作社好"四个大字。

1957年12月份，战士马维探亲归来，不但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窝头，一个又黑又硬的窝窝头。他把报告材料和这个窝窝头一起交到毛泽东手里，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毛泽东是一个容易动感情而又不容易掩饰感情的人。他不轻易流泪，但感情激动时是忍不住要流泪的。当他接过战士递过来的窝窝头时，手发抖了，眼圈一下子红起来。他没有说什么，掰一块窝窝头放在嘴里，泪水立刻顺着脸颊淌落下来。他一边把剩下的窝窝头掰开，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边清了清喉咙说："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食的人吃的粮食啊！……"分到窝窝头的工作人员，把窝窝头放进嘴里。毛泽东看得出，他们咽得很吃力。那天，毛泽东失眠了。值班卫士听到毛泽东嘴里不断喃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表情严肃起来。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乘车、散步，他都在深沉地思考。多次地自言自语，暴露了他沉思的内容："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吃饭的时候，尽管毛泽东的饮食极为清淡，但是，他指着自己的饭菜说：什么时候全国

农民都吃到这样的伙食，我就满意了。开会的时候，他要求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开动脑筋，集思广益，想出好办法，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全国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一些的日子？毛泽东日思夜想。不久，总路线提出来了。在毛泽东号召下，全党掀起了一个解放思想、敢说敢干、大办社会主义的热潮。在那些时间里，毛泽东频繁地外出视察，深入群众。他要求全党集中更大的领导力量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在探索富国强民、早日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新路子中，他也说过一些头脑不够冷静，甚至违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话。挫折是严重的，教训也是沉甸甸的，但毛泽东一心为着人民则无可争辩。

19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显现出严重的经济后果。再加上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遇到了极大困难。这年9月又有两名警卫战士探家归来，并且都带回了甚至比前两年更黑更硬的窝窝头。他们郑重地向毛泽东报告：“俺们村里，这样的窝窝头有人每天也只能分到两个。”

毛泽东怔怔地望着那窝窝头，恍若梦中。他接过窝窝头，两只手慢慢地把它掰开，里边露出了说不出名字的植物纤维。毛泽东的眼里早已溢满了泪水。他慢慢地掰着，一块一块地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什么话也没有说，自己拿起一个，没有掰，整整一个，啃了起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毛泽东慢慢地啃着窝窝头，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面颊直往下流。那天夜里，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不能入睡。睡不着，干脆就坐起来，坐在沙发上，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和卫士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不久，毛泽东直接派出的一支调查队伍从中南海出发了。毛泽东就是这样通过派警卫战士调查研究，间接获得了许多符合实际的真知实情，为他以后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读杜甫的诗

1958年3月7日，成都会议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和先期到达的九位省市委第一书记参观杜甫草堂和武侯祠。毛泽东兴致很高，在“工部祠”的“诗史堂”称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就他对政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一贯看法而言，他这样称赞杜甫的诗,应该说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诵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诵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时，风趣地说：“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随行的人员一听都笑起来了。

毛泽东对后人凭吊草堂题咏的诗联石刻看得十分仔细。特别对大廨前那副清代顾复初题的楹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异代不同时，同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毛泽东左手轻托下颌，右臂微弯地放在背后，神态从容专注。他用轻微的声音诵读完上联，踱步到西头看完下联，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赞赏地说：“好！集杜句。”这副楹联不全是集杜句，但其中截用了杜甫的诗句。上联中“异代不同时”，见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里“萧条异代不同时”句；下联中“有长留天地”，见杜甫《送孔巢父归游江东兼陈李白》里“诗卷长留天地间”句。可见毛泽东对杜诗的熟悉，几至于了然于胸的地步。

游览后，毛泽东从杜甫草堂借阅了各种版本的杜诗12部，108本。这些珍本善本杜诗归还杜甫草堂时，里面增加了一些圈点痕迹，可见毛泽东是都翻阅了的，如杨慎批点《杜诗选》中的《至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白帝城最高楼》、《九日五首》、《暮归》等，都留下了毛泽东的圈点。

在成都，毛泽东还阅读了唐、宋、明诸代的一些杰出诗人的作品，专门圈选出了“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其中陆游8首，李白6首，杜甫

的诗最多，25首，在成都会议上印发。可见毛泽东是很喜爱杜诗的。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一信中，说到“诗要用形象思维”时说：“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北征》是杜诗中最长的一篇，五言，140句。毛泽东对其艺术方法都如此了解，作了肯定的评语。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与杜诗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他常借用、化用杜诗的诗语入诗词。如《沁园春·长沙》中“同学少年”取自杜甫《秋兴八首》之二里“同学少年多不贱”句，“峥嵘岁月稠”，出自杜甫《敬赠郑谏议》中“旅食岁峥嵘”句；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横扫千军”，出自杜甫《醉歌行》里的“笔阵横扫千人军”句；如《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落花时节读华章”，“落花时节”出自杜甫《江南逢李龟年》里“落花时节又逢君”句；如《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中“域外鸡虫事可哀”，典出杜甫《缚鸡行》；如《七律·送瘟神二首》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后三字用杜甫《征夫》“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里“空自多”语意；如《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飒爽英姿”，活用杜甫《丹青引曹将军霸》里“英姿飒爽来酣战”句；如《念奴娇·井冈山》中“天际悬明月”，化用杜甫《后出塞五首》之二里诗句“中天悬明月”，等等。另，胡乔木《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最后两句的原稿是“万里千斤担，不用一愁眉”，毛泽东将其改为“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这“一戎衣”三字便出自杜甫《重经昭陵》：“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这些充分表明，毛泽东对杜诗非常熟悉，他的诗词创作得益杜甫诗作实为不少。

毛泽东到垂暮之年，对杜诗仍很有兴趣，常读常议，还借用杜诗说明重要事理。

大约是1971年的某天，毛泽东同护士长吴旭君谈到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

吴旭君想了想，反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您不考虑舆论界对您施加压力？您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

毛泽东笑了笑，有点“顾左右而言他”似的说：“你给我背背杜甫的《前出塞》吧。”吴问：“哪一首？”因杜甫的《前出塞》有九首。

毛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

吴旭君就接着往下背:“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毛泽东听了吴旭君的背诵接着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两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话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间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他一口气讲了这么多,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似乎已经将如何打破中美间僵局在心中琢磨透了。

吴旭君听得连连点头,说:“那么说,非找尼克松不行?”

毛泽东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中美关系的历史,真的就按毛泽东的构想向前发展了。

1975年,毛泽东患有严重的眼病白内障,一只眼睛尚剩微弱的光感,一只眼睛做手术后视觉功能恢复尚好。他是个嗜书成癖的人,除了坚持自己阅读书籍外,还常让身边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杜甫诗,是他常叫人读的作品之一。

读逻辑学论著

说到毛泽东晚年阅读和研究逻辑学论著的事,得先从1958年6月19日,毛泽东给他的机要秘书高智写的一封信谈起: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1956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

1957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到）找来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新建设》1956年全年各期，1957年全年各期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我国50年代学术界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的讨论，最初是在《新建设》杂志上展开的。1956年、1957年两年，《新建设》杂志先后发表的关于逻辑的不同观点的文章有15篇，1957年《哲学研究》杂志上关于逻辑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第3期刊登的苏联普•柯普宁《论辩证法、逻辑与认识论的统一》，一篇是第4期刊登的该刊编辑部《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的讨论》。据高智回忆，毛泽东当时在研究形式逻辑。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但对这场学术讨论很是关注。两年多时间里，对有关的不同观点的文章他始终密切注意，篇篇都读，潜心钻研，博采众长。在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他对逻辑问题的研究已经下了不少工夫，读过很多论文和专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上述信中提到的"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是指《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发表的马特《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和1958年6月14日发表的周谷城《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马特的文章虽然是对有关讨论情况的综述，但是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他把这场学术争论看作是"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把周谷城和王方名的观点说成"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周谷城《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与马特的文章是针锋相对的。这两篇文章《人民日报》登载后，毛泽东从当天的报纸上就看到了。阅读之后还吩咐江青把这两天的《人民日报》收存起来。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的记载，在周谷城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即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周谷城专就形式逻辑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给高智的信就是在这次谈话后写的。

毛泽东收到1956年和1957年两年各期的《新建设》、1957年全年各期的《哲学研究》及《人民日报》刊登的马特和周谷城两篇文章（三种报刊关于逻辑的文章一共19篇）后，大约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又一次进行了阅读和研究。

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逻辑问题，1958年6月26日，毛泽东再一次邀请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周谷城到中南海游泳池座谈逻辑问题。这一次的谈话是从下午5时45分开始的，一直谈到晚上11时30分。从这里我们也能约略看出，晚年的毛泽东对研究逻辑问题的兴趣是多么浓厚。

我国50年代后期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是从对1956年《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的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文章中的观点的不同看法展开的。周谷城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他对形式逻辑的独到见解。周谷城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文章提出了"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的"主从说"。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当时有些学者提出了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高低级"说。周谷城提出的"主从"说，不能不说是对"高低级"说的一种挑战。

周谷城的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新建设》杂志社先后收到不少反对文章，杂志社的同志一时也犯了难，并告诉周谷城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怎么办？"轩然大波"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读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文章后，对周谷城勇于探索的精神和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新见解，毛泽东很为欣赏。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开会。会上，在讲到批评要有说服力时，毛泽东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这是毛泽东对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的公开赞许。

周谷城在1978年毛泽东85岁诞辰的时候，曾回忆起这样一段往事：

有一次他（指毛泽东）在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和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陪同下到了上海，正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准备吃晚饭之前，把我召去。我同各位打了招呼之后，主席手拿一本《新建设》杂志，

对我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我说:“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

主席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

我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主席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我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

主席说:“人民大学里的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

我说:“我没有看见。”

主席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后来果然有人寄来了几本刊物,里面折了角的地方,都是引了我的话。因此我参加辩论的勇气也稍为大一点。那次和主席见面时,主席还一再说:“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1956年《新建设》2月号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发表后,也就是从“轩然大波”开始后,毛泽东对逻辑学的研究论文越来越有兴趣。上述周谷城的一段回忆,谈话地点是在上海。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尽管要忙于处理诸多的国家大事,但对逻辑问题的讨论仍然很关注。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接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时还谈到当时哲学界正在讨论的形式逻辑。毛泽东说,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还说,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公开赞许周谷城逻辑文章的观点。

人民大学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与周谷城观点相似的文章共三篇,分别刊登在当年的第1、2、4期上,均署名“求实”。这三篇文章毛泽东都阅读过,也相当欣赏。后来毛泽东还提出建议,将王方名的这几篇文章汇集成小册子《论形式逻辑问题》,1957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教学与研究》丛书出版。

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逻辑学问题的讨论,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百忙中挤出时间,邀请当时的逻辑学界、哲学界有关人士第二次到中南海颐年堂座谈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应邀到场的除了周谷城和王方名两位外,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人。中南海颐年堂是当时毛泽东、周

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召开重要会议、会见重要外宾的地方，在这里座谈和研讨逻辑学问题，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对这场几乎波及全国的逻辑学讨论的关注和重视。不知是出于对周谷城和王方名逻辑观点的赞赏，还是出于对二人勇于探索精神的鼓励或寄予厚望，座谈会上，毛泽东对周、王二人尤为注意，他当着众人的面为二人撮合，他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作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这次座谈研讨中，除了论及各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其他一些有关的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在当时的逻辑学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不仅从根本上指出了开展学术讨论必须坚持的原则和立场，而且也为当时的逻辑学问题的讨论指明了方向。当时周谷城的逻辑观点在讨论中的处境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很孤立，成为众矢之的。

毛泽东的谈话，一方面包含着对周、王二人勇于进行理论探索的鼓励，包含着对逻辑学界的期望；另一方面又含蓄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思想观点倾向，起到了保护学术讨论中占少数却比较正确的一方的作用。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并没有当众表明他自己对这场逻辑学讨论的观点，这不能说毛泽东没有自己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是因为"问题还在争论中"。当时毛泽东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是为了便于讨论的各方自由发表各自的意见，也是出于对诸多专家学者的尊重，出于对学术讨论自由的维护。实际上毛泽东并没有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避讳什么教条。前面已经提到的周谷城《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就让身边的同志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请周谷城从上海到北京来共同讨论逻辑问题。对此事周谷城回忆说：

到了中南海，只讲了几句话，主席就把话题转到逻辑问题上，他说："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我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

不易有人信。”

主席夹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logic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我说：“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

主席说：“懂不懂，当然也有人感觉得是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在逻辑学讨论中，毛泽东第一次召集有关人士在中南海颐年堂座谈逻辑问题，是在1957年3月15日。参加这一次座谈的人员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当然这是当时高层次人员的一次聚谈。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以下两个观点:一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当时毛泽东还举了不少例子说明他的观点）；一是形式逻辑是普遍适用的，没有阶级性。这次谈话清楚地表明，在逻辑学讨论中，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所谓“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不过是他的自谦罢了。他之所以不公开参加讨论，显然是为了维护逻辑界刚刚兴起的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为了维持他自己一贯主张的而且已经开始形成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毛泽东上述关于逻辑问题的观点，后来在不同的场合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的关于形式逻辑是一门专门科学、普遍适用、没有阶级性，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等观点，不能不说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芒。

1957年，从3月15日到4月11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先后三次与有关人员座谈逻辑问题，1958年6月17日、6月26日，在一个月中，又两次与有关人员聚谈逻辑问题。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他还嘱咐随行人员带上《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内部发行）和《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两种逻辑学论著。当然，这些还不是毛泽东50年代末期学习、研究逻辑学活动的全部，但从中我们也能看出，当时毛泽东对逻辑学问题的讨论是多么地重视，对逻辑学论著的学习和研究是何等地下工夫。

毛泽东学习、研究逻辑学与学习、研究其他的学问一样，总是那样孜孜探求，锲而不舍，网罗各家，兼收并蓄。

到了60年代，毛泽东学习、研究逻辑学的兴趣还一直很浓，对逻辑学问题的讨论还一直很关注。

关于逻辑学问题的讨论是从50年代开展起来的。可是到了60年代，有关报纸杂志还陆续刊登这方面的讨论文章。我们不能说，60年代有关的报纸杂志刊登的关于逻辑学问题的讨论文章，毛泽东篇篇都看过。但是，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对这方面的文章仍然是很有兴趣的，有不少的关于逻辑学问题的文章他都用心阅读过，其中有不少的文章他还用铅笔圈画过。毛泽东圈画过的这方面文章的报纸和杂志，现在都还收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谈到60年代毛泽东阅读报纸、杂志上有关逻辑问题的文章，还得再说一下毛泽东阅读朱波的两篇文章的事。1965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朱波的《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一文。当天上午，毛泽东在谈话中就提到了这篇文章，他说："《光明日报》今天有篇文章，谈逻辑的。"当天发表，当天上午在谈话中就提到，这说明毛泽东上午一收到《光明日报》就看了朱波的文章。按照惯例，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几种主要报纸，报社的同志都是在当天早晨就送到中南海西门收发室，领导同志一上班就可以看到当天的报纸。朱波的这篇文章既不同意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客观事物规律等同起来，又不同意把它与客观事物完全割裂开来。朱波认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反映的是思维的确定性，它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确定性。这种观点比当时那些把形式逻辑"规律"等同于事物规律的庸俗化做法前进了。在这次谈话中，针对一些党员和干部不喜爱学习、研究逻辑学的偏向，毛泽东非常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第12期上又刊登了朱波（发表时署名邵友勋）写的《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朱波的这篇文章毛泽东阅读之后，1965年12月在杭州的那次谈话中，当有人谈到朱波的这篇文章时，毛

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显然，对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是持否定观点的。

60年代，毛泽东除了用心阅读研究报纸、杂志上的有关形式逻辑的文章，还非常用心钻研有关逻辑学的论著。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大字本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时，毛泽东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还孜孜不倦地独立钻研这本著名的逻辑学著作。翻开毛泽东阅读过的这本逻辑学专著，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版序言、第二版序言的大多数文字下面，毛泽东都画了道道。

晚年的毛泽东还有很想了解西方逻辑学史的愿望。毛泽东曾对周谷城说过：“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这件事一直未能如愿。20年之后，周谷城谈及此事时，还不无遗憾地说：“主席虽没有要我一定这样做，但毕竟对我这样讲了。我如果有积极的研究精神的话，应该努力实现主席的期望，然而没有做！至今心里还很不安”。后来（1964年12月），苏联巴•谢•波波夫撰著的《近代逻辑史》一书的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一出版，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中译本为大32开本，字比较小，毛泽东即指示秘书田家英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毛泽东的指示是他本人亲笔直接写在《近代逻辑史》一书的封面上的。这个指示是这样写的：

田家英同志：

此书请印大字本一万本。小字本对于我们这类人不好看。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还存有我国解放后相继出版的多种逻辑学著作，这些著作，毛泽东生前都曾阅读过。

说到毛泽东晚年读逻辑学论著，不得不说一说编印《逻辑学论文集》、《逻辑丛刊》和重新出版章士钊《逻辑指要》的事。

为了学习和研究逻辑学的方便，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提议编印逻辑论

文集和逻辑丛书。这从1959年7月28日毛泽东给康生的信中可以看出。信是这样写的：

康生同志：

信收到。就照那样办吧。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信中提到的姜椿芳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书目搜编”是指姜椿芳等编辑的《逻辑学论文集》第一至第六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编印逻辑论文集和逻辑学“某些专著”这两项工作，当时是由两个单位分工负责进行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负责收集、编辑逻辑学论文集，姜椿芳副局长就负责这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工负责挑选、编辑逻辑学专著。

在毛泽东的关注下，我国研究逻辑学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读“小人书”

毛泽东身边的机要人员谢静宜回忆起一件难忘的往事：

1953年谢静宜到中央办公厅做机要工作，1959年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开始第一次跟随他出差执行任务，谢静宜认识他老人家已有六个年头了。虽然初来乍到，但谢静宜在他面前已没有了陌生感和拘束感。谢静宜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一开始就对谢静宜的学习非常关心，问谢静宜读过什么书，现在正在读什么书，还对谢静宜今后的学习做了很多具体指导，要谢静宜“在工作之

余多读书”。

列车上的生活是单调的，特别是在长途运行中的列车上的生活更是乏味的。毛泽东想到了这一点，他总是希望和要求身边工作人员除完成本职工作外，以多读书来充实提高自己。

毛泽东启发谢静宜的学习兴趣，是从看“小人书”开始的。因为在隆隆作响的奔驰的列车上，让青年人坐下来读经典著作不是件易事，而翻看小人书却是一件趣事，是寓教于乐的好方式。

在一次从北京到杭州的旅途中，毛泽东推荐给谢静宜183本“小人书”看。其中有的是革命故事，有的是历史故事，还有神话故事。原来，毛泽东在读艰深的理论著作和古籍的空隙，也看“小人书”。谢静宜估计，毛泽东在思考少年的学习和教育问题。因此，谢静宜看完后总是立即退还给毛泽东。但其中有几本毛泽东让卫士小田、小封送给谢静宜时就说明是送给谢静宜的，让她自己保存，不必退还的。在每本书的封面或扉页上均有毛泽东的亲笔批语和不让退还的字样，谢静宜一直珍藏着。

比如，一本是《庙子湖上的神火》，描写的是一位古代忘我助人的老渔翁的故事。这位老人为了引导渔船的航向，避免在风浪之夜迷航而发生危险，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黑夜坐在高山处点燃火源为渔民导航，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毛泽东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批道：“小谢，你要学这个人。”

第二本是《疯和尚》，画的是一位古代和尚扶困济贫惩恶扬善的故事，类似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济公和尚。

其中有这样的故事情节：村上一财主多收农民的银子，这时疯和尚用扇子把火向财主家的方向一煽，农民家的大火立即灭了，而财主家的房子却起了大火。

一次过年时，疯和尚给一穷苦农民画了一幅有各种小鸟的画，挂在墙上，不一会儿小鸟都活了，会飞了，叽叽喳喳叫着很是好听，给穷苦的农民家里增添了乐趣。财主知道了，也请疯和尚给他画一幅，疯和尚就给财主画了一幅，挂在墙上后，小鸟也都活了。只是许多小鸟不是在屋内给主人嬉唱，而是都来

啄这个老财主的眼睛，最后老财主的眼睛被鸟啄瞎了……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毛泽东的批语是："美妙的文学作品，尖锐的阶级斗争。小谢，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大有前途。"

第三本书是《卓文君》，画的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这本书，毛泽东未加政治性的评语，而是批："画得很好，注意看画。"事后，毛泽东赞扬这位画家："你看，在他的手下，一个人物只用几笔简洁的线条就勾画出来了，而且画得活灵活现，画得好啊！"

当谢静宜拿着这几本"小人书"向毛泽东致谢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小谢，你看这些人（指老渔翁和疯和尚）多好啊！要向他们学习。你长大以后可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啊！"当时谢静宜虽已23岁了，但毛泽东仍然把她看成是一个"孩子"。毛泽东又接着说："看历史故事的'小人书'也不错，可以了解一些历史知识，而且几个小时就把它看完了。但真正懂得历史，就不那么容易了，要看正书。"

毛泽东边抽烟，边思考，最后说："今后你要有计划地读书，哲学、政治经济学、鲁迅全集、古典文学、唐诗宋词都要读。"他怕谢静宜有畏难情绪，接着补充一句："不过没关系的，慢慢来。"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毛泽东常会有些意外之举，而这使他更具吸引力。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案头床边堆满了"事"，处理之余，他却迷上了"小人书"。那套《三国演义》连环画册也摊开在床边，他看得津津有味，而且一连几天反复看，吃饭睡觉也不放手。

一天，卫士尹荆山叫他吃饭，他靠在床上看"小人书"，不愿动弹。尹荆山说："主席，您还迷'小人书'啊？"毛泽东翻着书说："'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毛泽东给尹荆山讲赤壁大战，讲夷陵之战。说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一个三国鼎立。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临危不惧，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局势。他讲这些故事似有所指又无所指。影影绰绰，扑朔迷离。至今尹荆山还没想透。

毛泽东很欣赏"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语，说这符合辩

证法。他认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汉朝的张良和三国的诸葛亮都比较出色。他想象力极丰富，尹荆山说“我不可能追踪理解”。

尹荆山还回忆起一件事：那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在台阶上停住脚步。仰天凝视，深吸一口气。忽然放开喉咙，唱出两句戏。记得是《空城计》。

卫士们一怔，随即交换眼色，无不流露欢颜。这两声京戏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工作人员都生出“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感觉。到吃饭时间了，在尹荆山的建议下，毛泽东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毛泽东并不因为同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仍然是手不释卷，边吃边看。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火烧连营》，完全是休息脑筋的一种独特方式。“小人书”给毛泽东带来了乐趣和智慧。

读《一种清醒的作法》

毛泽东一生中读过很多外国人的著作，批语也写过不少。1960年6月21日在读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著的《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后写下了“很有意思，必读之书”的批语，如此批注还不多见。

《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是北京编译社根据伦敦柯林斯出版公司1959年英文版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60年3月作为内部读物出版的。全书5.1万字，大32开平装本。毛泽东的批语是用红铅笔写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的。批语全文如下：

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一日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除上述批语外，毛泽东还在书名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下面分别画了粗粗的曲线，“蒙哥马利著”下面画了粗粗的横道。

《一种清醒的作法》是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的批语

是6月21日写下的。这中间，即1960年5月蒙哥马利元帅曾来我国访问。这次访问是他本人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并共进晚餐，忻中说，毛泽东阅读过这本书，连同其他一些阅批过的书，他老人家一直放在自己身边。1976年9月9日以后，我们开始整理他老人家阅批过的图书时我才看到。既然老人家认为是“很有意思，必读之书”，我就从头至尾用心翻了一遍。

《一种清醒的作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1959年东西方外长会议期间，蒙哥马利在牛津大学作了两次讲演，并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西方应采取“和平取胜”的新策略，逐步同苏联达成协议，通过所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方式，“使苏联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最后战胜共产主义；分析了东西方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更是意识形态和争取人心的斗争，强调应通过谈判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提出，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等等。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和讲演汇集成书，这就是《一种清醒的作法》。

1961年9月23日，蒙哥马利第二次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这位英国元帅，并共进晚餐。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称赞这位英国元帅说：“我看得出你很开明。”这是毛泽东对西方将领的第一次夸奖。因毛泽东要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所以这次谈话时间不很长。谈话结束时，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同主席先生谈话，很受教益，我希望明晚再谈一次。”毛泽东告诉他，明天要离开武汉到别的地方去，以后还有会面的机会。蒙哥马利为请求不能如愿，不免感到有点遗憾。

凌晨4点钟，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决定继续同蒙哥马利会谈。蒙哥马利再次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他们开始了更为深入有趣的谈话。

蒙哥马利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至关重要的是领袖，人民并不总是知道对他们最有利的是什么，因此，领袖必须作出决定。”

毛泽东不同意这位元帅的观点，说：“人民的意志最重要，当人民信赖一

个人时，他们就会接受他的领导和决定，否则，人民就会反对他……”

毛泽东的话还没有说完，蒙哥马利就插话说：“这正符合我的哲学，胜利的取得，首先在于赢得人心，一旦你取得你周围的人们为你工作的人们的信任时，就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

蒙哥马利的确是一位很开明的人。还是在1960年5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中国在未来世界事务中的力量，他很有把握地说过：“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十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

关于销毁核武器问题，蒙哥马利认为：核武器的销毁，要等到东西方的不信任和猜疑减少了，裁军协议达成了，所有国家的武装部队从别的国家撤回到它自己的领土以内之后。他还说：“销毁核武器，是裁军计划中最后的项目，而不是第一项。”蒙哥马利的这种见解，使得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听后连连点头。

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问题。蒙哥马利1960年来中国访问与周恩来会谈中就预感到，中国将在1963年或1964年突破核障碍。这位元帅的感觉很准确。1964年中国果然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关于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60年5月28日，蒙哥马利元帅在上海欢迎他的宴会上说，在亚洲来讲，一个大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作为一个有理智的军人，我一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政府在北京，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

这样开明的西方军界要人，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观点和战略、策略观点等大都在《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中得到了体现。例如，在这本书中，蒙哥马利有这样一段话：“国家都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走向战争的。在分明就要获得胜利的时候，政治决策便成了首要的事。当时，重要的是怎样指挥作战，能以一种有利于取得和平的政治均势来结束战争。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是，战争继和平而来；但也可以反过来：和平继战争而来。”这段话是毛泽东阅读过程中圈画过的。最后两句：“和平继战争而来”，除分别画了横道外，每句后面

还画了一个大圈，在这句话旁边的书页空白处还画了两条粗粗的竖线，使这两句话在书中显得格外突出。毛泽东在这里又画又圈，说明他对蒙哥马利的见解很重视，很为赞赏。

阅读这本书，对认识和了解西方统治集团和平演变的战略与策略以及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的情形，对认识和了解蒙哥马利元帅等西方政界、军界要人的政治、军事观点等都不无益处。所以，毛泽东认为《一种清醒的作法》是“很有意思”的“必读之书”，并力荐其他领导也要看看。

向科学家学习

我国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曾应邀到过毛泽东的书房。在这里，他们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常常是清茶一杯，纵谈天地古今。大至宏观世界的天体起源、日月星辰；小至微观世界的细胞构成、原子裂变。主人不拘形式，或坐、或卧、或来回踱步，谈笑风生，幽默风趣。交换意见完全是商量、探讨、研究的口气，不强加于人。客人们也不感到拘谨，像在老朋友家做客一样，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无所顾忌。这种亲切坦率的会见，在五六十年代是经常有的。毛泽东从科学家那里学到并丰富了自然科学知识；科学家们从毛泽东那里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启迪。宾主相得益彰，尽欢而散。

毛泽东总是劝导科学家们要学习马列主义哲学，鼓励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建立密切的联系，结成巩固的联盟，以推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工作者遵循毛泽东的教导，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一定成绩。50年代，遗传学家谈家桢由于讲授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受到不应有的批判，不能开课。但他没有气馁，而是以科学家的严肃态度，潜心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进一步认识到在遗传学中，DHA、基因、染色体、细胞核和核外遗传物质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基因是生物本身传下来的内在根据，而表现出来的性状，是在各种外部条件和生物体本身的相互作

用中才实现的。这正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有关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精辟论述在遗传学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他思想上明确起来，对摩尔根派遗传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反马列主义的，是错误的，从而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信心。后来谈家桢见到毛泽东时，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告诉了他。毛泽东鼓励说："不要怕，要坚持真理。"谈家桢每当谈到中国遗传学的发展时，总是无限怀念毛泽东。他说："在中国，遗传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指导。"

毛泽东对用哲学观点分析、研究、总结生产第一线上发生的问题，总是给予热情支持和鼓励。1960年第24期《红旗》杂志上，转载了《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在转载这篇文章的同时，还刊载了一封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致作者们的信。全文为：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总支委员会

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原来，这一年的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上，提交会议的有一篇关于机床设计的论文。即当时有一种小机床加工大工件，叫作"蚂蚁啃骨头"、"积木式机床"这样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成果，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就这个问题作了哲学上的分析和研究，写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会后，此文被《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刊登，又被毛泽东推荐给《红旗》杂志，而那封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信，实际上是毛泽东写的亲

笔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师们所作的这项研究是“非常高兴”的，是“很喜欢读你们这类文章”的，是“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的。

此事的下文是：论文的作者们得到很大鼓励，并按照信中的要求，写出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并展开了一场讨论。前几年，有人评价认为，这两篇论文是我国从宏观上从综合上讨论技术发展战略问题的较早文献，而毛泽东提倡的这类研究，也正是现在应该提倡的。这是很有道理的。

毛泽东在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重视生产发展中出现的哲学问题的同时，也很重视科学实验，这是他历来倡导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毛泽东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并列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得到广大科学工作者的拥护和支持。1973年，毛泽东接见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杨振宁说：“毛主席，您看得很远，看到社会的将来。您把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毛泽东微笑着说：“没有科学实验行吗？”杨振宁在这次会见后发表感想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显然是一直密切注意着当代高能物理学的某些发展情况，特别是基本粒子是否可分的问题……我觉得毛主席对物理学的兴趣确实是浓厚的。我估计他在哲学方面的兴趣同他对于我们想在实验室里弄清楚的东西的了解和好奇心有关系。”他还说：“我认为毛主席是20世纪伟人之一，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学者。”杨振宁当然不会知道，他的《基本粒子发展史》一书，当时就放在毛泽东的书架上，他老人家非常仔细地读过它。

在党的八大一次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曾说：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懂得科学。50年代末，毛泽东多次要求全党“学技术，学科学”，否则就不能领导好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毛泽东深感自己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不足，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不大懂工业、商业，农业懂得一点，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

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借用毛泽东自己的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年逾花甲的毛泽东为了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经常虚心地向科学家求教。1952年，他关心即将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石油资源问题。他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地质学家李四光，一开口就问：“你那个山字形构造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能给我讲一讲?”李四光详细地讲了在力的作用下，大地形成的山字形构造的有关情况；此后，毛泽东又请李四光帮他收集有关地质科学的资料，并想读李四光的著作。为了能让毛泽东节省一些时间，少耗费一点精力就能看到他所需要的书，李四光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看了大量国外资料，写了七本书，用大号铅字排版，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编》，送给了毛泽东。一并送去的，还有李四光自己写的书中有代表性的两本——《地质力学概论》、《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毛泽东对李四光创造性的研究，给予很高评价。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在书房里约见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三位科学家谈话。据竺可桢的日记记载：“我到中南海，见毛主席卧室摆满图书……与我握手后，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毛主席说：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尚有缺点，还应加上光和气（日光和气候）。他对太阳光如何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有兴趣……”在这次会见时，毛泽东向竺可桢索取近著，竺可桢回去后，为他送去自己的另外两部著作：《历史时期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毛泽东都认真阅读。在这次会见中钱学森是这样记述的：“在这次被接见的人中，我是最年轻的。毛主席主要同两位年长的科学家谈地质科学、勘矿和气候、农业的问题。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路。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诲，对我进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启发。”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和周培源的一次谈话中问及：“《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

几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周培源不知道傅鹰教授的说法出自何处，问到本人时，才知道他是在讲义中提到的。周培源敬佩地说：“毛主席连北大化学系印发的讲义都看过，真是博览群书!”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于1965年把高深难懂的数学问题，用通俗的语言写成《统筹方法平话》，并走出书斋，深入生产第一线，使统筹学为生产服务。当他把《统筹方法平话》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后，及时给华罗庚写信道：“来信及‘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华罗庚说：“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的群众性科学实验蓬勃发展，遍及化工、电子、纺织、机械、冶金、轻工等几十个行业，这是我以往在书斋中埋头研究，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时所完全想象不到的。”

毛泽东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科学家们请教他所不懂的知识。1974年5月30日，他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因阐述自然界对称问题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博士。毛泽东一见面便直言问及物理学上的“对称”“何以那么重要?”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社会进化是以革命（变化）为基础的，它是动力学，而不是静力学。毛泽东坚信他的思想在自然界也是绝对真理。但对称系指“平衡的各个部分”，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概念。李政道为此作了一个极为简明的示范。他从桌上的一叠纸中取出一张，又拿起一支铅笔放在上面，用手指一弹，随即又把铅笔往回一弹，铅笔滚向一端，又滚了回来。李政道说：“这个过程没有一刻是静止的，但在整体上它具有对称性。”毛泽东很欣赏这个实践演示。当他们的话题由自然界转到人类社会时，得到一个共识：即人类探索自然界对称的内在冲动和建设一个美好的、稳定的社会的欲望是一脉相承的。这次接见的第二天，李政道在回去的机场上收到一套1922年出版的J·亚瑟·托马斯的原著《科学概论》。这是毛泽东送他的告别礼物。原来，在毛泽东和李政道的谈话时，毛泽东曾为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学习科学而表示遗憾，但他仍记得并很欣赏生物学家J·亚瑟·托马斯所著的这本《科学概论》，那还是他年轻时读过的。一位伟大

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这本《科学概论》成为沟通两位炎黄子孙的感情纽带。

毛泽东尊重科学，虚心学习科学。第一机械工业部编了一本40多位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他很为赞赏。在他逝世之后，人们在他书房里发现有不少自然科学杂志，如《化石》、《动物学杂志》、《自然辩证法》、《科学大众》等，其中许多文章都有毛泽东用铅笔画着的曲线、直线，这是他晚年阅读时留下的笔迹，也是他认真学习自然科学的又一例证。

毛泽东一直想安排出一段时间来很好地学习学习自然科学，这一方面是为了填补年轻时未能很好地学习这方面知识的空白，更主要的是为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他多次表露了这方面的愿望，又多次流露了愿望不能实现的遗憾。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的老同学周世钊、蒋竹如等人正在北京政治学院学习，有一次他俩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说："你们能够请假学习一年，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我很想学习两三年，特别想学习自然科学，可惜我不如你们幸运，现在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1963年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他很想骑马跑跑两条大江（指长江、黄河）。1964年，毛泽东真的想去实现他的这一愿望，骑马沿黄河而上，直到黄河源头，作一次系统的社会调查和自然考察。他还准备组建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地质的、搞历史的科学家参加。后来，毛泽东的这一愿望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未能实现，成为他的终生憾事！不过，他孜孜不倦地攻读自然科学，直到晚年，留下了不少令人不能忘却的学习典故，给后人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学习财富。

读放翁诗词如遇知己

1961年11月6日上午，毛泽东接连三次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请他找写梅的诗词。大约就在这个时间前后的一些日子里，毛泽东较为集中地读了不少诗

人咏梅的诗词。南宋大诗人陆游平生爱梅，写咏梅的诗词在百首以上，其中最有名的是《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毛泽东读这首词，萌发了“反其意而用之”的创作构思，于12月写出了著名的《卜算子·咏梅》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成词后不几天，他在一封信中说：“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作，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

这里所说的“末尾的说明”，是指毛泽东于12月27日写在陆游《卜算子·咏梅》词后面的文字：“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

毛泽东这个“说明”，应该说是切合陆游创作《卜算子·咏梅》词的实情的，所论也是中肯的。毛泽东说这个“说明”“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表明他的郑重与谦虚。

毛泽东对于陆游的生平很熟悉，对陆游的文章、诗词都作过研读，能背诵部分诗词。就在他写这个“说明”之前两个多月，即10月16日。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邵华，随着姐姐刘思齐来到菊香书屋看望毛主席，她顺眼瞟着老人家床头一叠线装书，便说：“毛伯伯，您也喜欢《剑南诗稿》？”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常随姐姐和岸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就很喜欢她。所以，她虽长大了，到主席身边来，就还是很随便的。

毛泽东点了点头，微笑着说：“看来，你读过放翁的诗词哟。”

“不仅读过，而且特别喜爱。”邵华说。

毛泽东问：“你最喜欢陆游的哪几首诗词?”

邵华说了《关山月》、《诉衷情》、《夜游宫》、《示儿》等篇，并当着毛泽

东背诵其中的作品。背诵时，邵华略微停顿想下句，毛泽东就提示她一下。邵华背诵《夜游宫》，背诵到“睡觉寒灯里”时，毛泽东指出她读错了一个字音，“睡觉寒灯里”的这个“觉”，这里不能读jiào(教)，应该读jué(决)，并要她回校去问问老师这样念对不对。他还说自己“读放翁诗词，如遇知己”。

邵华乘机要求毛泽东将《夜游宫》写给她。毛泽东谈兴正浓，立刻站起身来，走到桌前，铺开宣纸，提笔濡墨，写下了《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邵华如获珍宝，立刻双手将纸捧了起来，用嘴吹干墨迹。

当然，毛泽东不会到60年代初才读陆游的作品。早在邵华看见他床头的《剑南诗稿》之前，他就常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陆游及其诗词了。

1957年的一天，在专列上，晚饭时，服务员姚淑贤向毛泽东讲她看的表演陆游爱情悲剧的戏，讲完了还说：“主席，应该看，很不错的。”

毛泽东问：“这戏的名字叫什么?”

“《凤头钗》。”

“《凤头钗》?”毛泽东反问了一句。

小姚犹豫了，说：“是《凤头钗》还是……《钗头凤》来着?哎呀，我记不清了。”

毛泽东笑了：“是《钗头凤》。这是陆游写的一首词：《钗头凤·红酥手》。他是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年轻时就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他的表妹叫唐琬，也是一位有才华重感情的妇女。他们的爱情悲剧在《齐东野语》里有记载。”

大约在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和保健医生徐涛谈起了陆游与绍兴的沈园。毛泽东说：“陆游与唐琬离异后，又相遇于沈园，那是他们情意缠绵之地，陆游的那首词《钗头凤》就题在沈园的墙壁之上。”说着，他一时兴起，提起笔来，潇洒地写下了这首词：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毛泽东放下笔，问徐涛："你知道唐琬回赠的那首词吗?"

徐涛回答："我没读过。"

毛泽东用他那特殊韵味的湘腔背诵起来：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长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毛泽东接着说："这首词回赠没有多久，唐琬就因积愁而死去。当初是陆游的母亲与唐琬不和。陆游这一对夫妻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这是封建社会的悲剧。"

这天晚上，毛泽东兴致很高，他吸口烟，又说："我看你和小吴(指徐涛的妻子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你们这个家庭是很幸福的。"他略停了一下说："这世界上真正幸福的家庭能有多少啊？"那语气，深沉而带感叹。

陆游，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他一生创作甚丰，现存诗词近万首。反对妥协投降，坚决抗敌报国，是陆游诗词创作的基本主题，爱国主义是他诗词乐章的主旋律。陆游20岁时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壮志，以身许国。直到86岁他逝世前，还写下渴望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诗——《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毛泽东说："读放翁诗词，如遇知己。"正是陆游诗词中的充沛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引起毛泽东的共鸣。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本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写了12条批注和一个说明。批注，这里不必谈了；说明与陆游有关，抄录如下：

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1958年12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1927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餮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31年了，大陆上的蚊子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餮蚊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闲上太空，但悲不见九洲同。愚公尽扫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陆游盼望的是祖国的统一，毛泽东盼望的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历史时代不同，诗人的思想境界自然有高下之别了。

1961年9月，毛泽东写了《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其中一首云：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诗的第一句写绍兴地灵人杰，第二句写绍兴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第三句，举出陆游和秋瑾作为代表，第四句，说他们都一律载入了中国诗的史册。全诗的言外之意是：鲁迅继承了绍兴的爱国主义传统，他将同陆游、秋瑾一样，载入史册。诗中将陆游、秋瑾、鲁迅并提，可见毛泽东对陆游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高度评价。

读《增广贤文》

60年代的一个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游完泳，坐在藤椅上。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高智，你给我找一本《增广》，明天就给我看。”

“好。”高智应道。

高智，50年代初至60年代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立即给田家英打电话索要《增广》，并告诉田家英，主席明天就要。

第二天下午，送文件的同志到了。高智急忙去翻看送来的所有文件、材料。果然，有一本《增广昔时贤文》。高智放心了。

《增广》是一本什么书呢？原来，如同《三字经》、《千字文》一样，《增广》本是一种启迪童蒙的蒙学教材。

中国的启蒙文化自周秦以来，两千多年间涌现过难以数计的蒙学教材。但流传最广的却屈指可数。《三字经》、《千字文》、《增广》便属流传最广之列了。其中《千字文》已经流传1400年之久，《三字经》、《百家姓》也流传了千年左右。《三字经》甚至被誉为“古今奇书”、“袖里通鉴纲目”，被翻译成多种外文。

《增广》成书较晚，相传为明朝中叶一儒生编撰，后经一些人陆续增补，改成《增广昔时贤文》、《增广贤文》，简称《增广》。清代和民国年间曾风靡全国，几乎家喻户晓，流传极广，影响极大，比较著名的有上海普通书局和昌文书局的石印本。

《增广》同《三字经》、《千字文》一样，之所以流传至今，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是同它内容和形式上的许多突出优点分不开的。在内容上，《增广》紧紧围绕人生和社会两大主题，将历代典籍中先贤哲人的名言佳句编撰成书，从各个角度谈处世立身之道，深刻隽永，意味无穷，很有启迪和警醒作用。在形式上，《增广》将诸多名言佳句加以改造，使之通俗化，再吸收大量民间俗语，或两句一联、或四句一组，整齐押韵。循循善诱，简洁流畅，极便诵记。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骄”、“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等，哲理性很强。

许多领袖人物都读过《增广》，人们都熟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吧？这本书在几十年间曾跟随作者的命运几起几落。其中“中国有两句谚语：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世界上

完全不被别人误会的事是没有的，而误会迟早总是可以弄清的”这话所引的谚语，就见于《增广》。

1965年9月29日，外交部部长陈毅举行了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他慷慨陈词，博来阵阵喝彩。陈毅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统统都要报销！”陈毅手一挥，台下掌声雷动，须知，此话也见于《增广》。

毛泽东对《增广》更是熟读在胸，在实践中融会贯通，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也见于《增广》。

读宗教类书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他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兴起，使佛教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

死后由他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这也可以说是他读书有针对性的特点之一。

1947年的一天，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一起去驻地附近看白云山庙。县长也赶来陪同他们一同去。上山后毛泽东问县长："你是父母官，你说说这座庙为什么叫白云山庙？"县长回答："既然山叫白云山，庙就叫作白云山庙了。"毛泽东说："我听说，这山顶常有白云缭绕，依山建了50多座殿宇，亭阁楼台，重叠连云,远望似飘浮于白云之中，所以叫白云山庙。"县长说："还是毛主席调查仔细。"毛泽东又问："这庙是什么时候建的啊?""好像有年头了，说不准。"毛泽东告诉他："这庙创建于明，增修于清。"并批评县长说："你这个父母官治下只有两处名胜，这里一个，香炉峰一个，你还搞不清?"县长不以为然："都是一些迷信东西……""哈哈，我猜你也这么想。片面了，同志。这首先是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你是守着元宝当石头啊!"进庙后，毛泽东观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建筑，特别注意到墙上的1500多幅壁画，向带领他们参观的老和尚询问壁画所描绘的佛教经传故事，并感慨地对老和尚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存，不要毁坏。"参观完后，毛泽东又指示县长："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宗教神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虚幻的反映。宗教产生于史前社会的后期，当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时，人们无法控制自然力量，企求以祈祷、祭献或巫术影响自然界的神灵；阶级社会出现以后，阶级压迫给人们带来较自然灾害更加深重的苦难，当人们还不理解其社会根源时，便产生祸福命运由神操纵的观念。一切剥削阶级都竭力通过宗教神学麻醉和愚弄人民，消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意志，所以，它是一种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任继愈引用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

正是毛泽东极其深刻的论断。因为宗教是阶级社会一个常见的怪物，它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之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神学，它又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其他部门，“不批判宗教神学，就不能全面地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去，就会给历史唯心主义留下可钻的空子。”

毛泽东的批语，对任继愈的哲学研究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同时也给史学工作者指出了批判神学与搞好史学研究的关系，其意义是很大的。

读《黄琼传》、《李固传》

1965年，毛泽东读《后汉书》的《黄琼传》、《李固传》，认为值得一读，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都在百忙中及时阅读了。

1974年，毛泽东评价这两篇传记中李固给黄琼的信：“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可读”。

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以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忠言谏君著称。东汉时，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争相专政擅权。大将军梁冀的两个妹妹分别是顺帝、桓帝的皇后，梁冀垄断朝政近20年，骄奢横暴，不可一世。顺帝时，黄琼两次被举荐到朝廷做官，他都托病不去。李固非常仰慕黄琼，写信劝他出来协助朝廷治国安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们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副，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等缺点。信中写道：“……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这就是被毛泽东评价为“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的那封信。黄琼出来做官后，经常上疏规劝顺帝。所提批评和建议多被采纳。顺帝死，梁冀和

梁太后先后立冲帝、质帝，两帝在位的时间都很短。其后桓帝立，拟褒崇梁冀功劳，可与周公相比。黄琼不畏惧梁冀的权势，在众人随声附和中，只有他坚决反对。他举出萧何、霍光等功臣为例，认为“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桓帝接受了这个意见。黄琼临死前，仍上书直谏，指出桓帝“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这些人作威作福，“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使皇帝耳目闭塞。他还一一列举当朝的忠与奸，规劝桓帝要清醒、要明察。并表示自己在临死前说这些话的一片忠心。

李固也是汉顺帝时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李固多次上书顺帝，规劝他慎重选用官员，协助他整顿朝纲，为天下树立榜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顺帝死，质帝立，李固被委任为宰相。他任职后，“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质帝死后，李固建议“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他给梁冀写信说：“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梁冀不同意，免了李固的职，立了他妹夫蠡吾侯，是为桓帝。李固后为梁冀诬陷，被诛，死时54岁。

毛泽东对《黄琼传》和《李固传》中的“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几句充满哲理的警句特别欣赏，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就曾引用过，毛泽东说：“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读《触詟说赵太后》

《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一文，说的是：战国时期，秦国攻打赵国，赵国的太后主事，向齐国求援。齐国一定要赵太后最小的爱子长安君去作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舍不得，群臣怎样劝说都无用。左师触詟前去，先从自己的爱子说起，又说到太后把女儿远送嫁到燕国为后，都是为子女利益着想。最后才说到太后如若深爱长安君，就不应只封给他肥沃的领地，赠送他值钱的金玉，而不让他为国立功，否则太后一死，长安君的地位就无法保证。赵太后明白这个道理后同意送长安君去齐国为人质，齐国出兵后，赵国转危为安。

1967年，毛泽东阅后推荐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毛泽东大力推荐《解詟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其教育意义是很深刻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众诸侯王国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持住王位的原因时说："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又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凡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对于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关于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同样是涉及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大问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毛泽东看到这一问题，他从赵太后溺爱子女的教训中，总结出教育子女要严格的育子方法。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对子女真疼爱，要求也真严格。”1946年，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丁的旧衣服，让他到农村这个大课堂去上“社会大学”，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他又送毛岸英上了炮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当自己的爱子为国捐躯的消息传来，他强忍着老来丧子的悲痛，发自内心地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从小在延安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在大食堂吃煮黑豆。考上大学后，和所有同学吃一样的饭菜，住一样的宿舍，一样坐公共汽车上学、回家，一样下乡参加劳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泽东虽然看到李讷吃不饱心里很难过，却断然拒绝工作人员为正在发育的李讷多争取点口粮的建议。他说：“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1963年1月4日，毛泽东给李讷写信说：

>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就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毛泽东借《庄子·秋水》中的主人公河伯盲目自大，望洋兴叹，来说明自己渺小的典故来教育李讷，他就是用这种严格要求来体现对子女的疼爱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子女是这样要求的，他是从青年一代人的教育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早在解放之初的1951年，外交部亚洲司服务员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

油等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专设两三辆汽车，同时在西单附近定一联络点，由家长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毛泽东对这件小事很重视，亲自批示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查明酌办"。并批注："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毛泽东一直关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教育。这与他注意研究古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关。

读《南史·梁武帝纪》

《南史》是唐李延寿所撰。李延寿，字遐龄，相州（今河南安阳）人，生卒年月无考，大约死于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历官崇贤馆学士，符玺郎兼修国史。曾参与编修《五代史志》、《晋书》，又著有《太宗政典》等书。其父李大师有著述之志，曾着手撰编年体南北朝史，书未成而卒。《南史》的修纂，是李延寿继承了父志，借助于其父的遗稿，取材于南北朝八书，用16年的时间编写成的。

《南史》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合计80卷。上起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下到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载了南朝宋、齐、梁、陈四朝170年的历史。

毛泽东晚年阅读《南史》时，对梁武帝很感兴趣。梁武帝姓萧名衍，原为南北朝时齐朝的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齐朝的东昏候萧宝卷凶性暴虐，杀死萧衍的哥哥萧懿，萧衍因而起兵攻陷齐都建康，迎立肖宝融为帝，是为和帝。萧衍被封为梁王。后灭齐，建立梁朝。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在南朝宋、齐、梁、陈几朝的频繁更迭中，梁武帝执政48年，在位时间最长。在位时，基本保持着和平环境，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毛泽东在《南史·梁武帝纪》中，有许多精彩的圈画和批注。

早期的梁武帝是一个有比较清醒政治头脑，很有魄力的统治者，毛泽东对这一点有许多处圈画。《南史·梁武帝纪》记载：当梁武帝的哥哥萧懿为齐所害，他起兵讨齐时，有人劝他把齐和帝接走，免得别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被动。他不听，说：“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圈，每句加了旁圈。梁武帝还清醒地觉察到齐朝的政权被某些地方官员所把持的弊端，他说：这些地方官员“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而“政出多门，乱其阶也”。毛泽东在前两句旁画着曲线，后两句旁画着密圈，在两处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流露出他极为赏识的态度。

梁武帝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在《南史·梁武帝纪》及其他史书中，关于他善于用兵打仗的事例多有记载。毛泽东在这些地方也有不少圈画和批注，十分显眼。梁武帝在襄阳起兵时，齐派大军镇压。他派人离间齐军，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毛泽东在此处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梁武帝在争夺郢城的战斗中，及时在加湖打击齐的援军，梁“众军乘流齐进，鼓噪攻之”，很快取胜。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打援。

齐在援郢的同时，派人镇守江州，为之助威。梁武帝对诸将说：“夫征讨，未必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恭服……我为九江，传檄可定也。”毛泽东在这段旁加了曲线。后郢城求降，镇守江州的陈伯之“犹惧”，“乃束甲请罪”，证实了梁武帝用兵的预见性和善于决策。《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徐州刺史昌义之被魏国围困，梁武帝派曹景宗去解围，指令他在某地与另一援军会合后，共同行动。曹景宗想自己邀功，竟单独前进，却不料遇到暴雨，淹死了不少人，只得退回。梁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对此加了旁圈，在天头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军机。这是毛泽东用军事家和战略家的历史眼光来审度梁武帝的军事活动，并加以批注的。

对梁武帝的失误和衰亡，毛泽东也加以圈画和批注。《南史·梁武帝纪》

记载：梁武帝晚年，听不进正直的忠告，在他逝世前五年，大臣贺琛针对时弊给他写了一个奏折，提出官吏收括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上层统治阶级的生活穷奢极欲，浪费十分严重；权臣作威作福，专找别人的罪过；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生养，建议他对官吏“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贺琛提出来的这些情况本是实际存在的，建议也很中肯。但梁武帝对他秉公陈述的奏折却觉得忠言逆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口授敕书，一一反驳，痛加斥责。他说，我做皇帝40多年，一直能认真地听取好的意见，最恨昏聩，你贺琛在朝为官，不应和地位低下、品格卑鄙的人一样讲话。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

孙权是三国时吴国的国君，陆逊是他手下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得力名将，官至丞相。黄武五年（公元227年），陆逊上书孙权，劝他“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不接受，一一反驳。梁武帝和孙权一样，听不进正确意见。他用自己的简朴，勤于政事批驳贺琛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我以身作则，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住处除一张床外，别无装饰摆设，不饮酒，不听音乐，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处理国事，腰围都瘦了二尺，等等。这还不是起带头作用吗？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批注：“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离，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梁武帝还斥责贺琛说：你说当今做官的都通过皇帝奏事，谋求进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这样做呀！否则岂不“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吗？”毛泽东又在此处批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毛泽东对梁武帝的批注大意是说：一个好皇帝，艰苦朴素，自善其身固然很难得，但若听不进好人的意见，不能兼听则明，那就会被小人包围，导致失败，梁武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南史》作者李延寿评论梁武帝说，他即帝位后，除军事、经济上有建树外，还“制造礼乐，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最后终因宗室子弟相互倾轧残杀，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的降服，引狼入室，导致梁室的覆灭。开国创业贵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屈辱地饿死于

侯景的囚室。李延寿说："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乎。"徐偃是西周徐国国君，强大时有36国向他朝贡，被称为东方的霸主。毛泽东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忘情干戚"，"弛于刑典"两句旁画着密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在"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这几句旁，画着着重线。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唐朝诗人罗隐《筹笔驿》中的诗句。筹笔驿，古地名。相传诸葛亮出师，曾驻军筹策于此。诸葛亮一生北征南讨，协助刘备创业，怎奈他虽才智忠勇俱全，但因"出师未捷身先死"，无法用尽其才，光复汉业。"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崇敬和惋惜之情。毛泽东随手拈来用以评价梁武帝，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位创业和败亡双重的历史悲剧人物的嗟叹和感慨。

《南史》作者李延寿对梁武帝的评论，提出创业和守业的严肃问题。毛泽东对梁武帝纪如此重视，恐怕与这个问题有关。通过阅读《南史·梁武帝纪》，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恐怕是毛泽东读史的真正目的吧。

读人民来信

20世纪六七年代，虽然毛泽东的身体衰老了，但他仍然坚持读人民来信，这是一根挣不断的红线。

一位小学教员的来信打动了毛泽东的心，他再一次落泪了。顶天立地的毛泽东在感情世界方面丰富而脆弱，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

信是从福建省莆田县寄出的，写信的人叫李庆霖。他用朴实的语言平缓的口气向毛泽东倾述了他的困难、苦恼和不平。他的儿子李良模初中毕业，因

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山村插队去了。他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能锻炼他们热爱劳动、热爱贫下中农的思想觉悟，但是劳动一天连最简单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粮食吃不饱只能去黑市买，每月要到家里来拿钱拿油，住房也解决不了。原先下乡一个，现在又一个孩子初中毕业，他真害怕再增加负担，他实在生活艰难。他希望孩子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问题、吃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他反映有的人有权力有地位可以不叫孩子下乡，他们可以走后门，拉关系招工、招生、招干。我一个小学教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

毛泽东尊敬教师。他读过师范学校，要是没有那本《新青年》的诱惑，他很可能当了教书先生。作为革命家政治家的毛泽东直到晚年还留恋他的湖南第一师范的生涯，他的少年壮志是当教师。所以，当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吹捧他“四个伟大”的时候，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只要一个，导师。我过去就是教员”。

教了20多年书的农村小学教员遇到了无米之炊的艰难窘境，他不能不管。

毛泽东是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中读到这封信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遇到的许多实际困难，毛泽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他听说过这一类问题的简报和汇报，但李庆霖的这封信从一个家长的角度哀婉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苦楚，将心比心，毛泽东理解李庆霖的心境。虽然信中有一些“大胆”和“冒昧”的话，从当时的政治气氛来说，是“污蔑大好形势”的，但毛泽东看出这封信说的是真话，是许多人不敢说的话。

边看边想，特别是读到悲哀处的文字，毛泽东控制不住感情了，他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在眼眶中含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可怜天下父母心，毛泽东看得老泪纵横。

这是1973年4月25日。

在游泳池值班室里，工作人员议论纷纷：“主席今天看了一封信，

哭了。”

“这个教师儿子下乡，生活很困难。”

“主席叫我们汇款300元，从他稿费中支出。”

这一年，毛泽东80岁高龄。他为这封从福建莆田飞进中南海的人民来信，亲笔写了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李庆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在莆田街上的邮筒中投寄出去的这封寄给“尊敬的毛主席”的信毛泽东真的收到了，还亲自给他回信，“聊补无米之炊”六个字包含着海一样的深情。他收到了一张绿色的从北京飞来的汇款单，300元钱的汇单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领袖对人民的无限关怀！

李庆霖哭了。他甚至有点后悔了，悔不该将自己的困难去打扰年事已高的毛泽东，10亿人口的大国有多少事情需要他老人家操劳！他感到内疚的是毛泽东寄给他的300元钱，他怎么好意思接受毛泽东的钱呢？李庆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给李庆霖写信寄钱的消息传向四面八方，四面八方的人们奔走相告，李庆霖家门庭若市，从各地寄来的信件数不胜数。

不久，中共中央以[1973] 21号文件的形式将毛泽东的复信和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全国，传达到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

显然，李庆霖的信反映了全国上山下乡工作普遍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份中央文件后面，还附上《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全国党、政、军机关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对知青工作要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

“全国此类事甚多”，七个字像晴天霹雳，各级政府和领导人立即行动起来。5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批示，会议反映了各地知识青年的艰难处境，提出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

可见，阅读人民来信是毛泽东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的一条重要渠道。

读鲁迅著作

读鲁迅的著作，是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曾说过："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与鲁迅并没有见过面，也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把两位伟人圣洁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就是鲁迅的著作。

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集》（线装本）。这本书共收有鲁迅手稿29篇，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工作人员收到出版社送来的样书后，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见到这本书后，不分昼夜，一有空就翻阅。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一行一行往下看。有时，他一边看，一边还不时地用铅笔在手稿选集上圈圈画画。毛泽东为什么爱看鲁迅的这本手稿选集呢？毛泽东生前很爱欣赏名家字画和名人墨迹。他说，工作之余，看看名人字画、墨迹，这也是一种休息。鲁迅的这本手稿，都是在"语丝"稿纸上，用毛笔竖写的行书体，字迹清楚，运笔流畅自如。正如郭沫若在评论鲁迅的书法时所说的："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所以毛泽东常常翻看。有时，他把鲁迅的这本手稿选集当成鲁迅的著作来读，有时他也把它作为鲁迅的墨迹来欣赏。

毛泽东在读《写在"坟"后面》这篇手稿时，在许多文字旁边都画了红道道。鲁迅在这篇手稿中写道："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鲁迅在这里所说的"愚人"是指广大劳动人民，"聪明人"是指少数封建统治者。鲁迅的话充满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毛泽东对此非常赞同。在阅读1956年出版的单行本时，他就在"世界都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下

面重重地画了两道红线。这次在读手稿本时，又在这一段文字旁边重重地画了两道红线，使鲁迅的这句名言在这本手稿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971年毛泽东生病以后，大都躺在床上借助放大镜看单行本的鲁迅著作，后来视力越来越差，用放大镜看书也越来越困难了，怎么办？工作人员与秘书徐业夫商量，是不是将鲁迅的平装本著作印成大字线装书，这样他老人家躺在床上看也比较轻便。徐业夫把这个想法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说："国家目前还很困难，印大字本又要花钱。"当然，这是从经济方面考虑的。但是，无论从他的读书习惯上，还是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来说，他都是很喜欢看线装大字本的书籍。所以，经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同意，徐业夫与国家出版局联系，国家出版局于1972年2月初，责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将50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由于字要印得大，原来一卷的平装本印成大字线装本后，就要印成九至十个分册，每一卷还要做一个布面函套，所以，全书的印刷装订工作量很大，不能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印出来。

为了能让毛泽东早点看到新印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工作人员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有关同志，商定采取印好一卷送一卷的办法。当时并没有按原书的卷次顺序排印送阅，而是先印好哪卷就先送哪卷。毛泽东则收到一卷就先看一卷。他看这样的线装大字本是很快的，常常是一卷看完了，下一卷还没有送到。有一次，新到的一卷已看完，他还想往下看，可是书又没送到，便风趣地说："断炊了。"

为了满足毛泽东读书的需要，印刷厂将原来两班倒改为三班倒，厂领导、生产科长都来到车间，与工人师傅一起加班加点。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与工人师傅们一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从1972年1月初到7月中旬，大约个半月，十卷本全部印刷完毕。

因为是印装好了一部分送一部分，所以，待毛泽东收到全书时，他也差不多都读完了。

毛泽东阅读过的这部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现在还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打开函套，可以看到许多册的封面上都画有红圈圈，有的画一

个，有的画两个，还有的画三个，这红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晚年毛泽东读书的一种习惯，他每读一遍就在书上画一个圈作为标记，读过几遍就画几个圈。画三个圈就说明他已经读过三遍。毛泽东晚年还如此反复阅读鲁迅的著作，可见他对鲁迅著作的喜爱。

毛泽东尤爱读鲁迅的杂文。他很赞同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中的《捣鬼心传》这篇杂文的观点。对文中“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很赞赏，多次圈画。直到1975年8月，还用颤抖的笔在这句话的书眉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圈。他还在《二心集》、《伪自由书》、《淮风月谈》等杂文的封面上画红圈，说明这些杂文他在晚年至少看了一遍。

在《花边文学》中的《正是时候》这篇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毛泽东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粗粗的两道，还在“吃饭”后面添加了“夺权”两字。这样就把“旧家子弟”的本质更深入地揭示出来了，虽添两字，但恰到好处，给鲁迅的文章增加了色彩。这是毛泽东读书加以发挥的一个特点。

在大字线装《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五分册上，至今还留有毛泽东用颤颤巍巍的手写下的“1975.8”批注。

毛泽东在读《淮风月谈》时，写下了“吃烂苹果”的批注。

毛泽东所写的“吃烂苹果”是什么意思呢？

原因是在《淮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这篇文章中，鲁迅用苹果虽烂，尚有可吃之处作比喻。鲁迅在文章中说：“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鲁迅用吃烂苹果的道理来说明对文艺作品和文艺界的人要实事求是，不能因其有一点缺点和不足就全部地抛弃，或者全盘否定。毛泽东非常赞同鲁迅的这种观点。

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喜爱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1975年4月，他老人家已经重病在身，还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鲁迅的无题诗：“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

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读笑话书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而且读书范围广泛，晚年尤喜读笑话书。据担任过毛泽东报刊图书管理的忻中回忆，晚年毛泽东对笑话书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1974年这一年里，他读得最多的便是笑话书。

笑话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史记》中记载的淳于髡、东方朔等，就是擅长用说笑话的方式，来达到讽谏劝喻目的的。两汉以来，我国各种笔记小说和杂谈、杂记等诸多的书籍中就记载着种种笑话。唐宋以来，搜集成编的笑话专集有数十种之多。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家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一批笑话书。

1974年1月1日上午11时30分，忻中正准备去食堂吃午饭，张玉凤给他打来电话说：首长要看《太平广记》和笑话方面的书，并且要线装大字本的，要马上找出送来。《太平广记》为小说总集，北宋李昉等编辑。因该书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故称《太平广记》。此书共500卷，另有目录10卷，收录了自汉至宋初的小说、笔记、稗史等475种，保存了大量的古小说资料。解放后新版的《太平广记》，毛主席书库存有一部。因不是线装大字本，故还得到北京图书馆去借。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就在中南海北门外(现为北京图书馆分馆)，从中南海办公室到北京图书馆要不了5分钟。所以，忻中很快就从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借来一部明许自昌刊本《太平广记》,共10函100册。

《太平广记》送给毛泽东后，就放到毛泽东书库里，还采用老办法，首先翻《线装图书总目》。当时毛泽东书库存放的线装图书，为了查找、使用的方便，他们按经、史、子、集四大类和若干小类分别登记做成目录，打印后分为三份，每份装成三册。游泳池处放一份，毛泽东住地放一份。还算不错，就在“总目”第一册上，很快就找到了一些笑话书，可是最终从书柜里找出来

的只有四种共九册。其余的可能是毛泽东平常看后没有退回来，仍在他的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存放。将找出的《笑府》、《笑典》等4种9册笑话书即送到游泳池。

后来翻阅毛泽东读书登记簿，才知道，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要看笑话书。在此之前，毛泽东晚年至少有两次比较集中地读过笑话书。一次是1966年1月，据逄先知当时的记录，这年1月13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从外地来电话，说首长要看《笑林广记》等类笑话书。逄先知从1950年冬到1966年夏，一直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接电话后，他即从毛泽东存书中找出七种笑话书，1月14日，交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即现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通讯员送给了毛泽东。

第二次是1970年8月，据有关记录，8月25日这天，从北京图书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现为北京市文物局）及有关同志的个人图书中共找出20种笑话书送给了毛泽东，其中《明清笑话四种》、《徐文长故事》、《广笑府》三种和《笑笑录》、《苦茶庵笑话选》两种是从当时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代管的个人图书中找出来的。其余15种都是从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后来都如数退还了。

有了第一次的实践，第二次忻中也就变得有点聪明起来了。同时，“再找一找”，也没再强调要找大字线装本。所以，1月2日这一天，首先跑到北京图书馆，又到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泽东自己的存书中，线装、平装的笑话书一下子又找出不少，数一数一共是14种21册。与忻中第一次送的4种9册相比，这14种21册全是新的。新是新，可是线装本、平装本都是小字的，其中有好几种还是他以前看过的。不过这一次，毛泽东收到书之后没有很快就说“不理想”，而是从中选出《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两种要给他联系重新排印大字本。

1月2日送给毛泽东的笑话书，以及从中选出印大字本的《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等，他老人家不久全都看完了。这一次，虽然没说“不理想”，但是，2月23日他老人家又发出指示：“继续找笑话书。”

忻中经请教北京图书馆的同志，他们告诉忻中，这类图书可以去北京几

所名牌大学找一找。所以，这一次，忻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2月25日上午，拿着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去北京师范大学。李馆长先后找出来的笑话书有11种外，还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代管的个人图书中和琉璃厂中国书店旧书当中又找到了4种。

4月15日、17日下午，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借来了11种笑话书。

这样一来，先后合计找出25种49册笑话书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从中选出《时代笑话五百首》、《笑话三千篇》、《哈哈笑》3种，要重新排印大字线装本。

找了这么多的笑话书，又重新排印了《笑话三千篇》等3种大字本，本以为毛泽东看笑话书到此该差不多了。《新笑林一千种》、《时代笑话五百首》，加上《笑话三千篇》，还有别的笑话书，加在一起，笑话可能已过5000个了。5000个笑话，这个数字不算少吧？可是，事情并非像忻中想象的那样。6月4日晚饭后，毛泽东在看完新印的《笑话三千篇》等一批笑话书之后又说：新印的“《笑话三千篇》也不理想。”要他们再找一找有关笑话方面的书。

忻中等研究，决定“全面出击”，除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书店和北大、清华、北师大等老牌大学的图书馆外，还分别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中央宣传部图书馆，等等，凡是估计能存有笑话书的图书馆，都进行了联系。通过“全面出击”，广泛联系，各方查找，又找出了20种共55册笑话书。

这些书分别从有关图书馆借来后，工作人员于6月14日下午送给了毛泽东。一个星期后，即在6月21日晚上，他老人家翻看完这批笑话书之后告诉：“最近所借的笑话书，没有多少新鲜的，就不用重印了。”

京城大小图书馆忻中都跑遍了，能找的笑话书差不多也都找出来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将一般不出借的馆藏善本也都拿出来了。可是毛泽东认为“没有多少新鲜的”。北京城的笑话书，毛泽东几乎都读遍了。然而，能使他老人家满意的，换句话说，他老人家认为是“理想”的、“新鲜”的却不很多。

根据毛泽东“再找一找”的指示，除在北京地区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查找外，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有关领导又要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上海和杭州。从1976年6月下旬以后，“兵分两路”（北京、上海两地）继续努力为毛泽东查找笑话书。

6月26日上午，北京市委文化小组特派专人与忻中一起来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该处负责人说明了来意。当时他们都还不知道是毛泽东要看笑话书。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同志行动很快，他们是临时组织人力，翻箱倒柜，从他们收存的图书中仔细查找，第二天（即6月27日）就找出60多种笑话书。后来又相继找出几种，能找到的他们差不多全找出来了，这些书既有平装本，也有线装本，与以前送毛泽东的笑话书相比，大部分还都是新的。当拿出这批新找到的笑话书时，心中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并充满信心地认为，这批笑话书中肯定有毛泽东喜欢的。因找出来的笑话书过多，当时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要将这次找出的笑话书分为平装和线装两大类，先做出一份“笑话书目”送给毛泽东。如果从1974年1月1日为毛泽东第一次找笑话书算起，到9月19日，在北京地区忻中前后查借笑话书逾百种。在这个过程中，得知1974年毛泽东读了不少书，但据知读得最多的大概就是笑话书了。翻开毛泽东的借书登记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74年1月1日至6月30日，这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外借图书除极少数其他图书外，绝大部分都是笑话书。

8月26日，毛泽东在《笑话书目》中圈选了十种。9月19日，又圈选了十种。

毛泽东对《新笑林一千种》很喜欢，书中所收的笑话，有不少曾给毛泽东的生活带来笑声，增添了生活的乐趣。

送印《新笑林一千种》时，封面上有一幅彩色幽默画。毛泽东对这幅画很感兴趣。送印前，他老人家嘱咐说，封面上有一幅彩色幽默画和书前的四幅黑白幽默画照印。封面上的这画技艺并不高超，也非出自名家之手。但这幅画却表达一则“嘲啬刻者”的笑话：“一极啬刻人过河。不肯花摆渡钱。乃涉水而过。行至中流。水深过腹。势将灭顶。急呼人救。岸上者曰。非二百万文不

救。曰。给你一文如何。须臾。水过肩。又呼曰。给你一百五十文如何。岸上人仍不肯救竟至溺毙。阎王怒曰。你在阳也蓄钱自利。不肯济贫。坐令人死。罚下油锅。既至油锅。见一巨锅盛油。啬刻鬼曰。这许多油。殊可惜。若把这油钱折给我。我情愿干锅炰烤。”

毛泽东爱读《笑林广记》。

1974年8月6日，他老人家又一次要看新印的《笑林广记》。《笑林广记》搜集了一些使人读后捧腹大笑的笑话，现录两则毛泽东阅过的笑话：

我不去

……一妇人夫死，哭之甚痛。抱棺披发而哭。见人来更大哭曰。我的夫呵。我的夫呵。我愿跟了你去。你为何不拉了我去。正哭得高兴。被棺缝儿把头发挂住。妇人大惊。忙改口曰。你别拉。我不去，我不去。

穷人遇贼

两夫妇甚穷。朝不谋夕。竟至断炊。妇谓夫曰。我两人腹内无食。身上无衣。何不赊壶酒来。虽不能充饥。即可以御寒。夫出门赊酒而归。至晚。夫妇枵腹同饮。妇人大醉。家中只有絮一条。女人扯去自盖。男人甚冷。不得已拿半个破缸。覆在身上。枕瓦而眠。将要睡着。有贼撬门而入。穷人曰。我们穷得如此你还要来偷。顺手用所枕之瓦打去。我是用枕头打你。若用被头打你。早要你的性命了。

毛泽东之爱读《笑林广记》，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该书所收的300多个笑话，大都使他读后开怀大笑。一次，他独自在游泳池书房里看笑话书，看着看着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这时候，徐业夫正好从外边进来。一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发笑，便轻轻地走到他身边，这才知道毛泽东在看《笑林广记》。结果，他以极大兴趣，第二天便找忻中给他自己借一本新印的大字本《笑林广记》。

笑话书给毛泽东精神上带来了无限的乐趣，给他的精神世界酿造了一樽美酒。

看国产电影

过去毛泽东很少看电影，工作以外的全部时间他几乎全用在看书上。1974年以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明显不佳，肺心病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缺氧使他常常憋得喘不过气来，氧气基本上离不开了。偏偏他的眼睛又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看东西越来越吃力。毛泽东开始看大字本的书，听别人念书。为了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他常常借助看电影来转移注意力。开始一天断断续续能看一个，后来一天能看两个。

毛泽东让自己的卫士周福明和管理员吴连登学着放电影，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陪他看电影。

护士小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她曾看到这样一些情景：

在毛泽东的客厅里，为他放映故事片《创业》，他听说这部片子争议很大，江青等人竟给此片罗列了十大罪状，他倒要看看坏在何处。电影开始不久，他便被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民族的奋发精神所感动。他的神态是严峻的、沉思的。当影片的主人公（以大庆铁人为原型创作的人物）和他的伙伴们，抬着千斤重的机器一步步向前走去的时候，当他们喊出“帝、修、反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怎么办”时，毛泽东的眼睛里早已噙着泪水。中华民族的艰苦创业，铁骨铮铮的英雄气概，拨动着他的心弦，激荡着他的胸怀。

看了《创业》后，他当场表态：“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

还有一次小孟、张玉凤陪主席看电影《雷锋》，画面上出现了风雨中雷锋送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回家的情景。他看得那么聚精会神，这是小孟没有想到的。《雷锋》，一部很普通的片子。讲的是一些人们早已熟悉的故事，然而，当画外音传来雷锋的声音：“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您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毛泽东竟然用手帕擦着眼泪。小孟、小张看到毛泽东为此

这么激动，都有些不好理解。

这几句话，是雷锋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的200元钱寄给人民公社时，信中所写的话，这些话，或许使他想到了劳累含辛的人民，或许让他看到了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思想光辉。这些真诚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毛泽东一向喜欢京剧昆曲。爱看戏曲片，有时边看边听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毛泽东爱看喜剧片，这些片子常常使他笑得前仰后合。他几次要求工作人员为他放侯宝林主演的《游园惊梦》，喜剧片《新局长到来前》、《锦上添花》、《废品的报复》、《第十二夜》，这也许是毛泽东想在诙谐幽默中放松一下他那经常是绷得很紧的神经。

1975年8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几个工作人员在一起看电影《自有后来人》，这是一部悲壮的、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的电影。现代戏《红灯记》就是在这个戏的基础上改编写成的。

当电影演到革命者走向敌人的刑场，英勇就义的场面时，响起了雄壮低沉有力的《国际歌》的乐曲。本来毛泽东看这部电影时由于时间长了，他已把头仰靠在沙发上。两手也随便地放在沙发扶手上，显出一种疲倦的样子。但《国际歌》的乐曲一响，他立刻把靠在沙发背上的头向前移动了一下，身子也挺得直直的，把他的中山装衣角拽了拽，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然后，他又侧脸一看小孟，见小孟依旧歪靠沙发坐着，便轻轻拍了她一下，意思是让她也坐好。

英雄就义，《国际歌》的乐曲会使80多岁的毛泽东，显出如此的虔诚，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共产主义的一种真挚的信仰。

事过好几天，小孟都想不通，为什么毛泽东那次看电影会有那样的举动。20几岁的姑娘，自然理解不了一个一生都在追求，而且是如醉如狂地去追求着他的政治理想的人所特有的思想境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或许是他的精神状态吧。

尽管，暮年的毛泽东，已是疾病缠身，力不能支，但他的心并没有老。人，一旦停止了迸发自我潜力的追求，生命原地踏步，活力悄悄陨逝，遗下的就只是机械的生理重复。毛泽东的心并没有停止他的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光

辉，常常像一面火红耀眼的旗帜，时常向他召唤，拨动着他的心弦。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心甘情愿地一生在自强中奋斗的战士。

看京剧、听京剧

毛泽东对京戏可谓情有独钟，他在休息的时候，爱看京戏，爱听著名京戏演员的唱片。从唱腔上对老生的唱段更偏爱，从内容上则对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戏更感兴趣。

《空城计》、《借东风》、《失街亭》、《斩马谡》、《斩黄袍》、《李陵碑》、《辕门斩子》、《群英会》等老生折子戏唱段，他是比较爱听的，对老旦的戏也比较喜欢听。他多次听过《钓金龟》、《岳母刺字》等，对《霸王别姬》、《白蛇传》、《苏三起解》等很欣赏。

毛泽东对京戏唱腔、乐理是比较内行的，而且可以大段大段地唱，对台词也很熟，工作人员有时趁他吃饭或放下书本拿起烟来短暂休息的时机，给他放一个京戏唱片听，以便调节一下他的紧张情绪。胡琴一响，他马上能说出是什么调子、什么板，他听得很认真，甚至中间打错了一个鼓点他也能听出来，说："少打了一个鼓点。"

在听唱的过程中，如演员又转了板，他往往把视线转向工作人员一边，点一下头，示意"你们听出来了吗？转板了。"继而他打拍子的手势也变了，如二黄倒板，二黄慢板，或慢板、倒板转流水，等等。

在听唱片时，他爱在桌子或沙发扶手上打拍子，有时还兴致勃勃地跟着唱，虽唱得不很准确，但对一位南方口音的老年人来说已经很不简单了。他有时还用手势提示工作人员跟他一起唱，特别是遇到曲调难唱的唱段时，他常常示意工作人员们跟着唱片不换气唱下来，带有比赛的性质。如《逍遥津》有一段唱词是这样唱的："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想起了朝中事，好不悲伤。"在"悲伤"处，毛泽东唱得特别用力。"曹孟德与伏后冤家作对，害得他

魂灵儿不能够相随，二皇儿，年岁小，孩童之辈，他不能在灵前奠酒三杯。”在“年岁小”的“小”处，拖音婉转曲折，一口气很难坚持下来，毛泽东和机要员谢静宜谁也不示弱，憋足了一口气，比着唱下来。最后还是小谢年轻，唱得比他老人家连贯，他高兴地笑笑，对小谢点点头，开玩笑地说：“你投错了行，别做机要了，去唱京戏吧！”

毛泽东对四平调也比较爱听，曾夸赞梅兰芳先生的《新贵妃醉酒》说：“这个四平调唱得好。”

在听唱片的过程中，毛泽东常常考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先说是什么板，转什么板了？他们说对了，他点头笑笑；要是说错了，他给予纠正，以增长他们的京戏知识。

毛泽东对京戏，不仅是欣赏艺术，更主要的是采取“古为今用”的态度，把历史戏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有的是欣赏，有的是借鉴，有的则联想抒情。大家曾多次听他给讲述京戏中的历史故事。

毛泽东很重感情，他看戏听戏时，总爱把自己的感情融入戏剧情节中去，喜怒哀乐任其挥洒。

他在听唱《空城计》时，那种得意之情，逍遥之态，真的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一句接一句，抑扬顿挫，有板有眼，这时的毛泽东好像自己在扮演诸葛亮，面对着司马懿，真的在演《空城计》了，这不禁使人想起1948年他在石家庄、西柏坡导演的《空城计》。

随着唱片一直唱完，他对小谢讲起了这段历史故事，说诸葛亮之所以敢对司马懿施这一计，是因为“诸葛亮太了解司马懿了，对他的战术、性格、弱点都分析透了，知道司马懿多疑，料定他不敢进城，所以才把城门敞开。”接着他也说了诸葛亮当时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干的。

毛泽东很喜欢听刘鸿声的《斩黄袍》，也时常是边听边跟着唱片唱，特别是后面几句：“……一见人头珠泪滚，不由孤王痛在心，我哭，哭一声郑三弟，我叫，叫一声郑子明啊……孤王酒醉将你斩，我那三弟呀……啊……”

这一句句撕裂人心肺，悔恨莫及的唱腔，毛泽东模仿得悲愤高亢，一直唱完。这个片子，毛泽东听过无数次。

毛泽东听戏常常联想到一些哲理，他对小谢说："听到或看到某一事情感到气愤时，可暂时不作决定，因为这时决定问题容易出差错，怎么办呢？先看别的东西，不理睬它，放一阵子再说。等过几天或睡一觉起来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就比较冷静了。"毛泽东还对自己作出规定，并向工作人员交代：凡是在他吃安眠药后不作决定；如果作了决定也不算数，等第二天起床后再定。开始小谢不知道这一规定，有一次向他请示事情，不知道他已吃过安眠药，他回答后又说："你第二天等我起床后再来问一下。"小谢问："为什么？"他说："吃安眠药后不作决定是我给自己规定的。"

毛泽东晚年仍很想听一听过去著名演员唱的京戏，但因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好办到。有关部门为了满足他这一愿望，同时也为了推陈出新，保存资料，就请一些老演员重新化装演出，拍下录像片，放给他看。

毛泽东对京戏的兴趣始终未减。1975年，有一天毛泽东闭着眼睛听李和曾的《李陵碑》唱片。杨继业在碰碑前，那一声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哭诉："大郎儿替宋王把忠尽了，二郎儿短剑下命赴阴曹，杨三郎被马踏尸骨未晓，四八郎落番邦无有下梢，杨五郎，在五台学禅修道，七郎儿被潘洪箭射花标。只落得六郎儿随营征剿……可怜我八个子把四子丧了，把四子丧了，我的儿啊！可怜我一家人无有下梢……只落得我老残身难得还巢，我的儿啊！"

毛泽东听后流下了伤心的热泪。这非同寻常的泪，一方面渗透着他对戏剧中的人物的同情。同时也许是唱词勾起了年迈多病的老人家想起了自己的家事，勾起了他对为党为国牺牲的六位亲人的思念。

毛泽东在看《白蛇传》时，那种爱憎分明，出神入化的憨态，在卫士长有关回忆录中描写得惟妙惟肖，以至于看完戏后接见演员时，竟不和法海和尚握手。

1975年春，毛泽东看了《智取威虎山》，看后，他赞扬了这出戏演出成功，并用《智取威虎山》中八大金刚"老九不能走"这句话，表示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这一年，有一次他同孟锦云一起听戏，小孟看见毛泽东陶醉在戏中的情节中，便说“主席真是个戏迷!”

“我称不上是戏迷，只是有点迷戏。”

小孟说：“我为什么就不爱听戏呢？我听不懂。”

毛泽东说：“那是因为你不熟悉历史所以听不懂。”

一天，空政文工团的小丽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说：“我喜欢听京戏。听唱片是一回事儿，听本人唱又是一回事儿。你能不能给我请一个会唱京戏的女孩来。让他唱给我听听。”

“那么多名角，您请谁不行呀，李维康、杨春霞，都唱得不错。”

“我不想惊动这些名人噢。”

请个人来唱戏，这个愿望当然不难实现。小丽在空政歌舞团物色了一名会唱京剧的歌剧演员。

又一天下午，小丽带来了那个唱京剧的演员。她姓林，就叫她小林吧。

“主席，您想听京戏，我把小林带来了。”

小丽指着小林，向毛泽东介绍着。

“噢，好啊，欢迎你来我这里玩，你叫什么名字?”

“谢谢主席，我叫林君秋。”

“噢，与四小名旦张君秋同名嘛。只是不同姓，今天你唱一段什么呢?”

“我唱一段穆桂英大战洪卅吧。”

“可以嘛，那就唱唱吧，没人拉二胡，就清唱吧。”

小林清了清嗓子，用不大的声音唱起来。小林虽然多年不唱京戏了，但来之前，练了一阵子。给毛泽东唱戏，可不能唱砸了啊。她有些紧张，但总算是顺利地唱完了。她音色圆润、甜美，听起来确也还动听。

毛泽东听完之后，很高兴。小林坐了下来稍微歇息了一下，喝了一口水。

“小林这段穆桂英唱得蛮好听的，你唱段《霸王别姬》吧。”

“你喜欢听哪一段呢?”

“你最喜欢哪段，就唱哪段。”

“看大王醉卧帐中，不免去到帐外闲游一番便了。”几句念白，很有味

道。毛泽东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心。轻移步走向前中庭站定，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小林的这段清唱，使毛泽东更有兴致。还没唱两句，毛泽东开始用手拍着沙发的扶手，一板一眼地跟着哼了起来，头也摇，身子也晃动。看来，这段戏是对了毛泽东的口味。

《霸王别姬》这段戏唱完之后，毛泽东说：“唱得不错，休息会儿，今天就先唱到这里，以后欢迎你再来。”

读刘禹锡的诗

1975年春天，毛泽东已经80多岁高龄。有一天，他初次会见一位同志，道过姓名之后，问她：“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接着自己铿锵有力地吟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原来，这位同志姓名恰好镶嵌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里，因此毛泽东很快联想到这首他所熟悉的诗。从藏书中看，毛泽东对这首诗先后圈画过六遍。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他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一个大圈。标题后又连画六个小圈。在另一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标题前，他用红铅笔也画了一个大圈。编者在诗后注释：“时梦得与元微之、韦楚客、白乐天各赋金陵怀古，梦得诗成，乐天览之曰：‘四人探骊龙，子已获珠，余皆鳞爪矣’。遂罢唱。”“梦得”是刘禹锡的字。毛泽东对这段注释，逐句加了圈点断句。

在一本《唐诗别裁集》中，毛泽东在诗人刘禹锡这个名字上面，用红铅笔画着一个大的圈记；旁边，用黑铅笔画着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的标题前用红铅笔画着圈；诗中用红、黑两色笔作了圈画；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

线。编者注释中写道：“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对这段注释作了断句，在“造化亦无如之何”下画着着重线，批注道：“此种解释是错误的”。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的优秀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有着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家，除写过《天论》等文章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外，在诗词中也常闪烁着哲理的光辉。1959年毛泽东在和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谈话时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可见，毛泽东对上面这首名诗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刘禹锡23岁时被贬，10年后被召回京，写了一首著名的《玄都观桃花》，感叹“玄都观里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得罪了新贵，再度被贬。14年后，诗人又被召回，写下了《再游玄都观》，仍用讽刺的口吻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又重来”。充分表现了他政治上不畏强暴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很喜欢这两首诗，曾经挥毫手书过这两首诗。

毛泽东也很爱读刘禹锡的一些咏史诗。对《蜀先主庙》一诗，毛泽东批注：“略好”。对《乌衣巷》则圈画过六次。此外，对刘禹锡那些具有民歌风格的《竹枝词》、《杨柳枝词》等也都有不少圈画。从对刘禹锡的诗的批注、圈画，可以看出毛泽东阅读古诗词时的刻苦认真精神。

晚年听曲秘闻

1975年上半年，东方歌舞团的领导找已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乐曲任研究员的张晓辉，让张晓辉到北京西苑旅社报到。说是去执行中央下达的一项重要任务。到了西苑旅社才知道，是当时文化部调集文艺界的精兵强将正在录制中国古典诗词音乐。后来才了解到，党中央为减轻毛泽东因患白内障、眼睛失明的痛苦，组织有关人员为毛泽东录制古诗词，为的是让他能够以耳代

目修身养性。

录音工作是三头并进。

第一头，“翻译”词牌。文化部从上海音乐学院调来两名音乐家廉颇、周大风。由他们“翻译”古书《粹金词谱》中古代的音阶标记，再谱成演员们能读懂能演奏的简谱和五线谱。

第二头，抽调演员。录制组抽调了许多当时文艺界的名流：像演员有唱样板戏《海港》方海珍的蔡瑶先，《龙江颂》里的李炳淑和演小英子的李之华，琵琶演员刘德海、王范第，二胡演员闵慧芬、许蒋德等人。吹笛子的演员之前先有一人可能试录效果不太好，又调换，让张晓辉吹笛子并吹古箫。

第三头，讲解古词。当时从北京大学调来了四名古典文学的教授。每录一首古词曲之前，先由教授为他们这些演员讲解应当如何理解这首词。

当时录音是在西苑旅社专门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每首诗曲都是渐起音乐，然后是报以诗词的题目，再是配乐的演唱。曲子录好后除送毛泽东处，周恩来等政治局的常委委员也每人送一盘。

词曲送到了中央领导处后，很快就从中央反馈回对该词曲录制效果的反映。这些反馈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后来他们慢慢才知道，毛泽东非常爱听为他专门录制的这些古诗词演唱音乐，每首曲子都反复听多遍，有时兴致所至，还让改动古词的几句原词，让录制组重录。

毛泽东对张元干《贺新郎》一词的修改。这首词由在样板戏《海港》中饰演方海珍的蔡瑶先演唱，而且演唱有很特别的地方：先用南曲演唱一遍，又用北曲演唱一遍，两首曲子录音时间也不一样，南曲为5分1秒，北曲为2分55秒。据毛泽东身边人员回忆，毛泽东对《贺新郎》情有独钟，非常爱听。

张元干《贺新郎》一词的题目叫《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摧残署。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渡。万里江山知何处？

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日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举大白，听金缕。

这首曲子录好送到毛泽东处，时隔有日的一天，毛泽东突然改动了谱曲词中的最后两句：将“举大白，听金镂”改为“君且去，休回顾”。

为什么要改这两句？事隔多年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张晓辉才了解到：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国家的又一“砥柱”倾倒了，那一天，毛泽东非常难过，一整天就没怎么吃东西，也不说话，让工作人员将《贺新郎》录音整整放了一天。过了不几天，毛泽东就把《贺新郎》词中的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让录制组重录，说是原来的两句“举大白，听金镂。”太伤感了。后来，在新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中读到这首词，题目就叫《贺新郎•改张元干词悼董必武》。

在文化部组织为毛泽东录制的词曲中，还有一首岳飞的《满江红•写怀》，老人家也格外喜欢。录制这首词时，分别由蔡瑶先、岳美缇、计镇华三位杰出的演唱家分别演唱。三人的演唱一起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分别听过后，选中了岳美缇的演唱作精选曲来反复放听。为什么选中岳美缇的演唱，除了岳的演唱高亢有力，响遏行云，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宽阔胸怀和凌云壮志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岳美缇是岳飞的27代孙。

张晓辉等人当年录制的这些古词曲现存放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这59盘磁带记录有工作人员按毛泽东喜爱曲子的程度随手做下的记号。

毛泽东特别爱听的曲目盒子上画有“O”形字样，在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干《贺新郎》，杨春霞演唱的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磁带盒上，就画有“O”形铅笔字样。另外在岳美缇演唱的萨都刺的《满江红•金陵怀古》、计镇华演唱的《渔家傲》、方洋演唱的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等作品上都留有不同的记号。

此时的毛泽东也很喜欢“小桥流水”作品。来到录音组，为毛泽东录的第一首曲子是唐代白居易的诗《琵琶行》，而所配诗的曲子，是用已流传多年的《春江花月夜》改编的，由蔡瑶先演唱。该曲主要是古筝独奏，内有古箫的伴奏，张晓辉是吹箫者。据说，毛泽东非常爱听这支曲子，当时还录有宋词中不

少描写爱情的名词，像秦观的《雀桥仙》。据说毛泽东也非常喜爱这首词曲。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录音组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然后解散，其录制的词曲便成为珍贵的文物。

读《枯树赋》

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酷爱读书，酷爱学习。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亲眼见到他在晚年仍然是生命不息，读书不止。他那么大年龄，那么多病痛，仍然想方设法看报读书，一个伟人孜孜不倦的精神使张玉凤毕生难忘。

1976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让张玉凤找来古人瘐信（南北朝时著名的文学家）的一首《枯树赋》。这首赋他是早已熟读过的，前些年还嘱印过大字本，全赋大部章节他都能背诵下来，即使是在这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这是一首以树喻人，曲折动人，读来令人感慨万分的赋。

在他的病床边，张玉凤读着这首赋，读得很慢，毛泽东微闭着双目，体味那赋中描述的情景，回顾着自己一生的经历……

毛泽东让张玉凤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说自己背诵。此时，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赋，但他仍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地背出："……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抵盘魄，山崖表裹，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稍许，毛泽东又让张玉凤看着书，他慢慢地背第二遍。老人家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他的声音，他背诵时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令张玉凤终生难忘，感慨万千。

张玉凤读了两遍，毛泽东背了两遍，近半个小时，已超过医生的规定时间。为了不使老人家太劳累，只好停住，请他休息。其实，那天老人家精神还

好，也许本来可以边背边讲，可惜张玉凤当时只顾得医生的叮嘱，不敢引老人家多说话，不敢让他动感情。以致没有听他细谈，没有让他讲出此时此刻的心境和感想。至今想起张玉凤说："十分遗憾！如果当时不要急于劝阻，听他慢慢谈，这该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啊！"

究竟是这首赋对人间事物描写得真切、透彻，还是它抒发了毛泽东自己的感慨，这不是用几句话能说明白的。张玉凤说："用我贫乏的语言和词汇是难以描述的。后来主席常常想起来就吟诵着这首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这是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后来，他因听力减退只能用那刚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一只眼睛自己看书、看文件了。"

《枯树赋》是庾信后期诗赋的名篇之一。他前期仕梁，西魏破梁时，他正出使在西魏，因被强留下来；历仕西魏和北周。由于他曾亲经侯景之乱和西魏破梁，国破家亡的巨变，亲见黎民百姓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哀哀无告的惨相，所以他后期的作品，一变仕梁时期诗赋轻艳奇巧的风格，而多抒发亡国之痛、乡关之思、羁旅之恨和人事维艰、人生多难的情怀，劲健苍凉，忧深愤激。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他"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指他后期作品的这一特色。

毛泽东对于庾信的才思词采，是很欣赏的。他曾对芦荻说过，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的，远不止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他爱读《枯树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作品的描写生动，联想力丰富。他说，庾信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进来，眼界宽广、思路开阔。同时，毛泽东认为，庾信用形象、夸张的语言，描写出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这是很成功的写法。这样写，对比鲜明，读来自然使人对树木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特别是，毛泽东对全赋以殷仲文"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起兴，以桓温的"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作结的结构，激赏不已。他说，这两段话不仅是全赋的"纲"，是画龙点睛之笔，而且起结呼应，使赋文有一气呵成之势，突出了立意，又余韵

不尽。

毛泽东在重病之中，头脑仍极敏锐清晰，他深知大限将到，所以常坦然地说到死的问题，认为这是自然的不足畏惧的事。但他更是一位怀抱伟大理想、终生不知停步的巨人。他爱读《枯树赋》，屡读而不厌，更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赋中的那种“木叶落，长（音zhǎng，年老）年悲”的迟暮之感；他力正曲解了赋意的移植之说，也是由于移植说抹杀了旺盛的生命力，终因岁月无情和来自诸多方面的摧残而枯萎，以至“生意尽矣”的巨大惨痛和悲哀。毛泽东把自己的心境与《枯树赋》的意境融合到一起，借《枯树赋》抒发了内心世界。

三、苦读钻研篇

在艰苦的条件下读书／读书以求真理／酷爱报纸／关于读书会的商榷／遇空袭也读书不止／读《暴风骤雨》入迷／学英语／读书、写作废寝忘食／在困境里读书和向人民群众学习／“学字要有帖”／精心组织读书小组／“毛主席窗前一盏灯”／谈读书／晚年战病魔苦读书

在艰苦的条件下读书

毛泽东小的时候非常喜欢读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说唐》、《西游记》、《精忠岳传》等，他都是读了又读。小说里的故事、人物，他都背熟了，时常给小伙伴们有声有色地讲述，和大家评论。毛泽东曾回忆说："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我们几乎都能背诵了，而且常常再三地讨论。像这种故事，我们所知道的比乡村里的老人还要多，他们也爱听这些故事，而且常常和我们互相交换讲述。"有一次，毛泽东去野外放牛。他让牛自己去吃草，他在一个大树荫下看起书来。他读得那样出神，忘记了一切。牛跑到邻人的菜园里吃了不少菜，他也不知道。等邻人发觉后叫喊起来，他才从书中醒过来。连忙放下书本，飞跑过去把牛从菜园里赶出来。虽然忙不迭地向人家道歉，人家还是怒气难消。为了这件事，几乎闹了一场大乱子。后来惊动了毛泽东的父亲，少不了严厉教训儿子一顿，终以赔偿了事。

13岁那年，毛泽东离开私塾以后，除了干农活和帮助父亲记账，仍然挤出时间读书，并且常常是在晚上记完账以后读书。父亲并不高兴：一来儿子读的不是经史，再则也得节省灯油啊！毛泽东就用蓝布被子盖住窗户，不让父亲看见灯光。在一间简陋屋子的阁楼上，在豆大的桐油或菜籽油的灯光下面，毛泽东把当时在乡下所能找到的书都读完了。于是又设法到远处借书，每次往返，要走20几里崎岖的山路，还要经过几座丛林茂密、野兽出没的山冈，涉过几条碎石横陈、水流湍急的小溪。不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为了求得新知识，他每次借书，总是起早贪黑，来往于这条山路上。

1927年11月，毛泽东在宁冈县砻市创办了第一个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教导队的学员又那么多，笔墨纸张比较缺乏，给学习带来了一定困难。毛泽东就给学员们进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思想教育，并帮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克服困难。有一次，一个学员提出用柳枝烧成炭可

以写字，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立即发动大家烧柳条枝，并说，大家拧成一股绳，个个出主意，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们的！柳枝烧成炭后，毛泽东在青石板上试了试，软硬适度，写出来的字还挺清晰。毛泽东满意地说："倒真像墨笔哩！"学员们把它叫做不花钱的墨笔。毛泽东听到学员们的这种称呼，高兴地笑了。他说，敌人越是封锁，大家的办法就越多。看，封锁得同志们用木炭树枝当笔，在地上、石板上、沙滩上写字。这种笔墨纸张是用不完的。

1937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住在延安城内的凤凰山下。因为当时生活困难，领袖们都住在窑洞里，使用的家具都非常简陋。一位老乡看见毛泽东白天黑夜地工作学习，却连一把舒适的椅子都没有，就将自己家里的柳木椅子送给他用。这种椅子坐起来直摇晃，现在普通人家已很少用了。可是毛泽东在延安城内一年时间里，就坐在这把简陋椅子上，写出了《论持久战》、《矛盾论》等著作。

读书以求真理

毛泽东求学的志向是改造社会，探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

在湖南省第一师范陈列的《明耻篇》封面上，他写了四句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借到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爱不释手，很快读完了它，他对华盛顿、林肯、拿破仑等人的传记尤感兴趣，钦佩他们的历史功绩。不久，他对同学萧子升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一些人物，我们每个国民都应当努力。他还为自己起了个"子任"的笔名，意思是决心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崇高责任。一师有不少同学知道毛泽东有三不谈：不谈身边琐事，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他后来对斯诺说："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

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

毛泽东奋发踔厉，学习的目的是追求真理。1917年8月28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他又在读书笔记中写道：“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他明智地认识到：“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之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以樗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他把实现理想与社会的和民族的利益联系起来，认为这犹如腕之于全身，“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就明确表述：“我们的目的是在改造社会。我们的求学，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一直到1949年，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时，还强调：你们要记住，无论做什么都要有个目的，没有目的、前途，乱来是不行的。目的、立志也就是在确立奋斗目标。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阐述了自己为人、为国人、为世界人而学的真志。他说：“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诚为至理名言。

酷爱报纸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怀着强烈的爱国心，时刻关注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变化，他主要依靠报刊了解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第一师范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纳几十个人的阅览室，那里有湖南、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报刊。毛泽东天天去看，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他看报特别认真，常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凡属重要材料，不论篇幅多长，他总是认真阅读，做出摘记，还把报纸上见到的中外城市、港口、山脉、江河等地理名字，一个个记到笔记本上，然后对照地图，查看清楚，再查出英文名称。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1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在长沙报名参加了革命军，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那时，每个士兵可得薪饷银元七块，毛泽东每月除了伙食所用二三元之外，其余的全部用来订报纸，一有空闲就认真阅读，从而培养了从报纸上研究政治问题和观察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的报刊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唤起了追求真理的热望。

1911年4月，毛泽东在为"问题研究会"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问题的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报纸三项着手研究。"

1921年，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讨论个人学习计划时，毛泽东认为在人类知识积累的历史发展中，最先成为科学的是自然科学，然后社会科学才成

为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因此，他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纸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大概”。他深有体会地说：“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纸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可见他对报纸的钟爱。

1928年，毛泽东从敌人报纸上分析出进军湖南的大部队的情况。此后，他更把报纸看得像空气、水和食物一样重要。

1928年11月25日，在代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已能随时得到报纸，高兴多了，惟仍望你们随时将政治情况分析见告。”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封锁，曾两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9月以来，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得到亦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因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县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

后来，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同时，毛泽东又给中央写信，“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他在信中说道：“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同时，他又写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1929年，傅连暲利用合法身份，在汀州订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东的《工商日报》、《超然报》，派人定期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特别高兴。

在井冈山，要搞到敌人的报纸，很不容易。因为敌人实行封锁，报纸不许过封锁线。红军每次下山打土豪、筹款时，都要加上一个任务：到国民党机关或邮局里搜罗一批报纸，带上山来。每当部队打进一个县城或集镇，毛泽东时常派人或亲自带着警卫员先去敌人的县(镇)政府，找敌人的档案文件，再去当地的邮局买报纸和杂志。往往是空着手跟毛泽东出去，转一圈回来，每个人都背着一大捆书报。当天晚上，毛泽东就用红笔画出记号，警卫员便照着剪下保存起来。

有一次，又有一阵子没看到报纸了，毛泽东索性专门派了31团的一个营，去打大军阀谭延闿家乡高陇，收罗了一批报纸上山。土豪不可能天天打，红军也不可能天天下山。报纸只能时断时续地看，为此，毛泽东很苦恼。后来发现，有些小商小贩为了谋利，常常偷越敌人封锁线，带一些食盐、布匹和工业品进根据地。这就为搞到报纸找到了渠道。于是，利用小商小贩把报纸当包装纸揉得皱皱巴巴的，像废纸一样骗过了敌人。几经周折带上山的报纸，有的是过期的旧报。尽管如此，每当拿起从山下送来的报纸，毛泽东脸上常常显露出异样的光彩，他总是急切地把报纸接过去，迅速打开阅读，只要看到有用的东西，毛泽东总是高兴地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天下大事尽收眼底呀!"这些报纸，都被当成宝贝一样，在红军的领导人中传阅。

毛泽东看报看得很细。对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他都在上面画个记号。等山上的同志传阅完了，他就让贺子珍把做记号的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以备查用。对于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来说，报纸是一大资源，那是要多层次开发利用的。首先是信息的摄取，阅读了还剪资料，接着再裁下报边，作为写字纸，最后剩下的废报，还要把它"吃掉"——作为卷烟纸卷烟抽，因为那时纸张是稀缺的东西，可见，报纸本身处处是宝。

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急需判明尾追敌人和瑞金城内敌人的动向，以制订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当即派宋裕和带一个连到瑞金县城抢报纸。结果弄到一批《国民日报》、《中央日报》和广东、上海、福建、江西的地方报纸。毛泽东兴奋地说："抢来这么多报纸，收获不小哇!"他据报纸分析，印证了关于敌人的实力、动向和企图的情报，和朱德、陈毅商量后，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攻打尾追之敌刘士毅部，即是著名的大柏地之战。

1941年3月1日，毛泽东给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写信说："自3月1日起，请代订下列日报各一份：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及云南各种报纸。"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有

所放松，但是通过正常渠道购买图书报刊资料仍很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亲自开辟各种渠道，他请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通过合法的手段订购大量图书报刊。他曾多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发电报，请他们为边区的中央机关和学校订购报刊资料。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任弼时电告周恩来、董必武，请他们暂订全国各地日报两份，购买各种书籍刊物，“不论普通的，专门的，各买三份”，并指定将这些刊物寄新华书店转胡乔木或者李富春、王首道收。同时，毛泽东还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通过东北军获得一些图书报刊资料。他曾向张学良借过书籍及地图。1936年3月，在同东北军王以哲商谈停战协定时，王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买了两批物资外，还搜集到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出版的报刊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一起赠送给红军。由于彭德怀的工作，东北军高福源曾用飞机投下大批报纸刊物。

毛泽东青睐报纸，几十年如一日。1948年4月27日，在邀蓝公武(察哈尔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信中说：“30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晤，借聆教益。兹派车迎候，倘蒙拨冗枉驾，无任欢迎。”足见毛泽东读报印象极深，30年后仍记忆犹新。

关于读书会的商榷

青年毛泽东为了多读书，动了不少脑筋，想出好多办法，其中集资读书就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他在“读书会的商榷”一文中说：“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一、一个人买书看，出一元钱只看得一元钱的书。若合五个人乃至十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一元钱便可以看得十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二、中国人的

‘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会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好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辩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或辩明的机关了。三、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许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缘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各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定几份报，至少也可以定一种。那么，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呢？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为了探求学习方法，在《致黎锦熙信》中说：

邵西（黎锦熙）先生：

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寓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同住连我四人。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社，从事半工半读。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意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两年后，俄路通行即往。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不得了的恨事呵！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

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近来国内到处发了丛书热，不管他动机和内容怎样，总于我这种“知识荒”的人多少有些益处。旅京学会出报的事可实现否？只是这种混合的团体，很不容易共事，不如另找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东西，易于见效，兴味觉大。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我想做一篇“具体、鲜明、热烈，与新运动”的文章，无闲暇构思的机会，恐怕不能做了出来。先生能指挥日常生活，将“上衡门”、“下私宅”、“作事”、“读书”支配得那样圆满得当，真不容易。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望着先生，真是天上。北京此时想是很热，上海也热起来了。余话后谈。敬问

近安。

毛泽东

六•七

毛泽东谈出了一些自己对读书的独特见解和方法。

遇空袭也读书不止

从井冈山时期算起，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毛泽东经常处于飞机轰炸之下，他的妻子贺子珍就是被飞机炸成重伤的。撤离延安前，炸弹爆炸的气浪有两次震碎了窑洞的门窗。

1947年，毛泽东、彭德怀率2万人马同胡宗南的20多万部队在陕北转战对

抗。一次，一颗炸弹在他的院子里爆炸，烟尘散去，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毛泽东左手仍然端着茶杯，地上没有一星点茶水洒出。笔仍然在地图上画，那条调兵行进线没打一点折扣！人们递给他一块弹片，他掂掂说："能打两把菜刀呢。"毛泽东就是这样，在紧急的空袭中，泰然处之，指挥战斗，这是他的一种特殊的读书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受过一次轰炸。1958年1月18日凌晨，毛泽东在南宁冬泳邕江，夜里继续办公。凌晨一点来钟，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莫非国民党察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随行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大为紧张。须知，南宁没有军用机场和战斗机啊！他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空军部队紧急起飞，无论如何要将国民党飞机拦截住！

那天，南宁全城灯火管制。李银桥等涌进毛泽东卧室，请他去防空洞。他把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

"主席，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毛泽东指住李银桥的鼻子："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

李银桥说："不行，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好……"

"去！"毛泽东不耐烦了。"把蜡烛点着，国民党的炸弹扔我脚底下，扔我脚底下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实在令人敬佩。

读《暴风骤雨》入迷

毛泽东酷爱读书，一生手不释卷，这尽人皆知。然而，毛泽东读当代文艺

书籍，特别是读当代小说并读之入迷，却很少见。

1952年卫士张木奇随毛泽东去山东、河南，看黄河，观孔庙。专列中央有个公务车，车厢半截是会客室，半截是卧室。同行的有位民主人士李烛尘。他们在会客室谈得很投机。天下大事，日常生活无所不谈。看那谈话，这一路毛泽东是不会在车上干别的事了。

可是，晚上他躺到床上休息时，照习惯随手拿起一本书，翻看过两页便入迷了。把枕头垫高，一页一页看下去，很久才变换一下姿势。变换姿势眼睛也不离开书。时而侧躺着看，时而仰卧着看。看到深夜1点，卫士端来一碗面条请他吃。

毛泽东坐起了身，却仍在看书。卫士把面碗摆在他面前，又将筷子插入他右手，他目光盯着书，筷子机械地插入面碗便不动了。右手按着书还在读。卫士不敢打搅，直到毛泽东翻书页时才提醒："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条要凉了。"

毛泽东像根本没听见，抓着那一页书翻过去翻过来，反复四五遍。他看的什么书呢？

"主席，要不……我再给您热热去？"卫士试探着伸手去捧碗。

"嗯，不要。"毛泽东嘴朝碗沿靠近，动作很慢，因为他的眼睛始终是盯着书。呼噜一声，一筷子面条进嘴。偏这时有几个靠近书缝的字看不到，他的一只左手又要握书又要将书展开一些，便有些力不从心。张木奇借机过去帮忙，便看清了那本书——是周立波写的《暴风骤雨》。

毛泽东吃过面条，躺下又看，直到天亮，他看书如饥似渴竟到了这种地步。早晨，他到会客室又见了李烛尘，谈过几句话便说："我在看一本书，还没看完，有些放不下呢。"李烛尘一听马上明白了，便起身告辞："主席，你快去看书吧，看完书我们再谈话。"

专列经德州往西南，入兰封县境。毛泽东习惯躺在床上看书，随行的罗瑞卿和滕代远希望毛泽东看一会书能入睡，怕车晃得厉害，便命令停车。毛泽东并没意识到，他完全沉浸入书中，把最后几页读完，才像刚从水中探出头一般长吁一声，揉着太阳穴走到车窗前。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曾记述过："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

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西方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斯诺惊叹地说：“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

毛泽东读书入迷，使斯诺想到了“书能通神”。

学英语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群体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他们在早期革命生涯中都曾驻足于国外，或留学，或寻求革命真理。他们都或多或少懂得一点外文。尤其是周恩来，他在同外宾谈话时还能够当场纠正翻译的误译。

然而，唯独毛泽东，直到年近花甲，外国语言对他仍是一个神秘的王国。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伟大挑战者。他在其一生的实践中不断地寻求值得他挑战的对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党内假马克思主义者开战；在和平建设年代，他带头并号召人们向大自然开战，向科学开战，向一切胆敢阻挡中国前进的东西开战。他说，我就是不信邪。

当他意识到“外国话”是横亘在他和世界交流中的一大障碍时，便毫不犹豫地向这个神秘王国发起挑战。就像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建设遇到了诸多麻烦和问题时，他带头并号召领导干部啃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到达“红色世界”延安。毛泽东在村子里散步第一次路遇斯诺时，便伸出那宽厚有力的大手握住斯诺的手使劲地摇了摇：“美国朋友，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

斯诺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腔普通话，也不知道眼前这位披着一头浓密长发，身材高大，穿着朴素得有点简陋的人就是他心仪已久的毛泽东，因而，只是望着毛泽东发愣，直到翻译赶来。

然而，当周恩来见到斯诺时，用流利的英语和斯诺打招呼，并用英语与斯诺交谈。

生性爱挥洒自己个性的毛泽东对要通过翻译才能与外国人对话感到很不习惯。

也许从那时起，毛泽东就萌生出要自学外语的念头，且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确实自学过英语。

但是，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毛泽东自学英语受到很大限制。1970年毛泽东在接见金日成谈到学习外语问题时说：“我们这些人呢，主要还是自己不学。那时（指革命战争年月）工作也是紧张了一点，你打仗嘛，哪还有谁去注意学习外国话啊。”

全国解放后，年逾花甲的毛泽东再次提出要自学英语。

1954年，毛泽东提出，要找一个懂英语并熟悉国际问题的人，既教他学英语，又兼做他外事方面的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社物色人选。这样，林克就来到了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个春秋。除秘书工作外，林克的大部分时间是帮助毛泽东学英语。

与普通人开始学英语一样，毛泽东学英语先是学习基本的英语单词和短语。他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学得很认真。毛泽东湖南口音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林克领读，自己跟着读，然后再练习几遍，请林克在旁边听他的发音是否准确，不准的地方，就请林克纠正。在阅读课文时，遇有生疏的单词和短语，在林克领读、解释完字义和语法结构后，毛泽东用削得非常尖细的铅笔在单词上方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的空白处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的不同含义。其神态，那股认真劲，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共和

国领袖来说，真是难得。

但毛泽东学英语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本色。他的英语教材或者说课文的重点放在政论文章方面。他最先是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中的新闻、时事评论等入手，以后又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其他一些英文原版哲学著作。另外，他自己所著的《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英译本和经他审改过的当时和苏共论战的“九评”英译本，他都曾阅读过。这些材料中，最好读的还是他自己所写的著作；最难啃的就要算那些马列经典著作的英译本了。这些著作的文字要比一般的政论文章要艰深得多，生词、短语也多些。但毛泽东借助词典及其他工具书，硬是一句一句地啃。有时，林克为了节省毛泽东学习的时间，事先帮他查好未学习过的单词。但毛泽东还是要自己亲自查看词典上的音标和释文。他说，这样印象深。

1959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巴西外宾时有一段对话反映了他当时学英语的艰难情景。

毛泽东说：“我学问太少，除了中国话，别的国家的话我都不会讲。”

外宾问：“马罗金的报道说，你在学英文?”

毛泽东笑了笑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继续说：“我要订个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

毛泽东还说：“我们国家文化太低。在15年至20年内，每人都要学习一种外国语言，英、法、俄、德、日，这些主要的文字都得学。现在初中没有外文，将来也要搞一点外文。”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趣最浓厚的时候。毛泽东作为一大国之主，日理万机。他学习英语往往是在工作之余，心情轻松之时，大概他这时的记忆力也最旺盛。在北京不要说，就是巡视大江南北和在外地

开会，毛泽东总要叮嘱工作人员带上英语书和词典，一旦有空，便坐下来学英语。有时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挤时间学习英语。

1957年3月19日11时至12时，毛泽东在由徐州飞往南京的途中，书写了元人萨都剌的《徐州怀古》词后，即学英语。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登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时，常常在攀登途中停下来歇息时，坐下来便背诵刚学过的一些英语单词和短语。

……

毛泽东学英语还有一种独特的方式，就是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学习英语。

1968年11月，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代表团叶海亚•汗上将一行。谈到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时，毛泽东说："高尔（印军的一名军长）是个中将。"接着，毛泽东又问旁边的翻译冀朝铸："中将的英文怎么说?"

冀朝铸回答后，又分别把构成的字母拼写了一遍。毛泽东认真地复诵了一遍。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逐一与巴基斯坦客人握别。当轮到贾恩朱瓦中校时，毛泽东见他一身戎装，便问："打仗的？"

贾恩朱瓦回答说："是的。"

毛泽东侧过身来问冀朝铸："打仗的英文怎么说?"

冀朝铸回答后又照例拼写了一遍。

巴基斯坦外宾对毛泽东的这种好学精神非常感动。类似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接见外宾中屡见不鲜。

毛泽东还多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外语。1958年1月，在他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他又重申了这一建议。在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

毛泽东学英语的另一位"老师"是当时还非常年轻的章含之女士。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0寿辰。

这天，毛泽东邀请了四位湖南老人程潜、叶恭绰、王季范、章士钊来家做客。邀请时,毛泽东特作说明：很抱歉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

于是，章士钊就带了女儿章含之到毛泽东家赴宴。那时，章含之27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青年教师。

宴毕，毛泽东与大家坐在客厅谈笑风生。

毛泽东见章含之孤零零地在一边不说话，便笑着问：“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你教英语有多长时间了?”

章含之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1957年本科毕业，下放农村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1960年正式开始教书，三年了。”

毛泽东又问：“教什么啊?”

“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国文学史讲座。”

毛泽东说：“你喜欢文学?”

“很喜欢。”

这时，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吸，笑着问：“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

毛泽东的这一声“章老师”，把章含之闹了个大红脸。章含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以为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寻思了好一阵，才期期艾艾地说：“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毛泽东却显得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

章含之益发窘迫，章士钊在一旁赶紧打圆场：“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那就一言为定喽!”

1964年元旦节刚过，毛泽东便吩咐林克：“我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章含之同志讲好了，她教我英语。你打个电话去问问她，是否可以就从这个星期日开始。”

随着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的扩大，外事工作也日趋繁重。毛泽东也

是想给林克减轻一点负担。

林克赶紧把电话打到了北外校务办公室，把毛泽东的吩咐转达给了章含之。

电话的那一头，寂静了好一会，才传来支支吾吾的声音："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

林克劝慰说："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来吧，从中南海西门进来，我先给西门的警卫打好招呼放行。"

章含之不好再说什么，只好从命。章含之回到家里，急忙告诉父亲。

章士钊说："大可不必这样紧张。我同主席是世交。过去我称主席'润之'，现在当了领袖了，见面称'主席'，但主席仍尊我为长，称我为'行老'。"

元旦过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章含之开始到毛泽东处教他英语。教材是毛泽东自己选定的，就是当时发表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的英译本。这些文章的中文稿都经过毛泽东自己审改，内容非常熟悉。毛泽东要章含之做的，就是告诉他那些政治词汇的中英对照、英语发音及一些句子的语法结构。每次一个来小时。

毛泽东对老师的讲解听得非常认真，他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

"L"和"N"这两个英语辅音，南方人在读音上很难分得清楚。但毛泽东不服，坚持要分辨清楚。他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望着毛泽东那一丝不苟的神态，章含之忍俊不禁。

几次接触之后，章含之发现自己原先的紧张真是"大可不必"。毛泽东很和蔼，也很风趣、幽默。

毛泽东说："我请你当老师，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骑自行车来，天气不好时，我派车接送。"

因此，章含之一般都下午4点骑车赶到毛泽东那里。教完英语后，毛泽东总是留章含之吃完晚饭再走。毛泽东的饭菜很简单，每次总是由一位服务人

员用提盒送来。偶尔有一个大火锅。毛泽东爱吃肥肉。他把切成大方块的肥肉放在火锅里，然后，蘸着放有辣椒末的佐料大口地吃。

饭桌上，毛泽东天南海北，边吃边谈，风趣、幽默中充满教益。

1965年春末夏初。一天，毛泽东对章含之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

"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学了。"章含之也不知道党内发生了什么大事，也不好问。只是从最近的接触中，发现毛泽东的情绪越来越沉闷。章含之哪里想得到，此时在毛泽东的心中，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已开始酝酿。这就是后来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这次与他的"章老师"一别，竟是五年。这五年中，他亲手点燃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的邪火把整个国家烧了个黑白颠倒，一片混乱。他的"章老师"也吃了不少苦头。

读书、写作废寝忘食

1957年1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前夕，根据周恩来指示，卫士组提前开了每周一次的碰头会。

"这么说，主席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卫士长李银桥皱着眉头问田云玉。

"还喝过两缸麦片粥。"张仙朋补充。

李银桥的目光从几名卫士脸上划过，落在封耀松身上："小封，下一班是你吧?"

"嗯。"封耀松愁眉苦脸，压力不小。

"想想办法，要想想办法。"李银桥嘟囔半天，也没说出办法是什么，总

不能强迫毛泽东吃饭睡觉，那样毛泽东会发脾气。“你要机灵些，要抓机会，随机应变……反正就看你的了。”

卫士值班分正班副班，正班24小时不能离开毛泽东。封耀松面露难色地上了正班，在埋头写作的毛泽东身边侍立七八个小时，除了换茶水，没敢多一句嘴。只是下功夫观察着，寻找着……

凌晨两点，毛泽东忽然扔笔，将头向上仰去。以手按额，揉着、捏着。张开嘴，深深地、深深地呼吸。封耀松抓住机会，上前两步，小声劝：“主席，您已经十几个钟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来吧?”

毛泽东拼命伸着懒腰，然后放下手，布满红丝的眼睛望着封耀松，倦容已无法掩饰。刚张嘴，已经接连两个哈欠。他沉重地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要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就行。”

封耀松还想劝，毛泽东已经将手一挥，便低头抓起笔。封耀松不敢言声了，这个时候多一句话也会惹得毛泽东发脾气。

封耀松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在陕北时就是这样，毛泽东怕影响炊事员休息，夜里只让卫士烤馒头片或窝头来吃，不许惊动炊事员。

可是，侯师傅被惊醒了。他眨着两只朦胧的眼睛嚷嚷：“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封耀松摇头苦笑：“主席说让烤两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侯师傅便闭口无言。“交代了的就去办”，这是毛泽东的原则，侯师傅也懂，不照办才是“胡闹”。

封耀松烤熟了六个小芋头，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去。一进门，听到鼾声响亮。毛泽东睡觉打呼噜很响。他斜靠床栏上的毛毯，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笔，就那么睡着了。这种情况不少见，不能叫醒毛泽东。他睡觉极少极轻，一旦入睡不容惊醒，惊醒了必定发脾气。封耀松把碟子放在暖气上，便退到门口坐等。刚坐下眼皮就发沉，忙又站到门外，冷风吹着可以不打瞌睡。

毛泽东精力超人，中央首长里，几乎没有人能与毛泽东比。以精力过人著称的罗瑞卿曾多次感叹：“哎呀，这几天累坏了，我陪主席来着。”他也对卫士讲过：“你们很辛苦，我知道，陪主席是很辛苦的。他精力超人，我们都比不了。”

封耀松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听到毛泽东咳嗽一声，忙轻手轻脚进屋，捧起碟子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噢，想吃了。拿来吧。"

封耀松将碟子放在办公桌上，毛泽东走过来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着身子，吟诵过去作的一首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封耀松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亮了。毛泽东剥出半个芋头，便咬下一口，边咀嚼边继续剥皮，嘴里嘟嘟囔囔还在吟。封耀松见毛泽东自得其乐，便悄悄退出屋，继续吹凉风以驱走疲劳。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屋里的呼噜声隐隐又起。封耀松轻手轻脚进屋，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了。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一侧已然入睡。

封耀松踮脚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与往常有异。探过头去仔细打量，接着又揉一揉眼……

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完整的芋头！另外半个还抓在手里。嘴里那个芋头随着呼噜声颤栗着。封耀松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忙将手再揉揉眼，放下碟子，轻轻地、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惊醒了。

"哪个？"毛泽东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迷茫而又愠怒地盯着封耀松，气冲冲大声问："怎么回事？"

"主席！"封耀松叫喊一声，噎住了，泪如泉涌。他双手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嘴唇只是抖，再说不出一句话。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画两个圈："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啰。"他望住封耀松："好吧，小封，莫哭了，我听你的，我休息吧。"

毛泽东就是这样读书写作的。"废寝忘食"这四个字用在他的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

在困境里读书和向人民群众学习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错误路线时期给我的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20次。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一个人为什么只能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的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为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

发愤之所为作也。”一般来说，这种错误处理，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毛泽东还在和吴冷西的一次谈话中，就受排斥打击时如何正确对待时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既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毛泽东自己也有体会。他说到，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毛泽东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里弄来的书籍。

正因为毛泽东在受排斥打击时没有颓废消极下去，而是重振精神，在困境中发愤读书，去搞调查研究，因此，他的体会很深。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说：“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调查》，一个《长冈乡调查》和一个《才溪乡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做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

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毛泽东受错误路线打击排斥，却抓紧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结果获得了大量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走出了一条在困境中读书学习的新路子。

“学字要有帖”

博览群帖，学习、练习和研究书法，是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

毛泽东曾说过：“学字要有帖”。学习书法，对照字帖用心研究，反复临摹练习，这是历代诸多前人学书法的基本方法，也是毛泽东学书法的基本经验。这从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信中可以看出。这封信全文是这样写的：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的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曾任毛泽东图书管理工作人员的逄先知在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介绍：

> 毛泽东可说是当代一流书法家，尤其擅长草书。他喜欢看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的重要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在草书中毛泽东最喜欢怀素的草书。他多次要过怀素《自叙帖》，我们见到怀素的字帖，只要是好的，就买下来给他送去。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自叙帖》，并批示我们，把他所有的字帖都放在他那里。从此我们就在北京和外地，买来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等，放在他的卧室外间的会客室里，摆满了三四个书架。在他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放着字帖，以便随时观赏。1964年12月10日，毛泽东要看各家书写的各种字体的《千字文》字帖。我们很快为他收集了30余种，行草隶篆无所不有，而以草书为主，包括自东晋以下各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智勇、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頫、康熙等直到近人于右任的作品。

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忻中等先后为毛泽东搜集、购买、配置的约600多种历代碑帖和名人墨迹等书法作品，有一部分也一并搬放到了游泳池。工作之余、饭前会后，只要有空，他就阅览、揣摩字帖。有时一边欣赏，一边还用手在腿上揣摩、比画。

到了70年代，他老人家一次又一次地指示为他继续购置、借阅各种字帖。北京图书馆和有关单位找得差不多了，又让工作人员专门到南京、上海等地去借阅。仅1974年下半年，忻中经手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为毛泽东借用的各种字帖就达165342册。

忻中回忆说，毛泽东要看怀素的字帖。怀素是唐代书法大家，他精勤学书，以善“狂草”出名。相传他好饮酒，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虽多变化，而法度具备。前人评论他的书法时说其狂草继承张旭，而有所发展，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很大。留存下来的书迹有《自叙帖》、《苦笋帖》等。怀素的书迹特别是怀素的草书墨迹，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时常批阅。20年后，他又要工作人员找怀素的字帖，可见他老人家对怀

素的墨迹是多么地喜爱。怀素的墨迹，毛泽东书库存有两种：一种是《僧怀素草书千字文》，一种是《怀素自叙帖》。这两种字帖都是他50年代看过的。忻中将这两种字帖送给他之后，他立即放下手中正在翻看的新印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高兴地翻看起来。一边翻看一边问："你们知道怀素是什么地方人?"当时在场的几个同志一时都回答不出，他便笑着说："僧怀素是我的老乡，湖南长沙人也，俗姓钱，字藏真。"徐业夫看他老人家兴致很高，便开玩笑说："怪不得您爱看怀素的字帖，原来他是您的老乡！"他马上回答说："你们说话差矣，我爱看怀素的字帖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老乡，而是因为怀素的草书写得好，有大家风度，狂草尤为独特。"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学习草书僧怀素堪称典范。说着他还问工作人员：'唐代有位大诗人曾专门写诗赞扬怀素的狂草，你们知道是谁吗？'在场的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他便说：'又是一个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吧，就是那个号为青莲居士的李太白。李太白的《草书歌行》的诗，就是专门赞扬僧怀素的狂草的。'"说着他老人家就抑扬顿挫地吟起来："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心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当时在场的人，一是没读过这首诗，二是他的湖南口音重。所以，大家都没听懂。尽管如此，他吟咏的时候，在场的几个同志还是边笑边点头。他吟咏完毕，大家还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看大家鼓掌，他也笑了，看得出，他很高兴。

从1964年4月起，毛泽东的兴趣好像逐渐转到阅览字帖、字画上了。从当时毛泽东借书登记来看，1964年下半年，毛泽东看书看得较多的就是历代书法帖、名人墨迹等书法作品。1975年毛泽东还看过不少的字帖。直到1976年2月他还要忻中为他购买过两种字帖。

毛泽东曾说过："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炼。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毛泽东的字所以写得好，所以能书写迅疾，随意挥洒，自成一体，独具一格，在书法上获得很大成功，最主要的就是他几十年坚持不懈而

又从不满足地博览群帖，刻苦临摹和练习，锲而不舍，垂老不倦地下功夫的结果。

毛泽东对我国延绵数千年的书法艺术遗产的学习研究和临摹、练习不局限在书本上，也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他学习研究的范围很广，就是在环境恶劣、生活艰难的战争岁月，就是在战火纷飞的行军路上，只要一碰到刻碑、文字匾，他都非常虚心而又饶有兴趣地学习研究临摹一番。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率领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获得了胜利，打破了娄山关守敌所谓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神话。娄山关上有茅屋两间，石碑一通，上刻“娄山关”三个大字。当毛泽东随着胜利的中央红军沿着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羊肠山路来到地形十分险要的娄山关上时，如海的苍山、破旧的茅屋好像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而当他看到石碑上的“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时，却停住了脚步，饶有兴味地琢磨一番。

“学字要有帖”。毛泽东学习练习书法是从临摹字帖开始的。他老人家一生中学习临摹过的字帖是很多的。时间的流逝，征途的沧桑，道路的曲折，生活的艰难困苦，以及个人家庭生活中的风风雨雨，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毛泽东对书法的爱好和追求。如果说，毛泽东晚年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是书籍的海洋，那么，毛泽东十分喜爱的历代碑帖、名人墨迹等书法作品就是这浩瀚大海中璀璨的明珠。20多年来，他老人家究竟看过多少遍，临摹过多少次这些书法作品，这是很难说清楚的。直到1976年9月他老人家逝世之前，忻中到他会客厅里去的时候，亲眼看到，小圆桌上放着的《支那墨迹大成》(第1、2、4—12卷，共11册)《宋徽宗书诗卷》、《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三种字帖，有的是翻开放的，有的夹有白纸条，有的折叠了起来。《宋徽宗书诗卷》这册中还夹着一支他老人家晚年很喜爱的上海中国铅笔一厂生产的8B铅笔，笔杆六面形，浅蓝色，笔芯黑而软，削好的笔尖已磨损许多。仿佛他老人家刚才还在阅览临摹。

如今，故居的主人毛泽东已去，主人曾阅览、临摹过的种种字帖还在。这一册又一册的字帖，是毛泽东学书的范本，它们默默却又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学字的勤苦历程和执着追求。为后人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精心组织读书小组

1959年10月31日，66岁的毛泽东来到杭州。同年12月10日，毛泽东、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陈伯达组成一个读书组。傍晚时分，在宁静的西子湖畔，丁家山上一所平房里，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直至1960年1月4日，历时25天。这也是毛泽东在杭州逗留时间较长的一次。

毛泽东为什么要组织这个读书小组呢？

缘起于在这之前的两次读书建议。第一次，1958年11月9日，在党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致信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其目的，信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还提出"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次，1959年8月1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写的"前言"中，又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认为："《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书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

毛泽东的读书处丁家山，位于里西湖金沙港南端，刘庄招待所内。刘庄，包括韩庄、汤庄，山连水结，和而为一；山水交错，又分而为三。整座庄院，三面傍湖，北面倚山，即丁家山，也叫康山。山高不过40多公尺，因戊戌七君子的领袖康有为曾在此隐居而闻名。山腰一丛丛族立的岩石，形似芭蕉，雨点击石，叮咚作响，有康有为手书刻石"蕉石鸣琴"名列钱塘24景。山顶有一泓泉水，也有康有为手书刻石："潜岩"。其上有三间砖木结构，建筑古朴，四壁书橱的平房，名"蕉石山房"，也叫"康庄"，毛泽东爱此肃静的环境，就在这座平房里读书。

读书会开始，毛泽东对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说："从头到尾读，边读边

议。”意思是说要他们三人轮流读。会后，胡、邓、田分工：田，胡轮流朗读，邓记录，其他人不记。边读边议时，听毛泽东谈话，大家也插几句。毛泽东起初未注意他们有分工，问邓力群：“你怎么不读?”邓说：“我的口音不好懂。”毛泽东看邓力群记录，知道他在记录，没有再吭声。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19章，1、2两章讲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3至19章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册从第20章起，至第36章和结束语，共10章，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毛泽东在杭州读的是下册第20章至第33章，第33章未及读完，1960年1月4日晚，毛泽东和读书小组离开杭州，去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杭州读书的25天间（包括4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有21天，每天下午读，起讫的时间不等，一般是从4点左右起，到9点左右吃晚饭，有时则2点、5点、6点起，到7点30分、10点止。风雨不误。

1959年12月19日，星期六，下午读书至9点，宣布第二天放假。胡绳、邓力群、田家英三人想利用这难得的假日，就便看看与杭州齐名的苏州，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一早晨赶回，也未误下午的读书，这一天由胡绳朗读。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6岁生日，他照常读书，只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增加了参加读书小组的几位。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饭后，毛泽东即兴赋诗，还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集》，作为纪念。

12月30日，下雨，照常策杖登丁家山，从下午6点读至10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1960年1月3日，星期日，照常读书。1月4日，晚上离杭去沪。出发前的下午，照常读书。1月5日，在停靠上海的火车上，下午也照常读书，读完了在杭州未及读完的第33章。第34章至第36章和结束语，则于离开上海到广州后，在白云山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从上年12月10日起，恰好两个月，这也反映了他那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坚韧精神。

整个读书过程是很活泼的，波浪式的。毛泽东在评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是波浪式的这一点时，信手举了读书的例子。他说：“任何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的。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

读书之前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一直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

邓力群在杭州读书时，是当天记，当天整理，去沪前已把杭州这一段的记录整理完，并经胡绳、田家英看过、修正和认可。帮助整理的是梅行。上海会议小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泽东读书小组的人传达一下毛泽东读书时谈的意见。邓力群所在的组有朱德、邓小平。邓力群说：“主席没有叫我传达，传达好吗？”邓小平说可以传达。邓力群就把杭州整理的记录稿传达。当时，胡绳、田家英也在各自所在的组传达了。毛泽东知道后，也没有说不准传达或传达了是犯错误之类的话。

到了广州，书读完了，随后记录也整理全了。当时，周恩来听说毛泽东读书时讲了许多好意见，向毛泽东报告，是不是叫胡绳把谈话记录整理摘编一下，印发国务院到会的同志，作为学习材料。毛泽东同意，胡绳就从邓立群的杭州整理稿中，选了大部分，作了若干调整，题为《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社会主义部分）》，印发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聚精会神，耳听朗读，眼看书本，手拿铅笔，在他认为值得重视的段落、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问号。当时邓力群坐在毛泽东身边，也跟着在他的书本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画。有的段落，毛泽东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邓立群把毛泽东的这些讨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泽东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以及“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泽东发表的议论中，批评教科书的多一些，肯定的少一些；在那些简单的几个字的评论中，肯定教科书的多一些，否定的少一些。

胡乔木在上海听了传达以后，把在书上画了杠、记了字的原书拿去看了一遍，认为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准确地全面地反映毛泽东对教科书的评价。

1974年10月，邓力群从干校回到北京，为了弥补上述缺陷，1975年1月开始，又进行了一次整理。办法是，毛泽东发表的议论，分别放在有关段落后面，用不同的字体排印，以表示与教科书原文的区别；毛泽东说几个字的段落，也都按次序把原文排列进来，旁边写上“对”或者“不对”之类的评语。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整理完毕，从头到尾，都是照教科书的页码次序进行整理的。国家计委的房维中、王忍之去看邓力群，把全部整理稿拿去复印了几份。

这期间，林乎加主持国家计委日常工作，邀集胡绳、邓力群、于光远、吴冷西传达纪登奎转告的意见，为了研究执行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要他们把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再整理一下。那时，田家英已去世，就由他们几个人在国家计委把邓立群在1975年春的记录整理稿，从头到尾，一边读，一边议，一边修改，书名改为《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一)、(二)、(三)、(四)共4大本，印了40套送上。

1977年，邓力群以上述整理稿为基础，编辑了一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送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他批准印发党校教学人员阅读。

通览上述谈话记录，如入宝山。毛泽东的学风一以贯之，好读书又不唯书；重视苏联的经验，但又不迷信照搬。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致力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谈话内容博大精深。当然也不能不受历史局限，有的观点仍需商榷。

毛泽东总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考察事物分析是非，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就在他读“教科书”之后的第四年，1963年5月，在杭州写下了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他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又说：“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

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了一系列的评论，择其要者，有如下一些观点，他说：“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治经济学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那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

“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说社会主义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

毛泽东认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须提纲挈领。他说：“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其他的问题

上，他们也没有研究矛盾，例如数量和质量、产值和品种，都没有当作对立统一来研究。这表明他们没有运用辩证法来研究这个问题。”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

“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

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另一个缺点是研究问题的方法，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他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此相反，它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

“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认识规律径直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

“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毛泽东常临杭州，在杭州的青山绿水间，不仅留下了他履印的足迹，而且还留下了他读书的胜迹。以66岁的花甲之年，去探索我国经济建设的规律，给史家留下了潜心研讨的一段史实大记录。

“毛主席窗前一盏灯”

有一首歌叫《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歌词是：“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夜夜长明；伟大的领袖灯前坐，铺开祖国锦绣前程……警卫战士窗前过，心中歌唱《东方红》。”

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回忆，毛主席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他的作息时间没有个准点儿。用警卫战士的话说，他是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平时他工作

到黎明4点多钟，睡上一会，到9点钟又起来批阅文件、看书了。

1965年的春节，72岁的毛泽东早晨5点钟才熄灯睡下，到6点半钟就起来主持召开会议。

警卫战士在哨位上，根据毛泽东房间里灯光的明灭，计算过他的睡眠时间，平均每天不超过五个小时，一年四季，常年如此。警卫战士多么希望主席多睡一会，养养精神啊。

警卫战士做了一块木头牌子，上面写着“安静”二字。每当主席睡下后，警卫战士就把这个牌子放在毛主席寝室的外面，大家看到它，路过这里都轻手轻脚地，免得把主席惊醒了。

毛主席住的是平房，麻雀比较多，最爱大清早叽叽喳喳地叫，这时候往往是他睡觉的时候。警卫战士就在竹竿上绑了一块红布或用细沙土，轻轻地把麻雀们赶跑，让毛主席安静地入睡。每当主席房间里的灯光熄灭了，警卫战士们心里都非常高兴，知道他休息了，大家像是得到了很大安慰。

毛泽东不知疲倦的读书精神，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盏不灭的灯光。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说：“每当毛主席日以继夜地工作之后，走下工作台，说要去睡觉休息了，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好像卸下了一天的重担，放松下来，脸上都堆起了笑容，像传递好消息一样，互相转告着：‘主席要休息啦！’但是，时间一长大家就知道，毛主席从办公室走进起居室，并不意味着他就要睡眠休息了，而常常是回到寝室之后，灯光仍然久久不息，这就是说,他又转入了另外的一种工作形式——正在看书学习哩！”

毛泽东起居室里的灯光成了警卫战士观察他读书或睡眠的一个信号。所以每当毛泽东进入卧室后，值班卫士就把视线盯在向南的窗子上，看着那从窗口射出来的灯光，如果这灯光一小时、两小时或更长时间地亮着，说明他正在顽强地学习着。这时，警卫战士的心弦也就越拉越紧了，担心他休息的时间太少，影响健康。此时，常常会听到值班卫士们叹息：“啊！这么久了毛主席还没休息呀!”

警卫战士平常以毛泽东寝室里的灯光熄灭到他醒后按电铃的声音计算

他的睡眠时间，这常常是不准确的，但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有时常把他看书的时间记入在睡眠的时间之内，如果是在晚上或夜间，灯光可以告诉他醒了，在读书哩，不按电铃,也知道毛主席醒了。如果是在白天，大家还认为他老人家睡得很好，内心里都很高兴，值班的卫士兴高采烈地转告着：“嘿，今天我值班，毛主席睡得多美呀!”把此事看成是自己值班中的成绩。

毛泽东办公室右侧的床头桌上，放着盏台灯。只要他未在睡眠中，那台灯总是亮着的，伴着他读书。在灯光下的书面被照得很醒目，毛泽东半卧着，或半坐着，或侧卧着，或用右肘支持着上身的重量，眼睛在灯罩上的阴影里，也有时下放到灯光的领域里读着，读着……毛泽东睡前，多数的时间是在醒后，当走进他的寝室时，常会看到他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着，一点儿也没觉察有人走进来，当他读到有趣之处，常常会使你听到从他那抖动着的喉部迸发出的“格、格、格”的笑声。这些情景，不禁使人想起井冈山时的民歌：“天上的北斗亮晶晶哎，八角楼的灯光通通明，毛委员就是那掌灯的人哪，照亮中国革命万里程。八角楼的灯光彻夜明哎，毛委员写书到深更，光辉的真理照人心哪，他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

毛泽东一生的夜晚中，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在灯光下度过的，恐怕连在他身旁的工作人员也统计不清。特别是在晚年视力减弱的情况下，灯光更是他孜孜不倦学习的明证。

谈读书

毛泽东嗜书成癖，晚年尤其如此。在运动量减少，整日读书不止的情况下，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着急。他的保健医生徐涛想把他从书海中拉出来，劝他休息，他不听。

后来，徐涛发现毛泽东喜欢聊天，就找机会拉毛泽东到户外散步聊天，以暂停他的读书，使他得到一点休息。

两人出去散步。毛泽东说："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读得不多，还得补课。"徐涛说："我正好相反，自然科学的书读得多些，社会科学的读得太少，现在也得补课。"毛泽东兴致来了："我们以后多聊点自然科学嘛。"后来，他问徐涛："石油怎么开采，怎么炼，有哪些用途?"徐涛回答不了，就去查书。查完书再聊。这样一来，毛泽东常常向他提出新的问题，徐涛只得一次次地去查书。

后来徐涛发现，他读的书，毛泽东也在看。因而问题也越来越深，被他难住的时候就更多了。徐涛问："主席，您是有意考我吧?""哪里是考你哟，你在帮助我读书，帮助我增长知识。"

一听这话，徐涛茫然了：本想劝他少读书，结果倒逼他多读书了。于是他趁势说："主席，你读书很多但方法不科学。"毛泽东让他明说。他就说："您这么整天读，不休息，太疲劳，违背辩证法嘛。"

又说："主席，你电影不看，对打扑克、下棋没兴趣，体力活动不搞，长时间进行一种劳动，最易疲劳。"

毛泽东却摇头了，"叫我看，你那点辩证法不全面，你对事物的理解也有局限。你说脑力换体力是休息。看文件累了看报纸，看正书累了看闲书，看大书累了看小人书，看政治书累了看文艺书，我这也是一种休息，你不承认?"

毛泽东就是这样执着地从书中吸取知识，并有他的一套独特的读书方法。

晚年战病魔苦读书

到了晚年，虽然身体衰老，病魔缠身，视力减弱，但毛泽东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天天看书。平装小字本的看不见了，就看新印的大字线装本。他要看什么书，除身边有的他自己信手拈来就看外，其余的都由秘书们负责提供和查找。由于年老和习惯的关系，晚年他看的书，大都是线装本的。因为线装本一

册一册比较轻，他又爱躺着看书，拿在手里看起来比较方便，如果没有线装本，只有平装小字本，就要印成大字线装本。当时的工作制度规定：毛泽东要看的书，是什么时候要的，从什么地方查找出来的，及其书名、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册数、退回时间等都要一一登记清楚。

晚年的毛泽东，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明显地日渐衰老。进入70年代之后，各种老年性疾病无情地向毛泽东袭来。病魔缠住了他那曾是高大魁梧、非常健康的身躯；白内障遮住了他那曾是洞察一切、识妖辨怪的火眼金睛；肺心病伴严重缺氧致使他突然休克，险些夺走了他的生命；大叶肺炎带来的昼夜咳嗽，脑神经功能的减弱、脑血管的渐进硬化导致他腿脚行动不便。一位当年叱咤风云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全中国人民的统帅，面对这些肆虐的病魔也显得无能为力，最终只好“随它去”了。唐朝诗人罗隐在《筹笔释》中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为古地名。传说诸葛亮率兵出师，曾驻过这个地方，并在这里运筹决策。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出众才华的颂扬和钦佩，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未能实现初衷，用尽其才、光复汉业深感惋惜。毛泽东生前在读《南史•梁武帝纪》时，在有关文字旁曾用红铅笔写下过这两句诗作为批注。毛泽东写此批注，一方面表明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也是他内心世界的自我表露。如果说，从遵义会议之后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初期，毛泽东领导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排除万难，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是“时来天地皆同力”的话，那么，进入60年代，特别是到了70年代，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出现了失误，特别是对于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长时间处于内乱状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就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面对种种老年疾病的折磨和国事、家事一次次精神上的沉重打击，“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也没有放松在读书学习上下功夫。他“活到老，学到老”，倾心追求知识的精神是极为感人的。

1974年8月，毛泽东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眼渐渐看不清东西。1975年8月中旬，北京广安门医院的唐由之大夫主刀，成功地为毛泽东做了白

内障摘除手术。一个星期之后，毛泽东终于有一只眼睛能看清东西了。尽管只是这一只眼睛，毛泽东仍然坚持夜以继日地看书。病重期间，因不能进食，体弱无力，自己不能坚持看书时，还让身边的同志给他念书。

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已经是重病在身，每天24小时差不多都是躺在床上，此时他已经不能下床行走了，吃饭也要靠别人一勺一勺地喂。这时候大家都为他的病情焦虑，盼望他的身体康复、转好。可是他自己呢，还是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看书。这天晚上9时45分，秘书张玉凤告诉忻中，说毛泽东要看《容斋随笔》，让忻中赶快找一部大字的送到游泳池（中南海毛泽东当时的住地）。忻中急忙跑到毛主席书库（增福堂），毛泽东个人的大部分图书包括报纸和杂志等都集中存放在这里。因为全部图书、报纸和杂志，都是刚从别的地方搬到这里的，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和编排顺序。他以前看过多次的那部大字线装书《容斋随笔》一时找不出来。于是，忻中就立即与北京图书馆联系，请他们帮助速找一部大字线装《容斋随笔》。

毛泽东有夜晚看书的习惯，特别是从60年代末开始，经常在深夜里要书。为了及时满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夜晚看书的需求，北京图书馆的领导经过研究，专门成立了一个办事小组，白天、晚上、节假日，这个办事小组都有人轮流值班。凡是毛泽东要书，他的书库没有或一时找不到（因藏书较多，分类不准确），身边工作人员就可以与这个办事小组联系。在没设这个办事小组之前，也就是在忻中刚开始给毛泽东管理图书的时候，由于对毛泽东藏书情况不熟悉和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毛泽东要书时，忻中的心情是很紧张的。后来，尽管他也下了很多功夫，做了很大努力，但是有时有的书，特别是线装书还是不能马上找出来，有的名人诗句、警语等还是不能很快地查出来，有了这个办事小组，毛泽东再要书，工作人员心里就踏实多了。在那“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里，尽管有时为找一本书，查找一句话、一个典故，要在深夜里惊动许多人，如值班馆长、目录室人员、参考部人员、库房管理人员、出借组人员，还有门卫等，但工作人员和办事小组的同志都怀有共同的心情：为毛主席服务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

大约过了35分钟，北京图书馆的同志告诉忻中，书已从柏林寺书库找

到了，柏林寺书库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附近孔庙的东侧，距中南海大约八公里。从柏林寺书库取回《容斋随笔》后，按照惯例，忻中迅速地翻检了一遍。这是当时的工作制度，凡是从外单位借来的图书，送给毛泽东之前都要认真仔细地检查一遍，主要是看看里面有没有夹带什么易燃易爆、容易伤害人身的危险品及信件、字条等，一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二是为了防止增加对毛泽东不必要的干扰，以致分散老人家的精力和时间。检查完毕，忻中急忙将书送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当时的时间是晚上10时50分。

就在这次要书后不久，毛泽东的病情恶化，9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生酷爱的读书生活至此也就结束了。《容斋随笔》就成了毛泽东要看的最后一部书。9月16日，即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个星期，忻中就将这部书退还给北京图书馆了。借阅此书的主人虽然离开了，但他读过的这部书北京图书馆的同志还一直珍藏着，成为毛泽东读书生活的有力佐证。

还有一件事至今鲜为人知。1971年毛泽东生病后，看书都借助放大镜。为此，工作人员曾与国家出版局联系，与他们一起商量，将毛泽东要看的一些小字本的图书放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国家出版局和有关的出版社非常赞成这个提议。根据当时国家出版局的分工和安排，《容斋随笔》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一接到这个任务，全社上下欢欣鼓舞，印刷厂的工人师傅自愿加班加点。书于1976年8月30日印出送到北京，8月31日忻中将这部新印书送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此时毛泽东已处于病危状态。书是在毛泽东生前赶印出来了，可是此时他已经不能看书了。

从上面的几件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如何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走完他那一生刻苦读书的生涯的。《容斋随笔》大字线装本毛泽东虽然没有来得及读上，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四、读书工具篇

读书与图书馆/读书与“文房四宝”/谈美术/读书与藏书印章/从书信看找书、借书、买书与谈书/菊香书屋/读书与办公室/毛泽东和他的书/广读天下书/“不动笔墨不看书”/广收博览/《辞海》、《辞源》、《资治通鉴》和《中国历史地图集》/读书与考证/读书与借书/读书与专列/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晚年的书房/毛泽东的藏书

读书与图书馆

1912年秋，毛泽东退出湖南省立一中后，到湖南图书馆开始了他的自学生活，从此便与图书馆结下了“良缘”。

湖南图书馆藏书丰富，毛泽东初到图书馆时，看到书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种中外书籍，便下定决心，尽量多读一些。他每天吃完早饭，就匆匆忙忙地来到湖南图书馆，有时他来得太早，图书馆还关着大门，他就站在门外等着。每天一开门，毛泽东总是第一个走进图书馆看书。他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争分夺秒地看，一刻也不肯休息。图书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中午常常饿着肚子不吃饭，有时口袋里有钱，就到街上买几个烧饼充饥，这就是他一天中唯一的休息时间了。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毛泽东日复一日地坚持到图书馆去读书，从不间断一天。在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的严冬季节，看书坐久了，脚冻得发痛，他除了活动活动两脚，仍然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书本上。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先后研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名学》、卢梭的《民约论》等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此外还读了一些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和世界地理、历史书籍。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并联系实际很有兴趣地加以研究。通过半年图书馆的自学生活，他不仅增长了许多知识，而且大大提高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为解放穷苦的群众而奋斗的决心。

这是毛泽东学习生活中收获最大、很值得纪念的半年。后来他向友人叙述这段难忘的经历时说：“我没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它替我打好了文化的基础。但我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却是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半年。这正是辛亥革命后的一年，我已经19岁了，不但没有读过几本书，连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书，哪些书是我们应该读

的，都一点不知道。乃至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

1918年10月，毛泽东到北京，当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他在这里虽然时间不长，但能珍惜分秒的时间，如饥似渴地研读着介绍各种新学说的报纸、杂志和书籍，获得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新知识。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来到北京，虽然工作十分繁忙，还是利用点滴时间看书学习。20多年里，他经常与北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往。据不完全统计，进城以后直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阅的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1974年一年，借阅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的书刊就有近600种，1100余册。毛泽东的学识虽然已经很渊博了，但他走到哪里，总是把自己爱看的书带到哪里，另外又常常到当地图书馆去借阅书刊。

毛泽东喜爱图书，与图书馆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生前的住房就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图书馆在与他拥有的渊博知识之间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因此，他充分利用图书馆为自己寻求广泛的知识。

读书与“文房四宝”

笔、墨、纸、砚，历来被称为“文房四宝”。称它们为“宝”，绝不是因为稀有和价昂，而是它们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无论是著书立说、吟诗作赋、绘画书法，都少不了它们。自古以来，人们常常把这些书具，视为文学的某种象征。比如说以“砚田”、“笔耕”代称文人的创作生涯；赞誉优秀的文学作品，谓之“笔精墨妙”、“如椽大笔”、“生花妙笔”、“洛阳纸贵”，文章噜苏细碎，人们读后就会皱着眉头说：“笔墨委琐”、“赘笔冗

墨”；批评不学无术的笨伯，称为“胸无点墨”，等等。由此可见，“文房四宝”同文人的创作实践和文化的进步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千百年来，它们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珍视，是理所当然的。

《论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毛泽东读书写作，历来重视工具，他对“文房四宝”有着特殊的感情。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来到江西永新县，贺子珍和她的父亲知道毛泽东愿意用毛笔起草文件、书写文稿，便经常帮助购买笔墨纸砚。毛泽东喜欢用毛笔和铅笔，在江西福建做调查和记录时大都用铅笔，而起草文件、书写材料，一律用毛笔。他对“文房四宝”尤其爱护和珍惜，每次用完毛笔，都将笔插入笔帽，不常用时，便将毛笔清洗干净，他有时开玩笑地说：“我用‘文房四宝’要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贺子珍与毛泽东在江西结婚时，没有赠送别的纪念品，她亲手用了几天时间特制了一只多用挎包，送给了毛泽东。这个挎包是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缝制的，设计奇特而适用，专有装“文房四宝”的大小多层口袋，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赞赏说：“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

红军时期，这个挎包毛泽东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工作和扎营住宿，公务员、警卫员首要任务是将笔墨纸砚摆好，他向警卫员陈昌奉交待说：“我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把‘文房四宝’摆好，随时可以工作、看书、学习。”他吃完饭或尚未吃饭，就经常提笔批阅文件，书写文章。

战争年代艰难困苦，毛泽东用的“文房四宝”大部分需要购买，他要求工作人员要节省，有时也以缴获的战利品补充。在陕北打直罗镇，部队缴获了几支毛笔、一支好钢笔和一只手表。领导同志看毛泽东需要便都送给了他。毛泽东只留下几支毛笔，钢笔、手表都送给了其他的同志。

解放后，条件有了改善，毛泽东对“文房四宝”仍然是爱不释手。

有一次，北京医院要题写匾额，傅连暲找到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王鹤滨回到中南海，径直走到毛泽东办公桌旁，恭敬地说：“北京医院请主席给他们题字。”“写什么?”“给北京医院写‘北京医院’的匾额。”毛泽东

说好，立即把手头工作放下，站了起来，将四尺宣纸，横裁为三。王鹤滨忙把铜墨盒的盖子打开，毛泽东从笔架上抽出一支较粗的兼毫毛笔，手执笔端，蘸饱了墨汁，写了起来，真是笔走龙蛇，只见笔尖提、拉、顿、起、点、横、竖、挑、策、掠、啄、磔诸法任意挥洒，中锋侧锋兼用，很快写了三张“北京医院”的横幅。之后将三张写好的字，一一横摆开来，铺满了整个写字台，毛泽东站在转椅前一张一张地逐字审视了一遍，然后对王鹤滨说：“这两张拿去吧，由他们选一张用。”王鹤滨接过那两张写好的“北京医院”四字横幅，等字迹完全干后，才卷了起来。当题字送到北京医院时，院长冉洋沼高兴地说：“这样快毛主席就写好了，这是主席对我们医院工作的支持啊！”他两只手持着横幅的两头，看着题字，向王鹤滨说：“请你转达我们向毛主席的敬意和谢意！我们马上把匾做好！”

“文房四宝”成了毛泽东特殊的笔下生花的武器。

谈美术

毛泽东知识渊博，与他广收博览，兼蓄并重分不开。他十分喜爱美术，在这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可以说是行家。

1938年，刘岘投身新四军彭雪枫所部，次年调任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木刻教授。这时期，刘岘创作热情高涨，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就创作了数十幅新作。手拓自订数册，分别呈送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阅赏。11月间，毛泽东阅审后，挥笔为刘岘木刻题词：“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漫画家华君武投奔延安后，在鲁艺他和米谷、施展、苏光、孟化风等，曾向校方申请一块两米长的蓝粗布，把自己创作的漫画贴在上面，办起了一张“漫画墙报”，每月一期。

1941年，华君武和张谔、蔡若虹三人联合举办了一个《延安讽刺画展》。当时延安物资极端匮乏，印刷厂无法制锌版，报纸上发表漫画极少，所以画展一开幕就满城轰动，各方面人士都来观看，小小的几个窑洞竟挤得水泄不通。

有一天，毛泽东也来看画展了。那天正好华君武在，他就陪毛泽东一起看，毛泽东一幅一幅看得很仔细，最后表示漫画要发展。过了几个月，毛泽东通知当时在延安《解放日报》负责副刊的舒群，约张谔、蔡若虹和华君武到他住处见面。四人黄昏时到达，毛泽东就和他们谈起来，他谈到片面和全面、局部和整体、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问题，并举出画展中一些作品，谈了对漫画创作的看法。他的谈话生动幽默，有时还提到一些民间传说和笑话，不时引起阵阵笑声，使大家消除了拘谨。后来吃饭，几杯酒入肚，华君武提了两个问题：一是，听外边人传说，毛泽东爱吃辣椒，连吃西瓜都就着辣椒吃，有无此事？毛泽东笑笑说，这话有个来历，长征途中，有一次正就着辣椒吃饭，下面送来了当地产的西瓜，便放下饭碗吃西瓜。所谓“就着辣椒吃西瓜”，大约就是这样传出来的。华君武又问：打仗时勇敢冲锋并不难，可如果被敌人捉了去严刑拷打，经受不住，怎么办？毛泽东温和地回答说：“你想着为人民嘛！”毛泽东就是用这句话结束了他与漫画家们的谈话，使华君武终身难忘。

1952年，齐白石和许多著名画家为了表达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联手共作了一幅闻名遐迩的国画《普天同庆》，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于同年10月5日回书一信：

> 白石先生：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　、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
>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毛泽东与齐白石感情深厚。1953年白石老人90大寿，又荣获“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毛泽东特意送上四件寿礼：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长锋纯羊毫书画笔、一苗东北野参和一架鹿茸。白石老人十分激动，书写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1957年，95岁高龄的白石老人

重病缠身，毛泽东劝他从心所欲，静屋休养，还派秘书多次探望。白石老人希望自己康复后，能与毛泽东合拍一张照。直到弥留之际，留下遗言：将自己珍藏的字画、作品和用过的东西，献给毛泽东，以示知遇之恩。

1955年夏，钟灵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在中南海怀仁堂筹办全国第一届美展。毛泽东对这次美展很关心，要亲自来看展览。那天，钟灵前去迎接，毛泽东一见到他就高兴地说："噢，钟灵啊，是你在办这件事!"原来，早在1946年钟灵就与毛泽东相识了。毛泽东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并询问大家的籍贯。当有位同志回答说是云南时，毛泽东又问："你知道云南省为什么叫云南吗?"那位同志一时未答上来，钟灵便回答说："可能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在云梦泽以南而得名吧?"毛泽东又问："钟灵，你是山东人，你说为什么山东省叫山东?""因为它在太行山以东"，钟灵答道。毛泽东满意地说："钟灵，你的地理知识不错啊!"

随后，钟灵以及美协领导蔡若虹、王朝闻、张谔等一起陪同毛泽东看展览，毛泽东漫步于展厅，逐幅观赏，十分仔细。在看一幅木刻时，问："木刻就是版画吧?"在一旁的王朝闻回答说："木刻只是版画的一种……"于是，王朝闻讲起了版画的种类。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在近两个小时的参观中，毛泽东对作品的内容、构思、寓意以及美术上的一些问题向周围的人提出了咨询。

参观结束了，毛泽东对这次美展很满意。送毛泽东上车时，毛泽东对蔡若虹、王朝闻、钟灵等几位美协的同志说："我请你们几位去当当参谋。"不等大家表态，毛泽东便把他们拉上汽车，直驶勤政殿。进西门一看，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荣桓等老帅都在这里，毛泽东对他们说："我请来了几位美术家，也听听他们的意见。"这时，钟灵等人才弄明白，人民解放军即将实行军衔制，今天是军委领导同志在这里审定军服的式样，毛泽东请他们来以美术家的观点参加审定军服。毛泽东同大家一起来到军服陈列厅，这里陈列的有国外一些军服的式样，有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军队的军服，也陈列着新设计的我军军服式样。大家边看边议。在看北洋军阀的服装时，贺老总说："这种服装太难看，不能仿照。"在看到新军服军官的肩章时，一位领导说："这肩章倒是挺

漂亮的，但是戴上它就不好参加劳动了，一挑担子，一背筐不就压坏了吗?”贺老总说：“你就不能脱下军服再劳动吗?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在参观新式军服时，毛泽东问钟灵等人：“以你们美术家的观点看这军服式样如何?”这些美术家们谈了各自的看法。后来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穿着的新式服装，就是这一次审定的。

从这些小事不难看出，毛泽东不满足于已有的丰富的知识，而钻研各种有用的知识，从而精通各门学问。从他与美术的接触，不难看出，这正是他所具有的特质之一。

读书与藏书印章

从毛泽东的手稿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革命战争时期所使用过的几方印章。例如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签署派代表到国统区协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事宜的介绍信以及1937年7月13日在关于对日作战总方针的题词上，都钤有同样一方“毛泽东印”的朱文印章。又如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致柳亚子信：“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毛泽东在此手书《沁园春•雪》一词署名下端，也钤有两印，其中一方是“毛泽东印”的篆体阴文印章，浑厚古朴。

1945年，柳亚子曾送给毛泽东两方印章。毛泽东在1946年1月28日复信中说：“亚子先生左右：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

1948年，人称“篆刻王”的谢梅奴用家藏上乘的寿山石料，为毛泽东刻制了两方印章。一方是阴文“毛泽东印”，印文是回文排列的，笔画间架适当，松而不散，紧而不板，具有汉印风格。另一方是阳文“润之”，细文粗边，仿周秦小玺，字体秀丽，笔势圆润。这两方石印，高两寸许，有钮，印面约2.2

厘米见方，嵌装在一红木锦缎盒内，于1951年由湖南省人民政府送往北京，献给毛泽东，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北京和平解放后，齐白石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精心刻制了印文为“毛泽东”的朱白文印各一方，托当时接管中央美术学院的军代表、诗人艾青转交。艾青把这两方印章请毛泽东的秘书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印章后，于1950年春天派秘书田家英去看望了齐白石，约请齐白石到中南海品茶赏花，畅叙乡情，并由郭沫若作陪，共进晚餐，以作答谢。

1959年，画家傅抱石和关山月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作巨幅《沁园春·雪》词意画时，毛泽东欣然为该画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当时，傅抱石曾为毛泽东刻一名章，拟钤于题字之侧，后因故未用。

毛泽东读书有一个习惯，就是看书时，往往喜欢先仔细欣赏一番，自己加盖上“毛氏藏书”印章，然后再翻阅内页。

从毛泽东的印章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钟爱。

从书信看找书、借书、买书与谈书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中不变的大事。很难想象若一天不看书会成什么样子。哪怕是随手拾来的废纸，只要上面有文字，便能吸引他。翻开毛泽东书信选集，随便翻几页，你便会发现一个特点，几乎无信不涉及书，或送书，或要书，或谈书，几十年一贯。

关于找书。

1943年12月20日《致胡乔木》：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

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

关于借书。

1964年9月9日《致××》：

××同志：

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毛泽东

关于买书。

1936年10月22日《致叶剑英、刘鼎》：

剑英、刘鼎同志：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

关于谈书。

1959年12月30日给李讷的信：

李讷：

病好了没有？想你。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感冒。

父亲

由此可见毛泽东与书结下的难解之缘。

菊香书屋

一个好的书屋，对于创造读书环境，陶冶性情，激发思维，至关重要。所以，古今名流，都喜欢为自己的书斋起名，以励其志，抒其情，明其节。毛泽东的书房是“菊香书屋”。

毛泽东生前居住在中南海“丰泽园”。王鹤滨在《紫云轩主人》中说：“我像第一次看到‘丰泽园’那块匾额一样，感到惊奇，因而也浮想联翩起来，这又是谁家早为毛主席准备好的书房、卧室？难道建造它的主人具有特异功能，知道毛泽东是紫云轩最合格的主人？知道毛泽东是时代的骄子，知道他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当代伟人，就是在文学艺术上，毛泽东的造诣之深，也不愧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大文豪。”这“‘紫云轩’也可能隐喻着帝王、圣贤的祥瑞之气，李白曾有诗句云：‘东海泛碧水，西关乘紫云！’”

毛泽东生前喜爱菊花。因此，毛泽东的书房“菊香书屋”，正是这位伟大高洁之士的生动写照。“菊香书屋”四面房子形成一个封闭的小院。院内南北、东西两条小路交叉成十字形，把草坪对称分开，整个草坪成一个“田”字形状。百年老树，使院里添几分幽雅。毛泽东十分珍爱菊花，1929年10月曾在《采桑子·重阳》上阕写道：“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菊花秋开。古时，以阴阳五行解释季节的演变，秋属金；金又以黄色为正；重阳时节为9月，又有菊月之称，故“黄花”又称菊花。“黄花分外香”，正是“菊香”之意。毛泽东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菊香书屋”寓意深远。

“菊香书屋”是中南海里一座18世纪中国宫廷建筑的四合院。它飞檐走厦，青砖灰瓦，建筑风格很是古朴。庭院内老槐苍柏，鸟语啾啾，环境十分幽静。它面临碧波涟漪、岸柳依依的南海，毗邻假山叠翠、溪流潺潺的静谷。毛泽东生前，在工作学习疲劳之后，常去静谷休息散步。

在“菊香书屋”内，毛泽东的藏书非常丰富。据他的秘书介绍，至1966年夏天，毛泽东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他需要的个人藏书室。其中，除马、恩、列、斯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的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都有。置身于“菊香书屋”中，犹如在书籍的大海中遨游。毛泽东平时读书的范围很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到近代的，从中国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军事、文学、地理学，等等，无不涉及。毛泽东使用最多的是《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他最喜爱看的书是鲁迅著作。鲁迅的文章，他反复读过多次。

“菊香书屋”不仅是毛泽东生前读书学习的场所，也是他运筹决策的地方。1971年4月7日，正是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最后一天。这天凌晨，毛泽东的“菊香书屋”还亮着灯光，书桌上摊着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请示报告。原来，他老人家还在思考：首先让谁到中国来。最后毛泽东终于作出决策，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它将为尼克松访华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就这样，在“菊香书屋”内，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拉开了帷幕。此事披露后，更显示出“菊香书屋”的价值。“菊香书屋”不仅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书屋，而且是他“运筹帷幄”的地方。

读书与办公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生活比较安定了，除了处理党和国家的大事外，有了更多的时间来读书。他把看书作为脑力劳动后消除疲劳的良方秘药，作为恢复思维能力的强壮剂。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和书籍仍然是形影不离。在他生活、工作和休息的环境中，例如卧室、办公室、游泳池、休息室和厕所，总之，凡是在他活动的地方，无处不放书，无处不读书，无时不用书，无时不讲书。这里介绍几件与办公室有关的小事。

曾担任毛泽东卫士的李连成说："毛泽东有两个专门装书的木头箱子。那两个木头箱子，粗糙笨重。二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刷了清漆。这是专门出差用的，里面装满书。《辞海》、《词典》、《楚辞》等书是每次必带。其余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根据毛泽东的吩咐选择。毛泽东在生活中是漫无拘束的，书房和卧室中到处堆满书报。看似杂乱无章，他却能够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要去外地了，上火车前，毛泽东将手那么一划：'把这些都带走。'那手势须在老卫士帮助下才能理解。不但包括了桌案上的几堆书报文件，而且包含了沙发扶手和茶几上几本像是随意扔掉的书。提前两小时左右将两个木箱送到专列主车厢内，按照在家时的样子，将书报文件重新摆放在书桌上，丢在沙发扶手或茶几上。原来放在床上的书现在也仍放在床上。总之，一切照旧。毛泽东登车后，擦一把脸即可开始看书、办公。"

在丰泽园毛泽东的办公室里，西侧窗下，放着一个东西向的大写字台，与西窗成丁字形。写字台一头放着台灯。中间部分的前边，放着文房四宝即笔、墨、砚及铜墨盒，办公用纸放在了与文件相近的地方。靠写字台中间地带还放着一个一般是小学生用的脱了漆的铁皮铅笔盒，里面放着长长短短的十来支中等硬度的铅笔。每日，值班卫士把铅笔削好，放在铅笔盒子里，毛泽东不让

浪费，只要铅笔能拿得住，就不能扔掉，所以铅笔盒里老是有些铅笔头儿。此外，铅笔盒旁还放着一块橡皮。

毛泽东的写字台是一张极为普通的写字台，台面靠右手的一端，漆面已脱落了，右手着腕的地方，还留下一道深沟。这显然是毛泽东常年操劳留下的印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许多重要文章、指示、命令、号召，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都是在这张办公桌上起草的。

除了在书架上摆满各种书籍之外，饭桌上、茶几上、床上，就连卫生间里，也无处不是书，无处不放书。这些书都是毛泽东平时喜欢阅读的，例如，床边就放着大字本的《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线装本的《古文观止》、《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和《物种起源》，等等。旁边还放着一个放大镜。书上勾画的各种圈点、符号、标记和批语，密密麻麻。在卫生间马桶前面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小木凳子，上面放着烟灰缸、火柴、香烟、手纸，有时也放着书或文件，以便坐在马桶上阅读和办公。工作人员说，他读书，从不放过任何一点可以利用的时间，就是上厕所，也要捧起书来读几段。一部二十多册的线装书《昭明文选》，就是他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断断续续地读完的。他读书，要是入了神会忘记睡觉吃饭，就是外出视察，也从不放松读书看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向同志们提出："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有人说，如果真的把全党全民的读书活动称之为一场比赛的话，这场比赛的冠军不是别人，应该是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和他的书

中南海丰泽园里四合院的西厢房，是毛泽东藏书和读书的地方。一人多高的黄色木制书柜，背靠背，面对面，肩并肩地布满房间，共有36个。书柜里摆着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和各种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史地书籍及线装古籍，还有科技、文学等书籍和报刊。南、北、西三面，是一个个紧挨着的书柜，靠东窗下有一个单人沙发和一个小茶几，毛泽东常常一个人在这里静静地读书、思考。

藏书，是一切大学问家的共同特点。每个藏书家又有个人的爱好，有的讲究收藏贵重书籍，有的要求各种版本一应俱全。有的一种书备上三册，一本作观赏用，一本自家阅读，一本准备送给别人。毛泽东对这些都无所苛求。他的藏书标准主要的一条是齐全。据说，他曾提出将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的图书配齐。可惜这个要求未能实现。

从西厢房沿走廊向正房走去，正房的门前写着“菊香书屋”四个字。西间是书房，东间是睡眠和后来办公的地方，中间是吃饭和休息的地方。这里依然是一个书的世界。除了书架上摆满各种书籍之外，饭桌上、茶几上、床上，就连卫生间里，无处不是书，无处不放书。这些书都是毛泽东平时喜欢阅读的。例如，床边就放着大字本的《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线装本的《古文观止》、《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和《物种起源》，等等。旁边还放着一个放大镜。书上勾画的各种圈点、符号、标记和批语，密密麻麻，历历在目。在卫生间马桶前面的凳子上，也摆着书，书页翻开，似乎是主人刚刚翻阅后离去的样子。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的一切都是毛泽东生前的样子。他从不放过任何一点可以利用的时间，就是上厕所，也要捧起书来读几段。他读书，要是入了神会忘记睡觉吃饭；外出视察,也从不放松读书。

毛岸青、邵华回忆：50年代初，毛泽东买到一套线装本的《二十四史》，共485册，这套书他非常爱读，由于经常翻看，许多册的封面和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这套书一直伴随在他身边，50年代读过它，60年代又看过，直到1975年病魔已经缠身，写字手都颤抖了，还在许多册上亲手写下“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样。

许多人藏书、读书，都喜欢有枚藏书印章，毛泽东也如此。打开他的藏书，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毛氏藏书”的印章。毛泽东非常喜欢他这方细朱文藏书印章。这枚印章是上海著名篆刻家吴朴堂精心制作的，毛泽东所有的藏书，几乎都盖有这枚印章的印记。

80年代初，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夫人茑子，参观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故居，看到毛泽东睡觉的床上也堆满了书籍，感到诧异。陪同人员向她介绍说，毛泽东生前酷爱读书，为了充分利用时间，随手可读，所以在床上放了些书。茑子感慨地说：“一个人要有大学问必须多读书，我要建议我丈夫学习毛主席，多读书。”

毛泽东读书不仅注重内容，而且注意方法。1917年毛泽东为同学萧子升《一切入一》的自学笔记写了一篇《序言》，仅500字，精辟、系统地叙述了他在青年时期的治学方法。《序言》开宗明义地说：“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他主张学习之道，一要积微起纤，日积月累，不要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二要广汇百家之流，不要囿于一家之言，偏执于一孔之见；三要梳篦条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要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四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不要一曝十寒，半途而废。这都是他的切身经验之谈，终其一生，他就是这样做的。

仅以诗词为例，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诗词？

在求学时期，毛泽东就广泛地阅读了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屈原的《离骚》和《楚辞》，汉代的乐府诗，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的诗、词、曲、赋，乃至鲁迅先生的诗作。后来还阅读过诗话、词话、章韵、词律以及他的战友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诗词和有关诗词书籍。

对于毛泽东一生之中阅读了多少诗词这个问题，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工作

人员张贻玖曾作过研究和统计：在毛泽东的藏书之中，他亲自圈画批注过的有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篇赋，总计为1590首，其中唐诗约600首，汉、魏、南北朝时期诗人的作品150多首，明诗近200首。鲁迅诗中圈画过的有44首。以上仅限于毛泽东在解放之后逐渐积累起来的藏书中圈画过的诗词。至于毛泽东读过而又未留下印记的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包括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毛泽东究竟读过多少古典或近代及国外的诗词，就无法统计了。

广读天下书

走进丰泽园毛泽东故居，你一定会被里面那简单的陈设所吸引。作为一个大国最高领导人的住处，这里既没有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无任何名贵的古玩字画，除了一些朴实无华的生活必需品，就是到处摆放的大量书籍。书架上、桌子上、茶几上，就连睡觉的木床上也有一半码放着一二尺高的书。毛泽东完全生活在书的海洋中。

毛泽东有一个个人藏书室，但仍不能满足他那读书的欲望。毛泽东还经常让管理图书的同志向一些图书馆借书。北京图书馆第一号借书证就是毛泽东的。在外地也还要借书，杭州、武汉、长沙、上海、庐山等地都有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毛泽东酷爱读书，他生活在书的海洋里，这种起居格局，搬到游泳池依然保持着，给每一位亲眼目睹过的人们，特别是到过这里的外国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此有过细致的描述。他说：“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领导人的会客室。”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报纸、杂志、字帖，还有各种各样的杂书，像小人书、笑林广记、古今滑稽联等等。只要是书，毛泽东没有不看的。毛泽东看书的速度也是惊人的，且记忆力过人，有时五六百页的书让他看用不了一天的工夫。

毛泽东认为了解一个人物，认识一个问题，不要匆忙下结论，而是广泛地阅读有关方面的书籍后再作结论。他曾对周福明讲："一个人的知识面一定要宽一些，这样看问题就不停留在一个方面，能够从多角度、多侧面观察问题。"

毛泽东一生不仅读书广泛，喜爱的书籍也不少，像《二十四史》就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书籍之一。这套浩瀚的历史典籍从《史记》到《明史》一共828册，3019卷，毛泽东从头到尾通读过几遍。这套书平时就摆放在他饭厅的书架上，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有时让周福明把它们全部带上，有时只带其中的一部分，大概是1973年，毛泽东相对地集中了一段时间，把《二十四史》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足见毛泽东对它的偏爱。

还有一些书是与毛泽东形影不离的，这就是在他的床上摆着的三排书里紧挨毛泽东这边的一排。其他两排书过段时间毛泽东就让秘书负责换一换，唯独这排书他是不让替换的。外出任何一个地方，无论路程远近，不管时间长短，不用开书单，周福明必须专门用个小箱子单独地把它们全部随身带上，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把它们摊开，像在家一样摆在毛泽东睡觉的床铺上。就连每次外出坐火车的这段工夫，周福明也要把这些书按次序在卧铺上摆好。

这排书从毛泽东睡觉的枕头旁到脚底的顺序大致是这样的：枕头旁是摞地图，毛泽东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时涉及地名的，他都要搞清楚地名的方位。《中国地图集》《世界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分省新地图》《中国分省新图》就是供他随时查找的；接下来是诗词方面的，像《诗韵》《诗韵释要》《词综》《杨万里七绝钞》《唐诗别裁》《宋诗别裁》《元诗别

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清诗评注读本》等；然后是鲁迅的书籍，像《朝花夕拾》《两地书》《野草》《书信》《故事新编》《且介亭杂文末编》；最后就是马恩列斯的书和他自己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怎么办》《论反对派》《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等等。

在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下的是，紧挨地图集的里面有一个用松紧带勒着的卷宗，里面存放着毛泽东自己的全部诗词手稿。毛泽东一首诗词写完后，他总是要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斟酌，诗词手稿放在床边，就是使他感觉方便，随时随手都能够拿到。

卧室床上的书全部算起来大概有几百册，三排一摞一摞地摆放着，有的足有一二尺高。看书的时候毛泽东又把它们有的摊开，有的堆放，表面看起来似乎显得非常凌乱，其实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书是怎么码放的，从哪拿这本，从哪拿那本，全都清清楚楚，井然有序。卫士在换床单时要特别仔细，对这些书籍一定要按着毛泽东码放的样子，一本不差地恢复原样。否则毛泽东就认为打乱了他看书的程序，引起他的不快。周福明刚参加卫士值班时就遇到过这么一次。他看见毛泽东的床单该换了，便换了条干净的，但疏忽了把书恢复到原来位置。毛泽东一上床就感觉到不对劲，对周福明发了火："谁让你动我的书，打乱我的秩序。多此一举！"周福明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就十分留意卧室床上码放的书籍，为了跟上毛泽东读书的需要，对紧挨毛泽东身旁的这一排书，他更是牢牢地印在脑子里。毛泽东不仅有与他形影不离的书，还有与他形影不离的字帖。毛泽东是中国当代一流书法家，他爱好书法，尤其擅长草书。他喜欢读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的重要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在草书中，毛泽东最喜欢怀素的草书，怀素体的《千字文》使他老人家爱不释手，天天都要翻一翻。这本怀素体的《千字文》还是田家英为他收集来的，起先它是折子式的，并且破旧得不成样子。是田家英用精工裱起来，变成现在书的样式。

周福明看着手捧怀素体《千字文》的毛泽东问："主席，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本书？"

毛泽东显出一种神秘的样子："你不知道哇，这是个和尚写的，这个和尚和我还是老乡呢，他写了一手的好字。"

古人常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的博学，毛泽东所读的书应用多少车来衡量，又怎样来衡量他的博学呢？毛泽东多次到杭州出差，工作之余，也常从当地借书读，有地方志、当地古人的诗文集。如宋朝林和靖、明朝林谦等的传记、诗文集等，毛泽东都借阅过。林和靖一生不做官，不婚娶，隐居西湖孤山，他爱梅和喜鹤，是一位被称作"梅妻鹤子"的诗人。毛泽东喜爱梅花，也是一位诗人，他曾用自己龙飞凤舞的草书，书写过林和靖《山园小梅》中的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是毛泽东对千古诗人感情上的沟通和艺术上的欣赏！

毛泽东有两个长方形的大木头箱子，约两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木质粗糙，外面刷了一层清漆，十分笨重，这是他外出时装书用的。每次离京外出，毛泽东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定要开列一份长长的要携带的书目，装箱带走。他在飞机上、火车上、轮船上总是手不释卷。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绝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是用在读书上。在繁重工作的间隙，他也争分夺秒，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即使因公外出、生病休养、出国访问等特殊情况，也概无例外。毛泽东外出休养时，在海边湖畔就着水声涛声读书。在山上林间，伴着鸟鸣风啸读书。登上火车、飞机就拿起书本。有次飞机已达目的地，着陆好长时间还不见他下来，原来他完全沉浸在书中，对外界已经全然无知无觉了，现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就连紧张的会议和接见外宾的间隙，他也要翻几页书，看几行字。

毛泽东读起书来那种不顾吃饭睡觉、不顾健康休息的"拼命三郎"作风，使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医务人员、服务人员都为不能保证他有足够的睡眠休息时间，担心他的健康而十分苦恼。毛泽东读书工作入了迷，每次吃饭，都要催了又催，饭菜热了凉，凉了再热的事是常有的。有时他还一面端着饭碗，一面看报，看小人书。毛泽东睡觉也是这样，再三动员他上床休息，关熄了电灯之后，工作人员刚出门不久，他又拉开了灯，捧起了书本，和工作人员们打起了"游击战"。有一年夏天，他在工作人员劝说下，来到院中老槐树下，坐在藤

椅上乘凉休息，手中捧着一本书看出了神，当医生过来问候他的健康时，他答非所问地说：“郭沫若是很能写书的！”弄得医生摸不着头脑。为保证他的健康，医生建议他注意休息，并劝他看电影、下棋、打扑克，等等，毛泽东一概没兴趣。医生搬出他在《矛盾论》中提出的“一张一弛”这一辩证法的大道理来说服。毛泽东笑了，说医生“那点辩证法不全面”。毛泽东自有毛泽东的道理，他认为“脑力换体力是休息”，“这种脑力换那种脑力也是休息。看文件累了看报纸，看正书累了看闲书，看大人书累了看小人书，看政治书累了看文艺书”，这都是休息。

毛泽东有一副单腿眼镜。他原来的视力极好，有谁看到他戴着眼镜写作读书的场面和照片？有谁看到他戴着眼镜看讲稿、作报告的现场和镜头？都没有。但是，毛泽东晚年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视力变差，读书吃力。虽然他爱读的一些书，不断印出大字本，也解决不了他这一严重问题。医生不得不禁止他读书。很多人都了解，他的生活信条是：“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呀。他倔强地不接受这种医嘱，医生们只得为他设计了一副独特的眼镜，当他左侧卧看书时，戴有右腿的眼镜；右侧卧看书时，戴有左腿的眼镜。当他视力极度下降时，就只能请人来读书给他听了。这个任务落到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身上。从1975年5月29日开始，到同年9月的四个月中，芦荻为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昭明文选》、诗词曲赋、散文、鲁迅文章及其他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故居的藏书有历朝的诗别裁大字本，这些书的天头上，经常出现红色毛笔所加的注音、典故的出处和解释等，字迹娟秀，肯定是出自女性的手笔，虽然未经核实，估计可能是芦荻读书前的准备工作。芦荻作为大学中文系的讲师是具备一定文学功底的，但为毛泽东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的伟大人物读书，没有充分的准备，恐怕也要心中发慌的吧。

尽管晚年体弱多病，视力极差，但毛泽东仍千方百计，争分夺秒，攻读不辍。为毛泽东治病的医学专家姜泗长说：“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旧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学习，常常持续十几个小时，有时竟达二十几个小时，就连吃饭或量血压时也要抓紧时间做些事。我每次给毛主席治疗，他老人家靠在沙发或躺在床上，总是手不释卷，他那全神贯注的神态，仿佛不是同病魔周旋，而是沉

思着怎样指挥一场重大的斗争……”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毛泽东逝世后，当年书房里映照他读书的灯光熄灭了，那张他常年伏案攻读的书桌空闲了，那些他经常用来圈点批注的笔墨干涸了。可是毛泽东勤奋读书的形象，却永驻在人民心中。正像杨振宁说的，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

“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泽东非常赞赏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他认为，凡读书必要写心得、做笔记，这是他学习的一个好办法。后来，他终生躬行实践，受益匪浅。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想看法国作家小仲马写的一部名著，让刘松林去设法帮他借。刘松林后来在一位同志那里借到了，毛泽东看完后又交给刘松林让她去还。刘松林接过书来，顺手翻了翻，这一下她可傻眼了，只见书中画满了杠杠、圈圈、点点，有的地方还作了眉批。刘松林觉得“好好的一本书，被画成这样，怎么还给人家呢?”后来她在还书时也不敢吭气，把书退给人家，说声“谢谢”，拔腿就走，唯恐人家不收。当时听到这件事的人都笑了，笑刘松林幼稚，同时也为毛泽东读书认真的态度所感动。

几十年来，毛泽东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要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许多批语。他看过的书都是圈点细密，杠画不断，字句连绵，圈旁有圈，杠外加杠，铅笔字上叠写毛笔字。有时，他还把书中精彩的章节和语句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心得体会。这些批注和笔记，有对原著观点的疑问、评判、引申，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提出的正确主张。他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时，写下了1000多字的批注。乾隆年间线装的二十四史，是一部850册的巨著，从头到尾都有他的勾画、圈点和批注。在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

等人的诗集中，都留下他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笔迹圈阅过的笔迹。毛泽东读书真可谓“钻进去”了。

毛泽东的床头桌上总是放着削得很细的铅笔，他画的符号有：△、？、○、—、×、√、[ ]、w、=、≡，这些符号的具体含义他在自己的一个小本上都有注解。这些符号往往反映他在读书中的某种意图和倾向，他对某个观念的怀疑与反对，深思与不解。毛泽东在书上画的问号尤其多，有的一页之上多达四五个，有的问号已被他用短斜线划去，这表示后来已理解或肯定了书上的说法。这些特殊的符号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看来，“不动笔墨不看书”，的确是毛泽东独具匠心的读书方法。

广收博览

广收博览，这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基本特点。1957年10月2日，在给秘书林克写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十分爱读马列的经典著作。但是，他也十分爱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

1958年9月，张治中同毛泽东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上，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方面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

毛泽东不仅爱看正规的理论书籍、学术著作，有时还很爱看些闲书，如有关楹联的书，笑话，古人写的随笔、小说。他甚至还去研究读宗教经典，如《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毛泽东主张广收博览，但博中要有重点。林克到毛泽东办公室任秘书后，开始主要是陪伴毛泽东读外文。林克的外文较好，相对工作需要来说，理

论方面就显得弱些。195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信说，要他“看点理论书”。信中说：“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这种“如倒啖蔗，渐入佳境”不失为一种实用的学习方式。

毛泽东本人读书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他最重视、最喜欢读马列、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所谓博览，总是有限度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说对外国文学，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名著外，毛泽东读得少。中国现代的文学作品、经济管理，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相对的说读得少了点。

仅举一例。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又要到外地去了。照例，他总要随身带一大批书。根据逄先知当时的登记本照录如下，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广收博览的特点：

10月23日

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示要以下一些：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选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二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

《毛泽东选集》全部。

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

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

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一些主要著作。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经》。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西洋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日本史。

《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朱熹:《楚辞集注》、《屈宋古音义》。

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絜》。

《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苏联一学者给毛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

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字帖和字画。

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从以上书目可以看出，毛泽东读书是博览群书，面相当广。仅仅一次外出带的书就几乎囊括了古今中外的一些经典名著。

《辞海》、《辞源》、《资治通鉴》和《中国历史地图集》

毛泽东爱读书，很重视工具书。在他的藏书室里，各种辞书类工具书相当齐全。使用最多的是《辞海》与《辞源》。也许是由于经常使用的缘故，他很关心这两种辞书的修订工作。《辞海》的重编与《辞源》的修订出版，都是在毛泽东提议下才着手进行的。

1957年，毛泽东见到《辞海》的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20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

此后不久，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便集中到上海，着手进行重编《辞海》的文化建设工程。专家们经过多年呕心沥血的工作，一部新的《辞海》于1965年出版了。

新编的《辞海》出版后，毛泽东要在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将它跟旧《辞海》逐条对照，看看新《辞海》有什么优点，与旧《辞海》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对新《辞海》仍不甚满意。他说，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有而没有。这是毛泽东作为一位使用者对新《辞海》的批评，从这个批评中也反映出毛泽东求知欲的强烈。新《辞海》的修订工作，几经曲折。遗憾的是，毛泽东

没等到它正式出版就辞别了人世。1979年，新《辞海》经重新修改后正式出版，成为文化界一件盛事。在重编《辞海》的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辞源》也进行了修订。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里，现在还保存着一部袖珍本的《辞源》，那是从延安带出来的。解放初期，他一直使用这部《辞海》。他在里面还作了圈画。由于这部袖珍本《辞源》字太小，后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买了一部大本的《辞源》，一直使用到晚年。

毛泽东爱读中国历史书，通过史书了解历代兴衰的内在规律，增加历史智慧。为了能随手查找历史地名的方位，读史书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因此，毛泽东同时提出两件文化建设工作的建议：重新标点《资治通鉴》与编历史地图。

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藉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但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把它整理出一个用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

接着，毛泽东又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都查不到。这种图只能对付着作中小学教学之用，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详细史书时的要求。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吴晗想，这正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杨守敬的图用木板雕刻，用古墨今朱套色印在连史纸上，把一朝版图分割成几十块，按自东而西、自北而南的次序排列装订成册，全书共34册，翻检起来极为不便。再者，杨守敬图的“今”是清同治初年。胡林翼刻的《大清一统舆图》，其中许多州县的名称、治所，与50年代的已不相同，势必会给读者带来许多麻烦。因此，吴晗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的图予以改造，今图改用1950年新中国的今制，绘制印刷

装订采用现代技术。

毛泽东对吴晗的建议表示赞许，就把这两件事都交给他负责办理。吴晗当即邀集科学院两个历史所的范文澜、尹达、侯外庐、刘大年，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出版总局的金灿然和高教部、地图出版社的负责人等，由范文澜和他两个领衔，组成了一个主办机构号称“标点‘通鉴’改编‘杨图’委员会”。标点《资治通鉴》的具体工作聘请顾颉刚等十来位在京的史学家分担。改绘“杨图”的工作，则是由吴晗推荐，委员会通过，请上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担任主编。

按照吴晗最初的设想，标点“通鉴”和改编“杨图”两件工作同时起步，预期差不多同时告竣。因此，向复旦大学借调谭其骧时只借了一年。实际工作开展后才发现，改编“杨图”比标点《资治通鉴》要复杂得多，费事得多。一年之后，标点工作已告完成，而改编工作的大政方针还未确定下来。事实上，后来的编绘工作已不是改编“杨图”，而是新编中国历史地图了。当时习惯上却仍把这项工作称为“杨图”工作，“杨图委员会”旧称也仍旧沿用着。

吴晗及参加“杨图”工作的诸位原先对这项工作想得简单了点。吴晗总觉得，1年完成不了，只能加码到2年3年，3年再完成不了，充其量也只能加码到4年5年，否则就无法向毛泽东交账。为此，有一时期吴晗甚至怕见毛泽东，生怕见面时他要问起此事。几经曲折和磨难，《中国历史地图集》于1982年正式出版，又经7年，到1988年3月，8册“图集”全部出齐，这项文化建设工程的设计、论证、编绘和制图工作，前后历35年之久。编出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分8册，20个图组，共有图300余幅。图集画出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权的疆域和各级政区、重要地名、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它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用现代绘图方法绘制的具有精确计量意义的历史地图集，也是第一部完整而系统地显示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的历史疆域发展演变过程的史书。它的编辑出版是和毛泽东的关怀与指导分不开的，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壮举。

实际上，毛泽东青年时代就经常得益于地图。1912年秋天，毛泽东来到长沙省立湖南图书馆，度过了半年自学生活。在图书馆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对此产生了极大

的兴趣：世界原来这么大！他每天经过这里，都要停步细看一阵。这个山村青年，原以为湘潭县就很大，湖南省大得了不得，中国更是大得称为天下。谁知从地图上看来，中国只是一小块，湘潭县连影子也找不到。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人生活其间，有多少事情值得去研究呀！正是这幅世界地图启示了毛泽东，他感到自己负有神圣的历史使命，“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可以说毛泽东极其重视历史、地理图册是有渊源的。好的辞书和地图册确实能为读书提供方便条件，有时甚至为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由读书实践证明了的。

读书与考证

唐朝诗人贺知章有一首《回乡偶书》，充满哲理与诙谐，脍炙人口。原诗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1958年初，在一次谈话中，刘少奇曾以此诗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听了以后，“总觉得不甚妥当”，就记在心中。回家以后，毛泽东便查阅了《全唐诗话》等书，从贺知章的生平分析诗中“儿童”的所指，身边有无家眷的可能性。他还特地找出《旧唐书列传》中的贺知章传进行查对，发现均无不带家属的记载。1958年2月10日上午，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讲了自己考证的经过和所得出的与刘少奇截然不同的判断。

毛泽东的这封信写得十分有趣味，充满了学究气，见解又自成一家。我们按毛泽东的原手搞照录如下，供大家赏阅。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86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

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90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眷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法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着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得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夏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随信，毛泽东还给刘少奇送去了那本载有贺知章传的《旧唐书》。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儿童"与贺的关系问题，历代注家之间有分歧。刘少奇把"儿童"断为贺的儿女，这在过去的唐诗选注本中是占主流的说法。毛泽东对这一点的解释方式，历史上并非无先例。但像毛泽东这样严密有力的论证（贺的年龄、贺之子的官职），倒不多见。

刘少奇顺手拈来，不失为一家之见。毛泽东寻根究底，大有学者风度。他的考证方式，设定的周全程度，推论的严密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在治学严谨、独立思考、运思能力三个方面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是两位政治领袖之间的一桩文化生活轶事，期间虽无文化人之间唱酬往来那种清雅高致，却也不乏斯文；虽无学者之间切磋琢磨的雄辩之风与君子之谦，倒颇具真诚的直率与虚怀若谷的雅量！

读书与借书

毛泽东个人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室。就个人藏书来说，已经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他的读书需要。他还经常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向一些图书馆借书，其中到北图借的比较多些。

北京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图书馆。藏书量最多，品种最齐全，国内的孤本、善本、珍本也最多。北图不仅在中国首屈一指，在亚洲也是藏书量数一数二的大图书馆，还名列世界十大图书馆之一。

北图旧馆与中南海大院北门隔街相望的优越地理位置，对于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地利”，更确切地说，是对负责为毛泽东管理、提供图书的工作人员的一种方便。

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经常去为毛泽东借书，引起了北图同志的注意。1958年，北图换发新的借书证，毛泽东身边的同志特地去给他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1号。此后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使用的始终是北图的1号借书证。

借书对爱读书的人来说是常事。对于很多图书馆来说，毛泽东虽未办过借书证，却曾去借过书。不仅北京的一些图书馆，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的图书馆，都留有毛泽东在那里借书的记载。据逄先知介绍，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要做两个方面的调查。一是向本地做调查，询问现实情况，包括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状况；一是向书去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1958年3月8日，毛泽东曾借阅楹联书10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还有孙髯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180字的对联。毛泽东对这副长联甚为赞赏，能背诵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联丛话》中认为此联“究未予冗长之讥也”，毛

泽东颇不以为然。他在对此书的批语中写道："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

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例如，他借阅过宋朝林逋（和靖）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林和靖，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只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诗人。于谦，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计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2000多首，从中选出200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

读书与专列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读书学习是很刻苦的，他利用一切时间创造条件去读书，刻苦程度绝不亚于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新中国成立后，读书条件有了改善，他更是与书形影不离，寻找一切机会阅书读报。其中在专列上读书学习就是一大特点。

毛泽东的专列由前驱车、主车和后卫车组成，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是警卫一中队。主车挂有两节软包车厢，七八节普通软卧车厢。前有行李车，后有乘务人员休息的硬卧车厢（大约1959年前后也换成软卧车厢）。毛泽东起居的软包内有客厅和卧室。外出视察，他常有住在专列上的习惯，不愿进城麻烦地方政府。

1958年，毛泽东走出中南海，走上专列开始到外地视察。

毛泽东乘车出门，在火车上的学习一般是这样的：

走进客厅，卫士已经递过来湿毛巾，请他擦把脸。毛泽东洗手用水，洗脸有时不用水，只用湿毛巾擦一把。

客厅和卧室在一小时前已经安排妥当。这种安排就是"一切照家里的格

式”。内容主要是指书。毛泽东有两个约两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的白木板书箱，现代人看了也许认为只配做包装箱，但那是毛泽东外出不能离开的书箱，比人先上车两小时，里面装满毛泽东需要用的书刊和文件。装箱时都打了标记，原来放在桌子上的，上车后还要放在桌子上。原来丢在床上的，现在还要丢在床上。原来扔在椅子或沙发上的，现在仍然要扔在椅子或沙发上。外人看去是乱，毛泽东自有规律，心里不乱，找什么书或材料心里有数。如果不知情的人替他摆弄整齐，归置到一起去了，那就糟了，毛泽东反而要费力去查找。这是许多文人的共性，毛泽东也不例外。

擦过脸，毛泽东在沙发上坐下，随手抓起搭在沙发扶手上的一本展开的书。这本书是他出发前正看的一本书，随手朝沙发扶手上一扣便出去谈事情。

这天读的是《三国志》。毛泽东抓起书倒翻两页，这是因为他在家刚看过《张鲁传》，现在要重看一遍。

三国时期的张鲁，曾在陕西汉中地区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在社会制度上实行某种程度的公有公享，各基层组织设置“义舍”，“义舍”置有“义米义肉”，“行路者量腹取足”，颇有些世界大同的味道。毛泽东对张鲁的这个农民政权是非常赞赏的。

毛泽东半躺半坐在沙发里读书，工作人员便都悄悄退出。这种时候是不能打搅他老人家的。就连值班卫士也不敢频繁去换茶水。毛泽东久久没有翻书页，他的目光大概朦胧了。据说人老了喜欢回忆往事。毛泽东这年已是近65岁，读《张鲁传》他会回想起什么?

1918年6月，身材瘦长却抱负齐天的毛泽东，约了他的几位同窗好友，踏遍长沙岳麓山的田野乡村，希望寻找一块土地，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爱的新村。由于种种原因“事无成议”，但他的理想始终像火一样燃烧，任何风雨无法使它湮灭。1919年春，他又重新拟就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上，以实现“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他描绘着他的理想：“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

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这个理想突出的就是一个“公”字。

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迫使毛泽东放弃了这种一步登天的空想，怀了满腔热血踊跃投身到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中。苦斗28年，终于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他多次回忆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毛泽东眨眼间，重新看清了《张鲁传》。

他曾号召人们读《张鲁传》，现在他心潮澎湃，读不下去了。奋然起身，将书带声带响地掼于办公桌上，大步走到车窗前，凝望近处的飞掠而过的树木村镇，远处的向后缓缓旋转一般移动的绿野沃田和辛勤劳作的农民……

这是毛泽东在列车上读书的一幕，学、思、做，成为他探索新型社会的一种尝试。

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

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介绍，谭其骧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他参加了为毛泽东晚年注释“大字本”的工作。据他透露，注释“大字本”的工作过程是：

为毛泽东作注释的任务是由姚文元下达的，每次都由姚打电话给他，通知具体篇目，然后他再组织注释，完成后送姚文元审定，再由姚送毛泽东。注释的题解一般都经过姚文元修改。毛泽东阅后，基本上都批给全体政治局委员阅读，有的还专门批给某人（如江青）看。朱永嘉也曾将一些注释本送给当时主持上海市委日常工作的马天水作参考。

这些文件都在上海澳门路中华印刷厂排印，正文用4号老宋，注文用小4号老宋，全部繁体，版本长30厘米，宽20厘米，用60克米色道林纸、线装；以

后每次又加印了两册宣纸本。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称之为“大字本”。注释的具体组织工作交王守稼负责。至于毛泽东选择这些文章的目的，看了注释后的反应，有的当时向注释人员作过传达，多数并没有具体说明，谭其骧等只是奉命注释而已。

1973年1月2日上午11时，朱永嘉来到复旦大学200号楼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向谭其骧等人布置了注释任务。要求谭其骧为全部注释把关。谭其骧分到的是《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从3日起，注释成为谭其骧的主要工作，花了整整五天时间完成。

13日，朱永嘉将谭其骧找到复旦大学党委会，又就注释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要求谈了半个多小时。总之是要他负责为青年教师和其他人作的注释初稿把关，尽全力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当时需要注释的文章主要是历史类的，但以后增加了一些诗词赋，对这些文学作品的注释，朱永嘉和写作组没有交给谭其骧“把关”，只在修改《江梅引》的注释时听取了他的意见。当晚谭其骧开始看邹逸麟、王文楚(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所作的《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的注释。

14日是星期天，他晚上修改至凌晨1时，15日晚上又改至近凌晨1时，于16日下午3点改毕。当晚又开始改《晋书·桓伊传》，由于白天都要开会，因此每天工作至深夜，至21日（星期天）上午改毕。此时，《吕蒙传》和《明史·朱升传》的校样已经送到，经他改正后在中午12时1刻送走。

《吕蒙传》注引《江表传》中一段关于吕蒙在孙权激励下发愤学习的故事，为毛泽东一次重要讲话所引用，也成为当时全国军民学习的重要内容。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使毛泽东受到启发，他向世界发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无疑受到《朱升传》的影响。

谭其骧在22日下午校《夏侯渊传》校样，晚上开始审校《晋书·谢玄传》的注释，到25日上午还没有全部改完，但市委写作组已来催索，只能将稿子先送印刷厂排印，到时在校样上再改。26日下午3点，他到研究室看《桓伊传》的清样。晚上在《谢安传》注释的排样上校改到凌晨1点。第二天上午接着改

到下午3点，在16页中改完了8页，交走。28日一早，送来了《谢安传》注释，要他全部看完，他看到凌晨1点，第二天看到半夜12点15分，30日上午将注释改完。31日下午起改《晋书·刘牢之传》，直到晚上2时。2月1日上午9时将最后改定的《谢玄传》送到学校，正好接到王守稼来电，下午4时一定要将《刘牢之传》送去，可不必细看。不久又得到通知，4时是将稿子送到的时间，谭其骧午饭后顾不得休息，将《刘牢之传》的注释大致看完，2时半交邹逸麟和王文楚送走。

3月5日上午，朱永嘉又交给历史地理研究室三篇注释任务。为此，研究室在晚上开会作了研究，并传达了朱永嘉带来的讯息：毛泽东在看上次注释稿时，发现了一个错字，“濉溪”的溪错成了“漢”。不过经查对原稿，此字是中华厂排错的，但负责校对的人没有校出。大家听后既惊又喜，惊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稍有不慎就会出大问题，要是在关键地方出错如何得了？喜的是这些注释果然是毛泽东亲自阅读的，并且看得那么仔细。

会后回家，谭其骧就查阅郭沫若对《天文》的注释，作审改注释的准备，以后几天又夜以继日。至12日凌晨12点3刻将《天问》、《天对》的注释稿改定。12日起改《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注释，至16日结束。当天开始看《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注释，至25日凌晨1时20分完成。当天下午，谭其骧在医务室量出的血压是100—160。

医生要他病休一周。但他没有时间休息，27日起注释《旧唐书·李愬传》，至4月5日完成。6日又花了一整天时间对这三篇稿子作了校对。

6月24日虽然是星期天，谭其骧却与平时一样去研究室工作，因为新的注释任务又下达——注《史记·汲郑列传》。他参加至30日，此后转入其他工作。

7月27日上午10时，朱永嘉来研究室，布置注释《旧五代史·李袭吉传》。29日，中文系教师胡裕树交来了《李袭吉传》注释初稿，谭其骧立即投入工作，直到第二天凌晨12点20分。30日从早上至3日凌晨1点15分，31日下午4点完成，送至陈守实（历史系教授）处，估计陈守实又作了加工。8月4日清早，胡绳武（历史系教师）通知8点去中华印刷厂校对《李袭吉传》，谭其骧、陈守

实、胡裕树乘学校的吉普车先到康平路141号市委写作组，再由写作组派车送至印刷厂，王守稼陪同校对，至下午3点校毕回校。

8月5日又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朱永嘉找到历史系，要谭其骧立即着手注释柳宗元《封建论》。为了抓紧时间，谭其骧、胡裕树与中文系的顾易生等集中在复旦大学4号楼注释，连续两天日夜突击，至7日下午4点完成。9日上午8点半，谭其骧、胡裕树，顾易生乘吉普往中华印刷厂。由董进泉及历史研究所某人陪同，校对《封建论》注释，至下午2点半校毕。

8月11日下午，章太炎《秦政记》的注释稿送到，谭其骧改至次日凌晨2点。第二天整天在赶，至后半夜2点半结束，13日早上姜义华（历史系教师）来家取走稿子。谭其骧累极，上午补睡觉，但到下午3时又开始校改《秦献记》，也是到次日凌晨2点。休息了几个小时，谭其骧又起来工作，上午10点将一部分已完成的稿子送到学校。回家后再干，到下午1点多实在支撑不住，才上床睡了一会儿。5点多周维衍(历史系教师）、邹逸麟来拿走一部分稿子。6点完稿，晚饭后又修改，7点20分由周维衍取走。第二天（15日）上午9点去中华印刷厂校对《秦政记》、《秦献记》两篇。

当时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正来上海作“评法批儒”报告，由于杨荣国的特殊地位，上海市革委会十分重视对他的接待。当问杨荣国想会见什么人时，杨提出要见谭其骧，朱永嘉立即作了安排，预约的时间就是这天下午。所以朱永嘉讲完话后，就与谭其骧去和平饭店与杨荣国会面。5点谭其骧又回到工厂，校到7时半才结束。这是注释中最紧张的一次。

8月18日下午，王夫之《读通鉴论》节选的注释稿送来让谭其骧校改，当晚他改《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一文至19日凌晨1点，19日工作至20日凌晨2点半，第三天上午10点交出一部分。下午从2点赶到晚上8点半，由邹逸麟、周维衍分三批拿走。

8月30日校改的是韩愈《石鼓歌》注释。31日校阅的是杨宽（历史系教授）所作《石鼓文》注释。

11月中旬起，谭其骧陆续参加了在香港路和市总工会举行的“法家著作”注释审稿。如19日、22日讨论李斯《谏逐客书》、《解蔽》，28日上午审《商

君书·强国》，12月3日在家审《韩非子·五蠹》，4日改《荀子·王制》，5日至8日改《王霸》和王夫子《论治河》，这些注释稿显然并不是“大字本”的范围，但同样属政治任务，他自然也不敢怠慢。

11月23日上午，谭其骧又应召赴康平路，与陈旭麓等商议注释《后汉书·李固传》和《黄琼传》。中午由陈旭麓招待在食堂吃饭，至下午4时结束。24日早上历史系教师许道勋就将注释稿送来了，谭其骧在上午看完两张，下午、晚上继续看，但不断有人来催促，至25日凌晨2点看完30多张。25日早上起身后，他又看了两张。因为工作时间过长，眼睛发痛，就去研究室处理一些杂务，下午3点起继续审改，7点写作组工宣队员王某取走一批，谭其骧继续工作到次日凌晨3点。26日上午完成5张，下午完成五六张，傍晚取走一批；晚上完成8张，至12点半结束。28日下午，谭其骧去康平路看《黄琼传》、《李固传》的校样，接着又与邹逸麟、王文楚、王守稼、董进泉一起去中华印刷厂校对。到晚上6时半，工作大体完成，他与王文楚先回家。邹逸麟的家离厂很近，便与王守稼一直等到正式付印。

这次的注释要得如此紧急，是因为毛泽东要将这两篇文章批给江青看，文章中“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等话都被毛泽东引用。不久毛泽东的批示层层下传，这几句话也成为广大干部必须弄懂的内容。

12月10日，写作组送来了《谢安传》等注释，晚上让谭其骧初步翻阅了一下。11日上午，他去康平路，王守稼告诉他《谢安传》四篇的注释要重新整理修改，以便出版，下午谭其骧就开始校改，夜里搞至2点。第二天又干了一天，到凌晨2点半改定《谢安传》。但他发现其他人作的《谢玄传》、《桓伊传》和《浏牢之传》注释仅仅是转录一下，与要求相差甚远。上床后，他又翻阅了所附的《淝水之战》一文，觉得错误很多。13日上午，他打电话告诉王守稼，王要他修改。晚上谭其骧开始修改此文，发现无从入手，他只好将意见一一写出，忙到12点半。14日上午李霞芬来将意见拿走，谭其骧请王守稼决定要不要改。15日傍晚，谭其骧去朱永嘉处，朱仍然要他修改《淝水之战》，并要他另写一篇。17日上午，周维衍来谭其骧家告诉他王守稼打来电话，提了写作组方

面的三点意见修改《淝水之战》。写一封信指出其中的错误，另外写一篇。18日白天和晚上，谭其骧都在改文章，至半夜1点才改毕，第二天又花一天时间抄清。

12月27日起，谭其骧参加上海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团的学习，但29日回家时见有周维衍留下的李斯《谏逐客书》，要他修改，当晚他改到12点，第二天一早继续，至10点结束。1975年1月3日至4日上午，谭其骧在离家出席四届人大前修改了晁错《论贵粟疏》的注释。

1975年5月5日，谭其骧一到研究室就接到王守稼的通知，要让他赶快去写作组。到后才知道是因为北京大学写作组对《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词）的注释提出了意见，姚文元交上海征求意见，由王运熙与顾易生负责。要他发表意见。由于有了不同意见，这次修改特别谨慎。7月8日，王运熙又就《江梅引》的注释征求谭其骧的意见，并请他校改了注释全文。

8月中旬，又有《晋书》中的几篇传记要求作注释，其中一部分是以前曾经注过，要求修改后重新排印的。谭其骧负责的是《刘牢之传》和《王弥传》，前者是修改。自8月11日改至12日。后者是新注，自13日晚至17日半夜1时完成。22日下午，谭其骧去写作组听取关于注释工作的批示，并被要求继续注释《苏峻传》和《孙恩传》。

由于又有了批判《水浒传》的运动，他不得不先看了余嘉锡等的《宋江考》，并参加了25日下午新华社来校召开的座谈会，到26日晚上才开始《苏峻传》的注释。27日、28日搞了两天，《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的青藏幅又等着他定稿。9月1日他接到国家文物局通知，3日去河北承德参加北方文物考古座谈会。他赶忙抄清了元朝宣政院地图的校改记录，准备在承德用的讲话稿，2日上午去研究室，校完了《刘牢之传》的清样，下午又与地图出版社谈了地图稿中的问题，晚上整理行李时，却没有找到原来用过的讲话稿和边疆各区的讲义稿。3日一早他赶到研究室，还是找不到讲稿，只能匆匆登车去机场，到北京后他才发现离家时连皮带也没有系上。

9月27日谭其骧返回上海。修改清朝地图新疆幅、改正唐时期地图东北幅、研究黄河源资料等事又迫在眉睫。10月8日下午王守稼来找他，提醒他还

有注释未了。13日王守稼和董进泉又来催他搞注释，他只能腾出手来，从14日开始注释《苏峻传》。当天接到通知，15日上午去康平路写作组看批示。19日半夜注完《苏峻传》，但第二天用吴士鉴的《晋书注》复查，又改了一天，到21日上午交出，11月12日，《苏峻传》的清样送来，由他改定。

但剩下的《孙恩传》，谭其骧只在12月2日、3日作了注释，以后再无下文，王守稼也没有再催。王守稼已于1988年12月病逝。据其他人回忆。1975年后不再有注释任务，看来毛泽东已没有看大字本的需要了。

从谭其骧紧张而又辛勤的注释工作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出，在那段特殊的时期，毛泽东在耄耋之年是如何批阅古典名籍的。

晚年的书房

1973年8月2日下午，美籍华人医生李振翩夫妇走进了中南海“游泳池”。这里是毛泽东最后10年生活工作的地方。

宽敞的书房兼会客厅，满壁一人多高的书橱，整整齐齐地平放着一叠叠线装书，豆腐块大的白色书签纸随书夹着，层层叠叠，十分显眼。客厅中央六七座单人沙发，围成半圆形，间有茶几。一张小圆桌，安放在屋中央。茶几和圆桌上也散放着翻开的线装书，堆了几堆，有的尺把高。

两位老人久久地握着手，心情异常激动。一落座，毛泽东架起左腿，穿着黑布圆口鞋的脚背已明显肿胀。他转向右边，举起左手，伸出四个手指，对李振翩说：“有40多年了吧？”

“有50多年喽”，李振翩用一口湘乡人的家乡口音说。阔别了半个世纪的两位友人，要说沧桑之变，那该说上几天几夜了。

毛泽东想起1946年曾经接到李振翩的一封信，是由周恩来转交的。毛泽东说：“我接到了你的信。但你没有通讯地址，我没法回信。另外，你的信是用国民党的信笺写的。”等毛泽东说完，李振翩就向毛泽东介绍：“主席，这是

我的夫人汤汉志，她也是学医的……”李振翩接着风趣地说：“主席，我们分离了几十年，请你看看我究竟娶了个什么样的夫人！”

“噢，你们夫妇都是医学家，志同道合，真是天生的一对呀！”毛泽东幽默地笑道，接着伸出大手和汤汉志亲切地握着手。

汤汉志问道：“主席，您没有上过正规的军事院校，怎么成为这样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呢？”

毛泽东笑着说：“外面传说我主要依靠两部中国古书：一部是《三国演义》；另一部是《孙子兵法》。但在那战争年代，我那么忙，哪有时间读书呢！”

毛泽东说着又将话题岔到忆述往事上。他幽默地说：“振翩，我们是湖南老乡，你家和我家相隔只有30华里。你说话的声音像水牛叫一样，我给你起个外号‘水牛’。我们湘潭人素有狡猾的名声，你便叫我外号‘水老倌’，说我是个机灵鬼……”毛泽东的趣话逗得他们夫妇笑了。

“主席，您比我大五岁，您的活动能力很强，您像一块磁石把我们都吸引到您的身边了。”李振翩说：“我们同学都认为您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具有一个伟大的融合者的协调能力，而这种品格正是我们所缺乏的。第一次见面时，您那种身穿长衫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和李振翩接着谈到湖南学生驱逐张敬尧运动的事，1920年在到北京请愿开展反张敬尧运动的那些动荡的日子里，李振翩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和毛泽东战斗在一起，而且李振翩出头露面较多，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

谈到这里，毛泽东说：“振翩，你那时最勇敢，带领驱张请愿团到北京，大步迈进总统府大楼，递交驱张请愿书。当时的总统是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实权却操纵在皖系军阀首领、总理段祺瑞手里。段祺瑞和张敬尧同属皖系，是一丘之貉，显然段祺瑞不会屈从请愿学生的压力，把张敬尧搞下台喽！他们对学生运动疯狂进行镇压，在通缉13名主要闹事者时，把你的名字列为名单之首，悬赏要你的脑袋，却把我毛润之的名字漏掉了，使我乘机逃脱了虎口。”

他们一起沉浸在缅怀往事的谈话之中。谈到友情，谈到家庭，谈到祖国未来的希望。

他们会晤畅谈了三个小时，李振翩觉得应该告辞了。毛泽东劝阻说："天还不晚，不必着急，我们还有许多心里话要说嘛!"李振翩夫妇三次想走，都被毛泽东拦了回来。他们追忆在湖南乡村的简朴生活，谈到在长沙吃过的几种蔬菜。李振翩问毛泽东现在喜欢吃什么菜，毛泽东说："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冬苋菜和空心菜。"李振翩说："我也很喜欢吃这两种家乡菜，可惜在我住的地方买不到啊!"他们谈着笑着，忆述往事，情感交融，亲如兄弟，不觉已是深夜11点。

李振翩发现毛泽东手旁茶几上，沙发前圆桌上，到处都是翻开着的书，便关切地对他说："要尽量减少读书量了……"

"我已经不怎么看书了，眼睛不好使了，但字帖还可以看。"毛泽东说着随即让张玉凤在圆桌上拿来一本字帖，吃力地举到眼前，看了一会儿，嘴唇动了几下，没有念出声来。

"戴上眼镜看吧!"李振翩说。

"不!"毛泽东毅然说道。

终于，他看清了。这是明代书法家董其昌意临怀素的草书。他把字帖递给李振翩，让他也看看，以证实自己的视力。

李振翩接过字帖，一看果然是草书，对毛泽东说："我可不识'草'噢!"

两位老人相视哈哈一笑。使李振翩感到毛泽东仍像当年一样，充满了旺盛的斗志和自信力。

在这个客厅兼他的书房里，毛泽东会见过许多中外宾客。1972年9月，他在这里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套《楚辞》。1974年1月，他把一册《怀素自叙帖》送给了日本外相大平正芳。

若细看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宾客的照片，可以发现，这里桌上的字帖经常被摄入镜头。

1973年9月，毛泽东和法国总统蓬皮杜之间的茶几上，一堆书上面就摆着翻开的字帖。

1974年2月，他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照片上，一本字帖翻开在茶几上。

1974年5月，接见物理学家李政道的照片上，茶几上的字帖更清晰地被摄入了镜头。

字帖伴随在晚年毛泽东的身边，这一点连不懂书法的布什也注意到了。1975年10月1日下午，当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陪同基辛格来到“游泳池”。事后，布什在回忆文章中说：“……我们对面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法册子。”

1975年5月29日晚，芦荻为毛泽东读书第一次走进客厅，就看到桌子上摊开放着一本宋朝书法家黄庭坚的字帖。毛泽东逝世后，有人看到桌子上还放着一本宋高宗赵构的《草书洛神赋》。这也许是他看的最后一本字帖。

那么，毛泽东在“游泳池”的书房里，有没有留下书法真迹呢？从各种资料的记载看，应该说有，而且并不少。

据悉，1971年林彪叛逃前，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后，毛泽东沉思良久，然后在一柄白丝绸折扇上题写了“各求各志，各行各路；离凡离圣，离因离果”四句话。那可能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题扇书迹。

1972年9月，毛泽东书写了“老头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12字，送给美国总统尼克松，以作为他访华的纪念。

1975年，董必武逝世，毛泽东极为感伤悲痛，数日不思饮食，接连书写了几首辛弃疾、陆游、张元干的词，以排解心中的悲伤，寄托对战友的思念。

1975年，唐由之医生替毛泽东治疗眼疾，由“由之”之名，引起毛泽东随口吟诵了鲁迅的《悼杨铨》诗。因诗中“花开花落两由之”句，与唐由之的姓名相关。所以，他又应唐由之的要求，在一张白纸上亲笔书赠了这首诗。

同年6月7日，会见外宾时，他在谈话中引用了一段古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应客人的要求，他把这几句话写了下来。

仅芦荻替毛泽东读书期间，就得到了20多页手迹，有诗词、书名、篇名等。

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给刘大杰一封亲笔信，就韩愈的评价和李商隐无题诗的解释，作了回复。

这些书迹，如果汇集起来，已相当可观，很能证实毛泽东晚年是否在书法风格上有进一步演变的可能性。因为毛泽东还在继续博览群帖，未曾忘怀书法。他晚年独特的心境和神思，有可能像他以往一样寄情于瀚墨。在这间极普通的书房里，展示他那瀚墨飘香的书法艺术。

李振翩夫妇，在这间充满浩瀚墨香的书房里，感到这是一座极不寻常的知识殿堂，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临别时，毛泽东关心地问他们需要什么，李振翩婉言回谢地说："主席，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这次荣受主席接见，叙旧谈心，余愿足矣。主席给我们的最好礼物，莫过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啊!"

李振翩夫妇回到宾馆后，正当他们准备上床睡觉时，门外有人敲门。毛泽东派来的两位代表站在门口，提着满满一篮子湖南蔬菜，告诉说："毛主席给你们送来的告别礼物。"他甚至还让人关照饭店厨师，说明这些湖南蔬菜的做法。

1974年，李振翩成为"美中医学科学中心"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会长，他高兴地说："我完成了毛主席的委托，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搭起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桥梁！"李振翩晚年为中美学术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的藏书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马为于1999年8月得知张玉凤正在主编《毛泽东藏书》，于是便专程去采访。

对于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张玉凤的名字并不陌生。她的形象因时常出现在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纪录影片和照片中而为人们所熟悉。她的

名字也因其担任过毛泽东最后一任秘书而广为人知。然而，她今天作为毛泽东藏书研究专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却鲜为人知。

话题自然从这篇鸿篇巨制开始。

张玉凤从1962年到1976年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任宣传干事、主席秘书、调研员等职。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受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负责整理毛泽东藏书，布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等工作。故居的布置工作时断时续，最初是在毛泽东刚逝世后的两年内，预备1978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展出，但此时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工作暂停。一直到1980年，又开始重新组织一批人布置，张玉凤自然责无旁贷。这次布置的便是后来供人们参观的丰泽园故居。而毛泽东藏书的整理工作，自始至终地持续着。

毛泽东一生，书读万卷，藏书卷帙浩繁。那么，毛泽东究竟有多少藏书呢？据张玉凤说，毛泽东藏书目前全部放在中南海故居的菊香书屋中，也就是他晚年经常用来会见外宾的地方。凡一万余种、十万余册，这是一个中小型图书馆的规模。她介绍说，主席藏书来源有多种渠道，有的是自己买的，相当一部分是别人赠送的，也有一部分是战争年代随着他转战南北，一直保存下来的。她说："当年打土豪时，吃的穿的都分给穷苦乡亲或手下将领了，而好的书爱不释手，主席就自己留了下来。"而毛泽东藏书的种类也繁多，古今中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不一而足，甚至连当年比较盛行的小人书（连环画），也在他的收藏之列。这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为中国文史类图书，占了总数的30%—40%，马列主义著作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相对而言，外国文化内容数量少一些。

说起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张玉凤仿佛历历在目、如数家珍。毛泽东有两句名言："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张玉凤以"嗜书如命，书以伴行，书以伴眠，甚至书以伴厕，直至生命最后一息"来形容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

她说，主席对工作人员讲，"他们封了我许多头衔，这个'家'、那个'家'的，我只承认两个。一个是'导师'，因为我年轻时是个教书的，再一个是'书

生’，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毛泽东每次外出前都要开书目，专列上要带书，十几箱，有时二十几箱还不够，还要向当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去借。

张玉凤是这样形容晚年毛泽东读书的状态：“越到晚年，他越是痴迷读书。”这时马为插话：“这一时期正处于中国政坛大起大落，极度动荡时期，他能够静得下心来读书吗？”张玉凤说：“他一生，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经历过！越是在这种时候，他越是用读书来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安宁。”

张玉凤描述：“他就常常往沙发上那么一靠，一只手举着一本平装书，另一只手举着一只硕大的放大镜，读得非常入神。我们有时便同他开玩笑：‘主席呀！您很像举重运动员啊！’后来我们看他这样实在太吃力，就把书撕成一页一页的，读完一页再换一页……”

张玉凤从她陪伴毛泽东的经历中，体会到读书已经成为毛泽东生命活动的有机构成，而毛泽东的藏书，不仅体现出伟人选择书籍的慧眼独具，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他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因此便产生了编辑一套《毛泽东藏书》，将毛泽东所读的书有次序、有重点地介绍给大家的想法。

此前，有关部门曾编辑出版了一套毛泽东圈阅评点的《二十四史》，江泽民访美时曾将这样一套书赠给了哈佛大学。此事更增强了张玉凤编辑《毛泽东藏书》的紧迫感。恰恰在这个时候，曾负责主席生前图书管理档案的管理工作，后供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王德春也向张玉凤提出这一想法，两人不谋而合。就这样，一个由张玉凤担任主编，王德春任副主编的《毛泽东藏书》编委会成立了。他们将毛泽东藏书分成三大部分：一是中国古代文史；二是近代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书籍；三是马列主义著作。由于中国文史类书籍在毛泽东藏书中占比例最大，且对毛泽东影响最为深远，所以他们将这部分内容率先整理。于是，由张玉凤、王德春提供书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单位数百名专家、学者担纲，从设在毛泽东故居的菊香书屋1万余种10万余册浩瀚藏书中精选100余种毛泽东最爱读的传世藏书，汇集了5000万字，形成了这套《毛泽东

藏书》。

翻开《毛泽东藏书》，书目以中国最早的一部典籍《尚书》始，以《鲁迅全集》终，中间包罗了从先秦诸子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至近代作品，既有纯粹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如《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也有供历代统治者研究借鉴统治经验的《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既有一个时期一类作品的总集如《唐诗三百首》、《明人百家小说》等，也有优秀作家的别集如《三曹集》、《韩昌黎集》、《李清照集》等，还有单本著作如《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既有学理宏深的文学理论著作如《文心雕龙》等，也有通俗读物甚至武侠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国历史演义全书》、《儿女英雄传》，堪称真正的历史典籍、百科全书，极具收藏价值。

张玉凤介绍说，所选书目都是毛泽东毕生喜爱，反复研读的，其中不少书主席都对其有过精彩的评语，择其要者抄录几句如下：

毛泽东说：

《诗经》大部分是老百姓的民歌。

《论语》有一部分真理。

《老子》中有辩证法。

《墨子》——中国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录。

《六祖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

《史记》严格、准确。

《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

《楚辞》有民主色彩。

《昭明文选》好文宜读。

《聊斋志异》借鬼狐说教。

《三国演义》我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

《水浒传》要当政治书看。

《西游记》有永久的魅力。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

通过记者采访张玉凤编辑《毛泽东藏书》的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最宝贵的财产就是这些数以万计的藏书。值得一说的是：张玉凤长年工作在毛泽

东身旁，曾在毛泽东的教导下习过书法，深得其韵。赋闲后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练字，已颇有成就，专家们评价她的字很有“毛体字”风采，张玉凤说“不敢当”。不过她确曾随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一起去深圳，她的身份是顾问。马为等记者此次采访，还临了张玉凤签名的毛体“张玉凤”三字真迹。这次采访，记者们了解到了出版《毛泽东藏书》的全过程。从中也了解到了毛泽东藏书的全貌。

五、批注新意篇

批注《伦理学原理》／“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评点《西游记》／批注《智囊》／谈宗教问题／评价康熙／为胡乔木修改诗作／点评司马迁／支持姚雪垠创作《李自成》／解读《红楼梦》／关注《柳文指要》／批注古代战例／激赏《姚崇传》／诗情与林彪／阅报提倡独立思考

批注《伦理学原理》

毛泽东读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看、思、写相结合。他牢记古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的名言，把学与思紧密结合。他学习老师徐特立“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方法，喜在读过的书上批注，或打上各种各样的记号，并坚持写心得、日记。他批阅过的书籍和读书笔记、日记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放在湘潭韶山家中。可惜在马日事变之后，族人为避免落入反动派之手，将其焚毁。幸存的他批阅过的《伦理学原理》，足以说明他的这一读书特点。

现将其批注的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学，皆起于实践”。

“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下更畅发之。”

“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

“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学者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其有无价值抑其次也。”

“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言泯差别，不知其于道德界善恶问题如何处之？”

“道德之本质，本一人因其适用之方面，而有公私、大小乃至善恶之分。不仅道德为然，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

“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

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

“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

“凡自然界无无故而成者，无无故而毁者。人类无无故而生者，无无故而死者，其死既有故，则其故即所以解释之点也。”

“固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

“先有某事实之观念，后乃发生向之之欲望。”

“欲求某种效果，必行含有某种效果之行为，故杀身成仁之事，正鹄论之伦理学亦尊贵之也。”

“吾重在当时为善为恶之事实而已，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善而历史流传其善名，为恶而历史流传其恶名，皆不应顾。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

“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吾人亦有成就其必然之愿望。”

“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

“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若除去吾人，即顿失其完全。吾人之于自然也，若个人之于国民，然个人受国

民种种之影响，而即为国民之一部分，国民除个人亦失其势力矣。”

上述批语和其他批语手稿，经历磨难终于和世人见面了。但令人遗憾的是，与此相关的《心之力》一文仍未看到。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在杨昌济的影响和帮助下，读了《伦理学原理》。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100分。”

我们今天看到的毛泽东批阅过的《伦理学原理》原件，曾一度被同学杨韶华借去，直到1950年9月15日，他趁周世钊上京之机，托其还于毛泽东，并在书后附记：“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藉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

周世钊转交后，毛泽东说：“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这是毛泽东批注《伦理学原理》的心得体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心路历程。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盛世修志”，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国的传世志书约8700余种，11万余卷，占古籍的10%左右。方志可谓是“一方之总览”，一方之“百科全书”。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因而，志书常为历代所重视，遂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

毛泽东认为地方志详细记载了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的情况，是极其重要的书籍。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了情势，就能打胜仗。因此，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和平年代，他都非常重视地方志书的搜集，阅读。每到一处，毛泽东都把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及风土人情等作为任务来完成。

毛泽东年轻时就熟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泛览了不少地方志书。1929年红军打下兴国县城，毛泽东在县图书馆一住下，就开始专心致志地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毛泽东拿到了清代续修的一部八卷集的《瑞金县志》，虽然残缺一卷，但他却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在长征途中，环境恶劣，饥困劳苦，战斗频繁，毛泽东也不放弃阅读地方志。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机要秘书黄友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一次部队打了大胜仗，夜间宿营时，毛泽东进来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了过去，毛泽东说不是这个，这下秘书不解了。毛泽东看着他笑了，“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秘书这才明白，毛泽东指的战利品是地方志书。在延安时，他常考核警卫人员，当得悉有人是河南沁阳人时，他说：“你们那里有一条沁水吧。”警卫人员不得不为他的知识而叹服。

因为毛泽东喜欢这些书，所以每到一处，工作人员都为他去寻找历史、地方志一类的书籍。以后走的地方多了，地方志搜集得越来越多，为了减轻挑夫的负担，他只得利用战争的间隙抓紧时间阅读，读完就忍痛扔掉。直到解放后他仍不忘被扔掉的地方志书，经常提及它们。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他多次外出巡视，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其中就少不了地方志书。在汕头市，索读《汕头县志》、《潮州府志》，就问有汕头，是否有汕尾。到无锡，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了如指掌，原来他到无锡的当晚就浏览了《无锡县志》。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志》、《华阳国志》认真阅读。以后又要《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就连《武侯祠志》也读了。还在书上批、

画、圈、点。他还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

会议期间，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过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处引200个流量的黄河水，其中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另100个流量注入汾河。水文地质工作者经过勘察，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这个雄心壮志不错嘛。"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说，"对嘛，我们不能只是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嘛。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说到这里，他笑出声来，"说起来你们的设想也算不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了古人的遗志而已。你查查班固的《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最后东注于海。"

毛泽东又说："山西十年九旱，金木水火土，五行中就是缺水。解决了缺水问题，旱涝都不怕！山西也就和四川一样成为'天府之国'啦。"陶鲁笳兴奋地说，"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毛泽东点头称许："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吗?""不知道。"陶鲁笳回答。毛泽东解释说："两千多年前，汉武帝乘楼船到了那里，正好传来在南方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那地方起名闻喜。闻听胜利喜报之意嘛。"他说完这个典故后，又据此分析道："由此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可现在汾河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山西出煤，开煤矿，发电，也都得用水。黄河流经山西1000多公里，应该对山西有所贡献，引黄济汾，是理所当然的!"好学不倦的陶鲁笳过后去查《汉书》，果有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

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之前两月，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徐霞

客22岁出游，30年间足迹及于16个省区，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越过千山万水，克服千难万险，对祖国的山川源流，地形地貌，岩石洞壑，动物植物，直至民情风俗等都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写下《徐霞客游记》等。毛泽东对徐霞客十分推崇，积极倡导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的精神。

1959年6月30日清晨，66岁的毛泽东上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稍事休息后就要借《庐山志》读。工作人员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毛泽东看了目录后又要求把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也借来。看完后对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欲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威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百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转身对周小舟等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又说："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到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接着，他又讲了一个典故。说是历史上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

毛泽东读志书痴迷不懈，以至有时他了解的地方人文情况甚至比那些长期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还多。他曾问长期在江西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江西铅山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来果然在书上找到了，他讲的和县志中记载得一字不差。据书刊导报记，杨尚昆回忆说：毛泽东到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就说，赵子龙是你们这里的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到河南，他就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1943年春，当薄一波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紧紧地握住薄一波的手问："你就是薄一波同志？"为了记住薄一波的名字，他反复地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又问薄是哪里人，薄说是山西定襄人。他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她的弟弟叫薄昭；汉文帝曾被立为代王，建都在你们山西中部。"这使薄一波大为惊奇："这些史书上记载的帝

王家常事，毛泽东竟记得这样清楚，他对中国的历史太熟悉了。”

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文化，十分关注地方风物，对地方志所载的历史典故烂熟于胸。因此，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时，常常是恰到好处，他的“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经验之谈，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直到晚年，在他的藏书中，还有不少志书。对传统文化中的志书瑰宝，在耄耋之年，仍耕读不辍，成为一个闪光点。

评点《西游记》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神话小说。

毛泽东爱读《西游记》，更喜爱孙悟空这个敢于冲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大闹天宫，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神话人物。

据王炳南回忆，1945年10月，在山城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进行了接触。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把他们看成是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毛泽东去见陈立夫，他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树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他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作为正面人物来宣扬了。毛泽东晚年的会客厅里，也就是他老人家晚年的书房里，一直放着不同版本的《西游记》。

1971年8月初，他老人家要看《西游记》和《西游真诠》。《西游记》是从中央办公厅图书馆找来的，是大字线装本，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那种《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西游真诠》也是线装本，全20册，他老人家书库里没有，是工作人员从当时的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西游真诠》（清代悟一子陈士斌撰，康熙丙子（1696年）刊本），他老人家翻阅后，大约一个星期就退

还了。《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因为是线装本，装帧也较别致，字也比较大，他老人家就一直放在了身边。第二次是1973年3月上旬，这一次他老人家指名要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平装本《西游记》。他老人家跟前已经有了大字线装本的，为什么又要新出版的平装本呢？当时，管理图书的忻中头脑里有这个疑问。后来秘书徐业夫告诉他说，线装本有个别地方看不清，凡是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就翻看平装本，用平装本来补线装本的不足。毛泽东看别的书也喜欢这样做，他常常将几种不同版本的同一种书放在一起，对照着读。据记录，1973年4月5日毛泽东又一次要《西游真诠》，同时还要《西游原旨》一书。《西游真诠》，还是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西游原旨》是从中国书店购买来的，是清代刘一明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刊本，全24册，字也比较大。伴随着毛泽东度过终生的诸多图书中，上述几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和这部《西游原旨》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在上海广百宋斋光绪辛卯（1891年）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毛泽东阅后写下两段批语。一段是在第18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行者降魔”。作者在这一回中，写高老招猪八戒做女婿之后，在与唐僧一行谈及他这个女婿时嫌八戒吃得多。唐僧听后说：“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这里，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语：“只因为做得多，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当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毛泽东的这段批语，明确主张“多劳应当多得”，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第二段批语，是在读第28回“花果山群猴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时写下的。吴承恩在这一回中写孙悟空回花果山，用法术把千余来犯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并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孙悟空的这段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用黑铅笔都画上了道道。毛泽东对此的批语是：“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

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唐僧的善恶观，孙悟空不信，吴承恩不信，毛泽东也不信。毛泽东认为“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是乡愿思想。“乡愿”源于《论语》，是孔子的话。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可见孔子对“乡愿”思想也是极力反对的。什么叫乡愿思想呢？就是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人生哲学，就是《西游记》中所着力描写的唐僧的处世哲学。唐僧的善恶观，唐僧的思想言行就是“乡愿”思想的最典型的表现。这种“乡愿”思想，不仅不能号召和鼓舞、团结人们去斗争，去除恶、去积善，而且还容易长“妖魔鬼怪”的志气，鼓励、放纵“魑魅魍魉”作恶成灾。唐僧就是因为笃信、主张、恪守这种思想，三番五次地遭受苦难，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因此，毛泽东对唐僧虔诚信奉的这种处世哲学是极力反对的。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后来他老人家还说过多次。

对于有善就有恶即善恶并存的思想，《西游记》中还描写了在被佛教宣传为天堂般的西方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世界里，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伽叶勒索取经的人事（索贿赂），这样的事和我们现实社会中的贪污行贿的事一样。孙悟空将此事告到佛主如来处，如来反说：“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唐僧无物奉承，只得将紫金钵盂奉上。书中对阿傩的丑态是这样描写的：“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可见成了佛的和尚也是非常爱钱的。唐僧取的无字经被白雄尊者抢去后，满眼垂泪地说：“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毛泽东对《西游记》中这一段的描写看得很细。对阿傩丑态的描写，都画上了道道或波浪线，在“只是拿着钵盂不放”这句话后连画了三个圈圈。对唐僧说的“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这句话下面分别画上两条粗粗的横道，末尾还画上了两个大圈。这种种标志都是毛泽东读书过程中思想活动的轨迹，是对原书内容的一种反映。

毛泽东晚年不仅爱读《西游记》，而且对《西游记》的研究也非常关心。1957年，作家出版社将几年来国内报刊上先后发表的《西游记》研究的重要文章汇集编辑出版了《西游记研究论文集》。这部论文集，共收论文17篇，附录1篇。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游记》研究论文之荟萃，约13.5万字。全部文章，毛泽东都曾用心阅读过，一些篇章他老人家在阅读时还写下了批注，画上了密密麻麻的道道和圈圈。

卷首篇是现代著名作家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毛泽东在张天翼文章篇首写下的“1954年2月，人民文学”一行非常醒目的批注。意思是说张天翼的这篇论文原载于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杂志。标题的左边，毛泽东用黑铅笔连画了三个大圈，格外引人注目。“张天翼”三字下面还画了两条横道。全文从头到尾几乎逐段逐句都画上了横道、浪线和圈圈。圈画的种种符号表明，这篇文章，毛泽东是逐字逐句阅读的，看得很细，十分用心。

张天翼这篇文章的后面还有一个附注，共三条约2000字，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1957年，毛泽东已经64岁，对一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6号字看起来显然是很吃力了，然而，毛泽东如同读正文一样，还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画上了道道、圈圈。附注的第二条，是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传说，其中有这样两段：“《法华经》里还写观世音菩萨有时‘现妇女身而为说法’，民间传说里就渐渐使这‘妇女身’‘固定下来，终于成了’一个妇女。在《三教搜神大全》里就有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了，说她是一个国王的三公主，因为抗婚，父王要烧死她，而她‘色不变而志愈坚’。她被囚到冷宫里，大家苦劝，她不听，‘反失语激父，父大怒，立命斩讫’。虽然写她的反抗是为了‘欲了人间事’（要出家），而且那结果是公式化的（照例是由于一些奇迹而得救），可是总写出了一个非常坚决顽强的反抗到底的女性——民间所喜爱所歌颂的性格。”“就这样，这几乎成了个传统：在民间作品里出现的观世音菩萨，总往往是正面人物，而且往往是妇女。就连《西游记》对天界的哪一位佛神都讽刺揶揄，可是对观世音就另外一种态度，把她写得可亲近，有的地方还写得很美。”这两段文字，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都一一画上了道道或浪线。从毛泽东读上述有关观世音的附注中圈画的种种符号来看，毛泽东读附注比读正文

还仔细，还用心。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还有童思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在这篇文章的篇首天头处，毛泽东也写了一行批注："1956年2月，西南文艺"。意思是说，这篇论文原载1956年2月号《西南文艺》杂志。《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收入的17篇论文，毛泽东在篇前写批注和在题目上画三个大圈的只有张天翼和童思高的文章，说明了毛泽东对这两篇论文的重视。

童思高的这篇论文共分六个部分，毛泽东圈画最多的是第一、二、五、六这四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引了原著第35回中孙悟空和李老君的一段对话：大圣道："你这老官儿，着实无礼。纵放家属为邪，该问个钤束不严的罪名。"老君道："不干我事，不可错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试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天去也。"大圣闻言，心中作念道："这菩萨也老大惫懒！当时解逃老孙，教保唐僧西去取经，我说路途艰涩难行，他曾许我到急难处，亲来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掯害，语言不的，该他一世无夫！——不是老官儿亲来，我决不与他；既是你这等说，拿去吧。"

这段对话，毛泽东在每一句下面都画上了横道，其中"该他一世无夫"一句，除了画横道外，句末还连画了三个圈。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一段，作者引了孙悟空说的一句话："若专以相貌取人，干净错了。"毛泽东读后分别画了两条横道。接着作者又引了唐僧说的一段话："我等三个徒弟相貌虽丑，心地俱良，俗谓'面恶心善'何以惧为？"毛泽东在阅读中，前两句下面分别画了一条横道，后两句下面分别画了两条横道，末尾还连画了三个圈。孙悟空和唐僧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毛泽东读后又画又圈，表明他对这些话的赞同的心理取向。

童思高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中，在论述神魔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时，写道："统治阶级的作贱人民和妖怪的害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民的大害。"作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西游记》，格外引起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在"作贱人民"、"妖怪的害人"九个字下面都画上了横道，后两句下面

都画了浪线，句末连画了三个大圈，因为不是段末，所以画的三个大圈把后面一句话的前两个字都划进圈里了。可见毛泽东读这篇文章的心情是不寻常的。

这篇文章的第六部分在谈到“神佛既是要唐僧西天取经，为什么又要使妖魔为难，增加取经的困难呢?”时，引了《西游记》第77回孙悟空说的一段话：“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没有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叫我等来取。怎知道苦历千山，今朝到此丧命！”

毛泽东对孙悟空这段话很感兴趣，阅读中差不多每一句下面都画上了两条横道，第一句、第二句后面都画了一个大圈，最后一句末尾画了三个大圈。如此又画又圈，在毛泽东读过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是仅此一处。这段孙悟空在去西天途中遇到严重困难时说的牢骚话，是他在特定的条件下的一种逆向思维的反映。孙悟空的这种逆向思维，从思维方法上来说，是毛泽东一贯主张和提倡的。大概是心理赞同或者是称道孙悟空的这种思维方法吧，他老人家在阅读中才如此圈画。不过，正如论文作者所说：“若果如孙悟空这样说，也就没有取经故事了，也就不会有《西游记》这部小说。”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不会不理解的。

毛泽东读《西游记》和读我国其他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一样，喜欢联系我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各种不同角度去理解，去运用，去说明实际问题。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所以能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西天取到真经，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不止。毛泽东爱读《西游记》，这大概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生前与一些干部谈到《西游记》时就说过：“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毛泽东还说：“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

毛泽东读《西游记》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常常用《西游记》

中的人物或故事，来阐明党的具体的政策和策略，说来引人入胜，道来妙趣横生。1961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观看这出戏后，曾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郭老的诗后，认为他对唐僧的看法有些偏激。因此，他于1961年11月17日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了毛泽东的这首和诗后，表示接受他的意见，纠正自己对于唐僧的偏激看法。于是，于当天又依韵和诗一首，《再赞〈三打白骨精〉》："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迷雾聚成堆。九千万里明真谛，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警惕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次来！"

毛泽东看了郭老的这首和诗后，于1月12日非常高兴地挥笔，在郭诗旁边写道："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毛泽东读《西游记》，还从作者和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来加以理解，通过它来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把《西游记》当作历史材料来学，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又一个特点。

上面提到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关于创作《西游记》的社会背景，沈仁康的《〈西游记〉试论》一文论述得十分详尽，从政治说到经济，从农业说到商业，对朱明王朝的专制独裁、奢侈腐朽、荒淫无耻、昏聩庸碌、残害人民、疯狂掠夺、无恶不作等都作了分析。最后，作者指出："总之，农民、市民与进入垂死阶段的封建势力，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西游记》产生的时代特征。"这篇文章，虽然作者在文后说有"不少错误"，但是毛泽东还是从头到尾，又读又画，圈画符号密密麻麻。一条条横道、一条条浪线、一个个

圈圈，如同一道道耀眼的光环，折射出毛泽东“把《西游记》当作历史材料来学”的心理。它是毛泽东把小说还原到产生它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把小说当作形象的历史来读”的一个佐证。

关于《西游记》创作的主题思想，鲁迅认为，这部神魔小说“其所取材，颇极广泛……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而胡适却认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到底应当怎样理解这部大作的主题思想，毛泽东似乎也有自己的倾向。

上面所说的论文集中，童思高的文章是专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作者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出生于明代中叶(约公元1510—1580年)，正是明成祖制定严刑峻法、残酷迫害人民的时代。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作者以愤世嫉俗的情绪，讽刺揶揄当时世态；以神话式的幻想和虚构，创造了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名著。”

对神佛和妖魔的关系，作者认为《西游记》中的神佛和妖魔是一体，同属统治阶级。“神佛只不过是公开的‘合法’的压迫人民、掌握着人民的命运的统治者，有天兵天将、诸神法力等统治阶级的权威。使人民把他们奉为不可侵犯的神圣，并还要随时顶礼朝拜，供奉香火。稍有冒渎不恭之处，立即降祸生灾，万民受难……妖魔是神佛的下属，是直接受神佛支配的压迫与统治人民的工具。”作者还认为《西游记》“是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力”。

童思高的这一关于“神佛和妖魔同属统治阶级”的观点，与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是相通的。所以童文中的上述评述，毛泽东读来尤有兴趣，并且一一圈画，有不少地方，都画了两条粗粗的横道，还有不少句末和段末，都画了三个大圈。

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用历史唯物主义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和解释神话世界，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

毛泽东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西游记》，现在大多都还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他评点《西游记》的批注，为研究《西游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鲜资料。

批注《智囊》

《智囊》是毛泽东晚年爱读的史书之一。

毛泽东在逝世前曾阅读过两部《智囊》。这两部《智囊》都是木刻线装本。一部一直放在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的会客厅里。这个会客厅是他晚年经常会见外宾的地方，也是他读书学习的地方。另一部放在中南海增福堂毛泽东书库里。

放在游泳池会客厅里的这部《智囊》，据说是借章士钊的。这部《智囊》是木刻大字本，全书分为14个分册，每个分册的封面都是用浅褐色纹绢装帧的，由于原书主人的精心保护，看上去似新的一般。所以，这部书毛泽东很喜欢，一直把它放在身边。

放在毛泽东书库的那部《智囊》，是50年代从中国书店购买的。这部书似清代重刻本，字刻得稍小些，全书亦分为14个分册，每册的封面都是用深蓝色的普通纸装帧的，本子显得有些破旧。50年代，毛泽东常读的就是这一部。这一部与章士钊的那一部相比，无论是装帧式样，还是木刻字体及大小等，显然逊色多了。

这两部《智囊》，毛泽东都不止一次地读过，大部分故事都作了圈画，许多地方还写有批语。毛泽东晚年读过的图书中，除各种马列著作、二十四史和鲁迅著作外，圈画和批注文字较多的，就要数这两部《智囊》了。

《智囊》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毛泽东又为什么如此爱读呢？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12月出版的《智谋大全》（即《智囊》）的前言中说：“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1574—1647）所编著的这本《智囊》，正是我国古典智慧的集大成。

此书将先秦至明代各色人物以智取胜的故事千余则汇为一册，按政治智慧（即上等的智慧）、军事智慧、司法智慧、语言智慧、妇女智慧等分类编撰，共10部28卷。书中故事，大多取材于经史典籍，亦有少量采自稗官野史，集中展现了古代中国人在治国安邦、治军用兵、断案决讼、平定动乱、经营产业、为人处世等方面的高度智慧。”书中所收的千余则故事，读了之后，大多有利于“启迪思考、发展智力、增强应变能力”，读后能使人“变得更聪明一些”。毛泽东之所以爱读这部书，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阅读本书，应当说，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阅读《智囊》第一部上等的智慧通简卷有关朱博的这一则故事时，对朱博因老从事教唆百姓聚众闹事，而将老从事杀掉的事，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条批语：这个老从事也可以不杀，教以改过，或者调改他职。显然，毛泽东对朱博的这一做法不很赞成，并且很明白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什么老从事这个官吏可以不杀呢？朱博本来是个武官，没有做过文官，后来他做了北州刺史。上任时巡视部属来到一个县。这个老从事为了观察和试探一下朱博的本事，就故意让这个县的数百个官吏和老百姓聚众拦道，并且吵吵嚷嚷，说是要告状。官署、寺庙里也都挤满了人。朱博后来了解到，这幕闹剧是这个老从事故意制造的，所以把他杀了。这个老从事并无恶意，只是为了看看朱博的应变能力，也没有因此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所以毛泽东批语说，“这个老从事也可以不杀。”

《智囊》第一部上等的智慧通简卷中，还有一则韩裒以毒攻毒的故事。故事说：西魏文帝时，韩裒任北雍州刺史。此州盗贼很多。韩裒到任后，秘密地查访了盗贼的情况，原来都是州里豪富人家的子弟。韩裒表面上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对那些人仍然以礼相待，并将那些性情凶恶狡猾的少年全部召来都任命为捕盗首领，每人分片包干，有盗贼行窃而未抓获，就以故意放纵偷盗论处。那些被委以重任的纨绔子弟都惶惶不安，连忙检举说：前次的盗案实际上是某某所干的。将作案人的姓名一一登记在本子上。韩裒将这个本子拿过来藏好，在州府门上贴了一张布告：“凡是盗贼，可以马上来自首，过了本月不来自首的将公开处死，并没收他的妻子儿女赏给先来自首的人。”十天左

右，所有的盗贼全部都来投案自首。韩衮将登记簿取来一对，一点不差。因此全部赦免了他们的罪过，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从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偷盗案。毛泽东读了这则故事，用黑铅笔写了“使人改过”四个字的批注。显然，毛泽东对韩衮允许盗贼改过自新的做法是持赞许态度的。

对于有一般过错的人允许其改过自新，并给他们提供机会，帮助他们创造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条件，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和主张。毛泽东在读《后汉书·陈寔传》关于“梁上君子”一节时，也曾在书的天头上写下了一条类似的批语：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阅读《智囊》和阅读其他古籍一样，总是密切联系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读的是古书，想的是今天，为的是今天，以求指导和服务于现实斗争。

例如，《智囊》第二部思维的智慧经务卷“责任在谁”这则故事里说，明世宗时倭寇蹂躏东南沿海，巡抚屡次告急，请求朝廷出兵，兵部尚书根据朝臣徐阶的意见，发精兵6000人，结果遇到敌人的伏击，军队溃败。当政的人把发兵看成是徐阶的过错。因此，徐阶上疏说：“按法律应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的将校负责打仗，州县的长官负责防守，现在军队的将校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判死刑，而州县的长官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军队的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州县的长官仅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鼓励和惩戒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在全国当兵的只占一，而当民的占百，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的将校来完成呢？”毛泽东读了这则故事，特别是读了徐阶上疏的这番话，对重责守令还是重责军队的将校并没简单地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而是首先将旧制度和我们今日的新制度进行了一番比较。比较之后，毛泽东认为，明朝的这种制度，“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党政军民都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指挥枪，军爱民，民拥军，党政军民一条心，这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智囊》“闺智部”载有一则轶事：监察御史李畲的母亲，向以清素贞洁著称。一次，李畲派人送禄米到其家，其母让人重量了一下，结果多出三石。

问其故，则答："御史例不概。"不概，就是量米时不用小木板刮去平斗、斛中高出口沿的米。这样，每斗都冒尖装盛，自然就多出米来。其母又问脚钱多少，来人又说："御史例不还脚车费。"于是，李畬母大怒，下令送还所剩米和脚钱，并将李畬斥责了一通。李畬便追究仓官的罪责。其他御史得知后也十分惭愧。

初读此文，李畬之母冰清玉洁，不占公家便宜，不贪非分之财，十分可敬。而李畬得知情况后则严加追究，应当说也是能廉洁自律的。可是，毛泽东看了之后想得更深，看得更透，挥笔写下了"李畬应自科罪"的批语。仔细品味毛泽东的批语，确实令人深思，值得儆诫。"李畬应自科罪"，起码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作风不细。古时官吏的主要收入就是俸禄，让人给自家送禄米却不检查过问一下，无端地多吃多占，即便是属下所为，自己不知道，也是不能开脱干系的。其二是循例不当。不论是"例不概"也好，"例不还脚车费"也好，这些"例"都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一"例"便"例"出了特权，"例"出了贪污，有损官德，有污清名。李畬却没有看到这些制度规定的不合理性，单单处罚那位仓官，这就没有真正抓到点子上，假若李畬预先知道这些"例"，更参与或默许这些"例"存在，则罪责更大矣。其三，是当其母举报了这一情况并责怪时，李畬不是从自身找一找原因，来一番反省，而是单单处罚别人（尽管应当处罚），这也有点推卸责任，不是领导人应有的风格和风度。而且，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从制度上找弊端，不从根本上堵漏洞，那么，以后此类问题仍是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因此，毛泽东的批语深意大焉。

毛泽东读史书，从不人云亦云，总是开动脑筋，独立思考。这种治学态度，直到他晚年阅读《智囊》时也是如此。例如，《智囊》第七部语言的智慧辩才卷"子贡一箭五雕"，这则故事的最后有这样两句对子贡评论性的话：子贡真是纵横家的祖师，一点也不像圣贤的门生之作风。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之一。毛泽东读到这里，对书中的这种说法很不赞成，他说："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说到毛泽东读《智囊》，从他在书上圈画和批注的情形来看，最爱读的或者说是最有兴趣的还是在第八部（即兵智部）关于用兵的智慧。这个部分为

不战、制胜、诡道、武案4卷，共收119个故事。这些故事，毛泽东都不止读过一遍，差不多都圈画过，许多地方读后还写了批注。

例如，制胜卷“孙膑的战术”这则故事中，有一段是讲唐太宗谈用兵之道的。唐太宗说：“我常用我方的弱兵，去对付对方的强兵，用我方的强兵去对付对方的弱兵。对方在战胜了我方的弱兵之后，往往追逐我军不到几百步就止兵不前，因此我方的弱兵并未全军崩溃；而我方的强兵在战胜了对方的弱兵之后，必定要冲到对方战阵的背后，然后转过身来攻打对方，敌人没有不因此而全军崩溃的。”这就是用了孙膑的战术。毛泽东读了唐太宗的这段话，似乎觉得唐太宗说得还不够清楚和全面，因此他写了一段批语，对唐太宗的用兵之道予以发挥和完善，还对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作了一定的评价。他写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的批语把什么叫“以弱当强”，什么叫“以强当弱”说得更加明白了，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本人克敌制胜的一条重要的基本的作战经验。

还是在“孙膑的战术”这则故事中，在孙膑对田忌阐述攻魏救赵战术那段文字旁，毛泽东非常高兴地用黑铅笔写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其实，关于孙膑攻魏救赵的战术，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中就曾引用过，并将这一兵法运用于我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一战又一战的胜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了。

毛泽东爱读《智囊》，尤爱读《智囊》中关于用兵打仗、以智克敌制胜等军事方面的故事。孙膑、唐太宗、朱元璋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毛泽东是我国当代伟大的军事家之一。古今军事家如果有那么一个机会相遇在一起的话，他们会不会谈论治军用兵、战略战术等诸多的军事问题呢？

隔代不隔理。他们会在战场上交流对话，取得心灵上的沟通，毛泽东阅读《智囊》时，在书上留下了密密麻麻勾注的岁月留痕。说明他和古代先哲们的心是相通的。

谈宗教问题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说：

“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六祖坛经》是很有研究的。

毛泽东一直关注对宗教的研究。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来到回族聚居地六盘山下的单家集。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毛泽东对身旁的警卫人员说：“回民有许多规矩，比如他们不吃猪肉，不说‘猪’字。我们到了回族地区，买牛羊肉吃可以，对猪肉提都不能提，这叫尊重少数民族习惯。你遵守这些规矩，他们就欢迎你；搞得不好，就会出问题。”毛泽东的话很快传遍了整个部队。5日后半晌，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走在单家集的街道上，他边走边向街旁的回族群众招手致意。当晚，毛泽东就住在单家集一户姓张的人家里。

毛泽东这次到单家集住下后，清真寺的阿訇和寺管会商定，要用回族最隆重的仪式——摆“中合”，欢迎红军的到来。

第二天，天刚亮，寺里的老阿訇和马云清、马进山等九人来到毛泽东住的张家院子。起初，警卫挡住不让进。毛泽东听到外头有动静便走了出来。老阿訇上前一步，朝毛泽东拱起双手道了声：“色俩目(阿拉伯语，致敬意）！”毛泽东笑容满面迎上去，也拱起双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答道：“回族人民好!”接着，毛泽东又笑着问：“你们怕不怕红军呀?”老阿訇忙答道：“红军曾

来过单家集。我们从那以后知道红军是仁义之师，也就不怕了。”众人听了都笑起来。

老阿訇手指“中合”（用各种油炸食品及核桃仁、瓜子、糖摆成的宴席）请毛泽东食用。毛泽东拈了一小撮白糖放进嘴里，又随手拿起一块回族风味的糕点递给警卫员陈昌奉。这时，人们欢呼起来。

欢迎仪式结束后，老阿訇把毛泽东让进了清真寺的大院内。院中央是座花园，老阿訇撷一束芍药花献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刻将花凑到鼻子跟前闻闻，并连声说：“感谢，感谢！”在进入大殿之前，毛泽东先到水房用“汤瓶”净了手、脸，然后脱去鞋，净脚步入殿内。大殿的柱子上、廊檐上雕有各种花卉图案和阿拉伯文字。毛泽东对此称赞道：“雕得真好，回族人民有智慧。”

毛泽东为人很朴实、真诚、可亲。他在大殿里兴味很浓地给大家讲了个“金脚寺”的故事。他说：“南京有一座清真寺，别名叫‘金脚寺’。据说，朱元璋当了明太祖皇帝后，有一次特意去观览清真寺，由回族将军常遇春、胡大海保驾。这位皇帝下轿后就直往清真寺大殿。待他刚要迈进一步时，就被常、胡二将给拉住：‘万岁，进大殿内要脱鞋。’朱元璋一听，赶紧退出。他一边脱鞋一边说：‘来呀，把这个鞋印挖掉，用金子镶上。’从此，这座清真寺就定名曰：金脚寺。”

老阿訇听了这个故事感动万分，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不放。

出了大殿，毛泽东又被请入西厢房。桌上已摆好了“九席”（用九个碗盛着饭菜，是回族待贵客的一种宴席）。大家一起入座。毛泽东吃得很高兴，他还不时地为别人夹菜。

毛泽东离开单家集时，老阿訇代表回族同胞向毛泽东敬献了“全羊”。

毛泽东对宗教历来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他都读过。对于禅宗的学说，他更注意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兴起，使佛教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他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

也读过。毛泽东阅读这些宗教经典，既是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

早在井冈山时，有一次贺子珍问他佛教问题，毛泽东说："我小时候跟着母亲磕过头，大了就不信了。"又说："中国老百姓有时信，有时不信。不过佛教的确有不少辩证法。它主张吾心则佛，让人们自己觉悟，自己解放自己；又主张普度众生，大有为广大老百姓服务之意呀。它最要不得的是叫人把希望寄托到来世，死后上西天的极乐世界，而放弃改变现实去斗争。这一点就不如我们中国的道教啰。道教的修炼不是为了死后上西天，而是活着成神仙。道家的斗争精神极强，对妖魔鬼怪，魑魅魍魉，毫不留情，是除恶务尽。所以，历来农民起义，都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同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进行阶级斗争。佛、道、儒是中国文化的三个主要部分。最不好的是儒，是孔孟之道。"

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与西藏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1964年5月25日，在接见秘鲁等拉美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毛泽东同客人讨论农民信神时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这使人想起了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接见胡达法师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时，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参加了会见。这天，毛泽东穿着灰色中山装，一边等待客人，一边兴致勃勃地和赵朴初聊天。客人还没有到，毛泽东以开玩笑的口吻对赵朴初说："佛经里有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先肯定，再否定，再来一个否定的否定，是不是?"

赵朴初一听，连连点头，想，真不容易啊！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是读佛经的，至少他熟悉《金刚经》。“佛说”、“即非”、“是名”就是《金刚经》的主题。见毛泽东以自己的名字解释佛经里的话，而且，还和黑格尔的辩证的否定思想联系在一起，赵朴初也不完全同意，心想，自己可不是“非”赵朴初和“名”赵朴初啊，自己可是实实在在的赵朴初。所以，他笑着说：“不是。是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

平常，赵朴初研究佛法般若时，就发现其中有很多辩证的哲理和辩证方法，如只有利他才能自利的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等。他甚至怀疑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佛教存在某种关系。这回，见毛泽东问辩证法的否定，赵朴初有自己的主见。毛泽东很满意赵朴初的回答：“看来你们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的味道……”

正待要继续发话，胡达法师到了，谈话只好中断了。

毛泽东后来指着赵朴初对旁人说：“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

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不仅精通辩证法和唯物论，而且还能投入一定的精力，去研读佛法宗教，从内在本质上去寻找它们相通的地方，以利于开展群众工作。他将本来是一对矛盾的信仰，统一到认识论的本源上。

评价康熙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创造了辉煌业绩，作出了伟大贡献的皇帝，他与乾隆两朝，史称“康乾盛世”。毛泽东在与著名文学家老舍等人谈话时，高度肯定了康熙对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

那是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期间。

一天大会中间休息，老舍由主席台上下来，到旁边的休息室抽烟，坐在一个角落里。隔了一会儿，他发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也走进了休息室，而且照直向这个角落走来。老舍以为他们要找个角落商

量什么事，便想起身躲开，可是，毛泽东却把他拉住："一起坐一坐，说说你们满族人。"

于是，便都落座，围成一个小圈圈，真的开始大聊满族人，而且兴致极高。毛泽东主讲，其他几位频频插话。

毛泽东一开口便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接下来，便大讲康熙："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立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

"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要先进得多的汉文化，他尊孔崇儒。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这样，康熙便非常成功地克服了满族官员少的困难，真正达到了以一顶百的神奇效果。"

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奖惩严明的用人制度。"毛泽东讲了一些实际例子，说明即使皇子犯了错误，也一样受到严厉的处罚。皇子打了败仗，回来不敢进德胜门，照样要蹲在城外，听候处罚。他的这套办法既能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又能组织起一支有严明纪律的队伍，所向披靡。

毛泽东特别夸奖康熙皇帝的学习精神，说他不光有雄才大略，而且勤奋

好学。他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精通诗词歌赋，会琴棋书画。毛泽东说康熙皇帝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康熙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都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

毛泽东的这一番议论，再加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插话，使老舍大为惊讶。他从前也知道康熙皇帝的一些功绩，但既不系统也不具体，而且绝对没有这么高的评价。所以，回到家中，他便向家人做了详细的传达，并说他完全换了脑子，换了眼睛。从这以后老舍便开始着手写表现满族人民的作品，如历史剧《神拳》、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等。他的这些作品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过伟大贡献的民族。老舍还想写《康熙大帝》，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毛泽东对满族和康熙皇帝的评价，始终装在老舍的脑子里，它成了老舍晚年创作的主要课题。

对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毛泽东有褒有贬，这其中固然有他对许多问题的独到见解，有他个人的好恶，但总体上他还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以他在历史上的作为，以他为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为评价人物的客观依据，这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从毛泽东对康熙的评价中，可以看到这种态度，这种方法，这种精神。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对康熙皇帝是做了深入研究的，否则，不可能对他的三大贡献说得这样精辟。

为胡乔木修改诗作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因长期从事大量的文字工作，1961年夏秋间患病疗养。这年8月17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的病况及疗养的打算，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于25日复信，情意挚切，关怀备至，其中有这样几句：“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

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的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问谷羽（胡乔木夫人）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

毛泽东在信中特意引用曹操的《龟虽寿》，强调“此诗宜读”。古人云“诗可以疗疾”，毛泽东深谙此道。他对曹操的作品极为欣赏，称其诗文“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毛泽东尤其推崇《龟虽寿》，曾将此诗全篇书赠日本政界要人石桥湛三，这封信里所引的四句当然是针对胡乔木急于工作，不安于长期疗养的心境所作的慰勉，充满亲切的情味。毛泽东在信中还特意告诫胡乔木“专看闲书，不看正书”。所谓“闲书”当然是相对“正书”——马列经典抑或与时事相关的著述而言，大约是稗官野史、笔记小说、诗词曲赋之类。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常以默书或吟哦古诗词消遣、驱倦，这既是他的养生之道，以此相告于乔木，也含有以诗疗疾的知交之谈。

胡乔木在恢复健康之后不久也开始作旧体诗词。据作者自称，这“是由于一时的风尚”。细想来，这大约也正是1961年以来一段时期中“专看闲书，不看正书”的催化剂在起某种作用吧。所谓“一时的风尚”，大约是指毛泽东在1962年5月和1963年12月先后集中公开发表《词六首》和《诗词十首》，陈毅在1962年4月召开的诗歌座谈会上为报刊发表旧体诗词大声疾呼，一时间旧体诗词又为世人所注目，《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报刊更是乐于为旧体诗词提供一席之地。胡乔木在一次闲谈中向毛泽东表露试写旧体诗词的想法，毛泽东显然了解胡乔木在这方面的学养，当即加以鼓励和支持。

1964年10月，是胡乔木写作旧体诗词的起点。这年恰值新中国成立15周年，正从3年困难时期的低谷走出来的中国，在中央决定隆重庆祝15周年国庆的安排下，气氛远非往年可比：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喜讯传出，举国欢腾；还有一事须得提及，10月14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这在当时被看作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些接踵而来的大事，不能不在胡乔木的心海中激起波澜。“诗言志，歌咏言”，他在10月至11月间作的《词十六首》中，大体上是以上述事件为题材的，其中咏国庆的2

首，庆祝原子弹爆炸五首，感事七首，另外两首，一首是《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另一首是《沁园春·杭州感事》。这些词作均送呈毛泽东修改。毛泽东在极口称赞的同时，作了再三悉心修改，从标题到说明，从成句到单词。用胡乔木的话来说就是“终日把玩推敲”、“如此偏爱”。试以《沁园春·杭州感事》为例。

这首词的立意起于毛泽东1963年5月杭州会议的一次讲话，其中涉及对杭州保存过多的古坟与庙宇的批评。胡乔木在隔年金秋时节抵达杭州，流连湖光山色之间，想到毛泽东的那番话，遂吟成此词。毛泽东在修改时删去了作者的“说明”，并加写了一段批语：

> 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定稿（括弧里的是原稿）如下：

> 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飞）香。雪裹棉铃，金翻稻浪，秋意偏于陇亩长。最堪喜，有时潮人健，不怕澜狂。天堂，一向宣扬，笑今古云泥怎比量！
>
> 算繁华千载，长埋碧（泪）血；工农此际，初（小）试锋芒。土偶欺山，娇骸祸水，西子羞（犹）污半面妆。谁共（天与）我，舞倚天长（吼风奇）剑，扫此荒唐（扫汝生光）！

作品的立意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个中是非不予论列，然就表现的技巧而言，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的句子和单词，诚如胡乔木所言“像铁被点化成了金”。

其他如《水调歌头·国庆夜纪事》，末两句原作“万里千斤担，不用一愁眉”，经毛泽东修改为“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确乎大手笔，不但与整篇词作更为协调，而且在意境上有了拓展。

《词十六首》中的每一首差不多都经过毛泽东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修改，1965年在《红旗》杂志第1期上发表之后，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许多报刊作了转载，著名学者周振甫作了诠释，王季思教授撰文讲评，在当时产生了不

小的影响。

受到这样的鼓舞，胡乔木在1965年1月至9月间又写了《诗词二十六首》（发表在当年第11期《红旗》上）。毛泽东在称赞的同时也坦率地表示较之《词十六首》“略有逊色”，并且依然逐首作了精心修改，有的还写了批语。例如《江城子·赠边防战士》（其二），在将原句“胜天堂”改为“胜家乡”时写了这样的评语：“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有些改动立地显出高下，如“为保金瓯风景美，鞋踏破”改为“为保金瓯颠不破，鞋踏烂”；“细观摩满纸珠光宝气”改为“细观摩满纸云蒸霞蔚”；“旌旗猎猎春风盛”改为“旌旗猎猎春风暖”；“滚滚长江万里长”改为“滚滚江流万里长”；“你问健儿夸核弹，欣欣犹是比基尼”改为“休向英雄夸核弹，欣荣试看比基尼”，如此等等。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的磨难之后，待到胡乔木再度复出，毛泽东已与世长辞，1978年3月，胡乔木作七律，题为《怀念》，其中两句表达了作者对尊师毛泽东的矢志不渝的衷情：“此德此功如可没，海枯石烂地天翻!”

点评司马迁

在中国，有不少人是通过读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开始知道司马迁其人的。毛泽东在这篇光辉著作里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句话。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毛泽东非常熟悉司马迁的故事，对他的名篇大作《史记》尤为熟悉。

1963年，他读了新式标点本《史记》，选择了其中的《项羽本纪》，推荐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阅读。1973年9月，他在饭桌旁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述司马迁政治上三起三落的故事，不无感慨地引用《史记》几句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友态；一贵一贱友情乃见。1976年2月，在病床上他又念了

这句话，还说："这是《史记·汲郑列传》的话，如今像汲郑当时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爱屋及乌，毛泽东高度赞扬司马迁。1949年12月，他在赴苏联访问的列车上得悉翻译师哲是司马迁韩城同乡人时，随口就背诵了《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接着还说："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种抱负。"又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有人说中国没有宏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多次提及司马迁的刻苦精神："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这些人是有一肚子火才写的"。

可见，毛泽东对司马迁的研究是有一定深度的。

支持姚雪垠创作《李自成》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姚雪垠为写作《李自成》，兢兢业业数十年，刻苦勤奋地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古籍，积累了难以数计的卡片。可是他的创作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遇到了许多困难和干扰。

早在1963年秋，《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为了感谢毛泽东的关怀与肯定，姚雪垠即拿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样书，怀着激动的心情，和他的妻子王梅彩来到邮局，给毛泽东寄了一套书。他们相信毛泽东一定会收到这部小说的，也一定会抽闲暇阅读的。1966年七八月份毛泽东阅读完《李自成》第一卷上册，让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转告中共武汉市委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我已看完，写得很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老革命、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作家老科学家、老演员等都受到了冲击，挨打、挨斗、挨抄。姚雪垠是老知识分子，又是老作家，当然也不能幸免。那些造反派逼着他签名承认《李自成》是“大毒草”，他理直气壮地拒绝了。他们追问他后四卷还写不写，他回答说：“党叫我写我就写，不叫我写我就不写。”在颠倒黑白的年月里，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一天“造反派”闯进了他的书房，他们显然是来抄家的。姚雪垠首先想到，如果那些有关《李自成》的参考书籍、资料、笔记、卡片等被抄走了，那么《李自成》的写作就很难继续下去，他大半生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姚雪垠心里害怕极了。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东西造反派们竟然没有动。这在姚雪垠心中一直是个谜。

直到1977年王任重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他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那是1966年8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南局代理书记的王任重列席会议。会议当中，毛泽东将王任重叫到身边，特意嘱咐他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当时，戚本禹也在场。当天晚上，戚本禹对王任重说：“你不要听他的（指主席）！姚写的《李自成》第一册还可以，但写到‘闯王进京’时，一定是反动的。”王任重当时只是笑笑，未予置理，认为戚本禹太主观狂妄，竟敢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第二天，王任重打电话给当时的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如实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武汉市委立即采取了有效措施，因此才使那些图书、资料、卡片没有被抄走，姚雪垠这个摘帽“极右”派也未遭到更严重的冲击。

1975年，姚雪垠写完《李自成》第二卷已经有一年多了，但在“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的干扰下，不仅书稿迟迟不能出版，就连写作也很难继续下去。在好心人的建议下，姚雪垠准备冒着风险给毛泽东写一封信，汇报一下写作的情况。经过反复思索，姚雪垠决定先写信给时任武汉市委书记宋一平，向他询问给毛泽东写信能否帮助转交。宋一平当年全力支持《李自成》的创作，所以他见到姚雪垠的信马上同胡乔木、邓力群、吴冷西商量。胡乔木看完此信，当场表示：姚的信写成后，我可以帮助转交，并请主席给予支持。宋一

平立即将这一喜讯复信告诉姚雪根，并详细嘱咐了一番。1975年10月，姚雪垠用大开宣纸，毛笔大字给毛泽东写了信。信的结尾写道："敬爱的毛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争取在75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为要替党的文学事业多尽点微末力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填补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我将不断地努力追求，直至生命终止。即令最后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也不会丧失我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作家的雄心壮志，任何时候都不会将意气化为寒灰。但是，我相信，主席是会给我的工作以支持的。"姚雪垠还在信后附呈旧作七律《抒怀》一首：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海千潮涌，挥笔秋原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岂容杯酒持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成林亦壮哉。

信通过宋一平转给胡乔木，再由他转呈毛泽东，并附函介绍了有关情况。这样，一位饱受磨难的老文化人、老作家的信终于到了要达到的地方。毛泽东收阅姚雪垠的信后，于11月2日在姚的信上批示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的批示虽然简短，但却表明了他对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全力坚定的支持。在有关方面的关心和安排下，1975年12月21日，姚雪垠终于来到北京，摆脱了那些随意的干扰，可以一心一意地修改、写作书稿了。到京的第二天，他立刻投入了工作。凌晨起床，他伏在案头，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到京》一诗：

快车高卧入京华，笔砚安排即是家。
舞剑仍来残月外，挥戈惯趁夕阳斜。
心游见阙循龙近，眼望珠峰雪路遐。
任重只愁精力减，扬鞭少看上林花。

姚雪垠后来回忆说："在我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毛主席第二次保护了

我。”“四人帮”被粉碎，文艺界迎来了新的春天。从1997年开始，《李自成》各卷得以陆续出版问世。在十年动乱中，毛泽东保护姚雪垠并两度支持《李自成》的创作，这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独一无二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十分关心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尚未全部出齐，他就与世长辞了。然而，毛泽东对姚雪垠创作的关怀和支持却永驻人间。

解读《红楼梦》

《红楼梦》是毛泽东最喜爱读的古典名著之一。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谈到了《红楼梦》，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在他的晚年，不管是书库里、会客厅里，还是卧室里一直放有20多种不同版本的线装大字本《红楼梦》，有的版本就放在他身边，他可以随时翻阅，不断地探究。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爱读《红楼梦》呢？第一，因为他推崇《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很为欣赏。毛泽东认为，《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他在文章和与人谈话中多次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来说明现实问题。在1957年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他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一“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特别是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一句，在提倡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时候，毛泽东曾多次引用。1958年，在成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还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道理。是因为《红楼梦》在揭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的同时，体现了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及其作品《红楼梦》，同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一样体现了古代的“民主文学”的

传统。所谓民主性就是“不满封建制度”、“不满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对宗法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特别是妇女形象，表示了莫大的同情”。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贾宝玉是同情被压迫的丫环的。1962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

《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而《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希望。对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的逆子的描写，虽然没有能够逃脱被压抑而最终走向虚无的悲剧性命运，但作者曹雪芹的民主倾向和寄托的爱情希望渗透在字里行间。读《红楼梦》可以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红楼梦》所描写的是明末清初金陵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盛衰史。书中曹雪芹着重描写的是贾府。然而，就如同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中所说的：“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曹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读《红楼梦》，可以从贾府兴衰过程中一系列真实、形象、生动的画面来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和了解。早在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毛泽东就提出，这是一部好书，现在很多人鄙视这部书，以为它写的是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毛泽东1965年对他的表侄女王海容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1981年，薄一波也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直到1973年12月21日，在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他老人家又从《红楼梦》创作的动因和构思的角度，谈到它的历史主题：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红楼梦》，真事就是政治斗争。《红楼梦》除了具有上述的这些特色外，毛泽东认为它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家长制的动摇。他这样说过：“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固定是早已开始了的。《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

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又各有各的打算。要认识和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当然重要的是要读历史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封建社会作出分析，通过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认识、了解封建社会。但是，仅读这些书这不够，还应当读《红楼梦》这类描写封建社会阶级关系、人际关系和统治者与奴隶等人们生活面貌的文艺作品，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好、更细致地了解封建社会。”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有一天爬山，他兴致很高，对身边的摄影师侯波说：“你现在看什么书啊？”侯波说：“《红楼梦》。”侯波当时也就刚20岁出头，她的话音一落，毛泽东便接着问：“看得懂吗?”侯波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人熟了，说话也就比较随便了。因此，侯波随口答道：“看故事呗。”毛泽东对侯波的回答没有直接表示肯定或否定，他说：“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侯波回答说：“我一遍还没看完呢。”“一遍没看完也没关系”。毛泽东看了看身边其他的同志，又接着说：“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着在座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著名将领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降灌无文’，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降灌无文’。降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毛泽东在说这些话时，面对许世友，露着笑容。许世友以善战著称，习文不足，他对毛泽东给予的评价心悦诚服。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通过阅读，透过故事，明白事理，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

对《红楼梦》的写作背景，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

出现大观园里的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也是形成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命运的历史背景，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对封建社会来说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必然要影响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倾向，使其形成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因此，1964年8月，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封建社会制度必然要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红楼梦》是借一家一族的衰败展示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客观必然性。封建制度的“天”是无法补的，曹雪芹主观上想补也是不可能的。作者主观上的希望和封建家族必然衰败的客观规律的矛盾，《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等新的希望和他们无法摆脱封建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的束缚以及悲剧性命运的矛盾，这两方面的矛盾在《红楼梦》中通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实和一个一个的故事、一场一场的人物活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是通过读《红楼梦》来了解封建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的阶级斗争。《红楼梦》不是直接描写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的专著，它主要描写的是封建社会“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内部的冲突及其周围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延安时，毛泽东一次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读《红楼梦》时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1954年3月10日，毛泽东又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接着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后在岸上休息，问在身边的薛焰：“最近读过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说：“这是一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一听，便认真地对薛焰说：“搞公安就不要看？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条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对《红楼梦》第四回中“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

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句话他记得很熟。毛泽东在读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这几句话所在书页的天头上，他用黑铅笔画了三个大圈。在这几句话后“雨村……细问这门子，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这一段文字旁边，他用铅笔一一画了圈。毛泽东所以把第四回看作是《红楼梦》全书的纲，大概也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和统治秩序的形式和法宝，封建统治者就是利用这一法宝来剥削、欺压平民百姓，来剥夺和占有奴隶们用汗水和血泪创造的财富。

毛泽东读《红楼梦》很关注这个“纲”。他与人谈《红楼梦》时谈得最多的大概也是这个“纲”。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谈《红楼梦》，来理解《红楼梦》，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独到之处。

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的《红楼梦》线装版本有20多种。其中有两种版本毛泽东用铅笔圈画过。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这两种《红楼梦》，有不少的文字旁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画了道道，有的是画了圈，还有的是断句的标点。

这些道道、圈圈、点点，都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随手所画的，圈画的时间大概是50年代中后期或60年代初期。但是，毛泽东批注的《红楼梦》却没有见到过。是毛泽东读《红楼梦》没有写批注呢，还是写了批注流失在外呢？石玉山在《毛泽东怎样读书》中说：大约在60年代初，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时，把一部他随身带的有许多批语的《红楼梦》赠给了当时上海的一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把它交给石西民，并嘱咐石西民要好好研究。石西民把这部书拿回家一看，只见不少页的天地行间，写满了各种批语，那些极其潇洒的字迹，他一眼就认出了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石西民深知这部书的历史价值，遂一直把它作为至宝，妥为珍藏，一有空闲就拿起来认真地学习研究。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石西民，被红卫兵到处游斗，家中数次被抄。于是，这部毛批《红楼梦》从此就无影无踪了。“文化大革命”后在归还抄家的物品时，石西民最关心的物品就是这部书，他多次寻找，结果还是毫无下落。

这部毛批《红楼梦》到底还在不在，现在还难下断语。但从这段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60年代初毛泽东批注过一部《红楼梦》，而且在“不少页的天地行间，写满了各种批语。”

毛泽东生前不仅爱读、爱谈《红楼梦》，而且还非常关心《红楼梦》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工作。

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毛泽东圈画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他在这本书上画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毛泽东在这本书上曾写下过“这本书错误思想集中在第六、第七两节”。为何如此说呢？原来就在第六节“作者的态度”第5页上，俞平伯说：“《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的性格和书中宝玉的性格，便可知道，并且还穷愁潦倒了一生。”毛泽东在“是感叹自己身世的”8个字旁粗粗地画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第7页在“一切叙述情事，皆只是画工底后衬，戏台上底背景，并不占最重要的位置”这句话旁边也画上了竖道，在与这句话相对应的天头上，毛泽东也用铅笔画了一个大问号。第8页开头的一句《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画上了竖道，而且还画上了问号。第15页“既曰惋惜，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罢。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俞平伯的这段话，特别是前面的“痛骂”和后面的“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的说法，毛泽东是不赞同的，在文字旁边都画上了问号。第18页，作者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从后四十回看宝钗袭人凤姐都是极阴毒并且讨厌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红楼梦辨》第七节“《红楼梦》的风格”，毛泽东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画了七八个问号，这一节中毛泽东有疑问的或者认为有错误的地方有30多处。

就在这一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边画了两条粗道，然后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

者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红楼梦》的极高评价是相悖的。所以他在这7个字旁又画道道，又画问号，表明他不赞成作者的评价的心理倾向。这一小段的最后一句“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的评价，与毛泽东的评价“《红楼梦》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等也是相悖的。所以，毛泽东在这12个字旁除画了粗道道外，连续画了两个问号，表明他对作者的评价是极不赞成的。

毛泽东说俞平伯著的《红楼梦辨》的“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七两节”。画问号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作者“错误思想”表现的地方呢？当然这还是可以继续探讨的。毛泽东的批注，可以说是他的一家之言。

除第六、第七两节外，后面各节，毛泽东也作了不少的画圈。

说到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的关注，他还作过一段评价。他说：“《红楼梦》写出200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而这些“新红学”和“旧红学”代表人物的著作，毛泽东都曾仔细研读过，连同他读过的各种版本的《红楼梦》，现在都收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毛泽东爱读《红楼梦》，爱读《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对《红楼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一直有自己的看法。特别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读《红楼梦》，来研究、评价《红楼梦》，这在中国的“红学”史上可能还都是第一次。毛泽东对新、旧“红学家”都曾给予过评价，把从胡适到何其芳这些红学家，都称为新“红学家”，但一次没有谈及他自己。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红学家”。越到晚年，他对《红楼梦》的研究越有深度。

关注《柳文指要》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晚年撰写的一部对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文集的专门研究巨作。柳宗元的散文、游记、诗作等，毛泽东生前都很爱读。特别是《天说》、《天对》等重要的哲学论著,毛泽东则更为喜爱，多次阅读。这大约是毛泽东对《柳文指要》一书的写作和出版都十分关心的原因之一。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早在1920年，章士钊在上海时就曾帮助过毛泽东，为送新民学会的部分会员去欧洲勤工俭学筹集了两万块银元。在当时，两万块银元对毛泽东这些穷学生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就是因为有了这两万块银元，欲去欧洲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一家、徐特立、李富春等人才得以成行。对于章士钊的这次帮助，毛泽东尤为感激，一直深深地记在心中。新中国成立，章士钊先生定居北京后，特别是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毛泽东对章士钊的生活、住房等很为关心，常派秘书徐业夫去看望他，章士钊也常给毛泽东写信和送书。为了帮助章士钊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从1963年春节起，每年正月初二，毛泽东都让徐业夫从他的稿酬中取出2000元给章士钊送去，一直到1972年，年年春节如此。这就是后来传说的所谓“毛泽东十年还债”的故事。

章士钊不仅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而且还是一位潜心文史、用力精勤、著述颇多的学者。章士钊酷爱柳宗元的文章，他曾用大半生的余暇时间研究柳宗元的文集，《柳文指要》就是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所以，当毛泽东与章行老商量，提出能不能把书稿先送他一读。先“送请毛泽东阅示”，正是章行老的心底愿望，所以，徐业夫一提出此事，他就很高兴地立即派人将《柳文指要》初稿送到毛泽东处。

毛泽东收到《柳文指要》书稿后，按古人的做法，当日（即1965年6月26

日）就派通讯员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还给章行老写了一封很有趣味的信："行严先生：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注：即章含之，章士钊之女）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对章士钊的这部力作，毛泽东不仅从头至尾非常仔细地阅读，非常认真地把原稿中的错别字改正过来，而且还逐章逐段、逐字逐句地研究，凡是认为不恰当的地方，他都一一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请作者考虑，有若干处他还亲自作了修改。对此，章行老很为重视，并一一重新作了研究。对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地方，章行老全都采纳，很为满意。

章士钊在80多岁高龄倾心完成了这部《柳文指要》。章含之说，章行老撰写《柳文指要》，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是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初步评价。从6月26日收到书稿到7月中旬，毛泽东已将《柳文指要》上下部从头至尾读过一遍，并支持它的公开出版，期望能引起学术界的注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出于对柳宗元文章和这部"解柳全书"的喜爱，1965年7月18日，又给章士钊写信说"还想读一遍"。信中这样写道："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对章士钊的这部百万字的巨著，毛泽东不仅自己反复研究和阅读，而且在1965年8月5日将这部书推荐给康生阅读。他在给康生的信中说："你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意和引人发聩之处。"这里，毛泽东又一次肯定《柳文指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章士钊对《柳文指要》再次作了修改。1965年9月将修改稿再次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收到修改稿后，又一次阅读了全书。大约于1965年底，毛泽东再一次给康生写信表明他同意出版的意见，并将章士钊的修改稿一并送给康生阅。

康生这个人很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他本来是反对出版《柳文指要》的，但他看了毛泽东的信后不得不改变初衷，佯言符合。康生在给毛泽东的复信中说："……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等等。"最后，康生也模仿毛泽东的语调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收到康生的复信，毛泽东于1966年1月12日又给章士钊回信说："……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这封回信的最后，毛泽东还特意加了一个附注："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章含之回忆说，毛泽东把康生的复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了。信封上原写着："请交主席，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圈掉，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也是毛泽东的一种习惯，在公文转送中，他几乎都是这样，爱把别人给他寄信时用的旧信封利用起来。这大概也是一种节约吧。

照理说，到此《柳文指要》出版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修改后的书稿刚刚送到中华书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内形势的突然变化，使《柳文指要》出版的希望变得渺茫了。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在年近90高龄的时候才完成这一巨著的章士钊，内心里当然是难以平静的。大约是到了1970年，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转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章士钊又给毛泽东并康生写信重提《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信中措辞很婉转，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写信人的唯一真诚的心愿：企望《柳文指要》能够正式出版。收到章士钊的信，毛泽东才知道《柳文指要》还没有公开出版，即让徐业夫给有关方面打电话问及此事。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催促下，有关部门方决定将书稿发排铅印。1971年9月，《柳文指要》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柳文指要》的正式出版，使章士钊精神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章含之说：章士钊拿到书时，激动得两手都发颤了。他捧着新书来回抚摸着，还拉着

章含之的女儿妞妞的手叫她也摸着书的封面，还对她说："这是爷爷写的，你将来要好好读。"

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像《柳文指要》这样的书得以正式出版发行，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关照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书一出版，章士钊便用自己的钱买了上百部，还让秘书王益知买来红纸，裁成小条，由他亲笔题字，贴在书的扉页上，送给朋友们。章含之说，首先是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各一部。后来，出版社还按照惯例（当时全国各家出版社出版的书刊都要送毛泽东一套）送给毛泽东一部。章士钊送给毛泽东的那部《柳文指要》，1976年9月毛泽东辞世时，还放在他卧室里的书架上。从1971年9月到1976年9月，在这几年中，毛泽东时常翻阅《柳文指要》。中华书局送给毛泽东的那部，1972年初，毛泽东转送给他的女儿李讷了，也是他给女儿的唯一遗产。

说到《柳文指要》出版的事，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中美《上海公报》签署之后，周恩来在上海友谊大厦举行送别尼克松一行的晚宴。席间，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交谈过程中，发现弗里曼的古汉语造诣很深，曾经读过二十四史。周恩来深为赞赏，专门向他介绍了《柳文指要》，并说，这部书完全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才得以公开出版的。弗里曼对此很感兴趣，问了许多问题。周恩来就对章含之（当时担任翻译）说："弗里曼先生那样有兴趣，含之，你送他一部《柳文指要》嘛！"当时，章含之手头没有此书。尼克松一行第二天清晨即启程回美国。在上海同志的协助下，章含之连夜找来一部已经用过的《柳文指要》。据说，这部《柳文指要》是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写作组留作批判用的靶子书，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用当年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这部书"批倒、批臭"。幸好章含之逐页检查时发现了这张纸条，要不这张纸条将随书让弗里曼带到美国去，成为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档案里的一件重要"文物"了。

批注古代战例

毛泽东既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又有研究中外历史上著名兵法战例的经验。从故居现有藏书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阅读有关这方面史书时所作的圈画和批注。

臧质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时人。《南史·臧质传》称赞他“涉猎文史，尺牍便敏，有气干，好言兵。”曾任徐兖二州刺史。南朝到了宋文帝时，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的土地统一中国。北朝的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之后，有吞并江南的意图。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以后，南北两朝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臧质在和魏军作战中屡立战功。毛泽东读这篇传记时，批注：“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质之言，因以致败，惜哉。”

“解汝南之围”，是指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七年围攻汝南，宋守将陈宪告急，宋文帝派臧质去救援，魏兵伤亡惨重，魏太武帝败退。

“胜盱眙之敌”，是指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八年率十万大军攻盱眙，臧质为辅国将军与之抗击。这一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显示了臧质的军事才能。魏太武帝向臧质要酒，臧质为羞辱他，把人尿装进酒坛送去，魏太武帝大怒。毛泽东在“质封溲便与之”一句旁加了密圈，天头上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批注：“是欲战法，激之使战。”最后魏军登城肉搏，“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魏军损失超过一半人，臧质获胜。

“克刘劭之逆”。刘劭是宋文帝的长子，他昏庸残暴，杀了文帝自立为帝。臧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通知了文帝的第三子刘骏（孝武帝）和江陵王刘义宣（宋武帝的第六子），并即日率5000人马去讨伐，生擒了刘劭，为孝武

帝即位扫清了道路。

毛泽东所惋惜的历史上的“梁山之战”，是指孝武帝即位后，臧质因孝武帝年轻，许多事情都不向他请示和报告。臧质傲慢自负，“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又以为刘义宣更容易受他控制，因而阴谋推翻孝武帝，立刘义宣为帝。孝武帝得知这一情况后，派王玄谟等屯兵梁山洲两岸据守。臧质向刘义宣献计说：“如今应该派兵去打南州，王玄谟在梁山‘必不敢轻动’，我乘船去攻占南京，这是取胜的最佳策略。”有人劝阻刘义宣不要采纳这个意见，担心臧质取胜后野心更大，臧质的计划因而未被采纳。兵败后臧质逃回家乡，后被赐死。

毛泽东对臧质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褒中有贬，实事求是。毛泽东很赏识臧质的军事才能，多所批注、圈画。对臧质向刘义宣的进计，逐字加了旁圈。对劝刘义宣反对臧质的话和臧质逃回家乡后的情况，也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毛泽东研究了梁山之战中臧质和刘义宣两人的作战部署，肯定臧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一仗致败的原因不是臧质的无识无能，而是臧质的意见未被采纳，并为此发出“惜哉”的感叹。同时，毛泽东对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处，用红笔画了着重线，并批注：“此是妄想。”

《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臧质传》后有段评论说：“……臧氏文义之美，传于累代。含文以致诛灭，好乱之所致乎。”“含文”是臧质的字，“好乱”是指他有野心。毛泽东在“好乱之所致乎”旁，用红笔加了着重线，在着重线旁逐字画了六个大叉。毛泽东看重臧质在解汝南之围，胜盱眙之敌，克刘劭之逆等战役中表现的军事才能，因此他不能苟同旧史学家李延寿把梁山之战的失败，臧质被杀，归罪于臧质“好乱”这一论断。他以一个战略家的心态和感情，为臧质这一仗的失败表示惋惜，赞叹臧质为“豪杰之士”，替臧质正了名声。

激赏《姚崇传》

众所周知，毛泽东生前酷爱读史，越到晚年越感兴趣。罗世荣在《毛泽东读史论文》一文中说，读了《新唐书·姚崇传》，“毛主席对姚崇的主张非常赞赏，誉为十条政治纲领，他认为这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这十条纲领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对我们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里所说的“十条政治纲领”，乃是先天元年（712年）姚崇向唐玄宗面陈的“直谏之言”。这十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改变武则天“以峻法绳下”的做法，为政“先行仁恕”；

二、接受丧师青海的教训，“不倖边功”；

三、纠正巧言媚上者犯法“皆得以宠自解”的歪风，“愿法行自近”（从皇帝近处开始执行法纪）；

四、改变“喉舌之任出阉人（宦官）之口”的做法，宦竖不参与国政；

五、禁止皇室亲戚、公卿、方镇“贡献以自媚于上”的陋习，“租赋外（概）绝之”；

六、改变“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的现象，“戚属不任台省”（不在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及御史台任职）；

七、克服“先朝亵狎大臣”的遗风，对下“接之以礼”；

八、改变谏官“以忠被罪”的弊端，“群臣得批逆鳞，犯忌讳”；

九、克服大造寺观“费钜百万”的奢靡之风，禁绝“道佛营造”；

十、接受汉代外戚掌握国柄祸乱天下的教训，不使外戚专权。

姚崇提出上述十条，切中当时弊病，被唐玄宗悉数采纳。应该说，唐玄宗在历史上创造了“开元之治”，与任用姚崇，实施他提出的十条纲领有关。

毛泽东为什么激赏姚崇的“十条”，有四条可鉴：

第一，有唐一代，留给后人的文籍浩如烟海。别的不说，单是一部《全唐

文》，收入的文章就有18488篇，作者3040人，其中有见地的政论虽然很多，但像姚崇这样对唐王朝的积弊洞若观火，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大弊端的，为数并不多。所以，毛泽东称之为“古今少见”。姚崇的这种远见卓识，是政治家应具备的。

第二，姚崇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说话毫不吞吞吐吐。他忧国忧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敢于为民请命，向皇帝直陈诤言，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风格。如果只是见得深而不敢直陈，他的主张也无益于时，无益于世，无益于民。正因为他既见得深又敢直言，才使正确主张得以施行，也使他名标青史。

第三，姚崇不但指出了积弊，而且提出了“政先仁恕”、“不倖边功”、“法行自近”，以及戒绝奢靡和允许“批逆鳞”、“犯忌讳”等切实可行的对策。只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算不得好政论。既指出病症，又对症下药，拿出良策，自然棋高一着。

第四，姚崇的“十条”，全文只有200余字，极其简洁，要言不烦，而且高屋建瓴，气势不凡。历史上好的政论，车载斗量，但像这样提纲挈领，短短200多字说清天下大事的，实不多见。这说明姚崇不仅对天下事烂熟于心，而且有很高的分析概括能力与表达能力。有了这种功夫，就可以纳天地于片纸，在短小的篇幅里讲清事关天下苍生的大问题，以少许胜多多。

毛泽东读史，非常注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治国安天下的典型事例决不放过，激赏《姚崇传》就是一例。

诗情与林彪

毛泽东对林彪的异心早有察觉，九一三事件前，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林彪集团反叛的疑似之迹时，毛泽东叫警卫员拿来一把白色丝绸折扇，提笔写下：“各求各志，各行各路，离凡离经，离因离果。”暗喻林彪将走“离因离果”的道路。

1971年9月6日深夜到13日凌晨，自封为“联合舰队”司令的林立果，在他父亲点头同意和叶群的帮助下，策划政变，图谋杀害毛泽东，演出一场震惊世界的闹剧。在连续六个昼夜的紧张活动中，这位被吹捧为“超天才”、“将才”、“帅才”、“宇宙之星”的林立果盲目自信，既不能知己知彼，又不会审时度势，一厢情愿地蛮干，成为乱碰乱撞的无头苍蝇。在某些方面，他无知到近乎白痴。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林彪像坐在深宫中的皇帝，盲目相信他的“老虎”真是什么“天才”，批准了林立果的行动计划，亲笔签发了可以便于行事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被林立果牵着鼻子，一步步走上了蒙古荒沙的不归路。人们说，按照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声望，毛泽东即使举行三中全会解决问题，也只能改变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让他靠边站，不可能把林彪一伙整死。毛泽东说：“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真正置林彪于死地的是他的老婆、孩子。坏在老婆身上，死在儿子手里，林立果才是林彪这位“常胜将军”的地地道道的“杀手”和“掘墓人”。

林彪的背叛，给毛泽东晚年一个极大的刺激。他对林彪的花言巧语表示过不安，但绝没料到，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伪君子。林彪又是他一手扶起来的“接班人”，所以，他的痛苦、愤恨，更多的只能是埋在心腹之中。有时，借助诗情来表达内心的失察之悔。

毛泽东曾用白居易《放言》诗中的四句来表露自己的心境：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尚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周公，指周文王的儿子姬旦，曾辅佐周武王灭纣，周武王死后，即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尽管他昼夜操劳，“一日三吐哺”，仍有流言袭来，说他将取成王而代之。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理解了他的一片真心。西汉末年的王莽则恰恰相反，未篡位之时对汉朝皇室和人民十分谦恭，声名鹊起，最终却灭了西汉，建立新朝。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一个人的一生必须盖棺才能论定。

1972年10月2日晚，毛泽东的诗友和故旧周世钊来到中南海，和他长谈了3个小时。周世钊拿出了一封早已准备好的4000字长信，交给毛泽东，向他面吐诤言。信中谈了8个问题：林、陈黑帮利用“文化大革命”，打击了大批党内外干部，应该派出中央检查团分赴各省市落实干部政策；林、陈对各种知识

分子也都扣上了臭字，或斥为反动学术权威，应予以平反；经林彪的破坏，学校、工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处于很少有人管教的状态，现在应该恢复共青团、少先队；理工科大学要提高教学质量；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开放一部分……

毛泽东的回答如何，不得而知。但在周世钊后来的日记中，曾记有毛泽东当时手写录明朝人李攀龙的一首诗《怀明卿》：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
离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愁在侍臣颜。

念罢，毛泽东接着说，如将“侍臣”改为“叛徒”，将此诗送给林彪是最恰当不过的。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呢？

试析诗义，可略知一二。

豫章，古地名，在淮南江北，即今江西南昌市。石镜，《水经注•庐江水》称，庐山之东有一石镜，为一明净圆石，可照见人形，毫发不差。

前两句诗是写于江西庐山之巅远望长江一带的景色，实际上使毛泽东联想到1970年8月底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风云。正是在这秋风怒号时节的会上，林彪集团不顾毛泽东多次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迫使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林彪的同伙陈伯达，才把事态暂时平息下去。其后，林彪集团终于铤而走险，发动了武装政变的阴谋。所以，后两句诗暗喻说，无须再用石镜去照他的面貌了，林彪在次年秋季出逃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毛泽东在吟诵这首诗后，还戏改了杜甫的一首《咏怀古迹》：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这首诗本来是写汉元帝时，湖北人氏王昭君出塞和亲。她一离开皇宫，就直向北方无垠的沙漠。现在，只剩下那青色的坟冢，默默地对着夕阳。

念罢，毛泽东又说：“明妃”指的是“林彪”。于是，我们看到了一首巧合无间的绝妙好诗。“荆门”，正是林彪的籍贯湖北。“一去紫台”，他离开了中

南海紫禁城，摔到蒙古温都尔汗的朔方大漠之中，只留下几堆孤坟面对沙丘落日。据当时的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回忆，他们前去查看收尸时，因不明真相，确实给林彪、叶群等人堆起了坟丘，还三鞠躬表示悼唁。

1971年10月16日晚9时，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等到毛泽东住址，向他汇报接待将于10月下旬公开访华的基辛格一行的方案时，毛泽东打趣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还念了唐朝杜牧的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与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谈到"长沙水武昌鱼"、"孙权搬家南京"的典故时，突然要叶剑英背诵辛弃疾的《南乡子》。叶剑英未加思索，当场吟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听了很满意，指着叶剑英说："此人有些文化。"接着念诗："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然后又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

毛泽东临终前两年的心绪是不平静的，他只有从读诗中去寻找寄托。龚自珍晚年的孤寂表现在"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毛泽东晚年大概也是这种心声吧，他借助诗情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阅报提倡独立思考

毛泽东主张阅报要有分析有见解。有一天保健医生王鹤滨，常规性地去了解主席健康情况，当王鹤滨要离开时，毛泽东叮嘱说："王医生，我的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看《参考消息》，你去看看，看过之后，再给我讲讲。"从这天之后，王鹤滨就开始注意《参考消息》了。过了两天，王鹤滨看到《参考消息》

上有一则重要的国际新闻，于是毛泽东醒后，他就带着那张《参考消息》走进了紫云轩。“主席，今天《参考消息》上有一条重要的新闻，我给您读读吧。”王鹤滨读完后，毛泽东笑了一笑。过了几天，王鹤滨又看到了一篇重要的国际新闻，于是抓住机会，便在毛泽东面前读了起来。毛泽东听后，带着格格的笑声，轻轻地对王鹤滨说：“不是你这个办法。你要好好地看上它几个月，到时候，你就会对形势产生一些看法，也就有了观点。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向我报告你对时局、形势的看法。”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指示说：“你可以订些香港的报纸，不管是什么观点的，拿来作参考，钱可以从我的稿酬中出。”后来王鹤滨才明白，这是毛泽东让他从《参考消息》中，从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中，从纷繁的事物现象中，抽出决定事物发展的因素，以及预计事物发展的观察思考力，从而通过读报来训练自己的政治头脑。

毛泽东是一位把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起来的人，然而他成为有文化的人却不是家传，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是古人的那些读书贵在独立思考的经验感染了他。在学生时期，他读书就表现出了独立思考，反对迷信，绝不盲从的良好习惯与品德。

毛泽东常对同学们讲：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复思考，批判分析，真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应该抛弃。我们不应该一味盲目迷信古人，崇拜洋人。当然，也不应该把他们全盘否定。毛泽东在读《韩昌黎全集》时，就是这样。凡是他认为道理对的、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批语；对他认为道理讲得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打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并不因为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学上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一位古文大家，就不问青红皂白，盲目崇拜，一概接受。

不论读古书，还是读洋书，读报纸，听课，听讲演，他总是批判分析，精心领会，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绝不人云亦云，盲目迷信。尤其在对待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则更为集中地反映了他独立思考的特点。当时，他和他的同学们一样。都热烈地追求西方的新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又极

其重视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并不盲目崇拜西方的东西。这一点可以从《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得到证实。在文章中，他主要是引用了中国古代重视实践的实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其中，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以及韩愈等人的文章中，共引用典故、成语、诗文近20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16人，近代人物3人。他对中国的旧文化，采取了“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分析批判态度，不搞历史虚无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也是采取了分析批判的态度，既不拒之门外，又不盲目崇拜、全盘搬用。这篇文章刊登在《新青年》上，对批判当时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反对迷信、绝不盲从的宝贵品格，促使毛泽东在经过了一条崎岖曲折的探索道路之后，终于在1920年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为他后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曾对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的王方名说：“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他读书阅报的显著特点就是独立思考，因而在分析综合各种问题时都有独立的见解，不受任何干扰。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2000份扩大到40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毛泽东用种牛痘增强免疫力，来通俗形象地阐述说明了独立思考、比较分析的办法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有效途径。

六、创新思维篇

与黄炎培的书信往来／“用自己的脑筋想问题”／用典故铸新词／“当今惜无孙仲谋”／论三国／为曹操翻案／评价秦始皇／谈古典文学／关于“毛粒子”学说／畅谈外国影片《红与黑》／反批历史

与黄炎培的书信往来

黄炎培是毛泽东交往的朋友中书信往来最多的一位党外民主人士。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公开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收入的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就17封（其中有两封是致黄炎培、陈叔通的）。从1949年开始，到1960年底，这11年时间里，毛泽东与黄炎培这两位老朋友几乎年年都有书信来往。黄炎培虽然年长毛泽东15岁，但他非常信赖毛泽东，尊敬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也总是以朋友相待，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开头总是称其为："任之先生、黄任老"，字里行间凝结着领袖的谦逊和朋友的真诚。最能体现毛泽东这一品格的是1952年9月5日《致黄炎培》的信和信中提到的，对黄炎培1952年9月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黄炎培的这篇讲话稿的题目是《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毛泽东对黄炎培的这篇讲话稿作了以下四点重要修改：（一）毛泽东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毛泽东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指一些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

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为什么要作这些修改呢？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道：“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儿，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接着，毛泽东对上述四点修改意见在信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最后，毛泽东又写道：“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原信系从右至左竖写，‘如右’即‘如上’），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话语谦逊而真诚。

说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相处，从不以领袖自居，总是那么谦逊、真诚，还有这样一个事例：1954年3月8日，黄炎培将他3月1日对上海工商界的一篇讲话的讲稿送请毛泽东指教。黄炎培在这篇讲话稿中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术语比喻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没有什么痛苦。毛泽东看了黄炎培的这篇讲话稿，认为“无痛分娩法”这个比喻用得不妥当，为此于3月12日给黄任老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毛泽东的意见到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他不强加于人，仅作为他个人的一点看法提出来供黄任老考虑参考。所以，他在写完上面这段话之后，紧接着又写了四个字：“尚请斟酌”。一个是“最好不写”，一个是“尚请斟酌”，领袖谦逊的美德跃然纸上。黄老很高兴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修改讲稿时就把“无痛分娩法”的提法去掉了。毛泽东与黄炎培一封封书信的交往，是两位朋友心与心的交流。随着一封封亲笔书信的往来，毛泽东与黄炎培这对朋友的心贴得更近了。

1958年“五一”节，1959年元旦，黄炎培曾将他近期写的诗赠给毛泽东。黄炎培呈献给毛泽东的诗，都是用毛笔书写的，大都是楷书和行书，是诗作，也是黄任老的书作。黄任老的行书流畅自如，自成风格；楷书功力深厚，笔力遒劲，端庄刚健。黄炎培的墨迹诗稿大都是50年代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辞世时，游泳池他的书房里还放有黄炎培赠的诗稿墨迹册页。毛泽东把黄炎培

的诗作墨迹一直摆放在自己的书房里，由此可知，毛泽东对黄炎培的书法是很喜爱的。

黄炎培经常给毛泽东送诗稿墨迹，毛泽东收到之后除及时复信外，也常有回赠。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全文写完之后，特意又加写了这样一句话："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毛泽东在信中说的"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这一年他填的一首词是《浪淘沙·北戴河》。毛泽东在信中说的"今年"即1956年填的一首词是《水调歌头·长江》(1957年《诗刊》一月号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心有灵犀一点通。毛泽东是我国当代书法大家，黄炎培在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他们共同的爱好，频繁的书信、诗作墨迹的交往，使两位朋友的友谊不断增进。

《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入的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最后一封是1960年12月5日写的。在这以后，直到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逝世，这对朋友之间还常有诗作、书信往来。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有他老人家的遗物中，就看到黄炎培1961年"敬献毛主席存教"的《诗十二首》和1963年2月20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诗十二首》的总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颂》。这12首诗，黄任老是用毛笔行书体书写在一本装帧别致的约32开大小的册页上的。诗作的第一首是这样写的：

十月飞来炮一声，众人梦里几人醒。
大功作始由来简，一席倾谈信念萌。

诗后黄任老还用蝇头行书小字加了一段注："1921年7月党在上海开会成立，我来北京访李大钊问知大概，使我对党起了初步的信心。没有知道毛泽东早在1919年7月就论述了救国的根本方法——李维汉文，《红旗》1961年第11期。"

诗作的第五首是这样写的：

知识全从实际来，调查研究四言该。
良箴字字皆珠玉，手札纷披读百回。

在这首诗的后面，黄任老也用蝇头小字加了一段注："毛主席延安指示，仅有书本知识的最好回到实际工作里去。解放后，我受职中央轻工业部，毛主席面示工作方法，了解情况，了解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黄炎培晚年，倾心于《八十年来》的撰写。到1963年2月上卷写出了初稿，即打印呈送毛泽东。在送书稿时，他非常动情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1963年2月20日写的，随信附上的《八十年来》上卷为打印件，封面上的"八十年来"、"上卷"、"前言"、"第一时期"、"第二时期"等文字都是黄炎培用毛笔亲手书写，在封面的右上方，黄炎培书写的"毛主席赐教"五个大字尤为醒目。

《八十年来》上卷稿，毛泽东收到后是用心阅读过的，不少地方还用黑铅笔画了道道。黄炎培的信和《八十年来》上卷书稿，现在都还收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用自己的脑筋想问题"

毛泽东从来都强调要独立思考，启发大家阅读古典小说时，要对历史人物做正确分析评价。

吴旭君清楚地记得，1954年夏季在北戴河，休息时毛泽东常读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吴旭君问毛泽东这是谁写的诗，很有气魄。毛泽东告诉她这是曹操写的《步出夏门行》的第一章《观沧海》。

"曹操还会写这么好的诗?"吴旭君感到奇怪。

"大学生连这个也不知道，该补课了。"

"我从小到现在，凡认识的人都说他是奸臣，戏台上也是个大白脸。"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诗人，能文能武。那时封建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三国时代魏蜀吴的魏国就是他建立的，他统一了北方，打击了豪强，实行屯田制，开荒生产，提倡节约，改革了东汉的弊制，使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进步，难道不该肯定吗？说他奸臣、白脸，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

有一天他向秘书要地图，边看边说，“曹操来过这里”。

“曹操也来过北戴河?”吴旭君连忙问。

“来过北戴河，登过碣石山，在建安十二年5月，他出兵打败乌桓，得胜后经过碣石山时写了《观沧海》这首诗。”毛泽东后来还要登碣石山。

“曹操能带兵打仗，也能了解民间疾苦，征战30多年，手不释卷，喜读书学习又喜作诗，登高必赋，我喜欢读他的诗。南唐后主李煜写过一首《浪淘沙》你读过吗?”

“是‘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那首吗?”

“是，他的用词、意境都很美，但是情调柔弱、伤感。婉约派的作品我不大喜欢。你看曹操的诗气魄雄伟，给人鼓舞。真男子气，是大手笔。”

隔了些天，又谈到诗词时，毛泽东劝吴旭君多读读曹操的诗。他说：“《龟虽寿》也是一首好诗。你当医生的更该读读。”

“曹操不信天命不信神，他承认人总要死去，不能长生不老。本来嘛，有生有死，哪里有长生不死之理，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生、老、病、死这是新陈代谢，是辩证法的规律。孔老夫子如果一直不死，恐怕快2500岁了吧？那世界上该成什么样子了！”

“那么说曹操还是唯物主义者呢?”吴旭君笑着说。

“陆游也说过‘死去元知万事空’，都是唯物的。人会变老，老不服老，‘老骥伏枥’那四句讲得多好呀！要老当益壮嘛!”

“在医学上讲‘生理年龄’老了，‘心理年龄’要年轻才好。”

“‘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更说明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曹操多年军旅生涯，生活不会很安逸，离现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吧，他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你们搞医疗保健的

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革命乐观，心胸开朗，锻炼身体。我的原则是：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

毛泽东读书常用对比的方法，他曾要各种版本《楚辞》及有关屈原的著作，秘书为他搜集了50多种。他最爱读《离骚》。读唐诗宋词也要各种版本，他注重不同版本不同内容。有一次他要看中译本《茶花女》及《拿破仑传》，要多种版本。找来后吴旭君也和他同时看，吴一本还没看完，他已看了好几本。他读得快，重要情节一点也不漏。吴旭君问毛泽东：“你看哪一本写得好?”

毛泽东都看完再问吴旭君：“《茶花女》怎么样?”

吴旭君回答：“我不能看原文，只好看翻译本。”

接着吴旭君又提出问题：“为什么要看几个本子呢?”

毛泽东说：“一个人赛跑总是他第一，多几个人跑就分出高低了。”

毛泽东对问题的认识分析，从不受书本的、世俗的、历史的、舆论的束缚。他喜欢独出心裁，独立思考，有理有据地提出独到的见解。他也经常鼓励别人“用自己的脑筋想问题”。

吴旭君至今不能忘却，毛泽东给她讲的一个故事：是说一个老人带着孩子赶着驴驮着货去集上卖，卖完货回家时老人叫孩子骑驴，自己走路，过路人说“孩子不懂敬老”。老人叫孩子下来走路，自己骑驴，过路人说“老人不知爱幼”。老人把小孩抱起，二人骑驴，过路人说“不爱牲畜，太残酷了”。老人和小孩都下来跟着驴子走，过路人说“有驴不骑是呆子”。老人摇头叹气对孩子说：“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我们俩人抬着驴子走吧！”

这使吴旭君想起了一首《江南谣》：“做天莫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秧要日时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干。”毛泽东是在告诉她要“用自己的脑筋想问题”。如今，毛泽东虽然故去，但他所讲的道理仍然在吴旭君的脑海里翻腾着。她回味着毛泽东的思维确有独到之处，他读书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而是通过读书启发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探索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律，从而由

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

用典故铸新词

1956年6月的一天，63岁的毛泽东从长沙乘专机飞往武汉。一下飞机，毛泽东便兴致勃勃地挥手对王任重说：“游水去！”

毛泽东从机场乘汽车到了江汉关码头。“轮渡二号”已经停靠在码头待命。毛泽东上船后，“轮渡二号”即静静地驶离码头，从蛇山、黄鹤楼下边的江面上悄然掠过。那时，长江大桥还正在施工，两三个桥墩已冒出水面。“轮渡二号”避开了大桥工地，稳稳地停泊在远离桥墩的下游江面上，请毛泽东从这里下水。

毛泽东在身边卫士的保护下，从“轮渡二号”下到一只小木船上。木船上挂着特制的梯子。毛泽东双手抓着梯子，面对木船，背对江水，一级一级地下了梯子，身体触到了水面，又抓着梯子蹲下去，把身子埋到江水里湿了湿水，才松下手跃入江中。

老人家游过了江汉关，又过了滨江公园，一直向下游到一个名叫甚家矶的地方，已经游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有40里，大家请上船休息，老人家正游在兴头上，还要继续游下去。下边河道有一道沙洲，河道被沙洲分成了两股狭窄的水道，水道里水流很急。大家又力请毛泽东上船，他才不那么情愿地上了小船，再度由卫士搀扶着，攀缘梯子，回到“轮渡二号”上休息。

毛泽东上船后，冲了冲身子，穿上了浴衣，坐上躺椅，卫士给他点了支烟。又喝了一点点茅台酒暖暖身子。

毛泽东游水后稍事休息，已经到了下午两点钟，早该吃午饭了。工作人员事先已把厨师、服务员和一个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炉都带到船上来了。他们还带来了特意从樊口采购来的又大又肥的鳊鱼。这顿午餐就是在船上吃的。

事后，毛泽东词兴大发，作词以记此事：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自词体产生后的千余年，咏游泳者不多见，咏长江游泳者更没有听说过。毛泽东写的《水调歌头·游泳》是咏长江游泳之第一词。写游泳又不局限于游泳，而能感物吟志，见景抒情，展望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前景，的确是一篇述志抒情之力作。此词风格豪放潇洒，气势雄浑奔放，意境开阔深远，想象瑰丽大胆，情调浪漫美妙，语言精彩生动，是毛泽东创作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诗词完美结合的代表作之一。

1956年12月，毛泽东将这首新词书赠给黄炎培、周世钊时均题为《水调歌头·长江》。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录陈审正。"《诗刊》于1957年在创刊号上发表，改题为《水调歌头·游泳》

关于词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同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说："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

同时又在这本大字本诗词书眉上批注云："武昌鱼：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作口号云：宁饮扬州（建业）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现在改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顺口念了两副传世名联："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接着说："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

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才饮长沙水”是具有一定含义的。毛泽东的随员说，毛泽东来武昌那天，先在长沙看了清水塘，那是他年轻时代跟夫人杨开慧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清水塘有一眼很有名的水井，他看清水塘的时候，又特意喝了这眼井里的“长沙水”，然后从那里乘汽车直奔机场，登上伊柳14型飞机，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毛泽东从长沙坐飞机到武汉，途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从机场到江汉关码头上船，用了半个小时；下水游长江用了两个小时，从离开长沙清水塘，到中午用餐吃了清蒸鳊鱼，相隔五个多小时，所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是最恰当不过了。

那么，樊口鳊鱼何以成了“武昌鱼”呢？毛泽东诗词一出，注家蜂起，许多学者、专家都去考证，有的却不十分准确。

毛泽东善于用典，他的历史、地理知识十分丰富，众多典故颇费猜测。“武昌鱼”的考证，还得感谢当时香港《大公报》的一位记者。他得知毛泽东“万里长江横渡”后，便找到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抢新闻。但是，当时毛泽东游长江属于内部机密，湖北省委和中央公安部都严守机密，不肯透露半点信息。逼得这位记者一头钻进湖北省博物馆里去查找资料，还作了实地考察。一个多月后，他喜滋滋地宣布考察成果说，“又食武昌鱼”的“武昌鱼”应为樊口鳊鱼。他考证的结果是樊口古为鄂城管辖之地，鄂城古称为武昌，故而樊口之鳊鱼即武昌鱼也。因为是江、河、湖交界的闸口，里湖外江，此鱼在闸口上进进出出，兼得江、河、湖水的滋养，练就了一身肥而细腻的好肉，特别是鱼头靠肚皮之间，脊背上的那块肉格外鲜嫩好吃。所以工作人员以最好的樊口鳊鱼做给毛主席吃，不料想从此成就了“武昌鱼”的历史地位和赫赫大名。

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善于用典故铸新词。

“当今惜无孙仲谋”

孙权是三国时期一个很有作为的人物。《三国演义》里描写他“碧眼紫髯”，很有异相。他知人善任，先后选用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使他能继长兄之业，雄踞江南，与魏、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

毛泽东很欣赏孙权。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他的著名词作《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高度赞扬了孙权，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首词，多次圈阅，经常诵读。

1957年3月，毛泽东乘飞机从南京到上海，在飞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俯视当年的京口和滚滚江流，提起笔来，写下了这首词：

>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写毕，毛泽东向身边的随行人员讲解这首词的意义和所用典故。孙权当年在曹操数十万大军压境之际，力排众议，作出联刘抗曹的决断，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早年读书时，曾说过“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

1975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又说：“(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当今惜无孙仲谋。”毛泽东尤其欣赏孙权劝吕蒙读书一事。1958年9月，他到安徽视察工作时，对随行的罗瑞卿、张治中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说过仅仅从读书和不读书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他说，三国时候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济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

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不读书肯定不行，光知道读书也不行。毛泽东既痛多读书之误，又慨不读书之陋，看问题还是要辩证，要全面。

尤其到了晚年，毛泽东每谈及三国时，都把吕蒙和张昭作为读活书与读死书的典型，来教育干部看问题不要偏颇，要正确认识读书的真谛。

论三国

一天晚上，毛泽东请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他说："我们论三国，替古代担忧吧?"随即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虢亭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谈到热烈之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李越然回答不出。毛泽东接着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

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5600万。"

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估计算是5600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

郭沫若回答："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王粲《七哀诗》后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

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深深叹息继续说:“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谈古论今,毛泽东尽情抒发自己的创新思维。

为曹操翻案

曹操是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旧史学家评价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随着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的人物造型脸谱化,曹操被视为“旷世奸雄”已成为我国妇孺皆知的事。千百年来,偏见掩盖着历史的真实。毛泽东在一部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中,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有关曹操部分,作了不少圈画和批注。他主张对曹操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曹操生于东汉末叶。汉末爆发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强烈地震撼了刘氏王朝的统治。各封建氏族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割据称雄,曹操是其中之一。他被汉献帝授封为大将、武平侯,通过20多年艰苦的军事兼并,平定了北方各封建氏族的割据分裂,在全国形成蜀、魏、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毛泽东曾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议论曹操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另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充满感情地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

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在《魏书·武帝纪》中，毛泽东圈画批注得比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经历和战绩外，主要是曹操所采取的政策。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它对恢复战乱中被破坏了的农业，对支援战争，都起到积极作用，为晋统一全国打下物质基础。毛泽东对此很重视。《魏书·武帝纪》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以及卢弼、裴松之有关这方面的注释，他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强兵足食，秦人以农业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毛泽东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给予高度评价。《魏书·刘表传》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画着曲线，天头上批注：“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孟德是曹操的字，曹操对待俘虏表现出的豁达大度，确实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胜利起到很大作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的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后，可去。”毕谌去后就没有回来。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他的性命担心。曹操说：“夫人孝於其亲者，岂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不仅没有杀毕谌，反任命其为鲁相。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搏而用之”。这仅是曹操“不杀降”的两例。毛泽东一向反对虐待和杀害俘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为我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八条，严格规定“不虐待俘虏”，这对严肃军纪，瓦解敌人起到很大作用。因此，他蔑视刘表的做法，认为“杀降”，是像曹操这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政治家所不会做的。

曹操生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位尊权重，自己却未曾称帝。这和东汉末年割地称霸的风云人物相比，其政治远见高出一筹。毛泽东对他这一点也颇为看重。《魏书·刘表传》中说：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对此批注：“虚有其表”。

卢弼在传记中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占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对此又把他与曹操相比，批注：“作土皇帝，孟德不为也”。

在这里，毛泽东再次称赞曹操在政治上与众不同，高出刘表一筹。

《魏书·武帝纪》裴松之的注释中，引用《魏武故事》记载的一段史实，它是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12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说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等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除作了考证、订谬外，更对曹操提出许多指责。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改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指责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即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指责他“皆欺人语也”，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録，亦恶言不由衷耳”。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则认为这是：“文词绝调也，惜出於操，令人不喜读耳。”毛泽东对卢弼的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批注：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觀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的这个批注认为，卢弼对曹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卢弼用旧史学家的正统思想，先入为主地视曹操为奸雄，对曹操的功过是非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同意的。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

衡是东汉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没有重视这一人才反而污辱他，被祢衡大骂，祢衡后为黄祖所杀。鹦鹉洲相传是祢衡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肯定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毛泽东认为对曹操的这个评价才比较合乎实际。

1927年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50年代读到鲁迅此文中上述评论时，用红铅笔画上了粗粗的着重线，表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是非常赞同的。

曹操不仅武功卓著，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且酷爱文学，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都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当时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形成了被文学史家称作黄金时代的建安文学。毛泽东很喜爱曹操的诗文，在故居藏书中有四种不同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其中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卻东西门行》等诗篇，毛泽东多次圈画。大多数诗的标题前画着圈，诗中有浓圈密点。在《短歌行》的标题前，有红、蓝两色笔迹画的圈记。诗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处，都密密地加了旁圈。毛泽东爱读《龟虽寿》和《观沧海》两首诗，不仅反复读，多次圈点，还用他那龙飞凤舞的狂草手书全诗，作为练习书法的内容。《龟虽寿》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两句，有不信天命，自己掌握命运的朴素唯物论色彩，毛泽东很欣赏。1961年，他写信给胡乔木劝其安心养病，信中引用了曹操这首诗。并说："此诗宜读。"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1月2日，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访问。当晚，他请胡乔木、郭沫若到住处一道用餐，边吃边谈中，毛泽东首先提起《三国演义》的话头，他们夹叙夹议，谈得很热烈。毛泽东忽然转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

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郑州会议上，在谈到殷纣王、秦始皇的同时，谈到了曹操。毛泽东说：“殷纣王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

同月，毛泽东在河南接见安阳县委书记时谈到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同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把曹操当作奸臣来描写，《三国志》则把曹操当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

他还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的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案”。

1959年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两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

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教授吴祖湘写的《关于〈三国演义〉（三）》，毛泽东读后，即于吴文发表的第二天，专门请其办公室秘书林克找来吴文《关于〈三国演义〉之一、二》来看一看。他对吴文中关于不能因为《三国演义》中有“拥刘反曹”的正统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观点，十分注意。此次，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亦可看出他对曹操是有所评价的。

1973年5月25日，毛泽东谈到郭沫若一生“功大过小”时专门指出：郭沫

若“为殷纣王、曹操翻案”，“是有贡献的”。

1976年，毛泽东为了说明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还举曹操没有上大学的例子加以说明。

毛泽东一反历来史家对曹操的评价，摒弃了正统观念，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扭转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偏见，恢复了曹操的本来面貌。这些都说明了毛泽东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审视和评价历史人物，对指导学术研究是有意义的，这绝不是单纯去打笔墨官司，而是端正了历史研究中的方向问题。

评价秦始皇

毛泽东一生中点评最多的帝王，恐怕就是秦始皇了。

史家历来对秦始皇的评价有争议，秦始皇的名声并不好。但是，毛泽东对秦始皇的看法却与众不同。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就对老师徐特立说：“所以呢，治理中国，一定要中西结合，洋为中用，一定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1958年5月8日下午5点，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道：“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嗜古非今者杀全家’，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这时，在一旁的林彪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竟忍不住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对“焚书坑儒”这句话很敏感。新中国成立后，有些民主人士曾就此话暗示过共产党的一些做法。毛泽东反复同他们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一次，他对章士钊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

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前2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说过……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想。"这段话是个性化的，有要做翻案的味道，但毛泽东视之为"教训"，让人们"想一想"，都不乏有深意。

因此，在听到林彪插话后，毛泽东瞟了他一眼。他就是这样的性格，认准了的，你越反对，他越坚持，特别是他的威望开始达到顶峰的时候。接着，他索性把话挑明："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们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各大协作区主任会上，谈及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时说："各县社都要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的理念，一种独特的通俗解说。

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再一次详细地谈了对秦始皇的评价。他说："说秦始皇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太武断了。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各国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

毛泽东认为：秦始皇有独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面。后者在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取得成功的一个积极因素。因此，毛泽东说："秦始皇是个好皇帝"，"即使是焚书坑儒，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460人"。

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还把秦始皇和孔子比较。他说："我们

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1965年6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胡志明时，又谈道：“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毛泽东提出：“要学习和借鉴秦始皇善于集中力量于主攻方向，同时要学会走群众路线。”1959年他在上海会议上说：“历史上的秦始皇搞专制独裁，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

1970年6月19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艾南希时，林彪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毛泽东又说起秦始皇，他说：“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就是这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中国这个字有两说：一个叫瓷器，没有A字，就是CHIN(秦)。这个皇帝可做了些事情呢。人家骂他可骂得厉害。”

到了1974年7月17日，晚年的毛泽东在接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说：“有人骂我，说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是一派，只有460多人，他崇尚法家。郭老对历史分期的看法是对的，但是他的《十批判书》有错误，是崇儒反法。法家是前进的嘛！我们的社会发展，要前进……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坑儒也不过坑了460人。”

8月5日，毛泽东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说：历史上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

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

9月23日，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毛泽东又说到秦始皇。他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从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在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外，毛泽东也指出了秦始皇所做的蠢事，如去找"什么长生不老药"，这就不高明了，也是他愚蠢的一面。

可见，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但主要是肯定。

谈古典文学

1965年6月20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用过早餐，便带着孙子、外甥女去上海杂技场看杂技。正当他排队买票的时候，女儿匆匆忙忙地来告诉他，家里来了一辆小车，说有位首长要见他。于是，刘大杰便走出队伍，一辆小车把他带到了上海西郊的一个别墅。

当刘大杰走进别墅时，见毛泽东正坐在藤椅上。他又惊又喜，忙迎了上去。

香烟摆在小桌上，两边各放一只藤椅，刘大杰就在毛泽东对面坐下。开始时他有些拘束。后来见毛泽东很随便，也就随便起来，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烟。

毛泽东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刘大杰用不太重的湖南口音说："巴陵人。"

毛泽东听罢，立刻朗声吟道："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在他背诵完杜甫《登岳阳楼》的全诗后，两人开始了对文学的谈论。

当时，刘大杰就蔡琰的《胡笳十八拍》问题，正与郭沫若进行争鸣，又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与茅盾展开讨论，而毛泽东对这些都注意到了，幽默地对他说：“你现在和沫若不睦，和茅盾矛盾。”

刘大杰不禁笑了。

“你跟前辈的人敢于争鸣，这很好嘛。”毛泽东鼓励道：“你这个战斗精神，希望能继续发扬下去嘛。你参加百家争鸣，不要怕丢掉名誉地位。”

当时，毛泽东已读过刘大杰的有关《胡笳十八拍》的文章，也读过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他这套文学史还算是比较好的，基本上能自圆其说。

两人当时谈得比较多的古代作家有陶渊明、韩愈、李商隐等。毛泽东早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在国文教师袁仲谦指导下，曾熟读过韩愈的文章，因此，毛泽东认为韩愈的文章写得实在好，非常流畅。

当时，他们还谈到李商隐的《无题》诗。毛泽东说：“《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并与刘大杰谈到了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诗。在谈到《贾生》一诗时，毛泽东问：“能背得出吗?”

刘大杰立刻以湖南乡音吟诵道：“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听罢，喟然叹道：“写得好哇! 写得好!”

两人当时还谈到了杜牧的诗，刘大杰很推崇杜牧的《河湟》，毛泽东则谈到了杜牧“胜败兵家事不期”——即《题乌江亭》那一首。

当时毛泽东还对刘大杰说：“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作结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中去。”

这次谈话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到吃午饭时，刘大杰方才离去。

70年代，刘大杰根据毛泽东有关评法批儒的精神，曾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当时，他认为韩愈虽非法家，但也不是醇儒，并以韩愈的《进士策问十三道》之五、《读鹖冠子》、《后汉三贤赞》、《读墨子》、《讳

辩》、《毛颖传》等文为证，详加分析，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历来是主张“一分为二”的，刘大杰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是符合这种精神的，况且他老人家少年时又曾熟读过韩文，在延安时又与丁玲等谈起过韩文，也不忍心将韩愈一棍子打死，就给刘大杰复了信，同意了他的这种看法。

于是，刘大杰就在197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中，提出了“韩愈并不是醇儒”的看法，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并没什么新鲜，但在当时一片臭骂韩愈、扬柳抑韩的声浪中，也算是有一点儿突破了。

从毛泽东与刘大杰的接触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钟爱，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造诣。

关于“毛粒子”学说

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回忆说：“1973年夏天，当北京旅游局问我在中国想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最终鼓足勇气问能否见到毛主席。第二天我由于提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而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旅游局的人说：‘不，你完全不应表示歉意。许许多多人都曾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样，我心里才觉得平静得多。所以当我几天后接到通知说毛主席有点空想要见我的时候，我感到惊异并且感到非常荣幸。”

杨振宁到中国，既不是以记者身份去的，也不抱有任何具体的目的，唯一的目的是想促进中美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所以当杨振宁去见毛泽东的时候，没有任何拟定的问题要问他，也一点不知道谈话大概会怎样进行。其实，这样倒也好，因为这是一次非常轻松的漫谈性的谈话，毛泽东非常有办法使被会见者不感到拘束。

毛泽东问杨振宁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正在做些什么，杨振宁告诉他正在研究基本粒子的结构的时候，毛泽东对此非常感兴趣。使杨振宁感到惊奇的是，毛泽东显然是一直密切注意着当代高能物理学的某些发展情况，特别是基本粒子是否可分的问题。杨振宁告诉毛泽东这个问题仍然在激烈的辩论，迄今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涉及许多方面。比如，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曾推测过物质的结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作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当时新兴的尖端科学的研究情况。1955年1月15日下午，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参加扩大会的有李四光、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来上一课。"接着，他就同中央其他领导一起仔细听李四光、钱三强的讲解。当钱三强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钱三强回答："是这样。"毛泽东又问："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这一句把钱三强问住了，因为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最小物质单位是质子、中子，这是被认为是最小的基本粒子，对此世界各国科学家从未怀疑过。钱三强停了一会儿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从容地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听到这句话，当时在场的科学家们都沉默了，有的人露出怀疑的神色。毛泽东自信地说："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毛泽东坚持微观物质无限可分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以对立统一规律讲社会主义矛盾时，提出"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在同年11月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更提出："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正因为毛泽东把握了辩证唯物论的精髓，又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作出质子、中子、电子也是可以分的预言。

毛泽东说过："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

1964年8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当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向他介绍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时，毛泽东对坂田教授的文章给了很高的评价。

第二天于光远和周培源接到通知，毛泽东要召见。他们猜想，可能是谈坂田的文章。果然，下午1时，他们到达毛泽东的卧室时，老人家一开头就告诉他们要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毛泽东办公，经常不分昼夜。有时通宵达旦，白天休息几个小时。这时，他刚刚睡醒，还穿着睡衣，又开始了工作。毛泽东谈话时，或躺，或坐，或来回踱步，谈笑风生，引人入胜，完全是商量、探讨、研究的口气，使他们毫无拘束，就像在老朋友家里做客。这次一直谈了三个钟头。

毛泽东视野开阔，思想精深、语言生动，从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谈起，对许多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

毛泽东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毛泽东特别重视认识问题，经过毛泽东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对科学研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首先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千千万万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分割下去。"毛泽东还讲道："现在我们对许多事情还认识不清楚，我们对太阳搞不十分清楚，从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也不清楚，关于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

竟怎样从非细胞到细胞？许多事情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毛泽东十分强调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的发展，把辩证法贯彻于认识的全过程。毛泽东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毛泽东从太阳到地球，从水的合成到细胞的产生，举了许多事例来论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发展。毛泽东说：“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我们见不到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因为他一定要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毛泽东谈的是彻底的辩证法。一种科学的理论不会害怕自己作出的结论；如果一种理论对自身是不适用的，那绝不是科学。

1978年在美国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美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在答记者问时，有感于中国高能物理科学工作者，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粒子仍然具有结构无限可分的唯物辩证法观点，于1965—1966年提出由强子构成的“层子模型”，表明微观的物质同样是由无限系列的层次构成的，称组成强子的至粒子为“层子”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为了纪念已故的毛泽东，他提议把中国最早提出比基本粒子更深层次的物质命名为“毛粒子（Mao—

Particles)”。并且，格拉肖公开声明：他自己过去认为“夸克的出现将宣告物理学的结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格拉肖尊重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而且能够接受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唯物辩证法观点，改变自己的看法，这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

在科技领域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名字命名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畅谈外国影片《红与黑》

毛泽东的晚年，或许因为身体状况不佳，或许因为他的特殊地位，他的客人不多，子女又不在身旁。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委员及其他领导，很少来毛泽东这里做客。若谈工作，多半不是面谈，而是用文件、书信、电话的方式进行。

因而，毛泽东的客厅里常常是宁静的。他那宽敞的客厅，四季是窗帘垂地，紫红色的天鹅绒窗帘极少拉开，总是遮得严严实实，外面的风霜雨雪，春花秋月，似乎与这里毫无关系。那厚厚的紫红色的纯毛地毯，使用多年总是一尘不染，客厅里装饰的是一种暖暖的色调，灯光柔和，空气新鲜，使人感到宁静、舒适、幽雅。

毛泽东的客厅里，挂有一幅很高级的电影屏幕，平时用紫红色的天鹅绒布挡住，放电影时，便轻轻拉开。毛泽东常常和工作人员在这里看电影，看录像，每当看完之后，常常有一番议论。当然，这种议论的气氛是相当活跃的。人们各抒己见，毫无顾虑。

一天下午，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块看电影，电影的名字是《红与黑》。看过电影后，大家不免对片中的情节和人物进行议论，客厅里出现了少有的热烈气氛。

毛泽东这时虽然并没有显出疲劳的神态，但只是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不知是在倾听，还是在深思别的事情。

当大家看到毛泽东拿起一本书开始读起来的时候，便都很自觉地离开了，大厅里又恢复了往时的宁静。

毛泽东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坐在那里的小孟，放下手里的书，问道："孟夫子，刚才的电影，有何意见哪?"

毛泽东并没有等小孟回答，也许他根本就不想让小孟现在回答，而是接下去说了一句小孟没有想到的话："有何高见，今日可以不谈，你去小周那里借一本《红与黑》的书，看它一遍，然后再谈。书里的东西，有时是电影里无法表达的。你不是读过《红楼梦》吗? 还可以再借一本《红楼梦》，对比着看一遍。这样，也许会更有意思。"

毛泽东不止一次读过《红楼梦》，并能对全书及书中各种人物作出独特的评价。当然，总是有他独特的标准，有些评价，猛听起来，似乎像是漫不经心地说笑话，但若细心地咀嚼起来，却又不得不承认，他有他的道理。

他对王熙凤的评价甚高，认为王熙凤是当内务部长的材料，称赞她有战略头脑。一次，他风趣地举例说："王熙凤处理尤二姐'事件'，真是有理、有利、有节哟。"

毛泽东还说王熙凤善使两把杀人不见血的飞刀。"你看，她把个贾瑞弄得死而无怨，至死不悟。"

毛泽东对《红与黑》也颇为喜爱，多次读过。西方的小说，这可能是他读得最仔细的一部。他曾几次建议别人读这部小说。

这一天，又该小孟值班。那是初夏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漫谈式地把《红楼梦》和《红与黑》相提并论起来。他戏谑地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两个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接着，毛泽东问小孟："怎么样。两本书都读完了吧?"

小孟点点头。

"今天我们先谈谈西方的'红楼梦'。你看了电影，又看了书，现在有发言权了，请先发表高见。"

小孟由于做了认真的准备，便一二三四滔滔不绝地谈起来。

毛泽东知道小孟的习惯，她说话又快又急，不会半截停住的，所以只是静静地听，并不打断。

小孟说："我看那个于连是个胆大包天、无事生非的坏蛋，不值得一点点同情。他不安于职守，还想入非非，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

看到小孟讲完了，毛泽东再慢慢地，但十分自信而肯定地说出他与小孟的不同看法，并铺陈展开，大谈特谈："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于连是有些胆大，可还没有大到包天。你看他只敢在小桌底下摸夫人的手，还是在夜晚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点儿胆子称不上包天。他到夫人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哪。即便是胆大包天，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儿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

"那么，您是说于连是个大好人了？"当毛泽东停下来的时候，小孟忙问了这么一句。

"说于连是坏蛋，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角度不同，结论也不一样。站在这边看看是个坏蛋，站在那边看看，也许又是个大大的好人。"

听到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小孟又想起了毛泽东平日很少同意别人的看法。总有标新立异之见，因而也觉得不奇怪了。

毛泽东喝了一口水，又继续说下去："你说于连不值得一点儿同情，我可还是多少有些同情他。你看他多可怜，想说的话吞吞吐吐不敢全说出来，想干的事躲躲闪闪不敢做出来，这还不可怜吗？你说他不安于职守，这点算你说对了。可那是什么职守？这和感情可是另一回事。人是有理智的动物，可更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来了，可是什么也挡不住。所以，为了感情影响了他那职守，我看也无足深怪嘛。你说对不对呢？"

小孟感到不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感情的力量有时是不可战胜的。"毛泽东又补充了这样一句，然后，他又接着谈起来："你说于连想入非非，可孟子曰，那可是个真的孟夫子说的，'心之官则思'。头脑这个东西天生下来就是要想事的，你让他不想，除非他

是个傻子。所以，他要想，还要想的厉害。他是知识分子嘛，脑子里好使得很呢。你说他‘非非’，他说‘是是’，孰是孰非，很难说呀。”

“你还说于连破坏了别人的家庭，还是个幸福家庭。帽子好大呀。真的幸福家庭是破坏不了的，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的，当然就有反抗。这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我看于连是个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

“你不了解那时，也就是19世纪的西方家庭，尤其不了解那些家庭里的残忍和虚伪。国外有一种舞会，参加者都戴个假面具跳舞。我看他们不仅在舞会上跳，在家里，在社会上，也还是戴个假面具跳。由于大家都跳，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观者习惯，跳者自然，谁都见怪不怪了。正像人的眼睛，从科学的观点上看，那图像应是倒着的，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是正的呢？那也是习惯使然嘛。大家都这么看，都这么觉得，所以，反的变成正的，正的呢，又成了反的，错的往往成了对的，对的又成了错的。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的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观。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观不对，不但要迷，有的还执迷不悟。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是凑凑合合地过。因为这些家庭，本来就是凑合起来的，真正独立自主选择和建立家庭的有多少？我看不多。什么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哪个不想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不是仅供参考。不听，试试看？建立家庭时都是将就将就的，过起来难免就凑合凑合。表面上平平静静或热热闹闹，内里谁能说得清？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对外越需掩盖，越要装门面。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不过也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我说过，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书中的那些人，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得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

小孟完全被毛泽东这样漫谈式的学术探讨吸引了。但她不甘心自己的观

点都被否定，于是，她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于连把人家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裂总不好吧?”

毛泽东听了，竟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边笑边讲他那句讲过不止一次的话：“不破不立嘛!”

听到这里，小孟又反驳说：“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简直不择手段，不像个男子汉，不像个堂堂正正的人。”

毛泽东听了，收起了笑容，也严肃起来，但看得出，这是在探索问题时所常出现的一种神情：“照你的看法，男子汉，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该往下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要爬。爬，那是动物的一种动作。狗爬，猴子爬。人嘛，可以走，可以跑，但有时也要手脚并用地爬一下。如上山，也叫爬山。但人只能偶尔爬一下，不能一生总在爬。偶尔爬一下，人们还承认你是人，如果一生都在爬，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要怀疑你是不是人啰。”

“当然，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要的东西又都在崖上头，看得见而够不着，他不能走，不能跑，所以只好爬，拼命爬，直到从崖上摔下来，粉身碎骨。”

“如果于连是个有权有势的人，而那个夫人又是个穷人家的女奴，结果将会怎样?”

小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怔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那就好办了，于连就娶这个女奴呗。”

毛泽东说：“换个位置，好办多了，有钱有势就可以得到一切，关键是德瑞那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钱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压迫、阶级的较量。”

这最后一句，既像是慨叹，又像是在总结。看来，是惯于用他那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包容一切，解释一切。这是他的深刻，还是他的局限呢？可见，毛泽东观看外国电影片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看的。

反批历史

毛泽东酷爱历史，具有博大精深的学问，但他并不迷信史籍，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慧眼研读二十四史，并加以分析和批判。

1975年5月29日，毛泽东与芦荻就对如何研读这部巨著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诫告。他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就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问题，毛泽东举出了如下的理由和例证，加以说明。他说，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后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里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沬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毛泽东说，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

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他说，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

毛泽东说过：“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因此，他读历史一是以人为鉴，防错改过；一是以古为鉴，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他注重研究古今中外，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发现和总结社会发展规律，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饱读各种各样古籍，对各种历史人物进行评点，写了大量批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

毛泽东在读《三国志》失街亭一节时，写了一段非同凡响的旁批：“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亮初战，宜亲届街亭。致败，后战亮必在军中。”毛泽东对街亭之战作出独到的评论，一反历来史学家的看法。

据史载，诸葛亮作为蜀国丞相兼军师，是第一次率部西征伐魏，其作战目标是夺取魏国西京长安。诸葛亮料定司马懿“必取街亭”断蜀军“咽喉之路”。于是，立即指派马谡和副手王平率领精兵，先敌赶到街亭设防，还派几员大将率兵在街亭左右屯驻作为支援。

毛泽东指挥打仗，一贯重视“慎重初战”。指挥靠前，这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普遍倚重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然而，诸葛亮却没有“亲届街亭”。而且他的指挥部竟然也不设在街亭附近，而设在很远的祁连山中。这就在作战指导上犯了重大失误。因此街亭失守，并非马谡一人之过。诸葛亮应负的责任也不仅仅是用人不当。后来毛泽东在阅读《资治通鉴》时，在卷72第292页上批：“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说明诸葛亮还是吸取了教训。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讲话时又说，秦始皇、曹操，现在已恢复了名誉，“纣王被骂了三千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

毛泽东曾对商纣王作过颇为精辟又别具卓见的点评。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的第十天，毛泽东在和柯庆施、李井泉等在武汉东湖

开座谈会时，详细地说了对商纣王的看法。他说，史书上把纣王描写得像一个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坏人，太过分了。纣王宠妲己、剖比干心，这两件坏事，使他得到了一个大暴君的恶名。其实，纣王这个人聪明善辩，能武能文。他打起仗来是很有英雄气概的。商朝晚期，江淮之间的夷人强盛起来，威胁商朝。纣王当政后亲率大军东征夷人，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而且纣王尚武重文，他对东南的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了东南，这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毛泽东说，商朝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它标志着商朝已开始有了商品交易，到纣王时已成为当时最富强的、文化最高的奴隶制国家。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河南同吴芝圃等谈话，在谈到商周史时，他说："为什么纣王灭了？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来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毛泽东又说："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

1969年8月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找林彪个别谈话，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林彪听不懂，又不敢当面问，事后就让叶群打电话到北京毛家湾查出了这句话的意思：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

从以上几个事例说明，毛泽东对历史上的史实，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反批历史的例子很多。

七、实践求真篇

读书与方法／写对联／欲改造社会，必须学文化／作讲演喻革命道理／用知识教育人启发人／写《反对本本主义》／读报纸定向陕北／用文房四宝打击政敌／写《论持久战》／笔战蒋介石／写《新民主主义论》／读报纸发现人才／修改新闻稿／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改“序文”／写《卜算子·咏梅》／读书的艺术

读书与方法

毛泽东的读书方法是经多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其中主要如族训、师教，等等。

毛氏家规颇严。据族谱记载：毛氏家训有十则，其中第九则为读书所示："奋志芸窗。坐我明窗讲习，几曾挥汗荷锄，驱蚊呵冻志无休，诵读不分昼夜，任他数伏数九；我只索典披图，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右。"对少年毛泽东影响至深。

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的指导是双重的，既有思想文化的教诲，又有人格上的熏陶。杨昌济曾赋诗说："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他说："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的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故"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他又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

毛泽东对杨昌济极为尊重和崇敬："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先生"弘通广大，最为佩服"。他除专心听杨昌济讲课外，课余时间常常偕友去"板仓杨"寓所聆教，或听治学为人之道，或求改正笔记，或纵论天下事。这时，毛泽东正处在世界观逐步形成的阶段，杨昌济的影响和示范可谓大矣。后来，毛泽东在回忆第一师范的教员和生活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在杨先生逝世、举行追悼会时，蔡元培和毛泽东等人署名的"讣告"中说："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吾国学术不发达，绩学之士寥落如晨星。先生固将嗜学终身者，因不假年，生平所志百未

逮一。”反映了毛泽东对他的一片敬惜之情。

具体说来，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方法主要有以下诸点。

立志。毛泽东积极主张学习要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他说，有的人学习看起来是努力的，但目的却是为了自己将来的穿衣吃饭，为了自己的小家庭，为了谋取个人的功名利禄，这是最没有出息的人。他认为应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改造国家和社会而发奋学习。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说：“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始为真志。”“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而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或主张。”

杂学。毛泽东为学很有特色。早在上私塾时，他就不满足于经书而“偷”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禁”书、“杂”书。他读书面广，由于囊中羞涩，买不起书。据韶山井湾里私塾塾师毛宇居回忆：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他最喜欢看的是《精忠传》、《水浒传》、《隋唐嘉话》、《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后来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

潜心。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时只身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自习，叫作“静中求学”；有时又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作“闹中求静”，潜心读书，排除干扰。这种奇特的学习方法，得到了同学们的赞赏。

择书。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而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指曾国藩所纂《经史百家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后来又在1917年夏为萧子升《一切入一》的自学笔记写的序言中说：“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

积累。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读书、做学问比喻成修筑百丈之台。他说："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尔？！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也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

"庀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流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

"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异乎无学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

"有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缁磷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途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积极主张学习，一要积微起纤，日积月累，不要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二要广汇百家之流，不要囿于一家之言，偏执于一孔之见；三要梳篦条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要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四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不要一曝十寒，半途而废。

贵问。毛泽东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黎锦熙1915年4月至8月日记中，就有20余处记载。如"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和润之"久谈改造社会事"等等。

毛泽东还通过杨昌济等介绍，和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学士名人、老师、同学书信交往，质疑问难、拜学求教，受益匪浅。他致萧子升信中说："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苟舍谈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

当时，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城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消息和住址后，总是千方百计去拜访、聆教。曾经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的日本友人宫畸寅藏（号白浪滔天）刚到长沙，毛泽东即与萧三联名并执笔写信，要求面见请教，以示渴慕之情：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日

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泽东、植蕃（萧三），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游学。毛泽东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经验。1917年盛夏，毛泽东和朋友萧子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漫游了宁乡等五个县，进行了农村调查，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世态、风俗人情，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知识。他说：“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毛泽东还说，读“无字的书”与读有字的书同等重要。他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注重在实践中加深对自己所学知识的理解，热望在生活和实践中运用学到的东西。辛亥革命爆发后，18岁的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军，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在同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士兵朝夕相处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绝不能学到的知识。

1946年初，毛泽东对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儿子毛岸英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毛泽东连同上私塾大约上了12年学，其间还几次中断学业，他的举世景仰的学识和才能，主要是靠在实践中苦读“无字的书”，在实际生活中获得的。

三复四温。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熟读《史记》、《汉书》等著名古籍，到了老年仍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常读常新。他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上画一个圈做记号的习惯，保留在故居的不少史书封面上，留下他读过二遍、三遍的圈记，有的书上还明确写着阅读的时间，如某年某月阅，某年某月再阅等。打开这些史书，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纷呈，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多次阅读后留下的明显印记。毛泽东读书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阅读，认真思考，从中

获得真知。

“挤”和“钻”。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重任，日理万机，他和人们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他读那么多的书，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据他读书留下的种种迹象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就是“挤”和“钻”两个字。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他曾经与旧日的同窗老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几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里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毛泽东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毛泽东“挤”和“钻”的读书精神。据延安时期跟随毛泽东负责理发的王师傅讲，毛泽东几乎天天都要修面。一修面就常常向你提出时间要求。他说刮胡子，你答行，他就伸出三个指头，意思说，不能超过三分钟。实际上一刮起来，他老人家心里就开始琢磨事情。人们知道，毛泽东平时最喜欢读书，床头上、厕所里到处都摆着书，没有闲着的时候，刮胡子修面没法看书，他就动脑筋思考。因此，当他的脑子进入情况后，常常刮个十来分钟也没事。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夜幕沉沉，工作了一天的人们都已入睡，而毛泽东却在通宵工作之后，把读书作为一种休息，迟迟不肯入睡，有时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关灯。但是人一走，他往往又把灯打开，继续阅读。毛泽东吃饭，经常是要工作人员一催再催，饭端上来了，他放不下正在看的文件或正在读的书刊，饭凉了，只得端下去重热，往返数次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他读书忘了吃饭，感到饿时，把人喊来要吃面包干，思想却仍然集中在书上，一时竟说不出要吃的是什么，只是说，“给我搞块那个……那个……东西来。”及至工作人员习惯地把面包干拿来时，他才放下书，笑了，说：“对。就要的这个东西。”有时工作人员劝说他出来散散步，在院子里坐坐，这时，他也放不下书。有年夏天，他在庭院绿阴下，坐着藤椅休息，手中拿着一本书

看走了神，医生来问候他的健康，他答非所问地说：“郭沫若同志是很能写书的。”弄得医生莫名其妙。即使在外出工作、休养时，他也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总是要亲笔开列书目。带上几大木箱子书。到了住地后，还要向当地图书馆借书读。有一年夏天在武汉，天气闷热，他仍在挑灯夜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拿来毛巾请他擦一擦，他风趣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了汗水，学到了知识!”至于节假日，旅途中，甚至重病在身医生为他打针治疗时，他都争分夺秒，不肯放下手中的书。晚年为他治病的一位医生说：“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旧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学习，常常持续十几个小时，有时竟连吃饭或量血压时，也要抓紧时间做些事。我每次给毛主席治疗，他老人家靠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总是手不释卷……”

研究学术。青年毛泽东就注意研究学术，1920年12月1日他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说：“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做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处，诸君办法此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我意凡有会员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组织。子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

标点和批注。毛泽东读书的特点是“不动笔墨不看书”。凡他读过的书，总要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画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等语，反映出他读书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精神。

翻阅毛泽东读过的书籍，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做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着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不少册的封面上，有他用不同颜色笔迹画着多次阅读过的圈记。还在有些册的封面上，为了查阅方便，写满了他关注的历史人物的目录。他批注最多的是人

物传记。这些批注对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德才文武多所议论，别具慧眼，单就毛泽东的批注就可以整理出厚厚的一本书。

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值得借鉴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写对联

毛泽东古典文学造诣极高，故尔在作文为联时，能将先贤哲人点化入联，诚如何其芳所言：“无一字无来历而又推陈出新。”赵朴初说：“一点也没有‘掉书袋’的习气。经史百家都归他指使驱策，左右咸宜。”

早在1915年春，毛泽东就为同学廖廷璇与皮述莲结婚撰联：

二月梅香清友，
春风桃灼佳人。

廖廷璇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八班）同学，沅江赤水人，毕业后在沅江县教育科任督学，未几病故。

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不幸病逝，毛泽东撰挽联寄托哀思，其一曰：

疾笃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曰：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情真意切，读之使人潸然泪下。1959年，毛泽东曾回故乡祭坟，他说，养我者党也，生我者父母也。这种情感还体现在他作于抗战后期的挽朱德母亲钟太夫人的对联中：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
斯人无愧劳社阶级完人。

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国人大哗。该时，毛泽东的同学易昌陶因病逝世，毛泽东悲愤填膺，以挽联抒怀：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痛惜好友早夭，壮志未酬。表现了作者少年时代即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以及振兴国家，抵御外侮的高尚品德。

毛泽东创作的联语，豪放雄健，气度不凡，感情色彩十分浓厚，读之常意荡心回，激情难平，如挽王尔琢：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农难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解放方甘心。

王尔琢系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一期生，参加南昌起义后辗转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任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参与重大决策，和毛泽东交往甚笃。1928年8月，王尔琢在江西崇义不幸被叛徒杀害。

毛泽东还写有一副挽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的最长的挽联：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彭雪枫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仅37岁。

又如毛泽东挽冀东抗日英雄杨十三先生：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杨十三先生，本名裕民，以排行名，河北迁安县人，出身农家。少时在天津做徒工，靠发愤学习得以留美。归国后即入河北工业学院任教，到30年代，他已是蜚声河北教育界的造纸学专家。抗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他宣传救亡，组织民众，建立抗日武装，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某部政治部主任。杨十三率部转战，先后收复失地十余城，成为威震冀东平原

的抗日名将。后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溘然长逝。董必武评价说："杨十三先生是我党、十八集团军的忠诚而亲切的朋友。"

毛泽东挽郭朝沛联：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趋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将郭朝沛比附为东汉名士郭泰，令人观之，更为钦佩。

毛泽东所作挽联大多写于抗战时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悼挽国民党爱国将领和有识之士，如挽国民党陆军上将41军副军长兼122师师长王铭章联：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王铭章，字之中，著名川军将领，四川新都县人。1939年奉命出川抗日，转战晋鲁津浦北段一带，后在徐州会战中死守藤县，城破壮烈捐躯。

国民党元老徐谦曾先后参加两次国共合作并作出贡献。卢沟桥事变后，徐老从港返宁，先后任国防会议参议员和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他曾为抗日奔走呼号，夫人沈仪彬亦参与其间。后因操劳过度，心力交瘁，于1940年9月在香港病逝，弥留之际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念。留言："国难非团结一致不能成就，政治非根本澄清，国家永无清明一日。"其时正值皖南事变前夜，山雨欲来，毛泽东未雨绸缪，挽徐先生一联：

存亡攸关，抗战赖持久，而今正是新阶段；
死生同慨，团结须进步，岂能再抄旧文章。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常写一些畅晓明白，浅显易懂的联语，灵活地运用于公共场所，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1928年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遂川县工农政府召开成立大会，同时清算臭名昭彰、血债累累的土豪劣绅郭渭坚。主席台两侧就贴了一副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对联：

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加利。
到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1930年红军在江西宁都小布召开根据地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将党的方针政策，时事口号巧妙剪裁，拾入联内：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作联，擅长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1924年1月在挽陈子博的联中借用了杜甫《蜀相》的尾联：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援引了明人解缙一联：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解放后，毛泽东在赠叶剑英联中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用典恰到好处。

毛泽东作联时，有时将古人的名联稍作改动，便充满了新意。有时由人代笔，又作润色，遂成名联。如挽续范亭一联，原系谢觉哉代笔，联曰：

为民族翻身，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眼睛亮得很，骨头硬得很，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毛泽东将第一个翻身改为"解放"，下联开头两句改成"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寥寥数字，全联皆活。"云水襟怀"、"松柏气节"，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国民党爱国人士续范亭数十年为国家民族献身的崇高思想境界。毛泽东改联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位三次拒绝蒋介石"委任状"，弥留之际还陈书中共请求入党的爱国志士的莫大惋惜和哀思。

毛泽东不仅格律诗词写得好，他的对联艺术也是相当高超的。他提倡写对联要有时代感，要通俗易懂，不必咬文嚼字。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写的对联，不仅在语言艺术上是无与伦比的，在政治含义上也大有鼓舞人心的作用。

欲改造社会，必须学文化

毛泽东曾多次讲：“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是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

青年毛泽东非常同情工人没有文化受欺凌的境况，他在总结第一师范办夜校的经验教训后，认为举办工人夜校是改造社会的一部分,要改造社会，光凭空喊口号不成，必须从一件件具体的实事做起。

1917年10月30日，毛泽东用生动而通俗的白话起草了一份《夜学招学广告》：“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课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作保，此层只管放心。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从这里可以领略毛泽东极富魅力的人格特征和解民于倒悬的赤诚之心。3天后，就有100多人来报名，后增至300多人。11月14日，毛泽东记录道：“实验3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

字，其讲义宜用白话……本日算术，却觉过浅，学生学过归除者，令其举手，有19人之多，此则宜逐渐加深。”

办工人夜校，是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与城市工人第一次较为广泛的接触，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师附近的许多工人都很熟悉夜校中的毛先生，并将毛先生视为他们的好老师、好朋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也取得了与工人联系和接触的初步经验，为以后从事工人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为了培养党的干部，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每当到延安来的青年学生够上一二百人时，毛泽东总是要去亲自接见，给这些同学讲话。

“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京所有的大学不一样，北京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那里有礼堂、有教室、试验室、图书馆、桌椅板凳。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毛泽东习惯于这样的开场白。

“再有一点，我们这里没有教授教员，可能研究某些科目时有些人给讲一讲，都是一些行政干部，主要是靠你们自己学习。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大道理的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理论和方法的一个大学校，研究抗日道理的大学校。我们人很多，上千人，一二千人。”毛泽东这样介绍抗大。

讲完话后，毛泽东就跟学生一起会餐，然后，又一起开晚会。

抗大的课程由毛泽东亲自确定，一共是四科：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辩证法唯物论。其中辩证法唯物论的课程，就是由毛泽东主讲。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毛泽东在抗大讲演时讲授提纲中的两部分。整个讲授提纲叫《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毛泽东到抗大讲课，一类是讲哲学课，另一类便是思想修养课，或称做思想工作。除了给抗大讲课，有时他还到马列学院去作报告。这样高的领导人当教员，是世无仅有的。

作讲演喻革命道理

毛泽东具有鲜明的哲人气质，他有丰富的想象力，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有超群的智慧和胆识，设难置疑，一往直前。这些优点集中表现在他的讲演艺术上。

早在建党初期，他给工人夜校和矿工子弟学校上课时，就采用了通俗易懂的比喻给工人们以深刻的启迪。一次，他教“工”字时，先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说，上边的一横线是“天”，下边的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在地上，是顶天立地的，他们的世界是整个宇宙。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针对游击主义的说法，就“为什么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说：“根据地之于红军就像屁股对人一样重要。”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一个人肯定会因疲劳而倒下。毛泽东还把军队比作“鱼”，把老百姓比作“水”，军队与群众是鱼水关系，军队扎根于群众如鱼得水，从而密切了军民关系。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上思想修养课时，针对学员中存在的实际思想问题，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爬山主义”。原来抗大的早操有一个科目是爬山，有些学生身体弱，爬山经常掉队，觉得不光彩。想请假，又怕别人笑话自己落后，于是便发牢骚：“我们来延安，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懂得怎样闹革命，你们为什么老搞爬山主义呢？可不可以把马列主义增加点，把爬山主义减少一点？”

毛泽东说：爬山是作战的需要。我军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侵占华北的日军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动作慢了就要吃亏。练习爬山，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他左手叉在腰间，挥动一下右手，继续说：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人，胜利到达陕北。身体弱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能说成是什么主义。

第二个问题是有的学生发牢骚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加名副其实。"

对此，毛泽东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地增加，学校要办，又缺少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叫做"艰苦奋斗"。不得已而为之呀！他说：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队回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如果那样做，是增加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抗战的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咱们能办不能办？毛泽东的话，实话实说，入情入理，抗大学员思想上的疙瘩很快就解开了。

1939年初秋，毛泽东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让教育处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去杨家岭接毛泽东。

马列学院距杨家岭十来里路，两地之间的中点有一座延河桥。当四人走到桥头时愣住了，毛泽东正从对面走来。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邓力群说。

毛泽东听后笑笑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

毛泽东扬起手摆了摆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

"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毛泽东认真地说："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摇摇手："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的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在讲"爬山主义"和"劳动大学"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中肯的语言，磊落耿直，尖锐明快，入情入理。特别是用幽默诙谐的语言，阐述浅显的道理，更使人心悦诚服，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用知识教育人启发人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毛泽东博览群书,语言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的语言准确、有力、风趣，又能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风格，有时幽默风趣；有时像涓涓细流，滋润心田；有时又像黄河巨浪，催人奋起，感染力和鼓动性极强。

毛泽东在闽西时，有人对前途悲观失望，提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不是用什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道理去解决，而只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字，形象、通俗而又富有哲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时，有的干部汇报说搞不清参加"三合会"、"三点会"等帮会组织算不算土匪时，他明确指出：参加这些帮会的，除少数会道门头子外，大部分是穷苦人，他们生活困难，没得吃，有的也会自发去抢地主豪绅的东西，但他们不是土匪，不能打，要团结，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孤立和打击真正的地主豪绅。说到这里，毛泽东摊开手掌，做了个手势，启发大家，你们说是这样打出去有劲？还是——他又把手掌紧紧地握成拳头——这样打出

去有劲？得到大家肯定答复后，毛泽东又形象地用散沙和湖泥作比喻，进一步向干部强调团结之重要。他说，群众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团结起来，好比一堆散沙，缺乏力量，我们要用湖泥把这堆散沙胶在一起，捏成一团，这就团结得很紧，不会散了。

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讲，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而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弱有强，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集中兵力，专打敌人的弱点，打胜了立即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顿时信心倍增，全场掌声雷动。

抗战前夕，通信兵队伍不够稳定，许多人老想上前线，毛泽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讲了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辛辛苦苦干了许多天，桥身修好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坚固合适的石头嵌进去，没有这块石头，桥就砌不成。石匠跋山涉水，找到了这块石头，石桥终于砌成了。相传这块石头是鲁班路经此地，得知缺少一石，偷偷按尺码凿好后丢下的，从此人们给这块石头起名叫"鲁班石"。毛泽东说，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根据地，要靠通信兵从空中架桥连接，你们想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从这以后，通信兵们就常用"做革命的'鲁班石'"来鞭策自己，多为党工作。

延安时期，毛泽东常为抗大讲课，他根据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特点，讲哲学时，用深入浅出、形象具体的办法讲解。例如，毛泽东讲《矛盾论》时，为了说明内外因的关系，他举了鸡蛋因得适当温度而变化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的生动例子。讲《实践论》为了说明要有知识，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举了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吃一吃。把深奥的马列道理，寓于生动的语言之中，听课的新老同志、教员、炊事员全都笑了。还有一次，毛泽东讲到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加分析，别人一鼓动就来了劲，结

果事与愿违，成了鲁莽家。有的人越听越感到，毛泽东讲的像自己曾经指挥过的一次失利的战况，于是，一个学员没等毛泽东讲完，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一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从此，“不当鲁莽家，要作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为抗大学员的座右铭。

鲁艺的学员还记得，在毕业典礼上，毛泽东号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学习，即向工农兵学习。同时，他用柳宗元的黔之驴故事，告诉大家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本地的土包子干部。毛泽东一边讲，一边装作老虎观察毛驴的样子，大家被生动的讲演逗笑了，从而悟明了深刻的道理。

为了给大家讲明革命道理，毛泽东借用了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阁朝圣这个故事。他说，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所以，他骑毛驴和我们不一样，是倒骑。走着走着，遇到仙人吕洞宾，问张果老去何处，张说去蓬莱。吕洞宾惊诧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了，认为自己有理，反驳道：我的脸是朝东方蓬莱的！毛泽东讲完，接着说：想要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方向不对，革命还是不能胜利的，张果老虽面朝蓬莱，但路线错了，永远也到不了。大家受到很大启发。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部队的战士大多是不识字的农民，毛泽东很注意用简单明了的词句来阐述革命道理。一次，他对红军战士说，我们是革命队伍，所以，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马列写了很多书，一下子掌握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要求大家记住。二是指两种战争。古今中外，不断打仗，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三是指三大纪律。他强调，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不行，否则，不能统一行动，不能打胜仗，哪怕一个小小的鸡蛋也不能拿。四是指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之外，还要做好四件事，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第二，建立工农武装，主力才会有后备军；第三，是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党对立起来，用老百姓的话讲，建立我们的埃（苏维埃）政府；第四，是建立地方党组织。这个“二三四”的道理，好懂又好记，一下子就被战士们掌握了。

毛泽东善于运用语言艺术。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将革命的大道

理寓于中国的民族形式、风格之中，使广大干部群众把马列主义和哲学变成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写《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毛泽东经江西会昌来到寻乌县城，利用红四军一、二、四纵队分兵寻乌、安远和广东平远发动群众的时机，在寻乌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

在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新的发展。在农村，主张烧杀政策，提出什么“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把土豪劣绅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混为一谈，一律斗争，打倒。甚至还有人鼓吹什么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在这种极左思想影响下，有的地方乱烧乱杀，执行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使他们的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样，使得地主、富农看不到出路，拼命来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在城市，某些存在着“左”倾思想的人，也主张对中、小商人和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工商业资产实行没收的错误政策。以往，在红军内部曾有过对待城市商店筹款的规定，但是，并不了解城市商业的真实情况，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自食其力的经营者和手工业劳动者。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为了正确制定在农村对待富农的政策和在城市中对待小商业者的政策，亲自选定了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的边陲之地——寻乌，进行实地调查。

毛泽东一来到寻乌，就住在县城西关苍天堂，深入实际，进行了20天的调查，弄清了当地的基本情况。但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于是他和县委书记古柏商量，召开了有50多人参加的总结调查会，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会上，毛泽东说：我来寻乌调查了近20天，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

核对材料，叫做集思广益。毛泽东把没有把握或者不够清楚的问题，一一提了出来，让大家议论，广泛地征询大家的意见。这次调查会开了两天，集中大家的好意见，这样，寻乌调查基本结束。

毛泽东非常重视从实际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并不断进行分析研究。1931年2月，他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间隙，在宁都小布整理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并一直珍藏着，经过长征，带到延安。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下了《调查工作》。毛泽东说：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当时，这篇文章由闽西特委翻印，在红四军中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广为传播。革命队伍中，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知道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由于作战频繁，很多资料难以保存，这篇重要文章也在反“围剿”中失散了。毛泽东一直为它的遗失而惋惜。直到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荣山公社官山大队一位叫做赖茂基的农民，把自己珍藏了27年之久的一本油印的《调查工作》小册子，作为革命文物贡献出来，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才失而复得。因为年代久远，这本小册子的纸张已经变得发黄了，但是，它的重新出现，使毛泽东从调查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科学思想结晶又显现在人们的面前。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回忆这篇文章时说：这是1930年写的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做“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公开发表，毛泽东为它改了一个名字：《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

概括。毛泽东从思想理论上阐明了调查研究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要迷信本本，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做调查，而只是冥思苦想地“想办法”，“打主意”。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可以说，毛泽东通过调查写出的书籍，对于指导中国的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读报纸定向陕北

1935年9月21日，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哈达铺是个不大的集镇，但有一家邮政代办所。这里有很多种全国的和地方的报纸，对于消息闭塞的红军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

毛泽东到哈达铺后，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先到邮政代办所取走了所有能找到的报纸，然后到了宿营地和中央其他负责人翻阅报纸，查找消息。据当时《晋阳日报》报道，陕北有红军五万余人。《大公报》也报道：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甚于陕南。还报道陕北红军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安、延长、保安、安塞等，靖边一度为红军所占。毛泽东一边翻阅报纸，一边把有用的消息勾下来。正在这时，聂荣臻的通讯员也送来一张报纸。这张《山西日报》上刊载着阎锡山正在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此时，叶剑英在驻地也搞到一张报纸，报道“国军”进攻陕北红军的新闻。叶剑英立即对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说：“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闹革命，他们的力量还不小呢。我们去他们那儿，你看怎么样？”贾拓夫是陕北神

木人，他了解陕北的情况。他说：“陕北确实是和敌人周旋的好地方，又有刘志丹的根据地，我们应该把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同志。”叶剑英马上把报纸拿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后忙赶往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通过分析报纸透露的消息，确切知道了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而且徐海东的二十五军也在那里。他们所建立的根据地是红军长征后唯一一块完整保存下来的根据地。毛泽东认为，陕北地域辽阔，群众生活艰苦，又是穷乡僻壤，还有几万红军，是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的好地方。他们几个人经过初步讨论研究后，决定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彭德怀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叶剑英。他说：“你提供的报纸很重要，老毛和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去陕北投靠刘志丹。”

22日上午，毛泽东在驻地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经过讨论，中央正式决定到陕北去。这为以后革命顺利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文房四宝打击政敌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常常强调，革命者不仅要学会使用枪杆子，还要学会使用笔杆子。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出了《论持久战》。他用他的文房四宝告诉天下：这场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一论点不仅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产生重大影响，就连当时国民党内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也大为赞赏，并立即转述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也不得不表示赞同。

就在延安小小的窑洞里，毛泽东却能洞悉纷纭杂乱的国内外大事，深刻地把握中国历史的脉络走向，写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依然用他的文房四宝告诉人们：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目前所进行的是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此论一出，一幅清晰的社会变革前景，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蒋介石也描绘了一幅中国未来的图样。他请人代笔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之命运》。蒋介石在书中宣称：“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了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种主张，都不符合中国的需要。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两种主张，描绘了中国的两种前途。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1924年1月在广东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那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不少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亲自点名30岁的毛泽东作为正式代表，35岁的蒋介石也列席了会议。毛泽东穿着棉布长衫在会上作了发言，蒋介石只是静静地在台下听。会后不久，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而毛泽东则做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部长。也就是说，他们一个去抓了枪杆子，一个去抓了笔杆子。1927年以后，擅长抓笔杆子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指挥中国共产党人抓起了枪杆子。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一方。蒋介石的国民党为了“溶共”，一再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甚至打出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古训。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党一人的独裁“理论”。听了这一套，毛泽东在延安说：“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毛泽东的确不信邪。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以惊人的胆识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他们又站在了一起。相隔20年，毛泽东依然是一身便装。无论是信仰还是性格都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和蒋介石，成为当时国统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应诗人柳亚子的要求，毛泽东抄录自己1936年作的词《沁园春·雪》相赠。正是这首词，一经披露，让国统区的人们欣赏到了毛泽东的文人风采。

毛泽东熟读精典，知识渊博，尤其擅长抓意识形态和舆论工作，常常以文房四宝打败政敌，使人在深刻的哲理上，领略到他抓笔杆子的高超艺术。

写《论持久战》

毛泽东读书的一大特点是，学以致用，把学到的东西用到指导实践中去。

1938年，毛泽东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卫士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在躺椅上闭上眼睛养一会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大家生怕毛泽东累病了，便在值班时加倍注意，劝毛泽东多休息。

这天，正好翟作军值班。傍黑的时候，翟作军照例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在他写字桌上的两头各放了一支。翟作军有意把点蜡的动作放慢些，打算趁机劝毛泽东休息，不料毛泽东在翟作军点蜡的时候，眼睛根本没离开纸和笔。他不便打搅，一声不响退了出来。半夜光景，该是毛泽东吃饭的时候了，翟作军把炊事员准备好的热腾腾的饭菜给毛泽东端去，对他说："主席吃饭吧。您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

"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一边说，手中的笔仍在写着。

"主席，您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睡吧!"翟作军进一步用恳求的口气说。

毛泽东抬起头来看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好，等一会儿就睡。"

翟作军知道不需要再往下说什么了，便走了出来，把门轻轻带上，坐到自己的屋里等着。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翟作军估计毛泽东该吃完饭了，想去把碗筷收拾收拾，好让毛泽东睡觉。谁知道推开门一看，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写呢，放在桌子上的饭菜一动没动，只是不冒热气了。翟作军很失望，只好进屋去，把饭菜端出来放到火上热了热，又给毛泽东送去。

“主席，您吃饭吧，天冷，一会就凉了。”翟作军说。

“啊？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自己都不大相信，说：“好，就吃就吃。”翟作军又回到自己的屋里，有意多等了一会儿，心想这一回毛泽东总该把饭吃了。哪知道过去一看，饭菜还没动。毛泽东呢，还是低着头在写。那专心劲儿，就好像把整个身心都投到那支笔上去了。翟作军过去看他，他根本就没有发觉。

翟作军心里一阵难受，说不清是啥滋味。眼前这种情况，进去打搅主席显然是不合适的，翟作军只好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

夜，那么安静，万物都好像睡熟了，只能听到身边几个警卫同志甜甜的均匀的鼾声。可掉过头往毛泽东的屋里看看，蜡烛燃得亮亮的，在跳动的烛光下，毛泽东正在为国事操劳。天快亮了，翟作军再一次站起身来到毛泽东屋里，见毛泽东还在写。饭呢，还是一动没动。

毛泽东已经连着五六天没睡好觉了。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宽阔的两颊明显的消瘦下来，饭吃得更少了。警卫班几个人心里都火烧火燎样焦急。

到了第七天，又轮到翟作军值班，毛泽东还是不肯休息，继续在写。这时虽然已是初春，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夜间坐久了，还冻脚呢。翟作军怕毛泽东冷，弄了盆炭火搁在毛泽东脚边，又想起毛泽东硬板凳坐着累，就到饲养员那里找了条当马垫子用的毛巾毯给毛泽东垫在椅子上。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翟作军听得毛泽东在叫：“警卫员，你来一下。”

翟作军刚想站起身向毛泽东的房间里走去，忽然闻到一股破布烂棉花的焦糊味儿，心里在奇怪什么东西烧了，走到毛泽东房里一看，毛泽东正微弯着身子脱棉鞋，两只脚上还微微冒青烟！原来是毛泽东的棉鞋烤着了。翟作军赶快伸手帮毛泽东把脚上的鞋脱下来，随手用暖壶的水往鞋上一浇，火灭了，焦糊味儿直冲鼻子。毛泽东的一双棉鞋烧破了好几处，棉花都露了出来。棉鞋是没法穿了，翟作军把毛泽东的单鞋找来让主席换上。

“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就烧了。”毛泽东两眼看着那双烧坏了的棉鞋，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

翟作军也跟着笑了起来，心想要不是火烧痛了脚，毛泽东怕还不知道鞋

烧了呢。

“主席，您该睡睡了。您老不休息，把大家都急坏了。”翟作军抓住这个机会，又劝毛泽东。

“好，好，你们先睡，我等一会就睡。”毛泽东还是那句老话。说完，又埋头写起来，就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过了不多久，翟作军发现毛泽东屋子里的灯果然灭了，知道毛泽东已经躺下，心里不由得一阵轻松。又过了一会儿，翟作军想看看毛泽东是不是已经睡着了，轻轻走了过去，看见毛泽东正侧身躺着，用手在捶自己的腰。毛泽东看见了翟作军，忽然问道：“你们晚上睡得着吗？”“睡得着。还睡不够呢！”的确，翟作军那时年轻，正是贪睡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回答了毛泽东。

“唉，还是年轻人好啊，没心事，我就不如你们，我时常睡不着。”

翟作军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一声没吭。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问他：“翟作军，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哪?”“因为家里穷，吃不上饭。”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说：“是啊，要革命，不革命穷人没有饭吃。”

第二天，毛泽东就病倒了：头疼，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医生来看了看，说没有旁的病，是累坏了，给毛泽东开了点药，劝他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了一天，还没等病全好，又坐到桌边继续写起来了。

大概写到第九天的半夜，毛泽东把翟作军叫去，交给他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他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翟作军拿好卷卷，返身回屋子带上枪，就拼命向清凉山跑。一路上，翟作军高兴得自己对自己说：“这回好了，主席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

过了三两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毛泽东拿到手以后，又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

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写着《论持久战》几个字。这时，翟作军才知道毛泽东前些日子写的原来是《论持久战》。毛泽东拿到这叠书以后，脸上露出了微笑，吩咐翟作军立即把这些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请大家提意见，准备再修改。当翟作军兴高采烈挟着书往外去分送时，窗纸上已经透进白蒙蒙的光，天快亮了。

5月底至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正式作了《论持久战》的报告，有力地批驳了当时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从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如何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去读书写作，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去寻找真理，作出科学预见的。

笔战蒋介石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同年5月7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全面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他自己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思想披上了三民主义的外衣，并且要用这种假三民主义来溶化共产党。这篇文章标志着蒋介石封建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纲领》中指出，我党应实行“用真三民主义对抗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的政策。他还说，国民党“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的思想，应加以严正的批驳!”

由于国共合作之初，共产党曾郑重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所以，当时共产党内部一些人也产生了疑问：实行三民主义，还要不要共产主义，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否变了？为了回答党内外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反击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发起的反共浪潮，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文章从论述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入手，亮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新民主主义，并且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依据，深入批驳了蒋介石的反共理论。文章正确区别了孙中山的新旧三民主义，揭露了蒋介石的伪三民主义，解释了共产党人信奉三民主义

的基本依据，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处于胜利的前夜，战后中国的去向问题急迫地摆在国共两党面前。3月，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全面表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政治观点和对内对外政策，恶毒咒骂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扬言要在两年内解决共产党。这书一出版，国民党大肆吹捧是什么“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大上所致的开幕词，赫然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题，其中说道：“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论联合政府》是对蒋介石鼓吹的“中国之命运”那个黑暗中国的彻底批判和对我党所追求的光明中国的系统论述。这部著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次年1月初，毛泽东文章的文本被送到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的案头。蒋介石从头到尾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边看边发出感叹。几天后的一个上午，蒋介石把幕僚长陈布雷召到官邸，把毛泽东的文章朝陈布雷面前一掷。没好气地说：“看人家写得多好!”陈布雷其实也看过这篇文章，听蒋介石这么一说，心想，你打了败仗，还怪我写得不好，因此，就随口回了蒋介石一句：“人家是自己写的。”被陈布雷这么一顶，蒋介石竟一时说不出话来。蒋介石强压下火气，不吭一声地拂袖而去。

1948年9月，解放军攻克济南，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国民党内主张和平的一派，如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力主先行停战，再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因陈布雷与蒋介石关系十分密切，蒋介石的许多重要文章均出自他的笔下。于是，邵、张等人把希望寄托在陈布雷的身上，想请他向蒋介石多吹吹“和平之风”，并转达他们的意见。

10月10日，蒋介石要发表题为《政府能战能和》的演说，10月初告知陈布

雷，要他在几天内赶写出来。陈布雷白天睡觉，晚上动笔。而就在这几天中，邵力子、张治中等人频繁地来到陈布雷公馆，与他谈停战和谈之事，诚恳地请他无论如何向蒋介石进言和平。就这样，陈布雷白天耳朵里灌的是“和平”主张，晚上却在构思草拟关于“能战”的演说。终于，他违心地完成了蒋介石交给的任务。蒋介石拿到文章后大为欣赏，连说写得好。陈布雷回到寓所，彻夜难眠，部下只听到他唉声叹气。经过这两件事的刺激，陈布雷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他陷入御用文人不可名状的矛盾之中，最后决定用自杀来“解脱”自己，了结了自己难堪的角色。

毛泽东与蒋介石除了在军事上不断较量外，在一来一往的政治斗争上，也不间断地进行笔战论争。毛泽东在中国之命运面临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运用他的智慧，有理有利有节，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显然，他的精彩笔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写《新民主主义论》

清晨，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走进窑洞去收拾东西，看到毛泽东仍然伏在桌上，手中的毛笔很快地挥动着。桌子的一旁，那盏煤油灯发出黯淡的光亮。

贺清华忍不住轻声地说：“主席，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噢，天亮了？”他迅速地向窗户方向瞥了一眼，一边不停地写着字，一边说：“好，好，再写一会就睡。”

到吃早饭的时候了，毛泽东还在工作。贺清华从厨房打来饭菜，对毛泽东说：“主席，该吃饭啦。”

毛泽东应了一声，要贺清华把饭菜放在一旁。贺清华怕影响毛泽东工作，轻轻放下碗筷，便走出去了。大约过了半个多钟头，贺清华去收拾碗筷时，却见那些饭菜原样未动，就再次劝毛泽东说：“主席，快吃吧，饭都凉了。”

“噢，我这就吃……”毛泽东这样说，身子却不动。贺清华只得拿起凉饭冷菜，送到厨房里温热了，再端回来。一顿饭热了好几次，总算盼得毛泽东吃了几口。

毛泽东实在累了，才在布躺椅上靠一会儿，或是在窑洞里走几步，或是要警卫员弄一盆洗脸水，用湿毛巾擦把脸，便又坐在了办公桌旁继续工作。眼看着这种情况，同志们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没有办法。中央首长来看毛泽东，都说：“主席呀，这样下去不行，要把身体累垮的!”

毛泽东只是笑笑，过后照样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工作。

看看实在没有办法，卫士班把这些情况向组织上反映了。中央的同志们十分重视这件事情，陈龙特地为此召集开会，口气坚决地说：“主席不休息不行，我们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你们可以对主席说，组织上请他休息。”

陈龙的话给了大家很大的信心，决心想办法让毛泽东得到休息。

这天晚上，毛泽东依然在煤油灯下专心地写作《新民主主义论》。叶子龙第一个走进窑洞，劝道：“主席，你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党组织决定让你休息，请你停笔吧。”

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好，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一段了。”

叶子龙走出来，等待了好一阵，只见毛泽东桌上的灯光仍然亮着。叶子龙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对贺清华说：“你再进去试试看。”

贺清华“动员”毛泽东休息的结果，和叶子龙一样，心里不免有些灰心了。但是，陈龙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我们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是啊，毛泽东的身体累坏了，岂不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吗?于是，叶子龙和大家再想“巧计”。大家觉得光劝说不行，得另想办法,而叶子龙和贺清华都有些不好意思，便把主意打在十几岁的勤务员小王的身上。大家把小王找来，要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小王走到毛泽东跟前，坚决地说：“主席，你该睡觉啦。”伸手把桌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毛泽东睡觉的炕头上。

桌子上忽然变得昏暗了，毛泽东无可奈何地笑了，放下毛笔，缓缓地站起身来说：“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个小鬼，快去休息吧。”

“不，我要等你上了炕才走。”小王坚持着。

在朦胧的灯影中，毛泽东高大的身体走向炕边。见毛泽东在炕上躺下了，小王如同卸去肩上的重担，顿时觉得一身轻松。他高兴地看了看毛泽东，从窑洞里走出来了。

小王成功了，大家才安心地睡觉。第二天早晨，贺清华刚醒来，听见同志们正在谈论：“嗨，主席昨夜又没有睡觉。”

“看他睡下，我才走的!”是小王着急的、有些委屈的声音。

“你刚回来，主席就坐起来了！”

人们沉默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争分夺秒的为革命工作着，《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这样产生的。他的这种精神，使警卫人员都感动得流下热泪。

读报纸发现人才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杂文只有千余字，却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不浅。

侯方域是明末的“四公子”之一，入清后参加河南乡试，中副榜，曾向清总督出谋献策。田家英对这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作了犀利的解剖，他写道：“两年前读过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凉了。至今未忘的句子‘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搔二毛’，清晰地刻画出书生遭变，恣睢辛苦，那种愤懑抑郁，对故国哀思的心情。”“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只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回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这里自然我们不能苛责他的，

‘普天之下’此时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这种人也就不能指为汉奸。况且过去束奴的奴才已经成为奴隶，向上爬去原系此辈常性，也就不免会企望龙门一跳，跃为新主子的奴才。‘后之观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做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

文笔如此深沉老辣，而作者竟然只有20岁！当毛泽东听说田家英的大概情况后，特地把他找去谈了一次话，鼓励他给“大后方”因看不见国家前途消极悲观、空虚颓废的人抽一鞭子，在田家英的大脑记忆库里便深深地打下烙印。此后，毛泽东就一直注意这个“少壮派”。当需要为毛岸英请一位老师时，毛泽东立刻想到了田家英。田家英精心辅导岸英，师生如同兄弟，几乎形影不离。

当时，正处于历史性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非常忙，需要增加新的秘书。田家英经过毛泽东“面试”当场为毛泽东草拟一份电文，结果获得毛泽东的首肯，于是调为秘书。担任秘书以后，田家英为毛泽东和米高杨会谈担任过记录。进城后，为毛泽东处理群众来信，建议各级领导机关应指定专人或成立专门机构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18年的相处中，毛泽东对田家英很器重。最好的例证是：让田家英代他起草八大开幕词。让人代笔，对于毛泽东来说，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恐怕这是唯一的一次。“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名言，就出自田家英写的这篇开幕词中，颇受毛泽东的赞许。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致辞后来到休息室，当他听到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时，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田家英，原来是毛泽东注意浏览报纸，从报纸上挖掘出来的人才。

修改新闻稿

毛泽东在写了许多新闻作品的同时，还为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审阅和修改了大量稿件。他修改的这些新闻作品，大多是宏观新闻，有的是让字词句更符合语法逻辑；有的是把表述不准的思想挑出来进一步强化；有的是把写事不议理的新闻加上精辟的议论；有的是在典型的事实前面加上鲜明的观点，或是下以结论，圈圈点点，刻意认真。

1949年4月，他给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写信，讲该报有篇文章有若干个错字及多余的字句，十分中肯，如他在“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实现了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的旁边批道：“两个‘实现’，前面的‘实现’二字是多余的”。他把所有错了的地方都改正后，叫一名卫士将报纸和信一并带给报社。不久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更正表”。毛泽东说，写东西“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为防止报纸总出现更正的情况，他曾给延安《解放日报》的同志讲：“一切重要的稿件都让我看一看，防止亡羊补牢。”他讲了这话不久，一位记者送来了《衡阳的陷落》一稿，毛泽东一口气看完了稿件，大笔一挥，把这个标题划掉，又正正规规地在上方写道：“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字如其人，笔锋雄健，令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拟就的题目。为了强化主题，毛泽东又在篇尾将归结点加在“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之士其思之。”点中了要害。

毛泽东说：“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和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得到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他在修改《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

何》一稿时，就把记者的导语全部删掉了，只留下了电头和原导语的半句话，删掉的内容是失守三天的情况。翻阅当时的报纸报道，“删”掉这个导语是十分正确的。一方面因为报纸已报道了失守的情况，不宜在报上复见；另一方面是导语缺少引人处，抓不住人。所以毛泽东在旁边加写：“写衡阳的战士似是努力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人支援，因为我们政府和我们统帅部的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不能支援他们，人民虽然焦急万分，也无法自动去支援。”一下子就把衡阳失守的关键之点提了出来，昭示天下，从而让军队保持高昂的战斗气概。为了突出这一观点，毛泽东又在文中加写道：“可是国民党的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簇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自己人民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淋漓尽致，语言犀利。

毛泽东曾说：“我这一辈子唯有主义之争，其他什么都可以放弃。”他还说：“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因此，他在改写新闻稿件时，总是把新闻作品的立场、观点作为衡量稿件好坏的标准。有篇稿子，毛泽东就在上面批了“立场存疑，不可发表”。1949年1月30日，他修改《北平解放》新闻时，多处加上去的话无不反映这个问题，如“整个国民党处于绝望境地”、“北平的人民久已像亲人一样渴望着人民解放军”等。

毛泽东修改新闻稿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1955年主编的一部书。这部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材料书，共收集各地材料176篇，90多万字，仅汉文版就发行152万册。毛泽东亲自为此书写过两篇序言，为104篇材料写了按语。这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对社会主义

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也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使国家富强的美好愿望。

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前一段编辑《怎样办》（后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情况和材料来源时说："我是用11天工夫关了门，看了120篇报告。先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120篇。然后我对这120篇搞了11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许多报告是从各种刊物上挑选出来的。"因为这些刊物是零零碎碎发下去的。它不是集中比较好的典型。现在农村刊物又叫党内刊物，秘密不外传，其实毫无秘密。这些刊物有什么秘密呀！现在我们的书准备公开出版，由人民出版社出，民主人士也要卖给他一本。建议你们每年编这么一本书发下去，迅速来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

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调查研究时，毛泽东又说：解放后11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加上后来增补的，实为二百几十篇），每省有几篇，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每篇都看，有些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又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和34个部门讨论，每天一个部或两天一个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

9月24日，毛泽东在处理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样本最后一批文稿之后，给协助他编书的秘书田家英写信："最后部分附上，请付排。八月下旬的人民日报上载有邢台地委书记写的一篇关于邢台地区合作化的文章，请清出加印到河北省部分中去。此外，请商廖鲁言同志翻阅一下今年一月至九月的人民日报，看有无好的（要是很好的）材料可用的。"由于邢台地委书记这篇文章是介绍全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与全书体例不合（因已有的120篇材料都是介绍一乡一社的典型经验），田家英未收入。但考虑到文章中介绍的经验，比较突出的是邢台县东川口村合作社社长王志琪的办社经验，田家英经与廖鲁言商量，就邀请王志琪来京谈话。他们的谈话记录被整理成《邢台县东川口村是怎样完成合作化和达到增产的》一文，编入河北省部分，也是全书的第二篇。毛泽东为此文写了分量较重的按语。后来收入书中时，文章题目

改为《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

据逄先知回忆："毛泽东编'高潮'时，是那样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有些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改作文一样。""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每天一清早，就退来一批修改好的稿子和写好的按语，再由我们进一步作文字加工。""毛泽东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例如，有一篇材料原题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33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9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读者一看就有印象。又如，有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变成了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多么吸引人！"从保存的原稿和各次校样中看到，有的标题和按语，毛泽东是经过多次推敲、一改再改的。例如，三娄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那篇材料，发稿时题目为《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教训》，看初校样时，他改为《解虞县三娄寺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乎垮台的教训》，看二校样时，又改为《严重的教训》。在为这篇材料所写的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的按语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有一个定义性的解释。原来排印的是："提倡以集体利益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这是很重要的修改，社会主义精神并不是不讲和不要个人利益，而是提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正确结合起来。

毛泽东不辞劳苦，精心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对材料的选择，既照顾到四面八方，使之具有代表性，又尽量做到出类拔萃，使之具有典型性。对文字的加工修改，则力求刮垢磨光，精益求精。据逄先知回忆，"高潮"一书出版时，毛泽东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都没有这样高兴过。他所以这样高兴，我看除了合作化之快出乎他的意料，看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成功，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之外，恐怕也包含了一种在紧张劳动结束之后通常有的喜悦。

改“序文”

1959年春季，中央书记处交给文学研究所一个任务，就是从中国过去的笔记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要何其芳为这本书起草序文，并要他写完后送交自己审阅。

1961年1月4日上午10点40分，毛泽东办公室通知何其芳立即到中南海去，说毛泽东对序文有指示。

何其芳到时，已有两位同志在座。谈到《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时，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有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何其芳从毛泽东的话中悟到自己写的序有片面性，只从“不怕”二字上做文章，只讲战略上藐视，而没有把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讲。

1月23日下午2点半，何其芳又接到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那里去。

坐下后，毛泽东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像征求意见似的念给大家听，又传给大家看。等传到何其芳的手中时，何其芳发现修改了好几处。其中有两处最引人注目。

一处是加了这样一个长句：“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另一处是加了这样一句："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后来，毛泽东又让何其芳在序中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文字。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1月24日上午，何其芳要通讯员把誊清打印好的稿子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当天就看了，并亲笔批示："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又说："此书能在2月出版就好了，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

在此稿中，毛泽东又对上次改稿时增加的"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一句话作了些改动，变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通过毛泽东对这篇序文的修改，不难看出他的唯物辩证思想。经过他的神来之笔的润色，不仅使文章更加生动活泼，也使深邃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得到了具体反映。

写《卜算子·咏梅》

毛泽东爱读古典诗词，也爱读历代诗话。清朝中叶颇负盛名的诗人袁枚所著的《随园诗话》，是毛泽东圈画最多的一部。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的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袁枚的意思是，有知识而不卖弄知识，掌握典故而不堆砌典故，知识典故只能用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和才智，而不能在写诗时让古人替自己说话，就像有权势的人不能只靠权势来行使自己的意志一样。毛泽东在这一段里做了密密的圈画，同意这个观点。

1961年，毛泽东读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萌发了“反其意而用之”的想法。自然想到那位“梅妻鹤子”的北宋诗人林逋，并在寻觅有关诗句时，引起不少联想。于是，在1961年11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三个小时之内，三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信，请他帮助查找一首咏梅的诗。上午6时的信是：“田家英同志：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田家英很快就找到给了他。毛泽东立即翻阅了有关诗文，上午8时半，又写信说：“田家英同志，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信转出后，毛泽东仍在苦思，很快又追加一信：“家英同志，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含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下署时间是“6日8时”，恐是“9时”之误，因为这封信明显是在8时半那封信以后写的。一个月后，毛泽东便写成《卜算子·咏梅》。

毛泽东写咏梅诗，虽然未必将咏梅的诗句“无所不搜”，但从上述查诗的情况看，肯定由陆游的词引起不少联想，“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完全是意趣自辟，辞由己出。梅花，是历代诗人吟诵的对象，尤其是品格正直的诗词家，往往借梅花抒发内心未伸之志，喻节操之高洁，表明不与浊世同流合污之骨气。在这方面不乏古代名篇，但古诗人的咏梅诗，在傲骨厌俗中，难免带有孤芳自赏，甚至顾影自怜的气质，感情天地和精神境界毕竟不够广阔。当然，这也不能苛求于前人。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于世界风云变幻，托物言志于日理万机之中，以梅花比喻不畏严寒，蔑敌如鼠的革命战士，在诗词中渗透出乐观主义和必胜信念。“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足见对梅花的挚爱之情。

雪，本是严寒的象征，但毛泽东却把它当成迎接春天的使者，尽管冰凌垂挂于危崖，朔风怒号于幽谷，气象森然，望而股栗，梅花偏偏于此时此地坚枝奋挺，花朵繁茂，置寒风于不顾，视冰凌为温床，俏色夺目，使人心为之一振，毛泽东设计的场景是何等瑰伟壮阔，又是何等超拔不凡啊！

《卜算子·咏梅》这首词，短短8句44字，由于注入非凡之精魂，精确传神之词采，便透射出诗人的高尚品格和鲜明性格：先行者和公仆的品格，艰危中奋不顾身、转安后乐于奉献的执著性格。这首词，于庄严中寓轻松，于严谨中有跳荡，于明快中富含蓄，于流畅中见丰厚。这就是属于毛泽东的这一个“梅”。

读书的艺术

毛泽东一生所走过的路程，与看书学习密不可分，谈起他的成功与伟大，不能不去谈他的读书生活，不能不去研究和探索他的读书经验与艺术。因为他的成功与伟大，实在与他的天才和智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凭借书籍的阶梯，为自己也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通道，使自己攀上了光辉的顶点。

毛泽东是一位读书不知疲倦的人。读书奋斗，终生不辍，是他的鲜明个性。他能把智慧与才能用于指导革命的实践活动，他能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都出于他的读书经验的总结。他用读书去充实脚下的路，走出了一条光辉而又坚实的阳光大道。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说过：“毛泽东嗜书成癖，这样说不为过分。很难想象他若一天不看书会成什么样子。不过，更准确地说似应把书改成‘字’。哪怕是随手拾来的废报，只要上面有字，便能吸引他。”

毛泽东读书，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但他看书学习绝不是不讲究方法的瞎读、乱读，更不是毫无目的、方向、范围地狂读，而是很讲究读书方法和艺术的。

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他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动作，所从事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个性，都有吸引人的个性魅力，他的读书生活更是如此。毛

泽东说：做饭当然是一门艺术，但是书本知识呢？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只是读书，你只能认识几千个字而已，只会翻字典。

毛泽东一生的读书艺术经验概括起来，有如下突出的特点：不动笔墨不读书，每读书必动笔墨，勾、画、批、记。用不同的符号，标示出自己的心得体会；自然形成一个广阔的读书领域，主要有十大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随思想的骏马任意驰骋，博采群尖，采撷最香最美的知识硕果；确立自己一生最爱读的书，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反复读，举一反三，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体会书中的最精辟之处；站在时代的最高峰，多思善疑，寻根探底，亦读亦想，科学思维，理性思维，“愈思精则理愈来愈出”，学思结合，旨在求新，创新，开拓；经世致用，学用一致，从书内到书外，密切结合，将学到的东西应用于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特别是应用于改造中国的现实，为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而读书奋斗；拜师结友，不耻下问，虚心好学，乐于旁问，虽处高位，却从不因位高自居，在学业上始终遵循“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科学哲理，甘愿向一切有知识的人请教，永不自满，活到老学到老，终生都以一个普通的采石者姿态，活动在各种知识领域里的海洋中。

毛泽东一生中独特的读书方法，也是耐人寻味的，如“杂学”、“潜心”、“择书”、“积累”、“贵问”、“自学”、“游学”、“三复四温”、“挤”和“钻”、“研究学术”、“标点和批注”，等等，都具有很强的科学道理。

如今，毛泽东已仙逝，但他的读书经验和艺术，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

八、壮志未了篇

子子孙孙学下去/谈《形式逻辑学》/编辑诗词集/编辑影集/孟锦云陪读诗书/芦荻当“侍讲学士”/“读下去，我在听”/要看关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消息/读《容斋随笔》

子子孙孙学下去

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人们的学习认识也是永远无止境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顶峰。毛泽东主张除了当代人要学习，作为人类的整体还要世世代代学下去。

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50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两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毛泽东号召人们像愚公移山一样去攻克知识宝库。因此，他一直关心青年和子女的学习。

1939年1月31日，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写信：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1941年8月26日，毛泽东又给毛岸英、毛岸青写信：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

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1947年9月12日他在给毛岸英的信中说：“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

1959年12月30日他在给李讷的信中说：“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10年8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

从以上毛泽东同子女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子女的读书学习是十分关心的。

每逢节假日，子女们来团聚。毛泽东最爱谈的话题就是读书，他总是希望他们能多读些书，多掌握些知识。毛岸英的爱人刘松林是学历史的，一些年代、朝代她老是搞不清。在谈话中，她总把这个年代的事弄错到那个年代，毛泽东常常笑着说，你一下子就把历史抹掉几千年。对松林的历史学习，他从

思想上提出要求，也从方法上予以指导；亲自为松林开了学习历史的书目，要求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书开始学起。

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的一次演说中说：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天。他曾诙谐地对秘书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毛泽东的一生，所以能有坚强的毅力去刻苦学习，钻研学问，与他这种子孙世代学习，搞好接力的"持久战"思想密切不可分的。这种以几代人的学习去穷尽知识的精神，无疑是读书方法中的一大创新。

宏观世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要穷尽真理就要不间断的学习钻研，甚至几代人去努力，才能逐步认识绝对真理，改造宏观世界。这就是毛泽东向我们提示的学习理念。

谈《形式逻辑学》

毛泽东同志生前一贯倡导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尤其是在如何对待生与死，这个极易陷入唯心论的大课题上，表现出极大的乐观主义和辩证思想。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就跟护士长吴旭君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

"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在床上对吴旭君说，不停地吸烟。吴旭君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

"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

"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吴旭君好奇地问。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的。”吴旭君宽慰地说。

“你对你母亲好吗？”毛泽东反问吴旭君。

“好。”吴旭君说。“我母亲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大概只有八岁吧。不过，我记得她死时人们把她从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张席子。人们用白被单把她从头到脚盖起来。我当时特地把母亲给我做的红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给她烧纸钱。我想让她看见我在给她送钱。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信了。烧完纸，我都起不来了。其他的我都记不得了。我当时小，长大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我想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改。”

“要改什么？”

“我是主张要对一个人真好，就在他活着时好好对待他。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人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有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你觉得对不对！”

“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那样办红白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可以考虑一下。”

“主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我还是要想一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毛泽东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的时候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吴旭君说。

毛泽东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

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吴旭君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吴旭君的话，毛泽东笑了，他掐灭烟头说：“讲得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对这么突然的提问，吴旭君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吴旭君吓呆了，好久没有说话。

“你怎么了？”毛泽东问。

“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

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吴旭君从他的书架上找到《形式逻辑学》回到休息室就看起来，以应付“考试”。毛泽东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第二天，吴旭君陪毛泽东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已是下午，他们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毛泽东就问吴旭君：“你的书看得怎么样，我们接着昨天的谈。”

吴旭君说：“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

“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毛泽东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吴旭君把准

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他听。他听完以后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

吴旭君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导电的。"

毛泽东点点头，"讲得不错嘛，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

吴旭君想，我从来没把毛泽东与死联系起来想过，我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我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我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所以吴旭君直率地说："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

毛泽东看着吴旭君为难的样子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从飞机上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七十八，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吴旭君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毛泽东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

"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讲什么呢？"吴旭君茫然地问。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又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不能，万万不能。”吴旭君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毛泽东不再笑了，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你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吴旭君惊奇地问。

“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事后，吴旭君才知道在1956年4月27日，果然在一份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毛泽东是第一个签名的，还有中央领导及党内外136人签了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当时出于种种需要，在第二年建成了毛主席纪念堂，按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他本人意愿的。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时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如今，毛泽东已经离去29年了，他的“生死观”作为他的思想的一部分也应成为他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在这份遗产中，我们感受到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吴旭君后来说毛泽东的生死观，已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每逢他的生

日和祭日，她都穿上鲜艳的花衣服或新衣服，怀念他，目的是让他看到，自己正在履行他的诺言。吴旭君说：如果毛泽东的辩证乐观的生死观，得到了实践，他一定会含笑九泉。

编辑诗词集

1973年的冬天，就在毛泽东写最后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几个月以后，毛泽东让护士长吴旭君拿出一个卷宗，里面是他一生的全部诗作。他让吴旭君用毛笔全都抄写了一遍，然后，亲自一一核对，对其中的一些诗又再作了修改。

他想为后人留下一套诗词定稿。

这大概是诗人的一次自我总结吧。看得出，他很看重自己一生的创作，或者说，他不光认为自己是政治家或军事家，同时也常常用诗人的角色来审视自己。

那么，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怎样谈论和评价自己的作品的呢？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谈论自己的作品，已经无从查考了。大概说来，写诗的人，从开始写诗的那一刻起，就会用别样的目光来关注自己的作品，也关注别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毛泽东开始评论自己的作品，见诸文字的，最早是1945年10月在重庆谈判时给柳亚子的信中说的那句话："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他说的柳先生的"诗格"即此前给柳的信中所说的："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

1951年8月，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想要一本毛泽东写的诗词。袁仲贤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他却在上面批示："不要送这种诗词。"这无疑是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来对待这件事的。

这时候，毛泽东的诗词，还没有集中发表过，流传不多。报刊上的评价，

也只限于《沁园春•雪》等少数几首。臧克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雪天读毛主席的〈咏雪词〉》，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臧克家时，曾欣悦地提到：你那篇评论我的《咏雪》的文章，我看过了。臧克家乘机问词中的“原驰蜡象”的“腊”字当作何解，毛泽东反问说：你看应该怎样？臧克家提议，改成“蜡”字较好，可与上句中“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1957年1月，《诗刊》准备创刊的时候，主编臧克家等把收集到的毛泽东的八首诗词寄给他，希望能在创刊号上发表。几天后，他们收到毛泽东的回信：“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二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又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创刊号在发表毛泽东诗词18首的同时，还把他的这封信也发表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毛泽东谈论自己的作品。其中说过去不愿正式发表诗作的理由，第一条“因为是旧体”，他是一贯不提倡旧体的，但这种主张恐怕主要立足于新文化建设的角度；第二条“诗味不多”，则是诗人角色必然的自谦之辞。

1958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加了一首1957年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文物出版社同时也刻印了一个大字线装本。这是毛泽东诗集的第一个版本。一时间社会上注解纷呈。这年12月，他在广州的小岛宾馆，翻阅文物出版社的刻印本时，亲自动手为这本诗集作起注来。本来，他一向是不主张作者为自己的诗词作注解的，但想到这些诗词公开发表以来，社会上出现许多注解阐发，有的未必符合作者本意，觉得自己有说话的必要了，又见该书天头很宽，一时兴起，便写下一段文字：“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毛泽东为这本诗集中的12首作品写了说明性的批注。这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的诗词进行解释，但这些注解当时并没有公开。稍后，郭沫若曾问毛泽东，

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统一解释本，毛泽东回复：“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他1958年的这些注解，也就成为关于自己创作的一种“个人回忆”了。

在1958年的民歌运动中，毛泽东的作品事实上成了诗词创作乃至文学创作的典范。正好这时他又提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其诗词也就被评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结合”，毛泽东也被文艺界称为“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1960年，周扬在为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准备的发言稿里，按以上基调，专门有一段论述毛泽东诗词的内容。里面说：“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在文学创作上开辟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新的境界……磅礴的诗才和雄伟的革命气魄，浑然一体。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乐观精神在他的诗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晶为最新最美的形象。诗与人合而为一，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是他的伟大人格的体现。”毛泽东在审阅这篇稿子时，写了一个批示：“对我的诗词那一段颂扬，不适当，请删掉。”周扬在公开发表这个报告时，把这段话删掉了。

毛泽东的诗名，自然也传到了国外。斯诺早在1937年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里就透露了毛泽东会写诗，并有一首《长征》为证。后来又在1945年以一首《沁园春•雪》引起轩然大波，云集重庆的外国记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新闻。就在1957年公开发表18首诗词后，第二年英文版《中国文学》就刊载了英文全译本，此后，各种文字的译本先后出现。来访的外宾也常常要同毛泽东谈论诗的话题而毛泽东也常常向他们解释自己的作品和创作。从中也许更实在和细致地透露出他的诗人心态。

1960年5月14日，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几个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其中一位外宾说：帝国主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毛泽东回答：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作诗，我是少产作家，不是多产作家。外宾乘机说：所以要请主席多作几首诗，因为帝国主义不知道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影响大。而毛泽东则认为：再多写几首，总要有主题。过去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全世界现在还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这七年中，也

没有写几首诗，整天忙得很，把诗搞掉了。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

1963年11月，当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问毛泽东是否还写诗时，毛泽东说：写得很少，因为一些政治问题把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也是在这个月，来访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织书记，34岁的诗人桑托斯对毛泽东说："我们很多人遵循您的榜样，在政治斗争方面学习您的教导，也有一些人从另外一方面学习您，学您的诗。我就是这样，我要用诗表达人民的痛苦，我知道我的声音并不完美，但我在继续努力。"接着，桑托斯把自己的一册中文版诗集送给毛泽东，这大概是他预先准备的礼物。

接过诗集，毛泽东惊讶地问：你会写诗？这是送给我的？似乎是遇到了同道，毛泽东谈起他对写诗的看法："有些诗写好后，不能马上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桑托斯回答：很少）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不征求敌人的意见，只征求朋友的意见。"

对于写诗，毛泽东从来不取轻率态度，一气呵成而不做修改的作品，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几乎是没有过的。所谓修改，也不光是自己闭门苦思，不光是"新诗作罢自长吟"，还包括征求朋友同道的意见，以克服常常出现思想好而艺术表现尚欠火候的毛病。

大致从1959年起，毛泽东每有新作，常常寄给一些诗家，请他们帮助润色。这年六七月间写的《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在从庐山回北京后，9月1日就寄给《诗刊》的臧克家和徐迟，说是"录上呈改。如以为可，可上诗刊"。他当时想很快在《诗刊》上发表，完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两首诗在他看来是直接批判和答复"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甚至激愤地说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但最终还是诗人的角色战胜了政治要求，没过几天，他又让人从《诗刊》取回了这两首诗和附信，终于没有立即把自己的诗歌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从艺术角度讲，毛泽东对这两首诗也不是很满意。9月7日他让胡乔木把

它们送给郭沫若修改时，写了这样一封信：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是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从好的思想内容到向诗意的转换，依这两方面把它们改好。郭沫若看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谈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觉得有启发，又作了一次修改。然后，再让胡乔木送给郭沫若，“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对这两首诗，毛泽东生前始终是不大满意的。1966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故乡韶山时，当地同志因未获得他当初写的《七律•到韶山》手稿，便请他再书写一次，意思是写韶山的诗，韶山应该有一份手稿以作纪念。但是，毛泽东拒绝了，理由是：“这首诗写得不理想，不写算了。”

自从《诗刊》公开发表18首毛泽东诗词后，《人民文学》也开始着手收集一些流传的毛泽东的作品。1961年年初，他们在邓拓那里看到邓拓保存的毛泽东在苏区时写的有关战争的六首词，就把这些作品寄给了毛泽东，并希望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毛泽东反复琢磨，细心修改了好几遍。1962年5月，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为示纪念，《人民文学》在这个月发表了毛泽东《词六首》。这是第二次较集中地公开他的作品。

在发表过程中，有这样几件事：

发表前，这六首词先后给郭沫若、臧克家等人看过，他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都在信中说“改得好”，还问“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接着，又把这六首词寄给《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斟酌修改”。陈白尘大概觉得自己主要擅长写小说和戏剧，未敢“班门弄斧”，毛泽东又致信说“你为何不给我认真地修改一次呢?”

《诗刊》曾提出来，希望这六首词同时也在他们刊物上发表，为此，毛泽东两次给臧克家写信，没有同意，理由是自己的作品不宜“同时在两个刊物发表”。之所以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因为是《人民文学》搜集来的”。

当然，毛泽东也答应，自己手头还有几首作品，可以考虑将来在《诗刊》上发表。在《词六首》之前，毛泽东加了这样一个引言：这六首词，是1929—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

在马背上写诗，这个自我解释，由来已久。这是毛泽东对自己的创作状态的界定，这种创作状态，是他一直怀念和欣赏的。1955年，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问起他的诗歌创作时，毛泽东就回答说："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起来，还觉得留恋。"

《词六首》发表前，《人民文学》编辑部请郭沫若写了篇《喜读毛主席〈词六首〉》，清样出来后，立即报送毛泽东"删正"。毛泽东以郭沫若的口吻就《娄山关》一词改写了一大段文字。如今这段文字成为关于《忆秦娥•娄山关》的创作背景和创作过程的最权威的解释，而其中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马背生涯对他的创作是如何的重要，正是这种马背跋涉的生活，才产生了词中毛泽东最欣赏的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到1963年，毛泽东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新作。这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共收诗词37首，其中首次公开发表的有10首。这是毛泽东生前圈定出版的第二种也是最后一种诗集。

他自始至终指导着这本《毛主席诗词》的编选工作。正式出版前，他让人专门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根据他的意见，开了一个有20多人的会议，与会者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臧克家、袁水拍。光看这个名单，就知道毛泽东对这本诗词集的出版是何等的重视。

开会前，毛泽东还给负责编选工作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一些此前没有公开过的作品是否收入集中的意见：

田家英同志：

"钟山风雨"一诗，似可加入诗词集，请你在会上谈一下，酌定。

"小小寰球"一词，似可加入集中，亦请同志们一议。

其余反修诗词，除个别可收外，都宜缓发。

《八连颂》另印，在内部流传，不入集中。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

信中所说的“都宜缓发”的“其余反修诗词”，很可能是指他此前写的诸如“读报诗”一类的作品。大概也是因为“主题虽好，诗意无多”的缘故吧。

信发出以后，毛泽东又反复琢磨收入集中的作品，第二天一大早，又给田家英写信说：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在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与会者讨论后，由田家英负责把意见转达给了毛泽东。参加会议的臧克家回忆说：“我事先写了23条意见，这些意见曾与葛洛同志(时为《诗刊》副主编）商讨过，会后托田家英代转。《毛主席诗词》出版了，到手之后，我兴奋地即时拜读一遍，其中13处采纳了我的意见，有标点、个别字、小注中的字句，还有整个句子的调换。”其中就包括《七律•登庐山》中的“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句，原作是“热肤挥汗”，根据臧克家的意见改成了“热风吹雨”。

《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其反响之大恰如洛阳纸贵。注释者甚多，各有说法，也在所难免。毛泽东的早年好友也是诗友的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即写两函，向毛泽东请教对集中一些作品的理解。1964年1月31日，毛泽东在回信中却说：“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俟见面时详谈之。”

“可以意为之”，这可看出毛泽东对自己诗作的洒脱一面。但如果是专门出版整个《毛泽东诗词》的注释本，他则有另外的想法，而且就不是那样“以意为之”了。

这本诗词集出版后，销路非常好，可有不少青年读者不大读得懂，要求出个注释本。于是出版《毛主席诗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个编辑就自己搞了一个注释本的稿子。他们拿这个稿子去找胡乔木，请他看一看，帮着补充一下。胡乔木费了很大的工夫改了不少，对于一些该注而未注的地方，他都仔细查考，弄清楚再注。到最后这本注释简直成了胡乔木定稿的，成了他的稿子了。

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回忆：“我以为稿子由胡乔木定稿，

我们可以放心，就签了字，准备付印了。他却还不满意，把稿子送给毛泽东过目。可没想到，毛泽东在这本注释稿上批了几行字，说：‘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结果我们当然不敢再出，乔木的一番辛苦，全付东流。”

关于毛泽东怎样看待对自己作品的注释，胡乔木在1986年指导编选《毛泽东诗词选》时的一封信中，曾说及这样的事情：“注释太多太繁，使本书类似辞典之类，很觉累赘……作者生前多次反对出他的诗词注释本，说大多数注家绝少是成功的，注愈详愈坏。直到1966年3月杭州会议时，有四位大区第一书记找到我，要我请示出他的诗词注释本，他才勉强答应可以出一简要的注本在内部发行。”

毛泽东不愿意出注释本，但他在世的时候，注释本实际上也出得不少。看来，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愿意出一种由作者审定的注释本。而对社会上各种注释，他也知道甚至读过一些。1965年1月，他当面对老朋友周世钊说，有人在为他的诗词作注释。在参差不齐的版本中，特别是一些内部印刷的，自然也有一些不甚严肃、错误累累的东西。周世钊读了诸多注释本后，致信毛泽东，问对这些泥沙俱下的注释应做如何处理，哪些注释本较好。毛泽东在1968年9月29日的回信中却说“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

这种回答，倒不是妄自菲薄，或不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心上，而是对各种注解无可奈何，一笑置之而已。其实，他还是希望有一些比较接近作者原意的注解，如果真不放在心上，1958年他就不会在文物出版社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写那么多注释文字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有关部门要把《毛主席诗词》翻译成外文，参加工作的有外文出版社的叶君健，已调到中宣部文艺处的诗人袁水拍，《诗刊》主编臧克家，甚至还请了学贯中西的大家钱钟书先生。这阵势，当然是要搞出一个权威的译本。参加这一工作的专家们对如何解释一些作品和词句，列了17个问题，请示毛泽东。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专门约有关人员谈了一次，都一一做了回答。

1965年7月，元帅诗人陈毅把自己的几首五言律诗呈寄给毛泽东修改。毛泽东改了一首《西行》，于21日写了一封著名的谈诗的信：“你叫我改诗，我不能

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这大概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正式和比较集中地从艺术上谈论自己的作品及主张的文字。他在这里评价了党内一些诗家的创作，可知他平时很关注他们的作品。他把自己放在这个创作群体当中来评论，自认为对律诗还不大在行。在说自己的几首律诗“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一句下面，还专门加上着重号，看来不是随口应付之辞。而对于词，他还是比较自信的。的确，在毛泽东的作品中，词胜于诗，也是目前多数论者的共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泽东和诗家如此平等地讨论诗词的机会几乎没有了。

他一方面注意到一些关于他的诗词的注解，一方面潜下心来认真地整理和修改一生的作品。1973年，他让吴旭君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用毛笔抄写了一遍的时候，是不是有意为自己的创作画上一个句号呢？

这年7月间，他同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杨振宁：“我读到主席的《长征》那首诗，很受鼓舞。”

毛泽东：“长征是我们同蒋介石作斗争，那首诗是我们长征快结束的时候写的。”

杨振宁：“毛主席的诗我都念了，起头不懂，看到注释后，懂得多一点。”

毛泽东：“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如《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也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

倒是一个外国政治家，新中国成立后同毛泽东两次会见都谈论过诗词的法国前总理富尔，觉得自己读懂了毛泽东的诗词。他在回忆录里说：“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

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党的教条和辩证法的词藻所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明深刻而生动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够理解的……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某些创新。”

1973年秋天，同杨振宁进行上面那段对话之前，毛泽东在夏天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秋天过了是冬天，毛泽东整理起自己的一生的诗稿了。在核对《贺新郎读史》一词时，他的手稿里有一句“为问何时猜得?”吴旭君特意问：是“为问何时猜得”还是“如问何时猜得”？毛泽东说：是“如”不是“为”。吴旭君请他在手稿上改一改，毛泽东却说：“不要改了，随他去吧”。就这样毛泽东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完整的又是不朽的诗词集。

编辑影集

老摄影师杜山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晚年的毛泽东爱看年轻时的照片，在反映他波澜壮阔一生的摄影照片审阅单上，重重地画上了个句号。

1975年底，拍摄毛泽东成了杜山最棘手也最怵头的难题，几乎整个拍摄过程里都无法抓到一个“传神”的瞬间。

这年底，南斯拉夫的客人走进毛泽东温暖的书房里，似乎给沉寂的空气里注充了活跃的生机，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讲话又多又快，可是难懂湖南话和口齿不清的吐音让翻译为难，只好求助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秘书，秘书仔细地听辨后又告诉翻译，翻译再翻给外宾。

毛泽东虽然讲话不清，但头脑和听力还是很好的。他表达的意思，秘书理会对了，便笑着点头。如果没听准，他就会烦躁地直打手势，反复地重复这句话，直到秘书听懂为止。

会谈往往就是在这么有趣也很困难之中进行的。

最后客人告辞时，毛泽东仍不忘风趣地说：“我的双腿不让我走了，要我

和上帝见面。再见！我不能送你们到门口了。”

客人这时都衷心地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

毛泽东生了重病以后，在外宾会见时，他爱和客人谈起“上帝”。像告诉秘密似的告诉客人：“我和上帝有个约会！”那种神秘开心的表情真像是生活中一个甜蜜的约会在等着他去光临一般。

他说得很从容自然，而工作人员却在一边听得心里苦苦的——和谁约会都不能和上帝约会啊！

客人离去后，杜山在过厅里收拾摄影箱，张玉凤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身后，一声不吭盯着杜山收拾东西，杜山觉得有趣就逗她：“怎么？不放心哇，怕我带窃听器？”

“文化大革命”时期杜山的罪名之一就是带窃听器潜伏在中央领导人身边。

“扑哧”——小张笑了，说：“让你多喘几口气，不感谢还倒打一钉耙，姓猪哇！”

张玉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好几年了，有一次周恩来将杜山找去，告诉他：“张秘书在外地照顾主席，不能回家照顾家人。你逢年过节时带她的家人到公园去玩玩，让她安心在主席身边工作。”

周恩来说这话时，已经重病住在医院里，可还惦念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家人。

因为这个缘故杜山和张玉凤一直比较熟悉，说话也就随便。杜山见她心事重重的模样，就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主席身体一直不好，这你知道。”她看了杜山一眼，用手扇了扇杜山的烟雾，“他的眼睛现在糟糕透了，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看字用放大镜都吃力。昨天我进他的房间，看见他在看照片，问他，他不说。我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好像是以前照的，他挺爱看的。我想跟你找找有没有主席年轻时的照片，找来给他看看……”

谁能知晓和体谅毛泽东晚年的孤独？谁能想像到一个伟人，个人生活竟如此痛楚苦恼。

杜山颇为理解小张，“你们也真不容易啊！要照顾主席，又要对付那个人的胡搅蛮缠。别理那么多，专心照顾好主席。”

“那个人”指江青，小张会意地点点头。

“我们摄影部正在收集整理毛主席的照片，要出一本主席的影集画册，已经将黑白照片全部印染成彩色照片了。正好将照片拿来给主席看看，让他也选一选。”

“真的！可快点拿来。”

过了几天，杜山从汽车里拖出一个大盒子，张秘书连忙接过大盒子。

“小心点小心点……全是照片啊！”

到过厅，小张打开盒子一看：“好家伙，满满一盒子。”

“这里有188张20英寸的彩色照片，从1936年到今年的都有。你打个收条给我，记住！一张不能少啊。”

张秘书高兴地把照片搬进书房里。

转眼，到隆冬寒季。这个季节一般没有外宾来访。

杜山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安心地坐下来整理照片。可是电话铃声又打乱了工作日程。是张玉凤的电话，她叫杜山去。

杜山带着一身寒气走进毛泽东的住宅，一看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和张玉凤已经在那里等了。

“照片主席看过了，提出这两张要换。”张耀祠拿起沙发茶几上的两张照片给杜山看。

一张是游泳的，一张是在书房里的。

“不错，这两张人物姿势是不太好，摄影部也提出要换这两张。我这次又带几张给主席再选选。”

说着杜山将一个牛皮纸口袋交给张玉凤。

杜山问小张：“主席看了照片都说什么了？”

“当然高兴啦！连饭也不吃，津津有味地一张一张地看，这个照片大，他看得清楚，他就讲给我们听，他老人家的记性可真好！很久以前的事情连年月日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这张……”小张低头在一堆照片里抽出一张吴印

咸在延安抗大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张照片。

画面上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空地上，神情激昂地正在讲课。他双手比划着，好像要论证什么观点。脸上充满了自信和深沉。裤子膝盖落着两个醒目的方形补丁，那是艰苦和坚韧的象征。

“主席见这张直叫好，反复看了几遍，他看见年轻时的照片就高兴，唉……人一老就怀旧。他还老看这一张……”

这也是延安时的照片，毛泽东骑着马，身后是江青，也骑着马，因为年代太久了，画面有些灰，不太清晰。

杜山心里一沉，岁月留给毛泽东了什么？怀念还是沉思？

后来毛泽东留下了这套照片。并同意出版这本记载他革命一生足迹的画册。

送审单上，毛泽东重重地深深地缓缓地画了个圈。这个圈画在他光辉灿烂而又艰苦卓绝漫长岁月的尽头，像人生的句号。

影集在毛泽东去世的第三个月，也是他83岁诞辰日，正式向海内外发行。

虽然，毛泽东没有能看见这本唤起强烈情感和美好回忆的影集。但这里面却浓缩了毛泽东的气魄，毛泽东的才智，毛泽东的热望，毛泽东的情感，还有毛泽东的不幸……也许正是这些才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人生。

这部影集一直被流传下来，成为毛泽东一生中各个不同历史年代的形象记录。

孟锦云陪读诗书

孟锦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看到他经常读的书有：《二十四史》、《鲁迅全集》、《笑林广记》、《容斋随笔》、《全唐诗》、《智囊》、《考古学报》、《自然辩证法》……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

80多岁的毛泽东，读书竟然使他有忘掉一切的时候，这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向着知识的宝库勇往直前，吸取着智慧的力量。他既不是像学生填知识以应付考试，也不是为了满足某种对未知的好奇。他是一位对知识的热情追求者。也许在他看来，他从书本中所获得的每一点新知识，所吸收的每一种新学说，所冒犯的每一个旧观念，都是一次胜利，一种喜悦。他发问、选择、排斥、否定、判断，把他所读到的一切都做深刻的分析。他秉性不受权威的蒙蔽和震慑。

毛泽东在学问上是诚实的，同时也是勇敢的，他能冷静地思考，对真理有一份特殊的厚爱。他常常深入到书的头部，仔细地咀嚼，认真地品味。直到那本书的所有纤维和筋肉成为他的一部分，用它的力量来补养他，然后才告一段落。

老年时候的毛泽东仍然可以看出他青年时代不屈不挠的奋斗气概。尽管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生活上自理困难。但当他读起书来的时候，却如痴如醉。什么时候翻身，该活动，该吃药，该打针，该喝水，该吃饭，他通通认为是多余的，他都可以完全忘掉。

有一次，孟锦云看见毛泽东已连续读了五个多小时的书，还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默默地读着，小孟怕他过分劳累，便走过去轻声提醒："主席，您该休息会儿了。"

但毛泽东仿佛一点也没有听见，依旧在那里读他的书。于是，小孟便稍稍把声音提高了些，又说了一遍。毛泽东回过头来，大声一吼："滚!"这声吼真把小孟吓呆了，她只得悄悄走开。事后，毛泽东自感做得不妥，又主动向小孟道歉，小孟心里是理解的，聚精会神的人是不愿别人打扰的。

当然，有时候又与此相反。当小孟提醒他休息时，80多岁的毛泽东在年轻姑娘面前，变成了听话的孩童。小孟觉得他是一个有着大人身体的孩童，举止是斯文的。他富有权威，他有种种她所没有的，而他有能够用以驾驭一切的奇异的知识。小孟的提醒会使他乖乖地把书放在一边，眼睛微闭，静静地躺在那里，闭目养神，平心静气地休息，是那么和蔼可亲。

有一天，小孟见毛泽东手里托着书，似乎在看，但走近一看，他的眼睛已

经闭上了。小孟轻轻地关上壁灯，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床前，把他的书从手中轻轻抽出来，放在小桌上，又把他的眼镜慢慢摘下来，让他好好睡一觉。但等刚刚摘掉他的眼镜，毛泽东马上又清醒了。一醒过来，又顺手去找桌子上的书。这时，小孟只得又给他戴上眼镜，打开床头灯，让他接着读下去。这样的读书，有时会达七八小时之久。

毛泽东喜欢唐诗，在他卧室里的那张桌子上，常常放着各种唐诗本。仅《唐诗三百首》就有好几种版本，而且有一部《全唐诗》。他对唐代诗人的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尤其酷爱推崇。常常被诗中神奇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魅力所吸引。有时他边看边谈，自言自语地赞叹：写得好！写得好！

孟锦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亲眼目睹了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丰富。有一次，他让小孟给他读唐诗，小孟大声朗读："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小孟刚读完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毛泽东便一下子笑出声来，随即说："你再读一遍最后那句我听听。"

小孟不明白毛泽东笑她什么，又大声读了一遍"遍插茱萸（朱音）少一人。"

毛泽东听完之后，坐起来顺手拿了一张纸，写了两个字："茱萸"。让小孟过来，指着"萸"字说："你去查查字典看，这个字的读音是什么?"

小孟抱着本大字典，翻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了这个字，一看字上的拼音，才知道自己读错了。她忙对主席说："这个字应该读'鱼'。"

毛泽东点点头，慢慢地说："这茱萸是落叶乔木，还是一种药材呢，插上茱萸，可以避邪。小时候，在我的家乡，我就看见过插茱萸的。"

毛泽东常常给小孟纠正错音，有时遇到生僻字，小孟读不下去了，毛泽东很快给她接上。一次，小孟读杜甫的《进艇》：

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
茗饮蔗江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当小孟读到第五句“俱飞蛱蝶元相逐”时，不认识“蛱”字，在这里卡住了，小孟读不下去了，毛泽东马上接下来，把后面四句一下子就念了出来。对于这样一首并不是很出名的唐诗，毛泽东竟然能稔熟于心，小孟不得不佩服地说：“主席，您都这么熟，自己背诵算了，别让我给您念了。”

毛泽东听了，并不介意地说：“听你念是一回事，我自己咏诵又是一回事嘛。”

孟锦云是湖北人，说话快，而且声音高，每次读书念诗，毛泽东总要提醒她几次：“慢点嘛，声音也太高，简直像唱黑头的。”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话便马上放低声音，放慢速度，但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又变快变高了。

这时，毛泽东会开玩笑地说：“孟夫子，我这个听的，比你这个读的还要紧张，你是不是在跟我吵嘴哟?”

小孟也笑了，她抱歉地说：“我觉得我已经读得很慢了，怎么回事？老是太快。”

“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忘了苏老先生的话啦?”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毛泽东依旧在读着他所喜爱的书。几天来，只要毛泽东自己看书，小孟便也拿本唐诗读起来，她怕毛泽东让她读时老读不好，她也像应试的学生一样，在认真地准备着。

一天，毛泽东听京剧唱片，刚听了没几分钟，就对小孟说：“别听了，还是请你再给我读几首唐诗吧。”

小孟见毛泽东又要让她读唐诗倒挺高兴，因为心里觉得有底。她把留声机关上，顺手从毛泽东床头的小桌子上拿起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边翻边说：“我每次读诗都读得不好，还老让您纠正，这次我得选一首好读的，保证让您挑不出错来。”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读诗就是学习嘛，要知难而上，你这个孟夫子却是择易而谈。可以嘛，你随便读一首我听听，读好读的。”

小孟一翻，正好翻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她对这首诗读过好几遍，差不多都快背下来了，于是，便很有把握地放高声音，放慢速度，郑重其事地

朗诵起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毛泽东听了,连声称赞:“孟夫子选得好嘛!这首诗虽短,可内容是情深意长噢!孟夫子,这次你读得也好,看来你不用纠正三次嘛。”

原来,这首诗过去小孟也曾给毛泽东读过,总是把“怆”读错。毛泽东已经给她纠正过两次。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夸奖,也很高兴,并说:“就这么一个‘怆’字,再记不住,那我也太笨了,我的记性还不至于那么差。”

毛泽东听了小孟的话,便接着说:“我可不敢说孟夫子笨噢,孟夫子可是个聪明的姑娘。怎么样?再读一首听听。”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小孟便是早有准备似地读起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这首诗小孟多次给毛泽东读过,之所以是多次,是因为小孟觉得这首诗读得特别顺口。全诗以口语为心中事,毫无雕琢之工。而毛泽东也特别喜欢听这首诗,每次小孟读完之后,他自己还要再吟诵一遍。这样,小孟就在这本诗集里夹上一张小纸条,做个记号,一翻就能找到。只要毛泽东让她读唐诗时,她便很快找到这首诗,顺畅地读起来。

读完这首诗后,小孟自己也感到满意,她又问毛泽东:“您还想听读哪首诗呢?”

毛泽东稍稍沉思了一会儿,他没有马上回答,正当小孟准备把书放下,安排他休息时,毛泽东突然又发话了:“孟夫子,读读白居易的《长恨歌》吧!”

毛泽东把《长恨歌》这句话说得特别重,语调里有一种惆怅,又有一种近似恳求。

小孟可从来没有给他读过这首诗,但她有一次倒是听毛泽东吟诵过其中的诗句:“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当时听毛泽东吟诵这些诗句时,小孟便跟他开玩笑说:“您会那么多诗,出口成章,老是文绉绉的,我可听不懂。您是个大主席,又是个大诗人,真了不起啊。”

小孟开始翻目录,但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嘴里还不住地念叨:“《长恨

歌》，白居易……”

毛泽东看小孟找得怪着急的，便打趣说：“孟夫子，还是让我来找，你是视而不见哟。”

小孟还是不服气，便说：“您先别着急，我肯定能找到。”

“如何查目录？孟夫子，这是有规律的嘛，这首诗是七言古诗，你应该从这个项目里去找才是。”

小孟连“七言古诗”这项也找不到，越着急越找不到，她便不情愿地把书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拿过书，翻了两下就找到了，马上递给小孟：“孟夫子，有眼不识泰山。这不是嘛！”

小孟接过书来，开始朗读起来，她读得很慢，总觉得不太顺当，好不容易才读到最后几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小孟读完最后一句时，毛泽东已闭着眼睛，似乎是陷入了沉思。毛泽东从这首叙事诗中到底感受到了什么？是赞赏诗中哀婉动人的故事、悠扬婉转的诗句，还是对诗中所提出的告诫表示慨叹，令小孟不解。

有一天，毛泽东吃过午饭，坐在大厅里的沙发上，神态悠闲。大概他今天不准备读书了吧。他微笑着看着孟锦云，然后，指着他桌子上放着的那部《资治通鉴》问道：“孟夫子，你知道这部书我读了多少遍？”

小孟看着这部不少用透明胶贴住页码的《资治通鉴》，不等说话，毛泽东便又接着说：“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语调里充满了惋惜和遗憾，但却没有丝毫的消沉与感伤。

他接着问小孟：“孟夫子，关于这部书你知道多少啊？”

小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就知道这是一部写历史的书，听老师说是司马光写的。”

毛泽东认真地追问了一句：“还有呢？”

小孟羞怯地摇摇头。

毛泽东看出了小孟不好意思，又接着说：“当然，这不能怪你，这部书要

是从头到尾，认真读上一遍，得好几年的时间呐。不过，我还是劝你读一读，不能全读，读读某些部分也好。读与不读可大不一样噢。你还年轻，有没有这个决心啊?”

小孟回答：“试试看吧，我怕没那个毅力。”

毛泽东像老师辅导学生一样，十分认真地说：“孟夫子，你有个词可用错了，还是个挺关键的词呢，不改不行。不是毅力，而是兴趣。因为有了兴趣，人就不会感到累了。咬着牙看书，你那个毅力再大，也还是看不下去的。有了兴趣，越看越有味道，还会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

小孟说：“我看您就是对看书有兴趣，一天老看书也不嫌腻，还老看历史书，对历史书我就是读不进去。”

毛泽东听了小孟的话，并无责怪，接着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是继承，又要批判分析，对不对?”

小孟连连点头。毛泽东又问了一句：“为什么对呀?”

“主席说的还能不对?”小孟不假思索地回答。

毛泽东笑了笑说：“我说的就都对呀? 那可不见得，金口玉言，那我不成了圣人啦。历史上没有什么圣人，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都对的圣人永远也不会有。我说的有一半对，我就心满意足啰。是书上说的，也有不少屁话，不能相信。”

小孟说：“我看书时，总觉得书上写的还能不对吗? 所以特别信，百分之百地相信。”

毛泽东听了小孟的话，不紧不慢地向她解释：“用这种态度读书，还不如不读。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要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能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你白读了。”

“我读书可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同看法。”小孟天真地向毛泽东谈自己的情况。

毛泽东接着说："孟夫子，不要认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我们现代人写书，对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就那么客观？代代相传就不会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往往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哪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你就去找别的史料，对照一下，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您读书能怀疑，我可是连读都不一定能读得懂呢，还谈得上什么怀疑？书上写的能胡编？这我可想都没想过。"

"你这个孟夫子，就是头脑简单得很哩，要多思嘛。比如，有些史书里把个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

毛泽东说得不紧不慢，真是慢慢道来。但却是那样肯定与自信。说到这里，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很薄的书递给小孟："这是一本写《资治通鉴》的书，写得不错，好读得很，有时间的时候看看，我还想同你探讨一番呢。"

十几天之后，小孟把那本小册子送还给毛泽东。通过读这本书，小孟觉得对《资治通鉴》多少有了一些了解。所以，当她把这本书送还给毛泽东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既有对毛泽东的敬佩，真没想到那样一部大书，他竟然能读17遍，真是了不起。同时，她也感到这十几天很有收获。她觉得，不管怎么说，如果毛泽东再向她问起《资治通鉴》，自己总不至于一无所知了。

当小孟把书还给毛泽东时，他微笑着对小孟说："书看完了，可不能白看噢，要发表点见解，不吝赐教才对啊！"

毛泽东的玩笑话中透出一股子认真劲儿。小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对《资治通鉴》，只能说有了一点点了解。我还有许多地方不知道呢，让我说，也只能提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了解一点点也好嘛。看来是略知一二了，光提问题也可以嘛，能提问题就是一种提高。"

于是，在毛泽东那宽敞的大厅里，一场像是朋友间的交谈，或者说是像

师生间的讨论开始了。作为学生的小孟首先发问："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还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真是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都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还无法治他们，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小孟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不从头写起?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噢。"

小孟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有讲到?"

毛泽东说："你上学时，读过的历史课本太简单，怎么能讲那么细?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啰，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弱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小孟说："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作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小孟越听越觉得有意思。她心里想，我们这段历史还不知谁去写？怎么去写呢？但愿能写得真实点儿。她记得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人怕你的权势，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个折扣。"

稍稍停了一会儿，毛泽东便又接着说："孟夫子，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小孟说："当然不行，看来，历史书里也有不少不可信的东西。'通鉴，里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当皇帝，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简直就是个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

小孟说："这种皇帝当然好当。谁都能当，三岁就当皇帝，真是荒唐。"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都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拉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小孟说："您快别说了，真是吓死人。您今天讲了这么多，真使我长见识。今天您真是越说话越多，该休息了。"

毛泽东说："今天就到此休会，听你的，孟夫子。"

又过了几天，毛泽东在卧室里休息，他刚刚睡过觉，显得很有精神，坐在床上，习惯地又把头靠在了床头。他招招手，示意让小孟过来。

当小孟走过来之后，毛泽东抬起那双并不明亮的眼睛，看了看走过来的小孟，然后用手指了指床边的软椅，让小孟坐下。毛泽东看小孟坐下来之后，才慢慢地说："我们的讨论会什么时候开幕啊？"

“开幕闭幕还不是由您决定。”

“现在开幕!”毛泽东有意把声音抬高了说。

小孟笑着说:“您的记性还不错，没办完的事还得接着办。您等一下，我去拿我的笔记本，我的问题都在本子上记着呢。”

小孟去她休息的房间，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她翻着她的小本子，开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是怎么回事儿?”

小孟低头看着小本子，她坐得直直的，就像一个毕恭毕敬的小学生一样。

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

小孟说:“做到这点不容易，我们文工团‘文化大革命’分成两大派之后原来的朋友因不是一派，就变成了仇人，攻击起来，简直不择手段，哪里还谈得上尊重。”

毛泽东说:“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小孟说:“您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毛泽东说:“怎么会没有对手?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让我吃药，我不要吃，这不就成了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噢。”

小孟说:“我可不敢和您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

毛泽东说:“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

小孟又提出新的问题:“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

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编的，几个人合作很不容易。”

毛泽东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5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有不少呢。这个协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支持，一切都不会有。”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小孟说：“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小孟说：“人一辈子谁知会碰上什么事，很难预料。我看书里面还讲到，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说：“自从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出书可方便多了，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成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

这天，毛泽东谈锋甚健，面无倦色，谈得兴致勃勃。小孟听得非常认真，她觉得自己增长了很多历史知识，真是大有收获。看到毛泽东愿意谈，她又提出了关于武则天的问题。

“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的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

对于武则天，毛泽东以前谈过许多，看来，他对这个人物是注意研究的。

“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

女人没地位，女人当皇上，人们连想都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任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谈到这里，小孟记起了毛泽东过去给她讲过的一个关于武则天的故事：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出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当然。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那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有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毛泽东还谈过武则天立碑的事：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的墓碑上刻字。有人说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其实，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还是由后人去评论。

谈了武则天之后，小孟又移了话题：“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砍书’，可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部大的‘相砍书’。”

小孟说：“‘相砍书’，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战争吧?”

毛泽东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哪。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做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老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

小孟说：“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谈到这里，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他似乎笑得十分开心。然后，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接着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闭起了眼睛，显出了一种难以捉摸的神情。看着毛泽东陷入了沉思，有些倦意，小孟忙说："'通鉴'里有不少故事，以后您给我讲讲吧，我就爱听故事呢，您该休息休息了，您今天说得太多了，把您累坏了，我可担当不起。"

毛泽东微微睁开眼睛说："你这个孟夫子，就是怕负责任，看来，今天也是该告一段落了。'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毛泽东和小孟的一番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他们之间最长的一次谈话。也是孟锦云陪毛泽东读诗书的一段难得的佳话。

芦荻当"侍讲学士"

1974年春，毛泽东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病，视力模糊，看东西很吃力。对于领袖来说，一天有多少文件需要他看，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一生手不释卷、历来亲自批文件、写文章的人，一旦视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就是从

这时开始，张玉凤又多了一项工作，天天为毛泽东读文件、读书、读信、读报。

这可是一件难以胜任的工作。张玉凤读文件、读报、读信，还觉得能够应付。而读书，特别是读古书，困难就大了。很多古书，不但词意难懂，还有很多生字，这就增加了读书的难度。张玉凤记得最难读的几篇赋，如《别赋》、《恨赋》、《月赋》、《枯树赋》等，读起来实在力不从心，既没有铿锵有致的韵味，也无激荡肺腑的感情。所幸的是毛泽东的文学功底深厚，很多诗赋他都能背下来，读错的字和音他随时予以纠正。毛泽东告诉张玉凤："读诗和读赋不同。诗有五言、七言，还有平声支韵，去声径韵……你按韵律来读，基本上就可以了。而赋则不同，要抑、扬、顿、挫，要读出感情才行。你这样平平地念，像寺庙里的和尚念经。"

一次，张玉凤给毛泽东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泽东自己也跟着背诵起来。他用低沉的声调，一字一句地缓缓吟诵，那声调，那韵致，入情入景。让张玉凤措手不及而又惊奇的是，读到后边，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张玉凤意识到，毛泽东此时此刻一定是进入诗的意境了，他那浓重的情感，透视着对诗意的某种相通，毛泽东是非常喜欢这首诗的，他曾在书上这样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同等的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不久，年迈的毛泽东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替他物色一位"侍讲学士"。

在中国，自唐朝以来，宫中设"侍讲学士"，侍立君主之侧讲论文史，备君主顾问。"侍讲学士"是翰林院中的高级官员。

于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祠着手寻觅"侍讲学士"。既然要"讲"，普通话要好，口齿要清楚。在毛泽东身边"侍讲"，古典文学的根底要好。毛泽东精熟文史，要能够跟毛泽东对话，讲论文史。再说毛泽东的生活昼夜颠倒，侍讲者年纪不可太大，以免体力不支。但不能太年轻，怕学术功底太浅，以中年最为合适。还有，进入中南海政治上当然要可靠……这些，也就成了遴选侍讲者的条件。遴选工作在悄然进行中。

首先想到的最合适的单位，自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汪东兴、张耀祠委托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物色人选。谢静宜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到北京大学。没几天，他就送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机要秘书张玉凤把这些档案一一念给毛泽东听。听罢，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试试看吧!"

北大中文系的芦荻，是一位中年女教师。她普普通通，并非学界名流。毛泽东选中她的原因很简单：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这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语言系文学史教研室冯其庸、刘忆萱、刘瑞莲、李永祜、吴秋瑾选注的。毛泽东很喜欢其中《触詟说赵太后》、《赵策》、《别赋》(江淹)、《滕王阁序》(王勃)，很巧，这几篇文章的选注者正是芦荻。记忆力甚强的毛泽东，当时便记住了芦荻这个名字。

也真巧，从1970年年底起，芦荻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样，北大中文系报来的备选者中，芦荻也报来了。毛泽东记起了《历代文选》，也就选中了芦荻。

当年，44岁的芦荻本人对此毫无所知。5月23日，北大开来一辆中型面包车，来到三里河，停在芦荻家门前。车上坐的有北大中文系的负责人。

来客步入芦荻家中，要她马上带换洗衣服、脸盆牙具之类以及几本古文书籍，说是要住到什么地方去。芦荻只得遵命。上了车，径奔北大，驶往未名湖畔的一幢楼。来到那儿，她被安排住在一个房间里，据说是要她继续讲课。

被蒙在鼓里的芦荻，在那里关起门来看书，如同往日在家备课一样，认真地熟背古诗词。

三天之后，5月26日晚上，看了一天书的芦荻神情疲惫，正准备就寝，却响起敲门声。不速之客竟是谢静宜!

谢静宜要芦荻收拾衣服用具，马上随车出发。

"深夜里还要讲古文?"芦荻不解，但又不好多问。

楼前，一辆轿车在恭候。上了车，谢静宜开口，说了一句使芦荻难以置信的话："我要带你去见毛主席!"

芦荻瞪大了眼睛，吓了一跳，说了声："什么？见毛主席？"

"你去给毛主席讲诗、词、歌、赋。"谢静宜说出了缘由。

芦荻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对中国古典文学很有造诣，怎么会要她去讲诗词歌赋呢？

最使她纳闷的是，那"歌"讲些什么呢？中国古代并没有多少"歌"（即"歌行"），怎么讲呢？她心里琢磨，如坠入幻境一般，只觉得车子像飞一样在奔驰。尽管身边坐着谢静宜，她又不便说什么。她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会突然召见她这么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车子刚刚驶过西单，便转入中南海，戛然停住。

由于过度紧张，芦荻下车时，恍当一声，撒了手提包，把脸盆、两支笔、书、梳子和四件换洗的衣服，全都打翻在车里，狼狈透了！

"我替你收拾，你先去吧！"幸亏司机这么说。

她看了一下手表，10时18分。在谢静宜带领下，她步入毛泽东住处。当时，她仿佛在做梦一样，一眼就看到在电影、电视中见过多次的熟悉的毛泽东形象。不过，眼前的毛泽东，不像往常记者们形容的"神采奕奕"，显得苍老，但精神仍很不错。

对于她的到来，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病中卧床的他握着芦荻的手，问道："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

神情极紧张的芦荻，思维还一下子无法扭转到刘禹锡的诗上去。

这时，毛泽东在床上慢慢地用铿锵之声吟诵起来：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首芦荻非常熟悉的诗，经毛泽东用湖南口音吟诵，别具一番情味。

吟罢，毛泽东笑着问芦荻："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首诗里来的？"

芦荻笑了。她那紧张万分的神经，在毛泽东的谈笑声中，放松下来。

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双眼，说是患了眼疾，要请她代读中国古文。至此，

卢荻才明白了请她来此的用意，于是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芦荻一直侍立在床前。毛泽东让她坐下来，跟她聊起了刘禹锡。毛泽东很喜欢刘禹锡的作品，欣赏那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会背刘禹锡的《陋室铭》、《乌衣巷》、《竹枝词》、《杨柳枝词》等许多作品。

芦荻坐在一侧，很拘谨地静静听着。毛泽东的秘书、医务人员以及谢静宜，也一起听毛泽东谈话。

毛泽东兴致很高，海阔天空地聊着。从唐朝的刘禹锡，谈到了三国的阮籍，又忽地提及了北周文学家庾信。他见芦荻在一边只是听着，笑道：“该轮到你讲了，就讲讲庾信的《枯树赋》吧。”

毛泽东冷不丁地点了一个题目，芦荻毫无思想准备。她凭着自己的记忆，背诵起《枯树赋》，边背边讲解，毛泽东听得很有兴味，神情完全投入到《枯树赋》里去了。

接着，毛泽东又谈起了“江郎才尽”的“江郎”——江淹的《别赋》以及《触詟说赵太后》。事先谢静宜已从毛泽东那里得知，他要听这两篇古文，因此与芦荻打了招呼，所以这次“面试”，很令毛泽东满意。

大约很久没有遇到这样可以谈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对手了，毛泽东显得异常兴奋。他下了床，在屋里缓缓踱起步子来，一边踱，一边嘴里哼着宋代词人张元干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他缓步在宽大的房间里踱了三圈。这时，芦荻望着他，突然产生一种老松静穆之感。

从夜里10点18分，一口气谈到凌晨一时。大夫考虑到毛泽东正在病中，劝他早点休息。毛泽东谈兴正浓，不肯中断谈话。又谈了两个小时，大夫下了“命令”，非要毛泽东休息不可。这时，芦荻赶紧站了起来，向毛泽东告别。

毛泽东说：“再见吧，我们认识了，以后慢慢谈吧。”

就这样芦荻结束了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谈话。

芦荻被工作人员送入离毛泽东住处很近的一幢楼里住下。工作人员很细心，因为芦荻是毛泽东“请来的客人”。

芦荻住在底楼的一间屋内，楼内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谢静宜则住在二楼。

从此，芦荻的生活规律也按照月亮转了，以适应毛泽东昼夜颠倒的生活：她上午睡觉，下午则闭门看书，为讲读做案头准备工作。深夜至凌晨，她来到毛泽东那里，为他讲诗文。终日在中南海住着，不能回家。

芦荻自己讲当时的心态："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突然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我的心情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毛泽东当时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是神，我也是这样看的。我对他是毕恭毕敬。大概我看过许多古代史书的缘故，我总是有一种深入重地、深入禁地的感觉。我常常如《诗•小雅》中所说的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每当她奉召前往毛泽东那里时，谢静宜总要陪同一起去。芦荻步入毛泽东卧室，一般都是侍立于毛泽东床前，双手捧着书，逐字逐句地念。毛泽东一再叫她坐下来，往往用手拍拍床头的红丝绒的小凳子，她才小心翼翼地坐下来。这时，毛泽东往往对大夫、秘书说："来，你们也来听听。"在听讲时，毛泽东还常常问大夫、秘书："你们听懂了没有？"

芦荻仿佛变了一个人。她变得不苟言笑，只是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她显得过分地紧张、过分地拘谨，因此，不止一次被谢静宜批评，就连毛泽东也多次提醒她不要太拘谨小心了。

慢慢地，慢慢地，芦荻才开始适应那样的环境，绷紧的神经逐渐地松弛下来。尤其是毛泽东那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的风格，使她逐渐地打消了紧张心理。

芦荻亲眼目睹了毛泽东读书时那种如醉如痴的神情，她真的把他当作了神，从心底里敬爱他，佩服他。所以称呼他总是"您"，毛泽东却不喜欢，他说："还是说'你'吧！不要太客气。"

毛泽东公务甚忙。尽管在病中，半个身子行动不便，终日卧床，可是他仍亲自料理国内外大事，听汇报，发指示。他只能挤时间读书。入夜，芦荻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有时是夜里11点，有时甚至是凌晨2点，毛泽东要读书了，就叫秘书打电话给芦荻，芦荻跳上自行车，前往500米处的毛泽东住所。她一路上风风火火骑自行车，到达毛泽东那里直喘气，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放了张桌子，让芦荻在那里看书，他需要读书时便唤她进来。另外，她在书房里

工作，也好借阅毛泽东的藏书。

起初，讲古代诗词，芦荻得心应手。多年来，她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诗词。毛泽东点什么诗词，她都可以背出，并作讲解。

毛泽东点古代散文，芦荻也还算能够应付。

可是，毛泽东涉猎面广。有时，要她读《二十四史》，那已越出了她的专业范围。她很生疏，有许多生僻的古字念不出来。这时，她往往停顿下来，毛泽东催促道："念呀，念下去呀。"芦荻只好如实说。遇上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不料，毛泽东随口说那字该怎么念，并大笑起来。芦荻一边深感自己学识不够，一边非常佩服毛泽东的渊博知识。

芦荻在毛泽东身边四个多月的讲读生活中，曾多次聆听过他畅论历史，收获匪浅。她借整理书籍的机会，阅读了大量经毛泽东批阅圈点的古籍。

展阅毛泽东读过几遍的《二十四史》，芦荻看到书中有些扉页已经磨损。从《史记》到《明史》，繁圈密点，画线加批，比比皆是，颜色有红有蓝，有铅有墨，新迹旧痕，判然可别。可以想见毛泽东从1952年购进该书，到1975年，20多年中，三复四温、爱不释手的情景。

从圈画批注的情形看，毛泽东不仅认真细致地通读了这部4000万言的巨著，而且在每部书第一卷的封面上，都清楚地标写出卷、册的数目和分类，甚至某些传记所在册数和卷数，也都一一标明。例如，在《辽史》的封面上，他除了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目外，还写有下面一段话：

> 《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就加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

从这条按语看，毛泽东不仅在读该书时，一一标出了目录，而且还经过了仔细的核查。

毛泽东读这部书时，前四史的圈画、批语很多，但从目录的标示上，可以看出，他虽然不满意《明史》，认为《明史》芜杂，但读时却极下功夫。因为在封面上，密密麻麻，不仅全录出了《明史》的册和每册中的卷数，而且还列出

了众多传主的姓名。如“60册，列传107，张四维，马自强”、“67册，131—132，东林党传”之类，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下加圈，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下之后画括弧加注。读这样的一部巨著，持如此严谨的态度，在一般的读书人中，并不多见。对于毛泽东这样年老迟暮且又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毛泽东读史喜读人物传记，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不仅反复读传记正文，而且连注文也一一核阅，有时还把注中文字，提写到正文有关的地方。如《后汉书•光武帝本纪》，文中写刘秀“性勤于稼穑”（句下，毛泽东画了圈）。刘秀“避吏新野”（兄伯升宾客杀人，刘秀躲避官府搜捕，避到新野邓晨家中）时，值“南阳荒饥”，“因卖谷于宛”。毛泽东在这里特地把注家李贤转自《东观记》中的“而上田独收”的一句注文，移写过来，用以突出刘秀善于耕田的技术。像这类摘出注文，以突出传主的某一特色的地方，书中并非仅见。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仅认真地读那些所谓“正面”的材料，同时也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在这部史书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的《奸臣传》（秦桧、蔡京），《明史》里的《奸臣传》（胡惟庸、严嵩）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卷、册、姓名，有的还在名字前面画了圈。他说：“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他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项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词。”

毛泽东读史的特点是，不仅“正”“反”不遗，参详互见，而且还阅读了大量的其他史籍，包括历史演义、笔记小说等，以充溢史闻，广驰视野，力求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史实，评论人物。

5月30日晚，毛泽东与芦荻议论《晋书》时，他让芦荻好好读读《南史》和《北史》。他对芦荻说：“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要明白，所谓正史，那是指合乎封建统治者阶级要求的‘正’。所以，书里总是给统治阶级制造迷信，说许多天命、符

瑞之类的骗人的鬼话；所以书里要‘为尊者讳’，并把反抗他们起义的农民群众骂作‘匪’。其实，有些稗官野史由于不是官修的，有时倒会写出点实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读，《资治通鉴》要读，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也要读。”他还说：“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书，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判断和评论，就较少失误，这是辩证法，也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重要条件。”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论断，显然与他对二十四史的精细研究与深入分析分不开的。芦荻在翻阅毛泽东圈画的二十四史中，发现举凡有关农民运动的部分，都有毛泽东辛勤披览和思索的痕迹，圈连线密，旁批眉注，备极细致。甚至连起义军作战的路线，书中也有勾画。在《旧唐书•黄巢传》后，附有毛泽东亲笔画的黄巢行军路线图一张（黄巢与秦宗权合传，在全书之末），可以见出他读《黄巢传》时的用心情况。毛泽东高度肯定农民起义战争的积极作用，说：“陈涉、吴广的功绩甚至连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否认。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汉书•陈胜、项藉传》里也承认，‘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

毛泽东对于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领袖的错处，也总是惋惜地标出或批注，如在《史记》和《汉书》的陈涉传中所写他斩杀故旧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了“可惜”、“不当如是”类的批语。

在研读二十四史时，毛泽东阐明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华民族具有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固的凝聚力和优良传统。毛泽东让芦荻读《晋书》、《南史》、《北史》后来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

毛泽东还说：“《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毛泽东在李延寿写的《序传》中，画了大量的圈和线、注有很多赞赏的标记。他让芦荻读《南史》、《北史》，目的是让芦荻了解：

在南北朝长期分裂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出身士族的知识分子，都是希望统一的。

从读史书中，毛泽东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这是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

毛泽东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诸葛亮传》中，他在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和平定云南后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之处。"

对唐太宗李世民，毛泽东很欣赏，除了推许李世民的文治武功外，还推许他的民族政策好。毛泽东认为唐代的繁荣富强和李世民较好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他说："唐朝的名将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特别谈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婚事，说那时的吐蕃和唐朝政府就是一家人了，松赞干布是个很有远见、很有作为的人物。

毛泽东是精通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能灵活运用辩证法，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他从不给以简单的论断，而是谨慎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具体地加以剖析。比如对于宋代的道学家，他既深刻地指出了道学维护没落的封建统治的反动本质，又没把情况复杂的道学家简单化。他对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虚伪，说他责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而自己却又纳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骂曹操为"汉贼"的正统观念始自朱熹的论著，另一方面又说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并手书了"紫阳纲目"和"道学二朱熹"。毛泽东让芦荻读读朱熹的书，并说："这是很有用处的。"

至于二十四史中随处可见的，充满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警言名句，毛泽东从不放过。他或是加上连圈密点，或是摘录在天头，并铭记于脑。如"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偏听成奸，独任成乱"、"意合则胡越为兄弟，不合则骨肉成雠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借于一人"、"凡战者，以求正合，以奇胜"（引《孙子兵法》）。毛泽东引录之后，又加了解释："正，原则性，奇，灵活性"、"天

地之性人为贵”以及“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等等。通检全书，经毛泽东圈画摘录的这类“至理名言”，不可胜计。在交谈中，芦荻发现毛泽东读史所得常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非常注意一些有成就人物的出处。认为这对于研究人物的成长和作为是颇有关系的。如《后汉书•光武帝记》，他特地在刘秀早年勤于稼穑的记载处，加上密圈。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他特别圈出了卫青为“侯（平阳侯曹寿）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在《公孙弘传》中，圈出了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等文字。毛泽东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这不仅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也囊括了他读二十四史的所见与所得。

在《汉书》上，毛泽东写道：

>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舒服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与？比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

一部巨著《二十四史》，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几次批阅，爱不释手。晚年再读，芦荻陪阅，使她有机会了解到这位伟人的历史情怀。

毛泽东对《鲁迅全集》很有兴趣，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虽说这已属现代文学范畴了，非芦荻所长，他也要芦荻念。芦荻并不熟悉鲁迅的著作，只得赶紧借来成套《鲁迅全集》，钻研起来，以便能够完成侍读任务。

有时候，毛泽东记起鲁迅的一句话，叫她从《鲁迅全集》中查出处，往往使她忙一阵子。比如，毛泽东记得，鲁迅说过，烂苹果只消挖掉烂了的部分，仍然可以吃。他要芦荻查这句话出自鲁迅什么文章，芦荻很费劲，才算查到了原文。

最狼狈的一次，是毛泽东忽地对《土壤学》发生兴趣，要她读。她读得结结巴巴，因为她对自然科学实在很生疏。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加上病中语音含混不清，最初芦荻常常听不明白，需要张玉凤给“翻译”。后来，她带了笔记本，听不明白的地方，毛泽东就

写在纸上。这样，她也就随时记录下毛泽东对古典文学的种种谈话，并夹入毛泽东写的纸条。芦荻的笔记本，如今成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她正在根据笔记本上的记录及毛泽东的手书纸条，写《毛泽东谈六部小说》。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非常熟悉，常跟芦荻谈论这些小说。此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对不同人物，毛泽东都曾谈过这些古典小说。

日渐熟悉之后，有一回，毛泽东跟芦荻谈起南朝作家江淹的《别赋》时，说："江淹《别赋》中'秋露如珠，秋月如挂'，你的书中对'挂'的注释不很准确。"

芦荻一听，大吃一惊。她直到这时，才知道毛泽东曾看过她参加选注的《历代文选》一书。她对毛泽东的读书之博，打心底里佩服。她当即请毛泽东谈下去。毛泽东说了自己对"秋露如珠，秋月如挂"的理解。她觉得毛泽东很有见地，古文修养比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她要好得多。

还有一回，毛泽东谈起了抗美援朝，忽然问及芦荻参加抗美援朝的情况。她从未跟毛泽东谈起自己的经历，毛泽东怎么知道她参加过抗美援朝呢？她这才明白，毛泽东在挑选侍读者时，曾了解过她的简历。

毛泽东的这些话，解除了她思想上的顾虑。她刚进入中南海时，心情是很紧张的。

有一回，毛泽东笑着问芦荻："你平日教学生是怎么教的？难道光是你一个讲，'满堂灌'，你从来不提出问题？你得采用启发式呀！"

芦荻一听，便明白毛泽东在很婉转地批评她。因为她一直是侍读而已，近乎"照本宣科"，从未向毛泽东提过一个问题。

其实，这除了她的拘谨之外，还有毛泽东不知道的原因。她在进中南海之时，北大党委给她规定了几条"禁律"："不问你的时候，不能回答；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

芦荻一直严格遵循这些"禁律"。既然"不该问的不问"，她也就干脆什么都不问——因为她不清楚哪些属于"不该问"的范畴。这样，她在侍读时，一直保持"目不斜视"的姿势，双手捧书，专心致志地念着。

如今，毛泽东要她提问题，当然她不可不提。不过，她仍小心翼翼，仅仅就古典文学范畴，就毛泽东喜欢的话题，提出一些学术性的问题。

后来，芦荻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有一种失落感。她说，跟毛泽东谈古典文学，与其说是她“讲课”，不如说是毛泽东给她“讲课”。毛泽东兼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哲学家、军事家、书法家于一身，谈吐非凡，他的真知灼见，使她获益匪浅。在毛泽东晚年，即便是尼克松、基辛格，见到他也只能谈个把小时。可是，他却把她作为谈话的对手，一夜又一夜长谈，真是千载难得的机会。借着谈话，她了解了领袖的许多内心世界。可惜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芦荻深感遗憾。

“读下去，我在听”

1976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4月22日，毛泽东宽敞的卧室里依然是那样沉静。这天，毛泽东半躺半靠在那张宽大的床上，不知被一本什么书吸引着，他已经一个多小时也不动了。

护士小孟坐在沙发上，正在翻看着当天的报纸，也许是翻动报纸的细微声响惊动了毛泽东，也许是毛泽东感到了疲劳。他在床上转了个身，顺手把书放在了一旁。

正在翻看报纸的小孟，大概是护士职责的习惯，毛泽东这一不大的动作和声响，使她马上觉察。她顺着声音望过去，此时，毛泽东也正望着她，她刚要站起来，毛泽东却向她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让她坐下来，然后，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报上有些什么新闻啊？读一段听听，不过，我可不要听什么大批判的成果，要听新闻。”说来也巧，当时，小孟也正在看一段新闻，毛泽东的这个要求正中她的下怀。

“您要听新闻，这儿正好有一段，我正想做个记号，等您不看书的时候，读给您听听呢。”

“噢，一个想读，一个要听，巧合，巧合，你就读读看。”

“新华社长春1976年4月21日电，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今年3月8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星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10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星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于8日15时01分59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陨星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

读着读着，小孟突然发现毛泽东坐了起来，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好多次读文件、读报纸，毛泽东都是听听而已。一般他总是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也很少改变他或仰或卧的姿势，所以小孟感到给他读的东西多半没有什么大兴趣。

而这一次却不同，毛泽东坐起来听。小孟感到有些奇怪，忙放下手里的报纸，准备去问有什么事，但毛泽东又是用手势制止了她，并说：“读下去，我在听。”

小孟又接着读起来：“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西偏南飞去……最后一块陨石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穿破一点七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7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小孟读完这段消息后，又开始读另一新闻，毛泽东马上说：“小孟，就读到这里吧，不用再往下读了。”

毛泽东边说，边穿上了拖鞋，小孟上前搀扶，他慢慢地向窗前走去。

看来，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思虑，一种不安，一种激动。

毛泽东在屋里走了几步，他让小孟把窗帘打开。站在窗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望了很久很久，望得那样出神。

小孟见毛泽东转过身来，便问道："主席，天上怎么会一下子落下那么多的石头呢？也太巧了，还没伤人。"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回答小孟的提问："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噢，史书有记载的就不少，野史上就更多了。"

看来，今天毛泽东很有兴致，他又问小孟："这方面的记载你见过没有？你们家里的人有什么说法？"

小孟摇摇头，她也只能摇摇头，因为她对此确实了解得太少："这方面的记载我没有看见过，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在我们家乡的一个村边上，一天夜里，突然掉下了一块大石头，有磨盘那么大。后来，这块石头，又被风刮走了。咳，都是瞎说，我才不信呢。"

"噢，你妈妈讲过这样的事，你还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您能相信？"

"我相信噢，中国有一派学说，叫作天地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毛泽东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毛泽东说这些话时，多少带点感慨、激动。他压抑自己的激动，转而又用平静的语调说："不过，要是谁死都掉石头，地球恐怕早就沉得转不动了……"

毛泽东又在屋里走了几步，然后坐在沙发上，他问小孟："我说的这些，你信不信呢？"

小孟看了毛泽东一眼，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还是不信，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

小孟说完之后，似乎又觉得没有把握，她也很想听听毛泽东的看法。于是，她又好奇地反问："大人物要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

话呢？”

像是在回答，又像是一种提问。

这场陨石雨的消息，后来确实在民间引起一些议论：“这场陨石雨，可是百年不遇，听说落下了三块大石头，这三块大石头，就是说中国必有三个大人物要归天了。”“可不是嘛，三个领袖，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都在1976年逝世。”“那块最大的陨石，1700多公斤，就是象征着毛主席……”

1976年4月22日下午，毛泽东听到陨石雨的消息后，不止一次地站到窗前，望着渐渐昏暗下去的天空，仿佛那神秘的天空中，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能读得懂的天书。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这次会见，使孟锦云和张玉凤大为紧张。本来，因看到毛泽东的精神尚可，才同他讲了李光耀要不要接见的事，他当即答应接见，这已不是常规的接见规矩了。

那天上午，毛泽东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又刮了脸。在接见外宾前一个小时，小孟从毛泽东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中山装。

“主席，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小孟说。

“就穿这个，不穿这个穿哪个哟!”毛泽东点点头回答着。

小孟帮他脱下睡衣，换上中山装。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看，抻抻拽拽把衣服拉得平平整整。

看看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的样子，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鲜了，头发整齐，服装笔挺，显得精神多了。

平日的毛泽东，多数时间穿着细白布睡衣躺在床上，头发不理，也不修边幅，简直使小孟感觉不到他就是亿万民众瞩目的领袖。

“您现在才像个主席了，平时，您哪儿像主席呀。”小孟开玩笑地说。

“他就是扮成个主席呀，一扮就像，别人谁也扮不像。”张玉凤刚刚从外边走进来，也打趣地说。

“我去接见外宾，就像出台演戏，就是当演员，演员登台，哪有不化妆的!”毛泽东也开着玩笑。

时间到了，小张、小孟一边一个，搀扶着毛泽东，走到接见大厅。毛泽东刚刚坐下来一两分钟，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小张、小孟把毛泽东扶起来以后赶紧退去，隐在屏风后面，为的是不让录像里留下工作人员搀扶的镜头。当毛泽东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时，他扑通一声就坐下了。当时小张、小孟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她们不约而同地小声“呀”了一声。接见只有一两分钟，寒暄几句，便匆匆结束。

小孟、小张深知毛泽东的病情，他经常两腿发软，无法站立。这次突然坐下，是他实在无力支撑的结果。早知这样，就不该让他接见外宾了。

有一次，毛泽东接见外宾时，为了不让外界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不得不把鼻饲管和氧气管拔掉。其实，他早就需要靠插这种管子来维持生命了。

毛泽东自己也同意把管子拔掉，尽管这会很不舒服，会因缺氧而发闷，但他也不愿用带着插管的形象去见外宾，去公诸于众。

这次接见外宾时，等外宾进来的前两分钟才把插管拔掉，他的嘴唇立刻有些发紫，小孟问他：“您感觉闷吧？”

“有点闷，还可以。”

外宾来了。小张和小孟本来是一左一右地搀扶着毛泽东，小张在左边，小孟在右边。外宾一出现，当摄像机对准毛泽东和外宾的时候，按照惯例，小张和小孟赶紧撤走，躲到屏风后面，但这次，小张把右边的手抽走了，当小孟把左边的手也要抽走时，她感觉毛泽东用胳膊夹着她的手，意思是不要抽走，这样，毛泽东用右手和外宾握了手，而左手还是扶着小孟。

新华社很快送来了照片和新闻纪录片，小孟看到自己也在画面上出现，觉得不合适，她知道自己是护士，不宜在这种场合露面。因而再接见外宾时，她与小张换了个位置，她在右，小张在左。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这次接见，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这时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让人看出他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需一次又一次地取纸块擦拭。

封锁极为严密的关于毛泽东健康状况的信息，已经不得不披露于世。人

们从电视中看到了无法掩盖的真情。毛泽东接见布托，成为他在外交场合公开接见外宾的最后一次了。

1976年6月中旬的一天，孟锦云请假回家，去看看好久未见面的丈夫。下午5点多钟才到家，两人情深意切，正想谈谈心里话。7点15分，突然接到通知，让小孟迅速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毛泽东的卧室，才知道他犯了心肌梗塞病，病情十分危险。这时，毛泽东的脸色灰黄，嘴唇呈青紫色，呼吸短促。他的几位保健医生都来了，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张。经过20几分钟的抢救之后，毛泽东脱离了危险。

毛泽东平静地躺在那里，不一会儿，又睁开了眼睛。

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委员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旁。看到他睁开了眼睛，他们一个个上前探望。

张春桥从他面前走过了，姚文元从他面前走过了，王洪文也从他面前走过了，华国锋、李先念、吴桂贤、倪志福、许世友，一个又一个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从他面前走过了。毛泽东只是似看非看地望着他们，他好像是无动于衷。是他未从病态中缓解过来，还是不想去思考眼前的事情，人们不得而知。

当叶剑英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却抬起了那只显得又沉又重的胳膊，他的手颤颤地摆动了几下，嘴角微微地动了一下，细微得让人难以发现。

还是小张看出了毛泽东所表达的意思，她毕竟太熟悉毛泽东的一切了。毛泽东这些动作表示着他想与叶帅谈话，小张的分析判断是对的。

小张走到已过去的叶帅身旁说："叶帅，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您去问问看。"

叶帅点点头，又走到毛泽东的身边，他这次离毛泽东很近很近，俯下身来，低下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的眼睛突然显得明亮起来，他那本是黯然无光的眼睛，很久没有这样的光芒了。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毛泽东的心里一定是涌动着什么，但他的嘴已是力不从心了。只见他嘴唇在张翕着，很难听清楚他说什么。叶帅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想对叶帅讲些什么？是向他表示永久的别离，还是有什么事情想

告诉他？毛泽东曾对叶帅做过评价：“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在这个时候或许会意识到，中国又将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真是那样，谁将出此重任。这时，叶帅虽然能拉住毛泽东的手，却无论如何也挽留不住毛泽东的生命。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病情加重，他召见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谈话。毛泽东说：“人生70古来稀，我80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海岛上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朵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时，人们想起了一年前他曾给周总理写的词句：“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出与东流！”

1976年，似乎是中国人特别艰难的年月。

这一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整个中国在寒风和哀乐中震颤。隔了两个月，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之后，因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地震。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顷刻之间被夷为平地。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空地都搭起了防震棚。病中的毛泽东也被搬到中南海另一个别墅式的小庭院。他的房前也搭起了一个更为牢固的防震棚。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张宽大的木制床上。他那均匀的呼吸，安详的脸庞，那微微张启的双唇，使值班护士小孟感到毛泽东今天睡眠不错，她放心了。

自从7月中旬以来，毛泽东的睡眠总是不好。本来，多少年了，包括那些远逝的战争年代，毛泽东的睡眠就是个大问题。国事、世事、天下事，搅得他常常彻夜不眠，他苦苦地思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在屋里来回踱步，就这样，送走了一个个黑夜，迎来了一个个黎明。

进入80高龄的毛泽东，入睡更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小孟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以后，也常常为他的睡眠而发愁。使他能睡好觉，这成了小孟的一个重要的护理任务。如果他睡不好觉，必然要有一系列连锁反应，脾气烦躁，饮食不好，心肺病、脑科病加重。自小孟进中南海以来，在她的记忆中，毛泽东每天都要服安眠药。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秘书、小孟，再加上毛泽东，三个人每天都服一种药，有时毛泽东看小孟吃药，便说："怎么，服安眠药，看来，真是近朱者赤噢，受了我的传染。"

小孟边吞药，边说："可不是，现在吃安眠药都上了瘾，不吃简直睡不了觉。"

当然，秘书和小孟服药的目的是抓紧时间休息，每次一共四小时的睡觉时间，若不马上入睡，就很难保证一定的睡眠时间了。

毛泽东服安眠药已有多年的历史，甚至对这种药已产生了抗药性，有时不得不超剂量地服用，方能生效。为此小孟对他说："主席，您天天吃安眠药，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听说，总服这种药对身体不好呢。"

"孟夫子说得对，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只能用这种办法噢。任何东西都有正、副作用，只要正作用大，那就可以取之。"

今天，看到毛泽东还未醒，小孟心里很高兴，不知不觉，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小孟觉得有人用力摇她的椅子，她被惊醒了，马上站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耳边传来了玻璃震动的哗啦哗啦的响声，她发现房间的窗帘还在抖动。来到卧室，她往毛泽东的床上一望，看见他依旧躺在那里，很踏实，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只不过，已经睁开了眼睛，神态像是在想什么。

当小孟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护士小李、小俞已急忙跑进来。只听小俞慌里慌张地说："小孟，地震了，大厅里的窗户震得好响，主席怎么样？没事吧？"

"没事。"小孟回答。

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小孟她们几个人，从毛泽东床边的小柜里拿出一条床单，几个人一人抻一个角，撑在毛泽东床上面，为的是怕天花板上掉下什么

东西砸着他。她们一声不响地抻住，几分钟过去了，毛泽东又睁开了眼睛，翻了翻身，他好像忽然发现了自己头上面的那条床单，那条白色的细棉布床单在他头顶上面抻着，他略微转动头，向上面，向左右看看，有些奇怪，他微微一笑，然后说："怎么，抻条单子做什么？"

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便马上回答："主席，刚才发生了强烈地震，小李她们吓得不得了，赶快跑来，保护您呢。"

毛泽东听了，似乎觉得十分好笑，又很好玩，他不慌不忙地说："地震了，我怎么不觉得？噢，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

小孟说："我们都紧张坏了，您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俞说："主席，这次地震可厉害得很，比邢台那次感觉明显多了。"

"您什么都不怕，我们可害怕呢，可能还要有余震呢。"小李也补充一句。

"怕也好，不怕也好，我看你们抻着单子倒没必要，房子塌下来，一条单子能顶住？"

毛泽东做了个落下来的手势，他用力向下挥了两下。几个工作人员，才把单子放下来，叠好放在一边，她们也觉得对自己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

大约4点50分，张耀祠来到了毛泽东的会客厅。他通知秘书和小孟：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根据预测，近期很可能还会有余震。主席目前住的房子不太牢固，需要他马上搬家，搬到新建的202房间去，那所房子安全些。

毛泽东现住的房子，被称为游泳池。游泳池的住所是60年代用毛泽东的游泳池改建的，房子的四面都有宽大的玻璃窗，毛泽东卧室里的窗户位置很高，平时会用白色帷幔挡住。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和一些熟悉毛泽东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游泳池"是毛泽东住所的代称。这所房子，他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据测不甚牢固，所以又给他盖了202新房。早在地震之前就几次劝他搬家，但他始终不肯。

小孟根据张耀祠的意见，对毛泽东说："主席，汪东兴、张耀祠都来过了，他们讲了这次地震的情况，还讲您现在住的这所房子不太结实，可能还要

有余震，希望您赶快搬家。”

毛泽东听了这话之后，对搬家的事没有表态，只是紧接着问：“这次地震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简报？”

小孟听到毛泽东询问有关地震的情况，她便赶紧把刚刚送来没多久的一份简报清样拿来给他读：“我国河北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了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在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毛泽东听了之后，显出一种少有的焦虑。但他依然没有说什么，毛泽东常常这样，当得知某个消息，发生了一件常人认为的大事时，却不急于表示什么，这是他的特点。这次听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他把眼睛微闭，把眉头紧锁，接着又长叹了一口气，过了好一会儿，才心情沉重地慢慢说：“告诉汪东兴，通知赶紧救灾。”

“刚才汪东兴来时说过了，救灾的队伍已派去了，让我告诉您，让您放心。”

“随时把救灾的简报给我。”毛泽东进一步吩咐。

“这些您都放心，只是让您搬家的事儿，您到底同意不同意啊？”

毛泽东又是既没点头，又没摇头，似乎根本没有听见这句话。他只是沉思地望着什么，一言不发。仍沉溺在对灾情的忧虑中。小孟看见沉思中的毛泽东，也不便说什么了，不然又会引起他不高兴，她只得悄悄地坐在那儿。

28日下午，工作人员走到毛泽东身边，俯下身轻声说：“主席，华国锋来汇报有关地震的情况。”

毛泽东侧了一下身子，双眼望着门口说：“噢，快请他进来！”

“主席，这次地震，震中在唐山，北京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波及，人员伤亡及损失等情况我们已派人去调查，请您安心养病，不要牵挂，保重自己。”华国锋在床前坐下后轻声说。

毛泽东点了点头，一字一句缓慢地说：“我在病中，这些事就要委托你去办啦。”说着，他握住了华国锋的手，充满了期望的双眼久久地凝视着他。两

天后，中央将地震情况了解清楚后，写了一份报告给毛泽东，当时他病情已经恶化，连说话都很困难了，工作人员要将报告读给他听，他示意不要，接过报告坚持着看完。当看到关于唐山地震中的人员伤亡、房屋损坏等情况时，他的心缩紧了，拿报告的手颤抖着，眼睛里噙着泪，他喃喃地低语并示意：让华国锋代我去看望去慰问灾区的人民，一定要安置好灾区的人民，一定要安置好灾区人民的生活，一定要安置好人民的生活！……这份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告是这位伟人生前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31日，毛泽东依旧不提搬家的事儿，汪东兴、张耀祠十分着急，他们交代给秘书和小孟。找机会劝说，但他们又都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这天上午，毛泽东刚刚吃过了早饭，小孟忽然想起一个主意，便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您住的这房子，太老了，不结实，预测还要有比唐山还大的地震，您老不同意搬家，您不害怕，我们还怕呢，您也不替我们想想？"

小孟故意用这样的话去激毛泽东，没想到这办法还真灵验，毛泽东听了这话，没有摇头，也没有摆手，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们怕，那就搬吧。"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第三天，他带着忧虑的心情搬进了202新房。

从8月底开始，毛泽东曾多次昏迷，多次抢救。9月8日晚7时，孟锦云来值班，几天来，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委员们，一直轮流值班，医务人员一直在毛泽东身边观察他的病情变化。量血压、测脉搏、导尿、听心脏、输氧气……医务人员不停地紧张忙碌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还是要书看。在弥留之际，他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他的手已抖得托不住那本很轻的书。只好让护士为他托住，毛泽东看了几分钟，就昏迷过去了。

7点10分时，毛泽东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小孟连忙过来，低头给毛泽东按摩胸部。这时他用很低的声音对小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过了几分钟，他的呼吸开始平稳，但一直处于深度昏迷之中，医生奋力抢救四个多小时，这位伟人再也没有醒过来。工作人员后悔事先没有想到应当给老人家做套新衣服，仅把老人家

生前穿过的旧衣服用酒精擦洗了一下，给他换了件白衬衣。临终时衣兜里只装了两样东西：烟和手绢。

十几分钟之后，医生们退去了，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退去了，家属们也退去了。

汪东兴、张耀祠告诉小孟、小张，留下来把毛泽东的遗物整理一下。

委员们、家属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拿起床头小桌子上的那几份文件。那几份毛泽东最后批阅的文件，放在文件袋里。她又拿起那本依旧打开的“三木”的书，轻轻地把它合上了。

小孟把主席最后换下来的内衣、内裤，叠得平平整整，放在床头的小柜子里。

在毛泽东床头的书桌上，她发现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不由得翻了几下，忽然发现里面有一封信，一封没有装在信封里的书信。这是李敏写给毛泽东的信。

爸爸：

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我已经都读完了，什么时候，我想和您谈谈读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您画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问问。

祝

愉快

您的女儿李敏

1975年4月15日

小孟把这封女儿李敏写给父亲的信又夹在书里，放回了书柜。

她们做了些简单的整理，就不知还要整理什么了。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空阔，这样的寒冷。一向是23度的恒温已降至了零度，从空调机里送来的快速风吹动着宽大卧室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回去休息了，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身裹棉军大衣，却还感到那样的冷，她呆呆地望着静卧在那张宽

大木制床上的毛泽东。他今天静卧的姿势不同以往，他不再是左侧、右侧躺着。他仰卧平躺，显得那么安宁，只是嘴巴略略张开。小孟用手轻轻地托了一下他的下巴，就合上了他的双唇。他那灰黄色的脸上，还挂着一丝安详的微笑，死神奇迹般地还给了那副安详的脸庞。毛泽东的身躯用粉红色带梅花的毛巾盖至胸前。

是什么疾病夺走了毛泽东的生命？是心脏病？是肺气肿？是综合征？尽管他那么相信他会死，但他又曾那么留恋着这不寻常的人生。

要看关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消息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然而，就在去世的前一天，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坚持要看书学习。据当时的《护理记录》记载：毛泽东在9月8日看书、看文件共11次，时间累计2小时50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书、看文件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阅读的。

毛泽东在去世的前一天，究竟看了哪些文件和书？他的卫士周福明的回忆特别引人注意：9月8日，毛泽东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闻讯赶到，毛泽东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周福明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毛泽东艰难地握着铅笔，在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画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工作人员立刻反应到毛泽东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

“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周福明轻声地问。毛泽东默默地点点头。

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工作人员马上为毛泽东找来当天的《参考资料》，供他了解有关三木的情况。

病危的毛泽东，为什么还在记挂着三木？日本最近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为什么如此关注日本？

年初，据日本报纸披露：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在向日本推销“三星”客机时，向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贿赂六亿日元。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与此案有牵连。

这个消息一公布，引起了日本各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也激起了自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加剧。特别是7月份逮捕田中后，引起了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田中派的强烈不满，反三木的呼声日渐高涨，三木政权十分不稳，自民党也面临分裂的危险。在这种情势下，三木武夫不得不同意改组内阁，并将在近期内召开自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举行大选。

日本发生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田中被捕，日本政局又动荡不定，中日关系的前景将会怎样？特别是对世界反霸统一战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毛泽东在去世的前一天，身上插满了多种治疗的管子，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他的头脑并没有停止活动，依然通过看书、看资料，在观察世界形势的变化，在思考着。往日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四年前，为了中日建交，田中曾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破冰之旅”。毛泽东向田中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的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搞什么鬼啊！”田中说，美国支持日中改善关系，希望通过日中友好促进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毛泽东说：“他们今年2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双方都对这次能很快解决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表示满意。最后，毛泽东指着桌子上一套《楚辞集注》说，这是我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田中接过书，连连表示感谢。

毛泽东赠送《楚辞集注》一事，引起了日本新闻界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发表评论和猜测。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认为毛泽东把《楚辞集注》作

为礼物送给田中首相，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挑选中国古代的爱国诗人屈原和他的诗集来赞扬田中首相的爱国精神，用以告诉日本人民，田中首相正在完成的任务，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二是表示知道田中首相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对田中首相来华期间赋汉诗一事给予评价；三是表示赞赏田中首相来华之前对访日的美国总统国家事务助理基辛格问田中为什么要急于访华时，田中明确回答说："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久远得多。"

其实，他们猜得都不对。

毛泽东确实喜欢屈原，喜欢《楚辞》，并且有着很高的评价。但是，作为国际战略家的毛泽东，此时的注意力恐怕还是屈原"联齐抗秦"的外交战略。当时，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最强大，楚国的安全不时受到威胁。屈原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为了楚国的安全，他提出"联齐抗秦"的战略，以抵御来自北方秦国的军事威胁。这一层含意才是毛泽东赠送《楚辞集注》的真正意图。其实，早在田中访华前的一个月，周恩来就在一次讲话中把毛泽东的这个意图说得很清楚。他说，今天东方斗争的中心，亚洲斗争的中心，还是苏联。"我们在东边的战略部署还是要抓中日建交，这是大事。"我们要争取中日建交，但不能要日本反美，日本可以得罪蒋介石，但不能得罪美国。"我们应该推动日本对苏联硬一点。"

不久，毛泽东在同基辛格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接地提出了在全球建立一个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他希望美国跟欧洲、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

1974年1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毛泽东同他面谈了国际形势和全球战略问题，并且告诉他："日本的方针，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中国，中国帮不了日本多少忙。"这样使日本更了解我国的外交政策，有利于争取日本联合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认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

毛泽东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读有关三木的书报，说明了他已经把读书学

习，看作成生命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读《容斋随笔》

《容斋随笔》是毛泽东生前长期珍藏爱读的一部古籍，也是他老人家临终前13天还提出要读的最后一部书。

这部书的作者洪迈（公元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别号野处，文敏是他的谥号。宋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洪皓，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1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奉命出使金国，被扣留长达15年之久，饱尝人间辛酸，坚强不屈，后遇金国大败，才得以南归。之后，因斥责秦桧与金勾结的行径，被贬斥。著有《鄱阳集》、《松漠纪闻》等。他的两个哥哥，都在高宗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考中博学鸿词科进士，是朝廷命官，又是知名学者。长兄洪适，官至尚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著有《盘洲集》、《录释》等。次兄洪遵，曾为秘书省正字，历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官至枢密副使、资政殿学士，喜收藏历代钱币，著有《翰苑群书》等。

洪迈是洪皓最小的儿子。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受正统教育，有方便的学习条件和博览群书的机会。再加上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每日读书数千言，过目不忘，所以，在他青年时代，就“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旁行，靡不涉猎”，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知识结构。23岁那年，即绍兴十五年，考中博学鸿词科进士，捋入仕途。历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人为敕令所删定官。后因其父洪皓遭贬而被降调为福州教授，召入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复出知赣州（今江西赣州）、婺州（今浙江金华），再召入史馆，参与《四朝国史》的修撰，终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在家从事著述。

洪迈一生，勤于治学，思路开阔，志趣广泛，著述甚富。辑有《万首唐人绝句》、《史记法语》、《经子法语》；著有《夷坚志》、《野处类稿》、《容斋随笔》、《容斋诗话》、《容斋四六丛谈》、《糖霜谱》、《俗考》等。所谓《容斋随笔》便是他的笔记荟萃。

《容斋随笔》全书50余万言，不是一次编定的。据他本人自述，“随笔”汇集了他18年的读书心得，于淳熙七年编次成书。

《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撰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学艺术以及宋代掌故、人物评价等方面内容的笔记，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五集。实际上就是一部读书随笔的汇集。它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笔记性体裁的书籍之一。

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已经是重病在身，每天24小时差不多都是躺在床上（此时他已经不能下床行走了），吃饭也要靠别人一勺一勺地喂。这时候，身边工作人员都为毛泽东的病情焦虑，盼望他的身体能康复、转好。可是毛泽东自己呢，明知马克思已经向他发出了邀请。可还要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看书。这天晚上9点45分，秘书张玉凤告诉忻中，说首长要看《容斋随笔》，你赶快找一部大字的送到游泳池（中南海毛泽东当时的住地），忻中急忙跑到毛泽东书库（即中南海增福堂，因毛泽东个人藏书比较多，为便于保管和使用，经当时的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准，特将增福堂命名为“毛主席书库”），毛泽东个人的大部分图书包括报纸和杂志等都集中存放在这里。因为全部图书、报纸和杂志，都是刚从别的地方搬到这里的，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和编排顺序。他以前看过多次的那部大字线装书，《容斋随笔》一时找不出来。于是，忻中就立即与北京图书馆联系，请工作人员帮助速找一部大字线装《容斋随笔》。

大约过了35分钟，北京图书馆的同志告诉忻中，书已从柏林寺书库找到了。柏林寺书库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附近孔庙的东侧，距中南海大约八公里。从柏林寺书库取回《容斋随笔》后，忻中按照惯例，迅速地翻检了一遍，这是工作人员当时的工作制度，凡是从外单位借来的图书，送给毛泽东之前都要认真仔细地检查一遍，主要是看看里面有没有夹带什么易燃易爆、容

易伤害人身的危险品及信件、字条等，一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二是为了防止将不送毛泽东的信件、字条及其东西夹带送给毛泽东，增加对毛泽东不必要的干扰，以致分散老人家的精力和时间。检查完毕，忻中急忙将该书送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

这一次毛泽东要看的《容斋随笔》，负责登记的“一办”是这样记录的：“8月26日晚9时45分《容斋随笔》（宋）洪迈撰明刻本，两函14册借北京图书馆”。

这一次的登记不同于往常，往常的登记后面还有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的延续，后面的一行延续了前一行、后一页延续了前一页，那么这前一行、前一页往往也就显得那么平常，从而引不起人们对它的格外注意。这一次的登记是一组用书的最后一次登记，后面永远不会再有空页了。它是毛泽东结束读书生活的一个历史佐证。

《容斋随笔》这部书，毛泽东生前读过多次。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的《容斋随笔》是扫叶山房藏版、乾隆甲寅重刊的线装本，分上、下两函，共14册。当时，延安的读书条件，同大革命时期、长征途中相比虽然好了一些，但能得到的书籍还是为数很少的，远远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求。那时候，毛泽东多次托人从解放区、从上海等地替他买书，也常到当地的有关图书室（馆）去借书。他读过的这部《容斋随笔》就是从当时的“马克思列宁研究院图书室”借来的。这部《容斋随笔》他读过之后还曾转借给其他同志读过。毛泽东1944年7月28日给谢觉哉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容斋随笔》的事。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觉哉同志：

《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容斋随笔》这部书，毛泽东很为珍爱。在那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不少的用品和书籍都遗弃或丢失了，可是这部书连同他读过的马列著作、哲学书

籍、鲁迅全集等书刊一直带在身边。转移、行军到哪里，他就把书带到哪里。从延安东渡黄河带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到北京城，带到中南海。1949年5月到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居住之后，两函《容斋随笔》连同其他有关书籍一起就放在他卧室里的书柜上。现在，这部书还珍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书中不少地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圈、点过或者画上了杠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外地开会或视察工作，还常在工作间隙读《容斋随笔》。1959年10月23日，外出之前他自己除指名要带上马列著作、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多种有关书籍外，还嘱咐带上《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自宋以来的多种笔记小说。60年代，毛泽东先后两次要过《容斋随笔》，一次是1966年11月，这一次他让把他以前看过的那部《容斋随笔》两函14册全送上。一次是1967年9月23日，这一次要的不是全书，只要《五笔》两册。到了70年代，毛泽东还几次看过《容斋随笔》。

就在这次要书后不久，毛泽东的病情恶化，9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生酷爱的读书生活至此也就结束了。从北京图书馆柏林寺书库借来的这部《容斋随笔》，就成了毛泽东要看的最后一部书，也成了结束他读书生活的一个标志。9月16日，即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个星期，忻中就将这部《容斋随笔》退还给北京图书馆了。借阅本书的主人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读过的这部书北京图书馆的同志还一直珍藏着，永远珍藏着。

主要参考书目

1. 权延赤:《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2. 李银桥著、权延赤执笔:《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3. 权延赤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4. 权延赤著:《领袖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5. 权延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1957—1959中苏关系纪实》,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 陈登才:《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9. 贾思摘编:《1915—1976——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10.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毛泽东生活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

11. 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12.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13.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14. 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5. 曹志为:《伟人之初丛书——毛泽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 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17. 高菊村、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18.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20.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21. 刘学琦主编:《毛泽东风范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

22. 彬子编:《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3. 石玉山:《毛泽东怎样读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24. 王永盛、张伟主编:《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5. 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6. 海鲁德等编著:《生活中的毛泽东》,华龄出版社1989年版。

27. 靳建国:《中外名人故事丛书——毛泽东》,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年版。

28. 东方骥编:《落日余晖——毛泽东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9. 文热心:《毛泽东与故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0.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

31. 王澍:《毛泽东和他的卫士》,《中国老年报》1989年11月。

32. 郭金荣:《读破了的一部"资治通鉴"——毛泽东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中国老年报》1989年10月。

33. 《一个护士眼中的晚年毛泽东》,《国际人才交流》1992年4、5月合刊。

3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35. 《难忘的回忆——怀念毛泽东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编1985年版。

36. 邱峰:《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访毛主席的秘书林克》,中国老年报1989年11月。

37. 陈晋著:《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

38. 谢柳青编著:《毛泽东的亲情·乡情·友情》,辽宁大学出版社。

39. 南山:《毛泽东学英语》,《大地》1994年第11期。

40. 刘汉民:《毛泽东与杜甫作品》、《毛泽东与陆游作品》、《毛泽东与范仲淹作品》,《党史文汇》1998年第6、8、12期。

41. 斯夫:《毛泽东特批出版(柳文指要)》,《党史博览》2003年第8期。

42. 叶永烈:《北大女才子为毛泽东侍读诗文》,《文苑》总135期。
43. 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建文汇》1992年1—10期。
44. 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45. 陈东林:《毛泽东晚年的诗情与政见》,《传记文学》总第47期。
46. 葛剑雄著:《谭其骧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7. 马为:《张玉凤与毛泽东藏书》,《辽沈晚报》1993年8月26日。
4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毛泽东的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
49. 顾保孜:《红墙里的瞬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50. 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西文艺出版社。
51. 谭一著:《毛泽东新闻活动》,当代中国出版社。
52. 郭金荣:《伟人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新创作》1993年第1期。
53. 黄允升主编:《开国领袖毛泽东逸事》,中央文献出版社。
54. 张贻玖著:《毛泽东读史》,友谊出版公司。
55. 佳丰:《在人生逆境中》,《大地》1994年第7期。
56. 孙琴安:《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文艺报》;《凤凰从火中再生——纪念唐山抗震20周年》,《毛泽东生前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57. 董志英:《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58. 武象迁、韩雪景:《跟随毛泽东纪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9. 苏扬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60. 尹高潮编著:《毛泽东的老师们》,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毛泽东的读书人生
作者=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编著
页数=433
SS号=13441704
DX号=
出版日期=2014.01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